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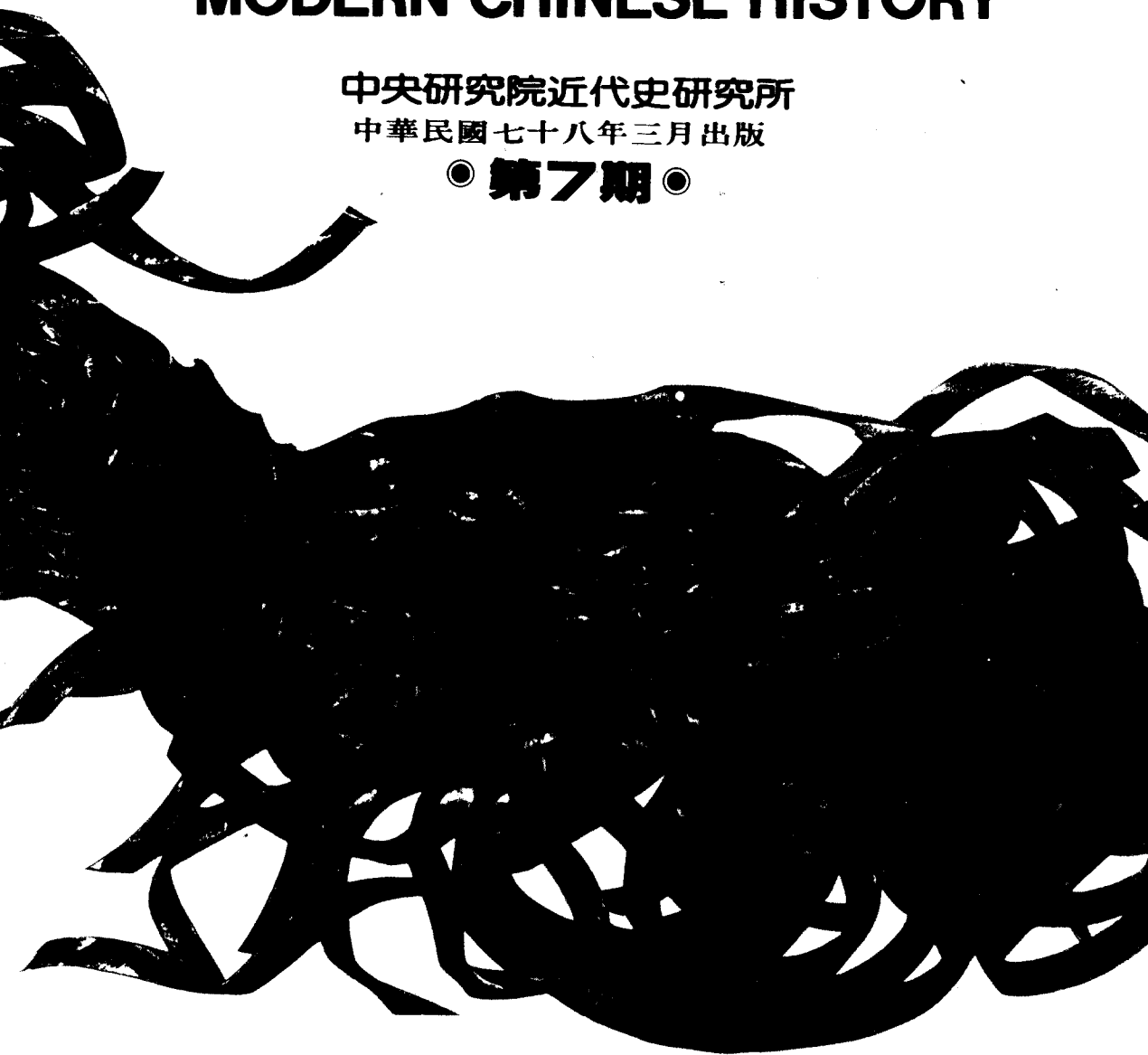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出版

◎ 第7期 ◎





「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於七十八年元月五日至七日舉行，
上圖左起為出席學者侯繼明、王樹槐、張玉法。



Knight Biggerstaff教授為美國漢學界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先驅。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	陳慈玉	3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張炎憲	10
	第一屆國際近代日本華僑臺灣史研究會.....	張炎憲	11
	臺灣大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黃富三	13
	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國際學術討論會.....	譚汝謙	15
	亞洲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		21
會議消息.....			9
學術演講	再談「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認識」.....	何丙郁	25
	一九二七年的中德關係.....	郭恆鈺	35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一覽.....		142
學人簡介	Knight Biggerstaff, 1906—.....	Jessie G. Lutz	53
	傅衣凌.....	楊國楨	61
	石川忠雄.....	林明德	63
	坂野正高.....	林明德	75
研究概況	從中國海關研究首次國際研討會看大陸的海關研究.....	張存武	82
	香港學界消息.....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資料部	87
史料介紹	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概述.....	程玉鳳	91
	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所藏保皇會、中國民主憲政黨、 中國民主社會黨史料.....	余慧子	97
	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特藏之臺灣資料.....	吳文星	110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簡介.....		116
新書評介	耿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簡介.....	李又寧	133
	評介郭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李雲漢	143
	張憲文著：中國現代史史料學.....	劉維開	151
	馮爾康等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	陳秋坤	157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薛化元	159
	John King Fairbank, <i>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i>	朱滋源	162
	王綱領著：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	胡國台	165
	劉維開著：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	蘇啟明	168
	胡平生著：民國時期的寧夏省(1929-1949).....	張力	170

研究部

17

Steven L: Levine, <i>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i>	陳永發	172
向山寬夫著：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許雪姬		177
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1845年-1987年	李培德	181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88-1989)	184
	國內東亞、大陸問題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70-1987)	賴瑞貞輯 185
大事紀要	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三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89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199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玉法
 編輯委員 張玉法 王 萍 林明德 蘇雲峯 陳存恭
 陳永發 楊翠華
 執行編輯 林明德
 助理編輯 賴惠敏 張 力 李宇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七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240 元 美金 9.5 元



學術會議

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

陳 慈 玉*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曾於民國六十六年夏天召開第一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討論人口成長與結構變化、土地與農業、商業、貨幣金融、國家財政等主題，內容非常廣泛，涵蓋了明清時期以來的各項重要問題。十一年半之後，該所在78年元月五日至七日舉辦了第二次會議，凝聚焦點於「市場」上，故所提出的論文主題是有關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質與運作，包括了商業、土地市場、穀價、商品市場、信用市場、工業結構、資本利用等方面。和第一次會議一樣，此次會議邀集了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讓屬於這兩個不同分野的專家學者能夠有機會濟濟一堂，利用短短的三天時間交換心得和研究方法，這是此次會議的一大特色。

會議議程如下：

主題演講：劉廣京，“Statecraft and the Rise of Enterprise: The Late Ch'ing Perspective”

第一場主題：Trad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主席：蔣碩傑

1. 全漢昇，“The Import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評論人：王業鍵）
2. 費景漢，“The Chinese Market System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評論人：Ramon H. Myers）
3. Thomas G.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efore World War II”（評論人：趙岡）

第二場主題：Commercialization and Regional Market

主席：施建生

1. 徐泓，「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評論人：林麗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評論人：陳慈玉）
3. 張玉法，「近代山東的交通發展（1878-1937）」（評論人：楊重信）

第三場主題：Commercial Institutions

主席：劉克智

1. Evelyn S. Rawski,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評論人：Sherman Cochran)
2. 陳富美 (Fu-mei Chen)、Ramon H. Myers,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評論人：William T. Rowe)
3.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Business Company, Patronage versus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評論人：Marie-Claire Bergère)

第四場主題：Land Market, Farm Wages and Grain Prices

主席：孫震

1. Michel Cart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and Market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評論人：David Faure)
2. 趙岡, "The Trend of Real Wages of Farm Worker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評論人：毛育剛)
3. 王業鍵,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for the Ch'ing Period" (評論人：Thomas G. Rawski)
4. 李明珠 (Lillian M. Li), "Using Grain Prices to Measure Food Crises: Chihli Province during the Mid-Ch'ing Period" (評論人：傅祖壇)
5. 李中清 (James Lee), "Pric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in Rural Fengtian 1772-1873" (評論人：蔡青龍)

第五場主題：Commodity Markets

主席：華嚴

1. 劉翠溶, 「明清時代鹽市場的不完全競爭」(評論人：陳錦江)
2. 陳富美、Ramon H. Myer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mmodity Marke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ree Case Studies" (評論人：Michel Cartier)
3. 范毅軍, "The Rice Trade of Modern China—A Case Study of Anhwei and Its Entrepot the Wuhu Rice Market 1877-1937" (評論人：王業鍵)
4. 陳國棟, "Transaction Practices in China's Export Tea Trade, 1760-1833" (評論人：李明珠)
5. William T. Rowe, "Tung Oil in Central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gional Export Staple" (評論人：蘇雲峯)

6. Sherman Cochran, "Japan's Capture of China's Market for Imported Cotton Textiles Before World War I: The Role of Mitsui Trading Company" (評論人: Evelyn S. Rawski)

第六場主題: Credit Market and Monetary System

主席: 費景漢

1. 張彬村, 「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的長程貿易與信用市場」(評論人: 陳師孟)
2. 何漢威, 「清末省區之間的銅元流通與貨幣套利」(評論人: 陳昭南)
3. 林向愷、吳聰敏, "Taiwan's Big Inflation: 1946-49" (評論人: 許嘉棟)

第七場主題: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主席: 劉廣京

1. 陳錦江 (Wellington K. K. Chan), "Sources of Capital for Moder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Late Ch'ing" (評論人: 王樹槐)
2. Tim Wright, "Industrial Labour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1930s World Depression: A Preliminary Study" (評論人: 張清溪)
3. Marie-Claire Bergèr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Nationalist to Communist Regime (1948-1952)" (評論人: 侯繼明)

第八場主題: Utilization of Capital

主席: 張玉法

1. 張朋園, 「落後地區的資本形成——雲貴的協餉與鴉片」(評論人: 李國祁)
2. 侯繼明,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評論人: 薛由琦)

綜合討論

主席: 全漢昇

引言人: 費景漢、劉廣京、王業鍵、Ramon H. Myers、Thomas G. Rawski

在主題演講中, 劉廣京院士提出了魏源的經世思想, 包括他對漕運、鹽務的看法和具體事蹟。而從〔海國圖志〕和〔聖武記〕中, 更可看出魏源的鼓勵商人創辦造船工業、軍事工業以及開銀礦。後來並且重視國際貿易, 其思想接近政府“不與民爭利”。

第一場討論貿易、市場與經濟成長。首先, 全漢昇綜合他數十年來的研究心得, 加上新發現的史料, 闡明明季至清中葉由於太平洋東西兩岸地區白銀供需狀況的不同, 於是美洲白銀經由國際貿易, 大量流入中國的經緯。作者從世界史的巨視的觀點把握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在國際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費景漢追溯 1000-1850 年間中國市場制度的形成及分析其特徵, 認為中國的「農業雙元經濟」(agrarian dualism) 在某些特殊意義下, 可以被稱為

「商業資本主義」(commercial capitalism)，因為它(1)承認私人對生產財的所有權；(2)接受市場制度下分工的調度。作者指出市場制度使中國能解決有關生產效率、經濟安全之保障及社會在「公平分配」(distributional justice)下得到和諧等問題，並且此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市場制度，在二十世紀後半使中國大陸周遭的地區迅速完成經濟現代化的轉型。T. G. Rawski 則概述他研究 1890-1937 年間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認為此一期間的中國經濟在總產出和每人產出等方面皆有顯著的增長。

第二場的三篇論文探討商業化和區域性市場，徐泓利用明清華北地區的方志資料，敘述明代後期華北地區的商品生產與流通及城鎮發展的水準，皆比前期發達，在其刺激下，社會風氣日趨「奢靡相高」，並導致「僭越違式」。劉石吉亦利用地方志和大陸出版的調查資料，論述明清時代江西省樟樹、河口、吳城、景德四大專業市鎮的發展過程及市場狀況，並指出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小生產者家庭對於市場的依賴，各種農村墟市蓬勃發展，更產生不少「專業墟市」。張玉法分析 1878-1937 年間山東省的水運、鐵路、公路、電報、電話、郵政等六部門的發展，認為均已具現代規模，但普及程度尚低，主要原因是地廣人眾，資力不足。

第三場論及商業組織，Evelyn S. Rawski 認為競爭的市場阻滯了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當時英美日等國出現了新的經濟組織形式 oligopoly，控制產銷各部門，帶來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變化，而中國沒有這種組織，工商業結構散漫，沒有根本改造的能力以適應變化中的世界需求情況，結果農民和商人較少穩定於固定行業，從資本和勞力方面阻滯了清末民初急速的經濟發展。Fu-mei Chen 和 R. Myers 則探究交易成本和清代商人行會的關係，指出行會的成員透過集體行動來減輕商人的交易成本，如果商人在行會之外單獨行動，則交易成本會較高。David Faure 認為在明清時期，商業藉著恩助的網絡來發展，家族成爲一正式的組織而具有一些控制財產的合法地位。商業仍以家爲基礎，商業組織之制度化表現在會館。而家族雖非商業行號，但比商業行號更能適應商業經營。

第四場的五篇論文研討土地市場、農業工資和穀價等農經問題，Michel Cartier 的短文以明清時期的徽州土地契約爲例，簡論農地價格的波動主要與所出售的土地之大小有關，而貨幣地租只占地價的 5%~10%，並且比率越來越低，故購買農地不是「經濟的投資」，擁有土地主要是爲了保持社會地位。趙岡則利用清代刑部檔案中各地農業雇工的現金工資，配合同時期的

人口數字，分析 1744-1819 年間兩者的相關關係，指出在耕地與農耕技術幾乎不變的條件之下，人口繼續不斷的增加導致實質工資之低降。王業鍵根據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發現 1738-1789 年間，長江三角洲糧價有溫和上升趨勢，並且由於稻和麥的收成季節不同，兩種糧價的季節性變動有顯著差異，而麥價的變動幅度比米價大一倍，且天時氣候對於農產和糧價的關聯極大，亦即糧價高峰都出現在本地或全國主要產區發生大天災的當年或次年。由於蘇州府糧價和其他地區糧價的相關程度大多超過 0.6，故他主張清代中國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整合 (market integration)。李明珠亦以臺北故宮和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糧價記錄，測量十八世紀直隸省的水旱災對糧價的影響，發現到 1743-44, 1761-63, 1774-76，三食糧恐慌時期，穀類價格確有上昇，而政府的荒政能有效控制天災所導致的經濟恐慌。李中清也利用相同的檔案來源，分析東北遼寧省農家的人口情況（出生率、死亡率、婚姻）和五種穀類的價格，探究出糧價和出生率有極高的相關，並且當經濟條件不佳時，農民以殺嬰的方式來節制出生率。

第五場的六篇論文探討各種商品市場，劉翠溶集中焦點在明清時期鹽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發現有四個主要特性：官定行鹽區界、官方發行引票、官定引票價和鹽價，嚴禁私鹽，而官鹽引價的變動大致與米價趨勢相同，但到十九世紀則相反，顯示官鹽市場已遭遇困難。Fu-mei Chen 和 R. Myers 的第二篇論文則探討 18~20 世紀初中國的三個商品市場：福建武夷茶業、江南棉紡業和臺灣糖業，發現商人很少採用「包買主制」(putting out type)，往往在分離的市場內交易，農民將其產品賣給中間商或加工工場，再經由商人運至他省或國外，市場則是高度競爭，並有極細的分工和交易。范毅軍分析安徽蕪湖的米糧市場，指出蕪湖米在 1877 年以後因通商口岸制度的影響而逐漸興盛，但隨著國內米和進口洋米的競爭日趨激烈，安徽米並未得到「自由貿易」的利益。陳國棟利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討論 1760-1833 年中國茶葉銷售給該公司的交易方式及其演變，並言及行商經營茶業的利潤以及茶商在將其茶葉賣給行商時的不利地位。W. Rowe 則研析 1930 年代中國最有價值的出口商品——桐油——的貿易興衰與結構，指出桐油對於湖廣區域經濟的重要，而此出口貿易的中止固然是由於抗日戰爭的阻礙，但桐油業本身的生產和市場等根本問題亦不容忽視。S. Cochran 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為個案，探究第一次大戰前日本對中國棉紡織品進口市場的占領，他根據該公司的史料，發現到三井物產會社由於跨越了經濟和政

治的界線，並運用了日本式的「縱向聯合」(vertical integration) 的經營模式，而能在日本的占領中國棉織品進口市場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六場的三篇論文論究信用市場和貨幣制度，張彬村認為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的長程貿易的效率甚低，風險甚大，反映出各地之間經濟互相隔絕的程度很高，而信用市場雖廣泛存在，但信用供給不足，需求強烈，使國民所得分配的平均度惡化。而長程貿易尚未善盡利用信用市場的運作方式與工具，故無法促進該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從長程貿易的經營狀況來看，當時的市場經濟仍不足以搖撼舊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基礎。何漢威則指出二十世紀初期省區之間的銅元流通有相當程度是取決於銀、銅部門的兌換差額利潤。1904年下半年以前，商人經由走私外運銅元來套利，1904年下半年以後面對財政壓力，地方督撫以擴充銅元外流為急務。錢商套利的主要方向是自南而北，或沿長江東下，在上海銷售銅元，其中有的更由上海運往山東。林向愷和吳聰敏探討 1946-49 年間臺灣地區的惡性物價膨脹的原因、過程及如何穩定。發現原因是：政府利用增印鈔票來融通支出、臺灣銀行對公營企業的巨額信用貸款、中國大陸惡性物價膨脹的影響。而1949年6月15日的幣制改革，成功地使物價平穩。

第七場的三篇論文探討產業組織，首先，W. Chan 分析清末產業的資本來源，包括官吏、地主、買辦、商人、手工業勞工和小商人等，以及來自東南亞和美洲的僑匯。接著，T. Wright 指出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經濟恐慌，使中國工人的名目工資低降，中國工業的就業減少，而上海的勞工運動在一九三〇年代並非那麼「如火如荼」，勞工運動並未能保護其成員不受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但勞工階級亦在1936年末警覺到經濟回復的信息，因此工運比前幾年更頻繁、更積極、更成功地展開。Bergère 認為 1948-1952 年間的上海經濟雖名為市場經濟，但實際上政府的干預已影響其運行，使之帶有混合經濟的特質。而這一段政權轉移時期的經驗，顯示出要在政府控制與資本家自主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並防止地方利益形成特殊的權力中心是非常困難的。

第八場有二篇關於資本運用的論文，張明園探討雲貴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協餉和鴉片稅來形成資本的主要原因是軍用支出太大，而雲貴人士的依賴心理也是導致該地區失去資本形成機會的重要因素。侯繼明分三段時期闡釋外人在華投資的歷史：(1) 1840-1949 年；(2) 1949 年至今的共黨統治時期；(3) 1949 年至今的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他指出這三個不同時期的在華外資有許

多相似之處，都是投入在與貿易（尤其是出口）有關的領域，並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其因素或許是：(1)此三期的經濟都屬於開發中的經濟，因而受到相似的經濟力量之牽制；(2)都存在着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並且在華外資的數額雖然相對的不大，但對於國內經濟有重要的貢獻，尤其是技術移轉方面。

總之，此次會議由於主辦單位的精心籌劃，與會人士的熱心參與討論，探討課題的深度超越往昔，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固然由於長期間的基礎訓練的相異，對問題關心的角度不同，使參加的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之間的意識、研究方法上的鴻溝依舊存在，但可看出歷史學者對於接受經濟學概念與方法方面的努力。再者，國外學者(包括華裔)可以運用大陸方面的檔案資料來加強其論文，讓生活在臺灣的我們於思索如何提高研究水準時不免羨慕。

會 議 消 息

1. Traditional Asian Medician Conference

第三屆國際傳統亞洲醫學研討會，將於印度孟買舉行，時間是1990年1月3至7日。此會由國際傳統亞洲醫學研究協會贊助。議程包括：古代和中世的保健之理論與實際運用、二十世紀亞洲醫學的專業化，和傳統醫學的社會、文化研究。有意參加者請洽詢：

Caharles Lesli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Newark, DE 19716, U. S. A.

2. The Chinese Abroad: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及新加坡南海協會所主辦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外華人經濟與社會的變化」國際研討會，訂於廈門舉行。時間為1989年4月25日至28日。擬定議程內容包括：(一)海外華人的社會、經濟變遷；(二)海外華人的文化、教育、宗教、醫學、科技等活動；(三)華人的社會組織，如氏族公會、秘密社會、寺廟、互助社區、商會等；(四)海外華人的族譜、自傳等；(五)海外華人變遷與發展上的衝突；(六)理論的爭議和社會經濟模式。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張 炎 憲*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假中研院三研所，共同舉辦「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會期一天，參加者為臺灣史相關研究者，以及地方上的業餘研究者，約九十人。其議程如下：

時 間	主持人	報告人	題 目	評論人
09：20 }	曹永和	湯熙勇	清代巡臺御史夏之芳的事蹟	張勝彥
10：40		唐 羽	蓮溪葉氏之渡臺與其祭祀公業之研究	林美容
10：40 }	休 息			
10：55	陳三井	黃卓權	從獅潭山區的拓墾看晚清臺灣內山墾務的演變	翁佳音
12：15		洪麗完	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	溫振華
12：15 }	午 餐			
13：30	呂實強	陳美妃	臺灣白話文學之文字理論與實踐(1924~1937)	林瑞明
14：50		王振義	從歌仔戲調談「樂合詩」與「詩合樂」	簡上仁
14：50 }	休 息			
15：00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

15:00 }	陳捷先	陳炎正	大陸有關臺灣史料之研究
16:10		曹永和	有關日本長崎華商「泰益號」文書與臺灣商界之經濟關係
		張炎憲	苗栗鯉魚潭巴宰族的古文書
16:10 }	休 息		
16:20			
16:20 }	莊英章	(1) 引言人：劉寧顏：地方文獻資料蒐集與整理情況報告	
17:20		(2) 臺灣史料之發掘與運用座談會	

這次研討會的特色之一，即舉辦了「臺灣史料之發掘與運用座談會」。主題在探討如何保存史料、整理史料，和利用史料。對於現今史料散佚的情況，與會者多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希望政府當局和民眾能重視臺灣史料的保存，為臺灣研究闢出一個有利的基礎條件。

第一屆國際近代日本華僑學術研究會

張 炎 憲*

由日本宮崎大學市川信愛教授為主的近代日本華僑研究會，於 1988 年 12 月 12 日、13 日，在日本長崎舉行第一屆國際近代日本華僑學術研究會。

市川信愛教授數年來以長崎華商「泰益號」為研究題目，曾數次來臺田野訪查。與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有學術上合作的關係。三研所以曹永和先生為主，負責臺灣方面的田野調查工作。這次的研討會，三研所有四位參加：研究員劉石吉、副研究員張炎憲、助理研究員湯熙勇、朱德蘭。

兩天的議程如下：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

十二月十二日

9:00~ 9:30

報告及開會致詞

9:30~10:30

紀念講演：近世長崎的華僑和貿易 中村質（九州大學教授）

10:30~12:30

長崎的華僑和漢方醫學 中西啟

近世臺灣長崎貿易史——以華夷變態為中心 朱德蘭

清代前期海外貿易政策和長崎貿易 劉序楓

三江商人和長崎貿易 劉石吉

12:30~14:30

午飯和參觀長崎市立博物館

14:30~16:30

泰益號臺灣方面調查報告 湯熙勇、張炎憲

長崎華商經營史——泰益號和生泰號帳簿的分析 許紫芬

十二月十三日

9:00~11:00

兩大戰期間日本華僑社會的變容 高橋強

辛亥革命和華僑 松本武彥

日本華僑學校的沿革和現狀——以橫濱中華街為中心 杜國輝

11:00~12:30

紀念演講：東南亞華僑史研究的回顧 陳荆和

12:30~13:00

閉幕

14:00~17:00

參觀長崎古蹟

□ 近代中日關係研究專刊五種 □

- | | | |
|--------------------------|--------|--------|
| (18)李毓澍：中日廿一條交涉（上） | 精 170元 | 平 120元 |
| (26)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 | 精 170元 | 平 120元 |
| (34)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 | 精 140元 | 平 90元 |
| (42)王 璽：李鴻章與中日訂約 | 精 200元 | 平 150元 |
| (45)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 精 250元 | 平 200元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 1034172-5 「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

臺灣大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臺灣史研討會

黃 富 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曾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六日舉辦首次「臺灣史研討會」，頗受學界之重視。民國七十七年適逢本校創校六十週年紀念，歷史系主任徐泓教授乃推動第二次臺灣史研討會之舉辦。本系乃各大學中最早設有臺灣史課程者，更擁有其它大學罕見之豐富、珍貴的臺灣史資料，因此舉行此項研討會當是必要而又有意義的。

研討會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舉行。會場雖嫌簡陋、狹窄，但學者專家出席者極為踴躍。上午八時三十分，由孫震校長、朱炎院長、徐泓主任簡短致詞後，於九時開始進行研討會。茲將議程列於下。

0850-0900 開幕式

0900-1040 主持人：陳捷先

報告人：宋文薰 卑南遺址的發掘

曹永和 簡介維也納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臺灣古地圖

1050-1230 主持人：孫同助

報告人：黃富三 從林文明案看清代臺灣的司法運作

陳志梧 噶瑪蘭城的空間重建

1330-1510 主持人：王曾才

報告人：張炎憲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反對運動之研究

顏娟英 日據時期臺灣美術的發展

1530-1710 主持人：鄭欽仁

報告人：黃俊傑 戰後臺灣農民社會意識的變遷

吳密察 臺北帝國大學在日本殖民地教育體系中的意義——
從殖民地教育學制的角度看臺北帝大的設立

1710-1720 閉幕式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宋文薰教授「卑南遺址的發掘」，係其自1980年至今十三次發掘臺東市南王里的卑南遺址的成果報告。文中指出此文化與中國南海地域的史前文化關係密切，且與中國東海地域的史前文化相關。

曹永和教授「簡介維也納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臺灣古地圖」，乃就其所獲之珍貴臺灣古圖加以影印簡介，據此可糾正或補足荷治時代史的一些疑點。

筆者（黃富三）「從林文明案看清代臺灣的司法運作」，係自司法制度與程序的合法性、妥適性觀點，探討同治九年(1870)林文明被處死於彰化縣公堂的案件。

陳志梧教授「清代噶瑪蘭城的空間重建」，則據城市的設計方式指出其受「君權神授」政治理念的影響。

張炎憲先生「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反對運動之研究」，說明臺灣之反對運動由於本身內部之種種矛盾與外在之日本統治的強大，終歸失敗。

顏娟英女士「臺灣早期西洋美術的發展」，論述在殖民統治下，畫家之創作深受殖民政府詳審制度的影響，以致難於發展獨有的風格，也無法茁壯。

黃俊傑教授「戰後臺灣農民社會意識的變遷」，陳述民國40年代至60年代間，農民社會意識的變遷——功利主義取代傳統價值，對農會由認同而離心。

吳密察先生「臺北帝國大學在日本殖民地教育體系中的意義——從殖民地教育學制的角度看臺北帝大的設立」，指出日本設立臺北帝大的目的是在堵截臺人赴日留學，並使臺灣成爲華南、南洋研究的重鎮，俾向該區擴張。

除上述論文外，楊雲萍教授亦提供珍藏資料供觀覽。研討會雖未安排評論員，然與會專家均踴躍發言，針對相關問題充分討論，成果相當豐碩。

中國早期工業化研究專刊四種

- | | | |
|------------------|-------|------|
| (2)黃嘉謨：甲午戰前臺灣之煤務 | 精140元 | 平90元 |
| (3)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 精120元 | 平70元 |
| (4)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 | 精140元 | 平90元 |
| (9)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 精120元 | 平70元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國際學術討論會

譚 汝 謙

一 討論會簡介

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於1988年10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國際學術討論會，主題是「中日關係史的過去和未來」。大陸出席學者一三〇餘人，來自日本、美國、加拿大、星加坡和香港等國外地區的學者二十餘人；此外臺灣的學者雖然不能親自出席，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的宋越倫先生向大會提交了論文，受到特別重視。

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是個民間學術組織，成立於1984年，首任會長是趙樸初先生，現任會長是孫尚清先生，秘書長是胡錫年教授，副秘書長是楊正光教授，主理學術事務的是常務理事汪向榮先生。該會顧問和理事大都是學術界知名人士，著述豐富。該會規定須具大專院校講師或同等資歷的人士始能申請入會，現有會員約七〇〇人。該會定期舉行學術報告會、討論會等活動，並出版會刊及學術專集。在該會大力推動下，大陸各地紛紛成立分會，從黑龍江、吉林、遼寧諸省到北京、天津、濟南、連雲港、蘇州、上海、溫州、西安，以及新疆的烏魯木齊等城市，凡是過去和現在與日本關係較為密切的地方，都已正式設立了分會，各就地方特別背景進行研究並培訓人才，成爲一支異常龐大的學術隊伍。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大陸出版有關中日關係史的專書逾百種，論文逾千，學術水平不斷提高；汪向榮先生等的著作被日本學者譯成日文，而王金林、呂萬和、任鴻章等幾位學者更直接用日文撰寫，由日本的學術出版社輯錄爲叢書在東京出版。據筆者個人多年的考察，大陸近來在中日關係史的研究，比較其他中外關係史（包括中美、中英、中俄等方面）的研究，無論在質或量上，似都較爲領前。汪向榮先生似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乎也有相同的見解，故此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開幕詞和閉幕總結報告時都提到，本次大會是大陸研究隊伍實力的總檢閱，藉以檢討現在，策勵將來，務求以「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進一步發展研究。

此次大會還有一層意義，就是紀念北京東京簽訂的和平友好條約十週年。因此，大會受到中日有關當局的重視。10月25日的開幕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舉行，日本駐北京公使湯下博之等出席並致詞，大陸、日本和一些國際新聞社都發報有關大會的消息，備受重視。

二 討論會程序

大會參加者一共約一五〇餘人。由於這是第一屆國際性會議，來自國外和各地的代表不少，雖然份屬同行，交流意見的機會不多，加上會議場所（中國中醫研究院學術報告廳）設備有所限制，故大會決定不設分組討論，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參加者都有機會宣讀自己的論文、引發討論，只安排一些參加者向全體大會作報告。據悉要作報告的參加者人數甚多，限於時間，大會不得不作選擇，只能安排海外學者和具特別代表性的學者向大會宣讀論文。有些知名度較高的學者，例如日本關西大學大庭備教授、明治大學德田武教授、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呂萬和先生、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前所長任鴻章先生等，都主動讓出向大會報告的機會，獲得與會者稱賞。

大會學術報告程序如下：

10月25日 下午（上午開幕典禮）

汪向榮（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大會主持人）

「中日關係史的過去和未來」

田中正俊（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神田外語大學教授）

「日本資本主義下之軍隊的武器與中日戰爭」

二見剛史（日本鹿兒島女子大學教授）

「京師法政學堂時代的松本龜次郎」

水野明（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教授）

「日本的『中國論』的檢證」

10月26日 上午

Douglas R. Reynolds（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副教授）

「被忘卻的『黃金十年』」（1898-1907）

鮑世修（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日本對中國晚清軍隊改革的影響」

石井明（日本東京大學助教授）

「『日臺和約』的締造過程之分析——關於日方草案的若干問題」

解學詩（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弄清史實，深入探討——滿鐵研究的若干問題」

宋越倫（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代讀）

「日本侵華之一貫性」

（下午參觀天安門城樓、故宮等）

（10月27日，全日參觀十三陵、長城等）

10月28日 上午

Joshua A. Fogel（美國哈佛大學副教授）

「戰前在中國旅行的日本文學家」

Barbara Brooks（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川島芳子女扮男裝考」

魏榮吉（日本名古屋外國語大學教授）

「『東亞交通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提要」

孫佩蘭（蘇州刺繡研究所副研究員·高級工藝師）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刺繡藝術」

劉學照（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

「上海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地位」

鄭雲卿（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日本科工作人員）

「從延邊朝鮮自治州的日語使用狀況看中日關係的過去和現在」

汪向榮（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大會主持人）

學術報告總結

楊正光（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

閉會致詞

上列每人報告約二〇分鐘，報告後回應聽眾的提問。與會者對三位美加學者的報告尤感興趣，一來被他們的普通話能力所懾服，二來被他們的題材深深吸引，尤其是加拿大 Barbara Brooks 女士有關川島芳子女扮男裝的報告，配合一些珍貴罕見的幻燈片，加深大家對這位傳奇女子的認識，氣氛又莊又諧，吸引全場的注意。

三 討論會的論文

大會收到一三〇餘篇論文，學術水平參差，其中不乏佳作。特別值得一提有好幾篇：張聲振（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再論卑彌呼大使難升米赴魏都的時間——與松永泰蘭先生商榷」、王守稼（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爭貢事件』故址考」、任鴻章（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的「略論豐臣秀吉的征明政策與德川家康的和平通商外交」、宋越利（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吉岡義豐與道教研究及中日關係」、容應萸（星加坡國立大學）的「從歷史角度分析『下克上』與日本政治文化」、譙樞鋁（上海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進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蘇崇民（吉林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圍繞滿鐵設立的中日交涉」、黃清根（華東師範大學）的「丁巳復辟與日本」、曹振威（復旦大學）的「幣原外交與二十年代中日關係」、周啟乾（天津市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周學熙東游與北洋實業」等論文，或宏觀或探微，見解新穎、精闢，將會開拓日後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此外，王仁波、郭存愛、安源、馮佐哲等關於中日文學藝術的比較研究，也有突破性的新材料和新見解。

一些一直被視為高度敏感的課題，也有學者敢去研究，出現新觀點。例如，賀軍（上海交通大學）的「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及其戰略構想」一文，使用了大量臺灣出版的文獻，如國防研究院編印《蔣總統集》，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印《革命文獻》、蔣緯國主編《抗日禦侮》、董顯光《蔣總統傳》等，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軍事機構檔案、美國的《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蘇聯的《蘇聯外交文件》、蘇聯的《蘇聯外交文件》(СССР)等外文檔案和學術專著多種，重新考察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又如郎維成(東北師範大學日本研究所)的「蔣介石與田中義一會談」一文，參考了臺灣(李則芬、吳相湘、林明德諸先生)和日本(山浦貫一、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兒島襄、高倉徹一、都築七郎、黑龍會俱樂部等)的著作，重新編述1927年蔣中正東渡日本的目的，與日本人士會談的內容及其後果。

此外，好幾位外國學者雖然因事不能出席會議，但寄交中文的論文。例如，日本京都大學的竹內實教授，在其「從中國近代史來看日本的近代」一文，探討和比較三個重大的課題：(一)中日兩國近代史分期的異同；(二)兩國人材出現的情況和政治體制；及(三)日本的洋務派和中國的洋學。東京女子大學的山根幸夫教授，在其「町野武馬與張作霖」一文，分析張作霖確立東北霸權與其日籍軍事顧問町野氏的關係。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西村成雄的「日中

戰爭前夜日本的中國統一化戰爭」，以矢內原忠雄、尾崎秀實和中西功等三人為中心，檢討日本對中國的「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各種意見，立論客觀。

宋越倫先生的「日本侵華之一貫性」一文，指證侵略中國是日本始終一貫的國策，成為大會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最嚴厲的文章，吸引與會者的注意。據悉有幾家大陸和日本的 新聞社特別向大會 要求宋先生的複印本，十分重視。

四 感 想

總體看來，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是成功的。論文內容方面，從邪馬臺時代到展望中的二十一世紀，都有論及，可說古今並重；至於題材方面，包括思想、宗教、文藝、政治、軍事、外交、教育、考古等，不一而足，相當豐富和新穎。參加者的年齡分佈幅度十分寬廣，老中青約略相等，這樣重視中年和青年學者的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大陸還是較為少見的。

大會的會務工作做得很好，食宿、交通、接送、參觀等繁重的工作大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會務工作人員幹勁十足，與會者都有賓至如歸之感。據悉與會者年紀最長者是來自四川的一位前輩，已達九十六高齡，最幼者是星加坡國立大學容應黃博士的千金，芳齡只有六個月，大會都給他們特別照顧，使能一起出席會議，甚至同登長城。最令參加者驚喜的是討論會籌備組竟然為參加者排印《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用32開本印刷，收錄了依時交稿的論文約40篇，近400頁，約30萬字，採同頁註，連封面也設計得頗有品味，方便與會者查閱，攜帶也較為方便。據了解，這部選編是在不到兩個月之短期內編印出來的；大陸（尤其是北京）的出版印刷條件並不太好，經常都有紙張「緊張」，印刷排期費時（學術性的東西通常難以獲得優先「照顧」），這次討論會籌備組所顯示的工作效率，使人欽服。

在籌募經費方面，這次國際討論會似乎為大陸民間學術團體發展大型學術活動樹立了榜樣。據悉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在大陸雖然是個一級學會，但不是「富戶」，並無獲得當局特別撥款，此次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也無特別資助。近來，物價不便宜，辦活動又在在需財，按常理這次討論會是辦不成的。所幸，在汪向榮先生、楊正光先生等負責人努力之下，獲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北京三聯書店和日本紅茶株式會社社長

松本洋一郎先生的資助，解決了大會經濟的困難。特別是三聯書店和日本公司的經濟支持，值得大書特書。在會議期間，三聯書店還派人到會場展銷中日關係史的書籍及為參加者購書、郵寄等服務；日本紅茶株式會社向參加者致送精美茶包和其他禮品。據大陸的學者告訴我，這樣的「義舉」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學者甚至表示「受寵若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次大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要提的是臺灣的學者還未能渡海出席這次討論會。據悉主辦者先後給臺灣的學術機構和學者寄發邀請，而且確有誠意盼望臺灣的同行前去作純粹的學術交流，可惜因為種種緣故，臺灣的學者都未能成行，只得宋越倫先生及時寄交論文，算是「紙上參加」。大陸和來自其他地區的同行都十分重視宋先生的「參加」，咸認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盼望在不久的將來海峽兩岸的同行便能自由交往，互相請益切磋。大陸的學者也希望臺灣的同行邀請他們來臺灣交流，以及從事共同研究和合作出版等。

其次，大陸學者提交的論文，似乎談中日友好的偏多，而論述不愉快歷史的較少。在芸芸論文中，復旦大學曹振威先生的「幣原外交與二十年代中日關係」算是非常突出的。曹文論證史稱「軟弱外交」的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其實絕不「軟弱」，相反「具有很大的欺騙性」、「狡詐」，並不折不扣「言行不一的陰險策略」。幾乎除了曹文之外，論述「非友好」史實的，多是來自海外的論文，例如，上文介紹過的宋越倫先生的文章及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水野明先生的文章等。水野先生指證戰前日本的「中國通」都有對華的侮辱感，名流學者諸如矢野仁一、內藤湖南、南田良平、稻田君山等人都不例外；水野先生進一步指出近年招致國際風波的「藤尾發言」、「奧野發言」、「否認東京裁判史觀」等，根底裏與戰前的侵略思想相通。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非友好」期間相對地十分短暫，但由於過去日本給中國造成曠古未有的極大創傷，很多「瘡疤」尚有餘痛，尚未好好診治，我們不應擱置不理。故此，治「非友好」史絕不等同「挖瘡疤」。這一點，田中正俊教授似有同感。他在論述日軍武器之前，就用了不少筆墨交代自己曾經是「皇軍」的砲兵，曾參與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等事實。這樣做，不但沒有減損其學術的客觀性，也沒有製造任何不友好的氣氛。誠如水野先生所說：「檢證過去，策畫未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史學工作者委實任重道遠，有些工作是不能不做的。

最後，我感到討論會的發言方式似可商榷。這次大會不設分組討論，只

設全體大會報告，因此只有十五六位參加者獲得安排發言，約佔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大會當局的考慮固然甚善，所選報告者也很適當，不過這樣的安排導致兩個缺點：(1)有機會發言的人數必然不多，亦即絕大部分參加者只有聽講的份兒；(2)討論交流受到限制；雖然這次大會在報告後容許發問，但時間所限，答問雙方都不能暢所欲言，致使討論並不熱烈，其實大多數報告之後都沒有任何提問，更遑論討論。學術討論會最重要的目的是交流切磋，如果只安排一二全體大會的報告（如汪先生的主題報告及閉會總結等），其餘分組報告，多組同時進行，任由有興趣者自由選擇小組而參加討論，務使全體提交論文者都有機會報告自己的論文大要，其他參加者有機會對任何一篇論文作出評論。如能這樣安排，相信對促進交流將有更大裨益。

總的說來，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相當成功，通過這次會議，其實超越了汪向榮先生的期望，不但檢閱了大陸同行非常雄厚的實力，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海外同行的若干短長，為今後進一步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基礎。趁此機會，我謹代表大多數海外參加者向大會主辦當局、全體工作人員，特別是汪向榮先生和楊正光先生兩位，衷心致謝！

亞洲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

亞洲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於今年（一九八九）3月17日至19日假華府希爾頓飯店舉行，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亞洲學者專家約五百人提交論文，參與盛會。主辦單位按照往例，依討論地域及議題取向的不同，安排各項及各分組的研討會。中國問題素來備受重視，今年一百二十一個分組研討會中，與中國直接相關者佔三十一組，其他之分組討論會涉及中國研究及中外比較研究者亦多。明清以降的近代史又為中國研究的重要環節，以下僅介紹相關的主題和重要論文。

政治史方面，「二十世紀中國的傳承與斷裂」分組討論會中，學者從政治控制的社會基礎觀察國共政權之更迭，宣讀三篇論文：①Merie-Claire Berger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Nationalist to Communist Regime (1948-1952)," ②A. Roux "Shanghai Workers and

Politics during Political Transition,” ③Laurence A. Schneider, “Chinese Governments and Chinese Scientists.” 「中國的國家與民族」分組討論會則討論國家建立與民族統合的問題，學者宣讀五篇論文：①Norma Diamond, “Defining Miao—Ming, Qing and 20th Century Views,” ②Shih-chung Hsieh, “The King and Indigenous Official: The Process of Ethnic Solidarity,” ③Stevan Harell, “The Incentive of Ethnicity: The History of History of the Yi,” ④Charles F. Mckhann,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ality Status of the Naxi,” ⑤Dru C. Gladney, “How Ethnic is Ethnic? The Problem of Nationality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一分組討論國家權力向外擴展的問題，該項名為「個體，從屬與權力」的分組討論會，有兩篇相關論文宣讀：①James L. Hevia, “Sovereignty and Subject: Performing Power in Qing Guest Ritual,” ②Angela Rose Zito, “Silk and Skin: Significant Boundaries.”

經濟史方面，在肯定文化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必然存有一些曲折隱微的關係的認知之下，從東亞文明觀察文化模式對民族成就取向的影響，此一研究途徑近來已有由綜論性的泛文化比較發展為對單一文化元素做精緻細密研究之趨勢。本屆大會中三個分組討論會反映了對這項論題的關注。一，「東亞的孝道與現代化」分組討論會，宣讀兩篇論文：① Deborah Davis, “Patrilocal Homes and Matrifocal Ties: Family Dynamics in Urban China,” ② Charlotte Ikels,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in Urban Chinese Households: Reinterpreting Filial Piety.” 二，「中、印商業文化中的合理性」分組討論會，宣讀論文四篇：①R. David Arkush, “Contracting with the Gods: Worship in Chinese Folk Drama,” ②Robert P. Gardella, “Squaring Accounts: Bookkeeping Methods, Accountability, and Capitalist Rationalism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③Man Bun Kwan, “Social Reproduction of Urban Merchant Families: The Case of Tianjin Salt Merchants,” ④Emily Martin, “The Meaning of Chinese Ritual Money.” 三，「中國經濟活動的文化基礎：一個科際整合的研究途徑」分組討論會，提出四篇論文：① Sherman Cochran, “Cultural Loyalties and Marketing Agreements in China’s Interregional Trade,” ②Myron Cohen, “Family Head and Family Manager: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Economic Culture,” ③Gary G. Hamilton,

“Regional Relationships (tongxiang guanxi) and Family Firms in the Conduct of Chinese Business,” ④Thomas G. Rawski,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Success.”

市鎮與人口的變遷俱為觀察社會現象的重要指標，研究成果尚不多見。市鎮研究方面，有一分組以「帝國晚期江南的城市：中國的另一面？」為主題，宣讀兩篇論文：①Antonia Finnane, “Internal Colonization and Chinese City: An Argument from the Example of Yangzhou Under the Qing,” ②Linda Cooke Johnson, “Shanghai: An Emerging Jiangnan Port, 1683-1842.” 人口史論文側重人口與家庭網絡的關係，宣讀二篇：①James Lee (李中清) and Cameron Compbell, “Household Hierarchy and vital Rates in Qing China, 1774-1873,” ②William R. Lively, “Sex Ratios and Birth Order in Sichuan, 1940-1980.”

專重精英分子及其文化的研究，不免扭曲對中國整體歷史之認識，研究民間文化與下層社會，可收補偏救敝之效，晚近以來，已蔚當風尚。有三個分組討論相關問題：一、「來自下層社會的中國宗教」分組討論會，學者宣讀四篇論文：①Kenneth Dean, “The Rituals of the Three-In One Religion, Fukien,” ②Brigitte Berthier, “Languages and Topography of the Cult of Lin-Shui Fu- jen, Fukien and Taiwan,” ③Allen Chun, “Village Ritual Handbook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④ Gary Seaman, “Landscap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Divine Revelations on Geomancy in Puli, Taiwan.” 二、「秘密社會與檔案開放：天地會的新觀點」分組討論會，宣讀五篇論文，①Dian Hechtner Murray, “The Orgins of Tiandihui: Scholarly Voices and Archival Revelations,” ② Rebert J. Antony, “Brotherhoods,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Law in Qing Dynasty China,” ③David Ownby, “The Social Origins of Tiandihui: The Background to the Lin Shuangwen Uprsing of 1787,” ④ Chuang Chi-fa (莊吉發), “Sojourners and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Secret Societies in Qing Period,” ⑤Qin Baoqi, “Recently Discovered Source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三、「從酒戲到彩票：賭博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分組討論會，宣讀二篇論文，① Dorothy A. Day, “Decent into the Bowels of the City: Gambling in Ming-Qing Fiction,” ②Ellen Oxfeld Basu, “Profit, Loss and Fate: Gambling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Ethic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研究，關係中國當代發展與未來走向，備受學者關懷。三個分組討論會的議題與此相關。一分組討論日據時期臺灣的發展，側重人口移動與文化轉型的關係，該項稱為「文化改革的源頭」的分組討論會，四位學者提出論文，①Wen-hsing Wu (吳文星),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s in Taiwan in the 1920s: Some Social Issues and Problems,” ②Caroline Hui-yu Ts'ai (蔡慧玉) “The *Hoko* System for Social Mobilization in Colonial Taiwan,” ③Douglas L. Fix, “Alternative Activism: Taiwanese Elite Strategies Under Colonial Rule in the 1930s,” ④Wan-yao Chow (周婉竊) “*Kominka Undo* (The Japanese Movement) and the Army Volunteers, 1942-1945.” 有一「個人發表論文」分組 (Individual Paper Session) 綜論民國時期大陸本土的轉變，內容涵蓋各個層面，計有相關論文三篇，①Gang Zou, “A Debate on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Reform Strategies,” ②Lewis Bernstein, “The 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00-1902: An Overlooked Chapter in Tientsin's Administrative History,” ③Ernst Schwintzer,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Jiangsa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另一分組為人物史之研究，這項名為「援助中國：二十世紀三個不同凡響的美國人」分組討論會，檢討外人在推動中國改革上扮演的角色，有三篇論文宣讀，①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in China: Myths and Reality,” ②Marjorie King, “Ida Pruitt: Critic of American Reform Efforts in China,” ③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s Secret Advice to Chiang Kai-shek.” 由於論文甚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清季革命運動研究專刊五種

- | | | |
|----------------------------|-------|-------|
| (1)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 精150元 | 平100元 |
| (19)元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論爭 | 精130元 | 平80元 |
| (24)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 精150元 | 平100元 |
| (32)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 | 精220元 | 平170元 |
| (60)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的個案研究 | 精350元 | 平300元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學術演講

再談「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認識」*

何 丙 郁

1982年12月在呂實強所長安排之下，我獲得一個機會，在本院談及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認識。當時我沒有想到將來我跟李約瑟和這部鉅著的關係會變得更密切。本文的動機是要把上次講演以後的發展向諸位同仁作一報告。

我並非是在1982年第一次訪臺，以前是來過幾次，可是跟科技史沒有直接關係。這次我發現臺灣對中國科技史有濃厚的興趣。繼著我在本院的講演，幾位聽眾對我說希望李約瑟有一天到來訪問臺灣。我答應轉告李約瑟。1983年我的演辭先後登載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和第十二期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1983年9月李約瑟往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所頒授的名譽博士學位，路經新加坡。當地的『南洋商報』和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同時引述『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所載的我那篇演辭，並且加上一箇「李約瑟一生不說人家的壞話」的標題。當李約瑟和魯桂珍從新加坡抵達香港的時候，魯桂珍立刻告訴我說，她和李約瑟都很欣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文報上所載關於「李約瑟一生不說人家的壞話」的標題，認為是我的傑作。我趁這個機會對李約瑟說臺灣的朋友們渴望他到訪。李約瑟很高興聽到我這句話。他大受感動，因為他多次訪問大陸，從來沒有到過臺灣，不知道是否會受到歡迎。當時我們沒有料到不久李約瑟就有訪臺之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所載的拙作也引起香港三聯書店蕭經理的興趣。他約我替三聯書店寫一本以李約瑟為題的小書。不久我便寫就一部『我與李約瑟』（1984年、香港三聯）獻給李約瑟的夫人李大棠。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何丙郁院士於民國78年2月18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之學術演講。

1983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五卷第五分冊出版了。本書關涉內丹的研究，指出以往西方學者對中國內丹的誤解。我還替香港大學的『東方學報』寫過一篇有關這部書的書評。同年12月，劍橋設立「李約瑟研究所」以李約瑟為首任所長。我在香港大學召開第二屆國際科技史會議。本來李約瑟早已答應出席是次會議。可是他兩三箇月前已經到過香港，不想在短期內再度奔波，不得已取消此行。他很抱歉的對我說：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without me。當時我沒有留意他這句話，把它解釋為「我不參加這個會議，您也可以擔當得起」。可是現在我覺得這句話可能是另有含義。我不試圖將之翻譯了。

1984年8月，北京召開第三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內子陪同我去參加這箇盛會，比李約瑟和魯桂珍早一天到達會址。和李約瑟四十多年前在重慶的先後兩位秘書，黃興宗和曹天欽共聚一堂，也是一件難忘的盛事。黃、曹兩位已經快近七十歲了，可是在八十多歲的李約瑟面前，他們的動作還有一點像在重慶時期跟隨這位中英科學合作館主任的姿態。黃興宗對我說和李約瑟在一起使到他自己感覺到年輕了許多歲。散會後一組到會者南下江南遊覽，另一組西往蘭州和敦煌。只剩李約瑟、魯桂珍、黃興宗和我夫婦倆一共五人取道西安。我在西北大學作了一次講演，講題是「李約瑟的治學方法」，由李約瑟自我介紹。我們也參觀秦皇兵馬俑、半坡博物館、西安歷史博物館、碑林、華清池、清真寺等名勝。李約瑟一面看一面做筆記，不減當年的風采。

我們分兩批離開西安。李約瑟和魯桂珍先往南京住宿一天纔轉機去上海。黃興宗和我夫婦倆則直飛上海，下榻錦江飯店。隔一天李約瑟和魯桂珍也搭火車到達上海。不料魯桂珍途中突然身體不適。起初她還住在錦江飯店，由大夫每天到來替她診病，在患病中渡過她的七十九歲華誕。後來她要搬進醫院接受醫療，因為李約瑟將去訪問泉州、廈門等地、黃興宗假期屆滿要趕回美國，而我夫婦兩人也要趕回香港辦理孩子的婚事。長男在9月13日舉行婚禮。李約瑟和魯桂珍連袂到港，出席喜宴。他們兩位有訪臺之約。魯桂珍剛病癒，李約瑟不放心帶她同行。我建議先替她作一箇全面的身體健康檢查。假如醫生說她不應該旅行，那就留她在香港休養，讓我夫婦照顧她。在外科專家毛文奇醫生的安排下，我們送魯桂珍往香港瑪麗醫院，由內科主任楊紫芝教授親自主持檢查。這位名醫判斷魯桂珍的體力可以旅行陪同李約瑟往臺灣，這也是他們第一次訪臺。我在香港接到李約瑟從臺灣寄來

的信，說他們受到很熱誠的招待，收穫甚豐，而且魯桂珍在旅途上健康良好。

198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二分冊出版了。這部農業篇的撰寫者是白馥蘭 Francesca Bray。這也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一本不經李約瑟親手所寫的分冊。白馥蘭現任職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社會學系。接著1985年，由錢存訓執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的印刷和造紙篇也開始問世。我還替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東方學報』寫就一篇關於這本書的書評，1988年出版。

1985年，澳洲悉尼大學召開第四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接著第十七屆國際科學史會議也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舉行。這兩次會議我都出席，但沒有看到李約瑟。同年我獻給李約瑟的一部 *Li Qi and Shu: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香港大學出版社) 出版了。

1986年11月，我應邀往西安西北大學講演，被聘為該校名譽教授。同時我參加一箇陝西地方科技史學術討論會。我不能在這古都久留，因為我還要趕回香港迎接李約瑟和魯桂珍到訪。當時我兼任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院長職。我在學院裏設宴招待他們兩位並請李約瑟向各位來賓說幾句話。在宴會中李約瑟找到一箇機會跟我單獨談話。他表示很希望我答應將來前往劍橋繼續他尚未完成的工作。這是一件義不容辭的事情，縱然自知碌碌無能，敢不勉圖奮發！我立即回答他說，我希望他能夠繼續工作許多年，必要時我準備放棄我的大學職位前往劍橋繼承他創下的大業。這次李約瑟在香港只作一箇短暫停留。他和魯桂珍啟程往北京然後重遊四川。當時他的體力尚好，祇是跑路有些不便。但是今天可以說，恐怕這是李約瑟訪華的最後一次了。去年十二月，他對魯桂珍說：“I am afraid our travelling days are over”（恐怕我們能夠旅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1987年，我和李約瑟合作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七分冊火藥和火器篇也出版。我以合作者身份和李約瑟的關係也告一段落了。4月我在香港大學任滿返回澳洲格理斐大學復職。9月我應邀往英國劍橋出席李約瑟研究所的一個理事會會議，正式被委為該所的候任所長，作為李約瑟的承繼者，上任日期由我們兩人之間作決定。我對理事會說，我是很愛好這箇「候任所長」的名銜，希望李約瑟博士能夠讓我享用這箇名銜一段很長的時期。當時我覺得李約瑟體力良好，所以我跟理事會的對話是很輕鬆。豈料不久後形勢會突然改變！

10月我去日本京都，出席慶祝戴內清教授八十華誕的一箇中國科技史研討會。在開幕典禮中，我替李約瑟宣讀他致戴內清的賀詞，同時將賀詞口譯爲日文和中文。12月我去香港參加另外一個學術會議，事前訪問臺灣，拜訪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並在國立清華大學和淡江大學兩處作講演。回到澳大利亞便接到李約瑟的信說，聖誕節前幾天李大棊已經與世長辭了。老年喪偶，失去六十多年相隨的老伴，李約瑟所蒙受的精神打擊是難以想像的。

1988年8月，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召開第五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李約瑟沒有出席，祇以錄影和錄音方式，在開幕典禮中致賀詞，並且介紹新落成的李約瑟研究所大廈。銀幕上的李約瑟，顯現衰老的樣子，講話也好像很吃力。這不是我個人的感覺，許多關心他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我們擔心李約瑟的體力已經大不如前了。閉會前我們選出劍橋爲1990年8月第六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的會址，希望屆時能以此盛會慶祝李約瑟的九十華誕。

11月，我再去英國劍橋，發覺李約瑟視力開始有毛病，體重減低十多公斤，兩膝關節炎。使他不方便走路，醫生已不允許他駕駛汽車。他的談吐比去年緩慢，語聲也轉微弱。幸虧他的頭腦還依然靈活。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問我接任的日期，他希望我可以儘快搬到劍橋。我答覆說1989年4月假滿回到澳大利亞將立刻向任教的大學提出辭呈。由於大學規定需要六箇月前通知，我最快還是要等待到年底，始能往劍橋接任他的所長職務。李約瑟希望這樣就可以不理一切雜務，專心一致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醫藥篇和結論篇。他聽說我快要去臺北，便託我替他向吳大猷院長和陳立夫先生致候。他說當年在四川計畫書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時候，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曾經給他很多鼓勵和援助。魯桂珍加上一句話說：「我們在臺灣有許多朋友，您見到任何一位也請您替我們向他問候。」12月9日是李約瑟八十八華誕，我們在李約瑟研究所裏慶祝了一番。十日我離開英國往新加坡小住三天，然後飛往香港，和香港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基金會取得聯絡。我23日回澳洲和家人團聚。

1989年1月1日我啟程往新加坡，翌日轉搭華航機赴臺。獲得有今天的一箇向本院的同仁討教良好機會。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分野。李約瑟是本院的一位通訊研究員，他的最早合作者王鈴，是李莊時期史語所的一位助理員，而他的繼任者也是本院的院士。所以諸位和劍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絕對不能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多少總有一點關係。希望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首先讓我略談『中國科學技術史』進行的情況。早在抗戰以前李約瑟已經有了書寫一本有關中國科技史的書的意圖。當時他認為只需寫一冊書，然後就可以回到他的生物化學實驗室繼續他的科學研究。1942年李約瑟被英國政府派遣往重慶，任中英科學合作館的館長職。駐華期間足跡遍佈整個在國軍守衛下的地區，訪問各處的科技機構，供應科學儀器和教材，選出年青有為的科技人員去英國升學，同時利用這個機會與許多中國學者討論將來撰寫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計畫，並蒐集大量文獻資料。1946年李約瑟回到劍橋就發覺需要把他計畫中的大作分為七卷，每卷一冊。上次我在本所已經提到第一卷在1954年出版，第二卷在1956年出版，第三卷在1959年出版。從這箇出版的速度來看，李約瑟大約到了七十歲原定七卷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應該可望大功告成。豈料第三卷的天文、數學、地理篇出版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社長對李約瑟說他的書篇幅已經越來越多。（原文是：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比中文翻譯難聽）。這位老闆向李約瑟建議以後採取分冊方式，將每卷分為數分冊，而且分冊的數量不受限制。原來老闆發覺『中國科學技術史』銷路好，自然樂意多出版幾部這類的書，多多益善。李約瑟也樂得同意。第四卷就分為三分冊出版。李約瑟也感覺到不能親自撰寫一些從第五卷開始的一些分冊。他把這些工作委託於一批散在世界各地的合作者。這些合作者都是有關方面的專家，有些是早已成名的學者，有些是剛完成博士論文的後起之秀。人事時有變動，各合作者沒有限定的頁數，也沒有一個交卷的期限。這樣一來，分冊的冊數不斷增加而且冊數的增加率還要比新書的出版率高。例如目前的情況是已經出版的一共有十五冊，排版中的有二冊，撰寫中的和尚未開始撰寫的一共是十三、四冊。最後的一個數字是隨時可以改變的。我們可以說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剛好出了一半。李約瑟已經放棄有一天可以親眼看到整部書完成的美夢，他只採取一箇見一步行一步的態度，希望可以完成還需他親自動筆的第七卷結論篇的一小部份和魯桂珍跟他合作的第六卷醫藥篇。

完成李約瑟的這一部鉅著該是我在劍橋的當務之急。我預感冊數不會再增，劍橋大學出版社對非出自李約瑟親筆的分冊，在銷路上存有戒心，不會鼓勵合作者隨意增加冊數。我希望能够早日完成這部鉅著，不想將事情拖延到第二十一世紀。假如李約瑟能够順利完成他書寫的部份，加上各位合作者能够依時交卷，『中國科學技術史』將可以在本世紀內全部出版。至於怎樣纔可以使到負責撰寫各分冊的合作者如期交卷呢？這該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將

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是盼望『中國科學技術史』能够早日整部面世。

『中國科學技術史』本身並不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例如各篇的份量分配並不平均。數學、天文、地理都包括在第三卷的一冊中，而鍊丹術則佔第五卷的第二至第五分冊一共四本。早期面世的一些作品，例如三十年前出版的第三卷數學、天文、地理篇已經是被時代追上了。兩年前我在日本京都的一個中國科技史會議上，提到現代科學的詞彙裏沒有「聖人」這個名詞。雖然關孝和被尊為「算聖」，這是基於傳統東洋文化。在一個科學家的心目中沒有一個科學者是絕對沒有錯誤的。李約瑟的鉅著對世界上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有很大的影響力，提出了許多問題讓他們更進一步研究。這些研究產生了不少新解析。

講到這裏我應該略談兩、三個有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基本問題。李約瑟在書中引用一套「傳播理論」，認為創新比較傳播是一件較困難的事情。假如兩不個地區在同時期出現一個相同或類似的科技知識，除非可以找出反證，那就是從較早出現的地區傳播到較晚出現的地區了。這個理論和三十多年前在歐美流行的文明發源於西南亞細亞觀念有密切關係。考古學家在西南亞細亞發掘了公元3年前的遺蹟，比世界上任何地區還早。依據這套理論，李約瑟猜想中國天文學上的二十八宿，曆法的六十甲子，聲學的十二律呂等，都可能是從西南亞細亞傳入中土。例如他引用「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隄之陰，取竹之懈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之宮。」一段章句，說這可能是指從西方傳入中國的知識。李約瑟所用的是「猜想」、「假設」、「可能」的詞句。我們也不容易找出確實證據來肯定或者否定他的「猜想」。不過最近三十年來，隨著世界各地的新考古發掘，許多考古學者和人類學家已經逐漸改變以前的觀念。他們相信世界各地可能產生沒有受到外來影響的獨立文明。中國大陸近年已經有不少新發現。希望將來有些更早期的文物出土，使得這個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李約瑟早已認識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的密切關係。每次他訪問中國大陸，他必定找個機會到北京考古研究所處跑一趟，探聽考古方面有些甚麼新發展。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也很注意中國考古學的新發現。最近已經出版了一部『新發見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分『譯注篇』（1985年）、『論考篇』（1985年）各一冊。中國大陸也出現了許多關於考古學的著述。例如夏鼐的『考古學和科技史』（1975年）。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對馬王堆出土文物作出多項報告。中國大陸的學者能够利用實物和作實地考察，這是

一個占有地利的特殊條件。

李約瑟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是有些西方學者的批評，說他是太偏向中國。李約瑟表明自己的立場說，作為一個學者，他已盡了一己之力採取一個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態度。可是偶然無意中犯了錯誤，偏向一方，他寧可所犯的是偏向中國而非西方，因為已往的西方學者輕視中國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他希望他偏向中國的偶然過失可以聊補以往一些輕視中國的過失。我不好意思評論李約瑟的這個立場。惟有衷心感謝他對中國人民的善意和友誼。

最重要的基本問題是，我第一次在近代史研究所講演時略為提過李約瑟本人的科學思想。劍橋大學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時。當時有一個舉世注目的部門。這就是由物理學講座教授拉瑟福德公爵 Lord Rutherford 領導的卡文迪什實驗室 Cavendish Laboratory。分裂原子的最初的試驗，就是由拉瑟福德公爵在此進行。另外一個著名部門是由霍普金斯 Hopkins 講座教授領導下的生物化學實驗室，這個實驗室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纔顯露頭角，引起世人重視。在科學思想上，劍橋大學也分兩派。卡文迪什實驗室的物理學家所主張的是一個有趨向唯物論的機械論 mechanism，認為宇宙中一切現象都可以用原子和機械學來解釋。我的物理學老師亞歷山大 N. S. Alexander 講座教授也是在三十年代從卡文迪什實驗室出身。我記得很清楚他的一句話：「嚴格來說，一切不能用數和量表達的學問，都不是科學。」，可是一般生物化學家所主張的是一個新活力論。例如李約瑟不可能單靠機械論來解釋雞蛋變成小雞的過程。生物學家相信有一種活力 vital force 存在，令生物能夠控制或者決定自己的行動。1920 至 1939 年之間李約瑟的一位左翼同僚霍爾丹 J. B. S. Haldane 主張一個活力論。可是李約瑟在三十五、六歲時，曾站在機械論和唯物論的陣線上反對霍爾丹的論調。不過他的立場和物理學者的機械論也有所不同。其實根本上他是反對機械論的，說他是唯物論者比較恰當。後來李約瑟接受了懷特黑德 A. N. Whitehead 的哲學思想，他便試圖用有機體 organism 論來調和唯物機械論和活力論。他的有機體論有四個特點：(一)反對當時一般物理學家所用的機械論和唯物機械論，(二)接受達爾文的演化論，(三)贊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四)用綜合法多於用分析法。以上是我個人對李約瑟的科學思想的淺見。早年在亞歷山大教授的薰陶之下，我自然也曾經受過劍橋大學機械論派的一些影響，因此我對李約瑟的科學思想也許未能充份了解。

攻擊李約瑟最劇烈的人可算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史教授吉利斯皮 Ch-

arles Gillispie。這位教授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出版後就批評李約瑟。他首先承認自己對中國的事情毫無所知，但他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撰寫一般科學史的作者是不可靠的。李約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用馬克思的觀點來討論中國科技史，所以他的結論也是不可靠的。後來很少看到吉里斯皮教授攻擊李約瑟的書評。也許他不常遇到反映李約瑟的科學思想的結論，或者他沒有再看李約瑟後來出版的書。總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一半已經委託了許多合作者獨自撰寫。李約瑟從來沒有要求合作者的個人科學思想是和他本人的一致。我認為做學問應該從各方面觀察，纔可以獲得更深入的了解。既然李約瑟已經從有機體論講述中國科技史，我不想東施效顰，也不想採用西方的另外一套的機械論。我正在想著，假如試用中國傳統思想，是否可以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稍作補充呢？

談到這裏就引起『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重修問題。劍橋大學出版社已經作了一番考慮。初步的決定是，為著便利購買者，該社認為不應再出版這樣大規模的修訂本，但是樂意考慮出版李約瑟研究所提出的補充和修訂『中國科學技術史』任何一篇的專書。我認為這是該所將來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科學技術史』帶來一些副產品。李約瑟費了不少心血作了大量的卡片，詳細登載他鉅作中所引過的人名、地名、和專門技術名詞。為著全書保持劃一，避免重複，李約瑟每次遇到一個新名詞或者可疑的名詞，他必定翻閱他的卡片。這些卡片應該電腦化，以便參考和將來編寫中國科技辭書之用。

『中國科學技術史』已經有幾種語文的譯本，有些是全譯本，有些是節譯本，最受我們所重視的當然是中文譯本。率先發起的是臺灣譯本，繼而有大陸的譯本。據我所知，中譯本在翻譯上曾經引起許多問題。雖然翻譯『中國科學技術史』並不屬於李約瑟研究所的工作範疇，假如從事翻譯這部書的諸位先生、女士們覺得需要利用該所去找尋資料的來源、或者是討論一些翻譯上的問題，我希望他們沒有忘記剛才我提到的該所跟中央研究院的關係。

李約瑟研究所的工作絕對不能僅限於以上所述的事項。為著長久之計，該所正在考慮將來創辦一個有國際性的東亞科學史學報。我也考慮到將來該所指導劍橋大學研究生，甚至幫助某些大學部門開課的問題。該所的圖書館命名「東亞科技史圖書館」，可見李約瑟早有把該所的範疇擴大的意圖。我希望所內的研究工作將來可以擴大，包涵日本、韓國、越南各地區的科技史。

這些地區都曾受到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

最後我要簡單的介紹李約瑟研究所的起源和現況。1948年至1965年，李約瑟任劍橋大學生物化學教授 Reader 職，他本身是凱思學院的院士。他一面向大學領薪一面在凱思學院的 K1 和 K2 兩個研究室進行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他從各處的基金會申請到一些資助，補助他的早期合作者的生活費、有時還需從自己月薪拿出一部份以補不足。他從來沒有驚動劍橋大學和凱思學院。（我本人從馬來亞大學支薪，省了李約瑟很多麻煩。）1965年，李約瑟在劍橋大學已屆退休年齡。同年他被選為凱思學院的院長，搬進院長宿舍，裏面有充裕的房間。從此他利用院長宿舍作為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場所。

1968年，李約瑟成立一個信託會，將他的藏書和父親遺下的一幢樓房移給這個信託會。當時我在劍橋，適逢李約瑟正式簽署移交合約，他順便邀我去做見證人，所以我在合約上也簽了名。1976年李約瑟的院長職任滿，要搬出院長宿舍。凱思學院讓他保留以前的 K2 研究室。由於他的藏書越來越多，他捐出的樓房只可作藏書之用，而沒有地方讓研究者工作。劍橋大學出版社替信託會在出版社附近租了一座預製件房屋，作為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地點，命名「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不久劍橋大學出版社又買了一座比較寬敞的房屋，租給信託會。1978年夏天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就搬到這個位於勃洛克蘭道 Brookland Avenue 的新址。同年劍橋的羅賓遜學院 Robinson College 在其靠西的地段上提供一幅約半英畝的土地，讓東亞科學史信託會興建永久性館址，使東亞圖書館和羅賓遜學院建立密切關係。美國和香港亦相繼成立信託會，助募基金。從1979年至1986年，李約瑟到處奔波募集東亞圖書館的建築費用。1983年英國的信託會已在西爾威斯特路 Sylvester Road 購買了一幅連接羅賓遜學院所提供的地，出價十萬英鎊，其中八萬鎊由魯桂珍捐出。圖書館的藍圖亦已繪就，正待劍橋市政局的批准。同年劍橋成立了「李約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作為今後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和研究亞洲科學史的機構，由李約瑟任義務所長 Director，魯桂珍任無職權的義務所長 Associate Director（以前我把魯桂珍的職任譯為「副所長」，但是去年十二月，她對我說她不是 Deputy Director，不能替所長處理事務。）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附屬於這個研究所，另由一位圖書館主任負責管理。同年我也被委為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信託會香港分會的理事。香港分會的產生應歸功於“三李”：李勵生、李宗瀛和李守

基 Peter Lisowski。他們在1978年發起籌款在香港為李約瑟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建立助一臂之力，後來他們組織了這個基金會，請到香港醫學界名宿毛文奇擔任主席。目前該會的義務秘書是利榮康博士。

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藍圖有三座相連的房屋。正中一座和向北的一座已在1987年初落成。一百萬鎊的建築費絕大部份來自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新加坡華僑銀行永遠名譽總裁陳振傳爵士 Tan Sri Tan Chin Tuan 個人捐三十五萬英鎊。此兩座房屋安置東亞科技史圖書館以及供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用的研究室和辦事處。尚未建築的向南一座是將來用於安置訪問學人的八個研究室，和一個陳列室。建築費預算是六十五萬英鎊。英國信託會手上僅有大約二十萬鎊。正在想法向美國募捐。李約瑟的願望是能夠目睹這座房屋完成。

應付日常費用的資源主要是來自李約瑟自己捐出的著作版權費、從香港克勞齊基金 Croucher Foundation 募捐的二十五萬英鎊所獲的年息、從租出位於勃洛克蘭道 Brookland Avenue 的一座房屋所得的租金等。研究費則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可口可樂公司、日本學術振興會、新加坡李氏基金會等。1984年、1986年，李約瑟訪問臺北和北京也先後獲得一些資援。在財政方面，李約瑟研究所不靠劍橋大學，也沒有獲得英國政府的資助。

目前李約瑟研究所的開支大約是一年十三萬英鎊。李約瑟和魯桂珍兩位從來不支薪。該所也沒有足夠資源用來發給所長的月薪。受薪工作人員有圖書館主任一名，打字兼文書一名，編輯兼行政助理二名，圖書館助理一名。

李約瑟研究所的資源僅可以維持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進行其他的計畫就要靠外援。我預料一小部份的資助可以來自香港。我也希望將來能夠籌募一筆錢，用以幫助劍橋的信託會，讓它有足夠資金聘任我將來的繼承人。

以上是我對本題向中研究作出的第二次報告。希望諸位先進不吝賜教。第一次的報告對此次報告有深刻的意義。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在本院提出第三次的報告，反映今天向諸位討教的收穫。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一九二七年的中德關係

郭 恒 鈺*

1927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捩點。這個轉捩點表現在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中，諸如北伐戰爭，上海清黨，國共統一戰線的破裂，寧漢由分裂到重新合作，最終導致在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統一中國。這些在內政上的重大變化，也影響了中國的對外關係。

在對外關係上，主要是中國的北方政府和南京的國民政府對英、美、日等列強的關係。在當時，對中國來說，德國還扮演著——正如德國人自己所形容的——「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不過，1927年中國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從這一年德國對華政策的瞭解中，我們可以對此後中德關係的發展得到很多啟示。

威瑪共和國在二十年代的外交政策，深受史特雷思曼（Gustav Stresemann）的影響，它的目的是為戰敗德國重新取得民族主權地位，並且通過德國與西方簽訂的保證協定（1925年10月的羅諾加協定）和同東方的中立協定（1926年4月同蘇聯簽訂的柏林協定）來實現這一目的。這兩個協定也間接地規劃了威瑪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內容和範圍。德國的對華政策也就不能超出這個框框，那就是「嚴格的中立路線」。^①從這個中立政策出發，德國企圖在不加入任何一個在中國積極活動的列強集團的情形下，獲得在中國問題上的發言權。^②因為德國在1921年5月20日的中德條約中，一如凡爾塞和約所要求那樣，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治外法權，藉以恢復和平關係，所以德國政府也希望通過廢除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來改變中國和列強之間的不平等

* 西德柏林自由大學教授

- ① Der Staatssekretär des Auswärtigen Amts von Schubert an die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Telegramm Nr. 134 vom 28. Juli 1927, Nr. IV Chi. 1080 (Film nummer 4558/E 150711-12), 參見：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ADAP), Göttingen 1974, Serie B, Bd. VI, Nr. 73, S. 149.
- ② Aufzeichnungen des Vortragenden Leagtionsrats Trautmann über den Beitritt zum Washington-Abkommen vom 30 Januar 1926 (4558/E 150 260-66), in: ADAP, ebd., Bb. III, Nr. 41, S. 82 參見；Schuberts Telegramm Nr. 1 vom 5. Januar 1926 an die deutsche Botschaft in Tokio (3088/D 623 327), 同上，S. 81, Anm. (1).

關係。③基於這一立場，德國應美國政府的邀請，④並「事先得到駐北京公使鮑耶（Adolf Boyé）的同意」，⑤加入了華盛頓條約。⑥

德國之所以加入華盛頓條約，正如公使館參贊米歇爾森在一份備忘錄所闡明那樣，是期望「今後我們又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來參加各國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談判。在對中國的關係上，我們可以得到成果，如果中國終於能夠承認德國是一個其他國家都努力尋求與其建立友誼和合作關係的強國。因此，中國應該放棄藐視德國的政策。這樣做，對中國是有益的。中國這種藐視德國的態度主要表現在履行條約義務方面猶豫不定，應付了事，以及在國際聯盟對德國所採取的敵對態度。」⑦

中國，也就是當時與德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北方政府，抗議德國加入華盛頓條約。因為德國已於1921年同中國在相互平等的原則上締結了兩國條約，如今德國加入被中國人視為不平等條約的華盛頓條約，這對中國來說，無異違反了中德條約的平等精神。⑧

儘管中國方面提出了抗議，米歇爾森還是確信德國加入華盛頓條約對中德關係的發展還是有益的。因為此後的事態顯示，中國也的確在努力改善對德國的友好關係。⑨他指出，中國和德國在國際聯盟的緊密合作，即為明證。⑩

德國加入了華盛頓條約以後（這個條約在1926年底，德國國會還未批准），就產生了由於中國北伐戰爭所引起的新形勢，是否要修正德國的對華政策的問題。

在1927年德國的外交檔案中，已經觸及到一些對三十年代中德關係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這主要是承認國民政府，向其提供軍火以及聘用德國軍官擔任顧問的問題。這些問題又涉及德國的中立政策。認識德國外交官

③ Runderlaß des Staatssekretärs des Auswärtigen Amts vom 30. November 1926, Nr. IV Chi. 2404 (4558/E 150 345-46), ebd., Nr. 239, S. 478.

④ 參見註②，Nr. 41, S. 82.

⑤ Das Auswärtige Amt an die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Telegramm Nr. 99 vom 15. Februar 1926, 3088/D 623 366.

⑥ 參見：Aufzeichnung des Gesandtschaftsrats Michelsen vom 2. Dezember 1926 (5265/E 321 083-86), in: ADAP, a. a. O., Bd. III, Nr. 240, S. 479.

⑦ 同上，第480頁。

⑧ Aufzeichnung des Vortragenden Legationsrats Trautmann vom 24. März 1926 (4558/E 150 331-35), ebd., Nr. 97, S. 183, 185; vgl. S. 83, 84.

⑨ 參見註⑥，頁480。

⑩ 同上，頁481。

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和他們對中國形勢的判斷，對於理解當時及此後中德關係的發展是非常有啟迪意義的。他們始終是從德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同英國和蘇聯的關係著眼，來處理中德關係的。對中國，他們竭力嚴守中立政策。以下，我們從德國外交檔案來看看1927年的中德關係。

一、承認國民政府問題

國民政府從1926年7年開始北伐。出乎意料地，國民革命軍在幾個月之內，把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推展到長江流域。換句話說，1926年下半年的軍事發展，導致了中國內部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根本改變。

德國外交部在1926年12月9日的一封電報中，指示駐北京的德國公使鮑耶，立即報告中國的情勢，並通知他說：「我們的看法是必須及時地考慮到由於南方軍隊的勝利而出現的有利於廣東的力量轉移。如果我們對於因廣東政府建立關係一事等待過久的話，那末我們在中國的政治地位也許就會遭到極端惡化的危險……。因此，我們應該對於承認廣東政府一事，認真考慮，即使不先於其他列強給予承認，那至少也要與其他列強同時或緊接著對此事表態……。假如你不同意這個立場，務請說明，我們如何使對日益強大的廣東黨深表同情的輿論能夠理解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猶豫不定的態度。」^①

在答覆這封電報之前，鮑耶公使在1926年11月26日關於承認國民政府問題的報告中所得的結論是：「我覺得對德國來說，擺在面前的道路很清楚：耐心地等待其他國家的行動；我們既不要搶先，也不要不恰當地落後他人。在歐洲的政策迫使我們和其他列強聯繫在一起。在中國由於我們的微妙地位，也不得不這樣做……。即使我們過早地承認國民政府，它也肯定不會為我們付出任何代價，用以補償北洋政府對我們的刁難和列強對我們的疏遠。並且他們也不會因為我們的承認而接受任何特殊條件。不論如何，這個問題目前還不是急待解決的。」^②

鮑耶公使在1926年12月13日答覆外交部上述電報的回電中，再次強調了對承認問題保持靜觀待變的立場：「德國人民應該清楚，與其他列強相比，

^① Telegramm Köpkes vom 9. Dezember 1926 (4558/E 150 356-57, auch 3088/D 623 395-96), ebd., Nr. 245, S. 491-92, Anm. (1).

^② Boyés Bericht vom 26. November 1926 (K1961/K508 515-21), ebd., S. 492, Anm. (2).

特別是在中國人的眼裏，德國人在中國只是扮演一個毫不重要的角色。我們在這裏沒有任何政治目的，同其他列強的巨大利益相比，我們的經濟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我們除了想和平地進行貿易以外，別無他求。因此，我們的政治方針是：不干涉中國內部的爭端和黨派，格外謹慎，同所有在這裏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列強保持中立。包括蘇聯，同主要列強相比，我們的承認，對南方政府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也只能得到些許感激之情。中國人是冷酷的現實主義者。如果我們很禮貌地用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實現我們在政治上的要求，這要比我們用一廂情願的友誼跟在他們的後面還能從中國人那裏得到更多的諒解和尊重。雖然我們之間簽訂了友好的平等條約，但是中國人對我們迄今未有任何偏愛。」^⑬

在外交部1927年1月8日關於「中國的軍事、政治形勢和新的英國對華政策」的備忘錄中，國民政府是分析中國局勢的重點，同時也強調了蘇聯的影響。根據這份備忘錄，北伐之所以可能，乃是依靠與蘇聯的合作。蘇聯不僅向廣東提供了金錢、武器和彈藥，而且他們也把關於組織陸軍、行政機構、工人和農民團體的全部經驗提供給南方政府。此外，蘇聯還提供了必要的軍事和行政顧問，甚至蘇俄的術語也被中國人接納了。在中國人們開始把那些根據舊條約在中國享有優越地位的外國說成是「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列強」，並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⑭外交部這個論斷的根據，是蔣介石的一次「答記者問」。依照備忘錄中的「答記者問」，蔣氏說他是依照蘇聯模式的委員會制度建立政府，拒絕美國式的民主政體。蔣氏要求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放棄一切特權和租界，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締結新約。^⑮

外交部根據這一「答記者問」，就在備忘錄中做出結論說：「雖然沒有表面上的布爾什維克化，但是政綱除了包涵純粹的民族基本路線外，毫無疑問地，還含有蘇俄思想的明顯痕跡。在漢口被廣東政府佔領後，組織了百餘工團聯合會和工人協會，與此關連的，似乎一時還採取了構成威脅的罷工和

^⑬ Der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142 vom 13. Dezember 1926 (K 1961/K 508 508-10, auch 3088/D 623 401-03), Nr. IV Chi. 2569, ebd., S. 492-93.

^⑭ Aufzeichnung über die militärpolitische Lage in China und die neue englische Chinapolitik vom 8. Januar 1927, an sämtliche Missionen außer Peking, Nr. IV Chi. 2697, 3088/D 623 409-26 (auch 4558/E 150 380-97), D 623 413-14/S. 3-4.

抗英集會，諸如此類的活動都說明蘇俄對廣東局勢的影響特別強大。不難想像，蘇俄是想利用廣東政府作為反英的武器，以打擊英國的弱點。」^⑮

根據外交部的分析，國民革命軍迅速獲勝的理由是「完善的組織、思想和意志」，它的勝利也使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推到長江流域，從而導致列強在對華政策上的轉變。此外，北伐取得了勝利，也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和國家意識，因此，取消治外法權的要求，也就回應強烈，而這些要求通常是以英國為主要對象的。這是因為英國在中國擁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英國也制定了對華政策的基本路線，而其他國家的在華活動又都以英國的對華政策為行動準繩，德國也不例外。

德國外交官認為，英國政府在1926年12月18日的備忘錄中，已經清楚地闡明了英國的新對華政策。英國從巨變的中國局勢出發，認為北方的中央政府幾乎已不存在；人們不得不以同情和諒解的心情去迎接一個強大的民族運動的興起。因此英國政府建議，一旦中國人自己建立起一個有力的政府，列強就應該同意修訂舊約，並針對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同中國進行談判。^⑯

英國雖然在這份備忘錄裏對國民政府的評價很高，但在形式上，還是針對南北政府而發出的。英國準備單獨承認南方的國民政府為地方政府，可是國民政府卻堅持要求承認它是中國的中央政府。

對於列強之於承認問題的態度，德國外交部的分析是：英國的這份備忘錄是針對整個中國而寫的，這就使英國可利用一個地方軍閥去反對另一個地方軍閥而從中獲利^⑰，美國似乎只想同一個擁有對全中國行使軍事和行政權力的政府簽訂協約。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對予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過激的廣州政府還有著一種情感上的厭惡」。^⑱從這一動機來看，法國的立場與美國相去不遠，因為法屬印度支那接近「華南瘟疫中心」的廣東。民主主義激進思想可能侵入法國殖民地的危險，使法國對廣東政府不得不抱有謹慎地態度。^⑲至於日本仍想繼續通過同中國簽訂關稅協定尋求特殊利益。因此，日本不會參與華盛頓政策，而將是不變地遵守1922年的舊政策，以期重新恢

⑮ 同上，D 623 417-18/S. 7-8.

⑯ 同上，D 623 418-19/S. 8-9.

⑰ 同上，D 623 420-21/S. 10-1.

⑱ 同上，D 623 425/S. 15.

⑲ 同上，D 623 423/S. 13.

⑳ 同上，D 623 423-24/S. 13-14.

復關稅會議，討價還價。^②德國外交部認為，引人注目的是，蘇聯至今還沒有宣佈承認廣東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廣東政府理應隨時都可先得到承認，但是蘇聯似乎不得不考慮，由於過早的承認廣東政府將會危害它在滿州的權益，遭到張作霖報復的危險。另外，蘇俄相信，只要廣東還不是北方的主人，它的友誼是可靠的。因此，蘇俄的對華政策含有「分而治之」的意義。^③

根據德國外交人士的看法，1927年初的中國政局，仍然動盪不安。在中國方面，還無法確定指出何方勢力掌握大局。德國已經置身於華盛頓關稅協定與舊條約之外，並且早已放棄在華的各項特權。因此，德國外交部在上述1927年1月8日的備忘錄所做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以謹慎的態度與中國所有的政權建立良好的關係。此外，要執行『靜觀待變』的政策，我們不能採取政治主動。如果英俄在廣東問題上的對立尖銳化，那末我們就更要持審慎的態度了。」^④

德國外交官認為，這種「靜觀待變」的政策，其本質並不是被動的，因為情勢的發展可能使德國捲入某種行動之中，而德國就必須針對此一未來發展而有所準備，「即同其他列強一起承認那個最終保留下來的政府，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在承認的同時締結一個新的貿易協定，而這個協定又能夠成爲此後中國同其他國家簽約的樣板。問題是，這個目的能否在廣東政府依然持有激進觀點的情況下得到實現」^⑤

以上是德國外交部對1927年初的中國局勢和列強對承認問題的分析。對此，我們應該給予一些說明。

德國外交部的這份具有重大政策性意義的備忘錄，主要是根據來自倫敦、華盛頓、莫斯科、東京和北京的報告而撰寫的，而鮑耶公使的影響尤爲顯明。關於中國局勢的分析，主要著眼於蘇俄對國民政府的影響，並以英俄在中國的對立爲出發點。

「完善的組織、思想和意志」，毫無疑問地是國民革命軍在短短數月獲得輝煌勝利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⑥另外也無法證實，蔣介石在一次

^① 同上，D 623 424/S. 14.

^② 同上，D 623 425/S. 15.

^③ 同上，D 623 426/S. 16.

^④ 同上。

^⑤ Kuo Heng-yü,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Paderborn 1979, S. 148-49.

答記者問」中（關於這次記者訪問，備忘錄未作進一步的說明），要求按照蘇俄的委員會制度來建立國民政府，德國外交官沒有瞭解「以俄為師」的真正目的^⑳，從而誇大了蘇俄對中國南方的影響。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也不是從蘇俄那裏搬來的口號，它是國民政府同時也是北方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㉑1921年中德簽訂的關於恢復和平狀態的友好條約，可以說明這一點。漢口的工會活動和反英罷工，也不能用來說是整個「廣東政權」的政策，因為自1926年底起，武漢與南昌的緊張關係日趨尖銳，反蔣運動也不斷升高。換句話說，接近1926年底時，對「廣東政權」就不能不加以區別而一概而論了。^㉒

對蘇聯想利用廣東作為反對英國的武器，藉以打擊英國的這種推想，也只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一面。至於中國，蘇聯與國民黨的合作，具體表現在1923年至1924年的國共統一戰線。蘇聯當時在中國推行此一統一戰線的目的是，利用中國的反帝民族運動來為他們的民族利益服務。^㉓德國高估了英蘇在中國的矛盾，又和其他列強一樣高估了蘇聯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

由於國民革命的勝利越來越明顯，中國和列強之間，圍繞著有關關稅協定、關稅自主以及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而展開的爭論，也日益激烈。德國外交部在1927年3月20日的一份備忘錄裏，論述了這些問題：「最新的發展顯示，除形式上的問題之外，又出現了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實質問題，而這些問題又直接影響了外國在中國的基本路線。」根據1921年的中德條約，德國無權參與關於重新恢復中國主權的爭論，對於這個不斷提高民族意識覺醒的中國，德國「抱有同情」，但必須嚴守中立的態度。^㉔在承認問題上，德國外交部在這份備忘錄中，再度強調了迄今業已表示過的立場：「嚴守始終遵循的、決不干涉中國內政和外交事務的基本原則。德國政府相信，中國正常發展的過程，決不允許由於不適時機地提出承認問題而受到干擾。國際公法規定在什麼是適當的、應給予承認的時候。只要時機一到，我們將毫不猶疑

⑳ 參見：Aufzeichn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über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China (bis Ende 1927) vom 25. Januar 1928, 3088/D 623 562/S. 10.

㉑ 參見：Aufzeichn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vom 25. Januar 1928, 同上，D 623 573/S. 21.

㉒ Kuo, S. 283.

㉓ 同上，頁7。

㉔ Aufzeichnung des Auswärtigen Amtes vom 21. März 1927, 4558/E 150 498-99/S. 1-2.

地宣佈承認。在這件事情上，決不落人之後。^④在這裏，備忘錄提到，駐漢口的德國總領事，已「和南方政府有著官方往來。」^⑤

1927年3月，武漢與南昌之間的矛盾和反蔣運動，隨著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而達到高潮，蔣介石被排除在黨和政府的「集體領導」之外，但沒有解除軍權，他仍然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⑥三月中全會後，蔣介石致力於同北方及英日進行諒解，以便取得在同莫斯科決裂時的外交活動餘地。^⑦

德國外交部在1927年4月7日的備忘錄中指出，隨著上海（1927年3月22日）和南京（1927年3月24日）的攻占，外交形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⑧關於三中全會，備忘錄認為：「看起來，有一段時期，國民黨的激進分子與溫和分子之間的對立，可能導致他們關係的破裂。這個危機似乎已被克服，也許那只是暫時的。蔣介石將軍和外交部長陳友仁服從了三中全會的決議。」^⑨這是一個錯誤的論斷，外交部不久就修正了這個看法。

備忘錄繼續指出，基於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局勢的演變，德國從危機開始時就在中國各黨派相互之間的鬭爭和中英矛盾中遵循了「嚴守中立」的基本原則和保持了「不介入的第三者」的立場。德國最關心的是，德國在中國混亂的情況下處於困境的貿易利益。因此，德國希望在中國各黨派之間，特別是英國與南方政府之間不久能達成諒解，以保證中國市場的和平發展。「將來我們也將堅持迄今遵守的嚴格的中立態度，決不採取可以認為是偏袒任何黨派的措施。」^⑩

在1927年3月底至4月初，也就是四一二清黨那段緊張而又關鍵的日子，德國駐上海的總領事狄爾（Fritz Thiel）直接向柏林發出四封電報：

3月30日 「蔣介石的國民黨右派已經開始進行反共活動。」^⑪

4月2日 「山雨欲來風滿樓，蔣及溫和派民族主義分子的決心說明，

④ 同上，E 150 499/S. 2.

⑤ 同上，E 150 501/S. 4.

⑥ Kuo, S. 283-84.

⑦ Domes, Jürgen, *Vertagte Revolution. Die Politik der Kuomintang in China, 1923-1937*, Berlin 1969, S. 190.

⑧ *Aufzeichnung des Auswärtigen Amts über Allgemeine Lage in China vom 7. April 1927*, 4558/E 150 577/S. 2.

⑨ 同上，E 150 582/S. 7.

⑩ 同上，E 150 589-90/S. 14-15.

⑪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27 vom 30. März 1927*, E 150 509-510.

他們有能力維持秩序和鎮壓共黨影響。」^③

4月3日 「蔣對擾亂分子採取果斷措施，解除了中國人居住區域內的工人武裝。」^④

4月8日 「局勢尖銳化」^⑤。

狄爾總領事的電報也同時抄送駐北京公使館，與狄爾的報告相反，鮑耶在4月2日發給柏林的電報說：「當前，南方革命政府完全掌握在共產黨的俄國顧問手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溫和的民族主義方向能否貫徹，還是疑問。而承認問題又與這一點有密切關連。」^⑥鮑耶在他發給外交部的這封電報中，毫不掩飾他對共產主義和受共產黨影響的國民政府的厭惡。

鮑耶報告的資料來源，主要是新聞報導和在中國的西方外交官，特別是英國外交官對中國局勢的判斷。根據蘭普森（Sir Lampson）的消息，鮑耶在另一封電報中說：英國已經中止對國民政府的「和解政策」，「這個政府已經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一個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控制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委員會……許多人對蔣介石的反共傾向寄予希望，但是有可靠的資料證明，蔣介石的軍隊在南京『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進行了排外的暴力行動。」^⑦

四一二上海清黨。當天狄爾總領事從上海發出報告說：上海「事件證明，蔣介石同共產黨的決裂是認真的，另外也有很多徵候證明此點。」^⑧在另一封電報中，狄爾認為「蔣的行動已使共產黨的煽動宣傳失去支柱。」^⑨「新政府的改組主要是針對武漢和佔優勢的共產黨的影響。」^⑩

③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28 vom 2. April 1927, E 150 519-520.

④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30 vom 3. April 1927, E 150 529.

⑤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38 vom 8. April 1927, E 150 602.

⑥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100 vom 2. April 1927, E 150 521-22.

⑦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95 vom 30. 3. 1927, E 150 507-508.

⑧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40 vom 12. April 1927, E 150 641-42.

⑨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44 vom 15. April 1927, E 150 661.

⑩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46 vom 19. April 1927, E 150 670.

四天後，鮑耶才從北京發出電報，報告有關上海四一二清黨事件，但避重就輕，沒有指出這次事件的政治意義：「政府於星期五晚，動員強大的兵力解除了工會和肇事士兵的武裝。在暴力衝突中，特別是在與鐵路工人的衝突中，逮捕了工會領導人和無數肇事者。這些鐵路工人不久前曾大力從事宣傳鼓吹活動。許多人在這次衝突中死亡。」^{④⑦}

四一二清黨這一歷史事件，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是沒有影響的。但是美英兩國依然沒有改變他們對蔣介石的懷疑態度。鮑耶在四月十五日的一份電報中指出，美國的駐北京公使麥克莫里（John MacMurray）對他說，「向蔣介石發出的五國照會『有關南京事件的照會』不過是通知蔣的副本……人們只是希望減少蔣的困難而已。但對蔣本人的政治色彩和企圖還不能不持有很大懷疑。」^{④⑧}

駐英德國大使史泰姆（Friedrich Sthamer）從倫敦報告英國關於中國局勢的判斷：「最新形勢的發展又把中國重新推入了軍閥混亂不息的從前狀況。在他們之中，根本沒有一個人可能被視為中國的代表者。」^{④⑨}對蔣介石，英國人表現出「普遍的憂慮和不信任。」^{⑤⑩}

關於當時日本的態度，狄爾總領事相信，爲了不破壞蔣介石反對共產黨的努力，日本需要北方。^{⑤⑪}

四一二政變的一個月後，鮑耶公使才詳細地敘述了中國的「當前形勢」，並報告說，列強對蔣介石的看法和態度並不一致，蔣介石可能是未來的獨裁者，也可能是革命政府的最高政治人物。^{⑤⑫}

1927年7月，武漢分共，寧漢統一。8月中旬，蔣介石宣佈下野，根據德國外交部關於「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至1927年底）」的分析，「蔣介石下野的理由要從國民黨的組織和委員長的個性中找出。因爲從這個黨的產生

④⑦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136 vom 16. April 1927, E 150 662.

④⑧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135 vom 15. April 1927, E150 660.

④⑨ Der deutsche Botschafter in London Sthamer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270 vom 20. April 1927, E 150 671-72.

⑤⑩ Der deutsche Botschafter in London Sthamer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268 vom 20. April 1927, E 150 675.

⑤⑪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44 vom 15. April 1927, E 150 661.

⑤⑫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162 vom 11. Mai 1927, 3088/D 623 690.

和世界觀來看，它植根於中國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社會階層裏。在這個社會階層裏，人們有時也用激進主義思想來出出風頭，或者是用這種思想來對付他們的政敵。其實他們是拒絕這種思想的，並且也懼怕這種思想的實現。至於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這點，人們的想法也是如此。」⁵³

根據備忘錄的論述，蔣介石之所以向共產主義挑戰，並且與武漢斷絕關係，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位年青的軍事領導人在取得輝煌的軍事成果之後，不再滿意三中全會的決議，做一個依附於黨和政府的工具。⁵⁴

備忘錄認為，蔣介石的下野和武漢分共，在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此一「根本的變化」的結論是：「與蘇俄分手後，國民黨失去了組織上的內聚力，或者是如人們所說，失去了它的『政治靈魂』。一些將軍和政客，集團和派系的野心，權力慾和掠奪慾，從此以後將無限制的膨脹，集中全力去奪取對手的權力。曾經承諾給予中華民國人民以民主自由和重新恢復國家統一的南方政府，已經蛻化而為腐敗無能，實行暴力和鎮壓，比北方政府尤過之而無不及……」⁵⁵

這雖然是一段立場明確的陳述，然而並未論及1927年以來國民黨的根本變化。從武漢分共到寧漢統一象徵國民黨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同時也意味著國民革命面臨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備忘錄卻指出：「自從南方政府崩潰以來，承認南方政府的問題已經時過境遷了。如果今天南方政府要求重新恢復中國主權和自治的話，那麼人們不會把這些要求看得比北方所提出來的類似要求更重視。」⁵⁶

上面提到，1927年初，德國外交官把中國政府恢復主權的要求，說是受了蘇俄的影響。到了1927年底，他們才認識到：「儘管國民黨內部崩潰，儘管南北進行戰爭，儘管缺少一個被人承認的中央政府，但是所有的中國軍閥在以下這一點是一致的，即必須利用每一個機會實現中國向締約國提出主權和經濟自主的要求，和逐漸從這些國家手中奪回他們自己的權利。」⁵⁷

武漢分共後的新形勢，並未影響德國對中國的關係。德國在列強與中國

⁵³ Aufzeichnung über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China (bis Ende 1927) des Auswärtigen Amts, an sämtliche diplomatische Vertretungen mit Ausnahme von Peking, Nr. IV Chi. 138, 3088/D 623 562/S. 10.

⁵⁴ 同上，D 623 562-63/S. 10-11, vgl. Anm. 36.

⁵⁵ 同上，D 623 563/S. 11.

⁵⁶ 同上。

⁵⁷ 同上，D 623 573/S. 21.

的爭執中竭力保持中立和不介入爭端的立場。但實際上，德國卻分享了締約國所擁有的經濟特權。

德國外交部在關於「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1927年底）」的備忘錄中，就明白指出：「中國人要聰明地認識到，這種特別謹慎處理德國的做法，可以成爲締約國考慮將來放棄他們的特權而效法的榜樣。所以我們的地位的這一特殊性，是對我們有利的。」⁵⁸

1928年4月，鮑耶調職返德。新任公使布爾（Uon Borch）8月作爲第一個外國公使訪問了國民政府的首都，他在南京逗留的期間，於8月17日同國民政府簽訂了一項條約。通過這項條約，德國政府終於承認了國民政府。⁵⁹

二、軍火與顧問問題

在承認國民政府問題和對於中國與列強的糾紛上，德國竭力嚴守中立政策。但在其他問題上，諸如國民政府對於關稅自主的要求、德國公司販賣軍火和南京聘用德國軍事教官等問題上，如何履行「絕不干涉中國內政和外交的基本原則」這一點，在駐北京的鮑耶公使和柏林外交部之間，不是沒有摩擦和意見分歧的。

1927年6月底，國民政府決定實行關稅自主，把港口停泊費提高了百分五十。這在締約國中間引起了不滿和抗議。駐上海的外交領事團提出動用列強軍艦的建議，「作爲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對犯有過失的中國政府採取直接的行動。」⁶⁰

駐上海德國總領事狄爾詢問鮑耶公使，在這種情形下，對德國商人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並補充說：「如果德國接納上述的相應做法，就必須首先取得列強海軍對德國船隻及其靠岸進行保護的協議。這樣就得放棄我們迄今遵守的政治路線。」⁶¹狄爾的意思是，抓住機會，避免德國處於不利的地位。

⁵⁸ 同上，D 623 574/S. 22.

⁵⁹ Chen Chi,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bis 1933*, Hamburg 1973, S. 104.

⁶⁰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202 vom 26. Juli 1927, E 150 708-09/S. 1-2; vgl. hierzu: ADAP, a. a. O., Bd. VI, S. 149, Anm.(2).

⁶¹ 同上，E 150 709/S. 2.

「因爲」，狄爾特別指出，「我們不能用強權手段來保護我們的利益。」⁶²

鮑耶公使同意狄爾總領事的看法，並且在他關於這個問題向柏林發出的電報中指出，他將指示德國商人，以其他列強爲例，拒絕交付提高的港口停泊費用，同時總領事狄爾將與列強海軍協議保護德國船隻。⁶³

德國公使和總領事的行動，明確表示，這是開始放棄迄今履行的嚴守中立的政策，它也顯然違反 1921 年中德條約的精神。鮑耶所持的理由是：「對付中國人在這次事件和過去的類似事件上，所表現出的傲慢無理和沒有理性的行爲上，值得推薦的是，我們的利益不能完全聽任中國無理行動的擺布，並且避免從開始就冒著要從此後的政府那裏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危險。」⁶⁴

但是，柏林外交部沒有接受來自北京和上海的建議。外交部在一封電報中指示駐北京公使館，不要與其他締約國進行協議，動用國際海軍保護商船來對抗國民政府的措施，換句話說，不能放棄德國嚴守中立國政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德國商人應在抗議下交付提高了的港口停泊費。⁶⁵在電報中，外交部特別指出參與列強行動可能給德國帶來的不利後果：「如果締約國要駁回中國對條約權力的侵犯，那麼他們始終是期待我們能夠站在他們那一邊。而我們只是依據實際的，而不是依據法律上的最惠待遇分享了這些條約權利。如果我們在這次事件承擔了酬報的責任，在將來，那我們就幾乎無法拒絕締約國今後提出一致行動的任何要求。」⁶⁶

鮑耶接受了來自柏林的指示，但並不同意外交部的觀點。他很勉強地同意靜觀事件的發展。在回電中，鮑耶說：「但願不會因爲我們顧慮到令人擔憂的政治後果……而犧牲了德國的現實利益，從而使我們陷入比今天在中國的情況更爲不幸的孤立之中。」⁶⁷

從柏林和北京之間的外交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外交部和北京公使館

⁶² 同上。

⁶³ 同上，E 150 709-10/S. 2-3.

⁶⁴ 同上，E 150 710/S. 3.

⁶⁵ Der Staatssekretär des Auswärtigen Amts von Schubert an die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Telegramm Nr. 134 vom 28. Juli 1927 auf Nr. 202 vom 26. 7. 1927/Peking, zu IV Chi. 1810 (4558/E 150 711-12), in: ADAP, Bd. VI, Nr. 73, S. 149-50.

⁶⁶ 同上，頁 149。

⁶⁷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205 vom 4. August 1927 auf Nr. 134/Berlin, E 150 728/S. 3.

不僅對中國形勢的判斷和提出的主張不盡相同，而鮑耶又企圖影響德國的東歐政策和對華政策。他警告外交部要注意德國新聞界發表反英評論，^⑧和過度親俄的立場，^⑨都會使德國的對華政策和歐洲政策陷入困境。

此外，鮑耶又認為柏林外交部未能推行理智的對華政策。因此，他建議，在這關鍵性的時刻，任用一位資深的、「有權威的、能冷靜考慮作出政治判斷」的人，負責制定外交部的對華政策。^⑩

外交部給鮑耶公使的答覆說，德國的外交政策既不親俄，也不親英，而是儘可能地從英俄之間的爭端中擺脫出來。在中國，德國必須嚴守中立，不同的新聞報導，祇是表明要求外交政策妥協的一種壓力。^⑪至於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部在外長的直接領導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予以處理。^⑫

1927年初，英俄在中國的對立不斷提升。英國懷疑德國政府是同情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甚至認為德國用提供軍火的方式給予物資支援。^⑬關於這個問題，鮑耶在一封電報中特別指出：「提供軍火一事，通過路透社的傳佈，在中國已是人人皆知，這是對德國事務最嚴重的損害。」^⑭

所謂德國提供軍火，實際上是過境武器，而大部分又都落到北洋軍閥政府的手裏。祇有一小部分運到南方。^⑮幾年來，德國向中國各方提供軍火一事，已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英國的猜測顯然有誤。爲了統一論點，外交部在一封發給駐倫敦德國大使館的電報中說，提供這些武器，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純屬生意；德國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商人從事這種可以獲得鉅額利潤的生意。此外，根據凡爾塞條約，德國生產的軍火出口是不受限制的。不過，外

⑧ Boyés Telegramm vom 11. April 1927 (4558/E 150 643-45), in: ADAP, Bd. V, S. 183, Anm. (2).

⑨ 同上，頁 182。

⑩ 同上，頁 184，註⑨。

⑪ Der Staatssekretär des Auswärtigen Amts von Schubert an die deutsche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Telegramm Nr. 90 vom 14. April 1927 (4558/E 150 657-59, auch 3088/D 623 478-80), Antwort auf Tel. Nr. 127/ Peking, in: ADAP, Bd. V, Nr. 84, S. 183.

⑫ 同上，S. 184-85.

⑬ Ministerialdirektor Wallroth an die deutsche Botschaft in London, Telegramm Nr. 93 vom 12. Februar 1927 (K 1961/K 508 814-15), e.o. IV Chi. 394, in: ADAP, Bd. IV, Nr. 135, S. 295.

⑭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19 vom 13. Januar 1927, E 150 419.

⑮ Aufzeichnung des Auswärtigen Amts über die Waffenlieferungen nach China vom 7. April 1927, E 150 594/S. 3.

交部在電報中指出，德國政府將採取一切措施來阻止危害德國政治地位的軍火生意，但是政府沒有充分的法律根據。^{⑦⑥}

鮑耶不同意外交部的立場，要求有效地、無條件地禁運軍火。否則長久下去，德國的尊嚴和威望將受到嚴重危害。^{⑦⑦}鮑耶更進一步地警告外交部不要為阻止重新制定法律草案而承擔任何責任。^{⑦⑧}

不僅英國報紙，就連俄國的新聞也攻擊德國，因為德國商人把武器運給北洋軍閥。蘇聯駐柏林大使，在1927年4月2日還為了這件事與德方外交官晤談。^{⑦⑨}外交部認為英俄的猜測純屬「無理取鬧」。^{⑦⑩}

為了制止軍火運華，外交部曾考慮制定一項法案，^{⑦⑪}但是需時較多，最後決定由有關團體提出保證，不再經過德國港口或是在德國領土以外用德國船隻向中國輸送軍火。^{⑦⑫}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1925年輸入中國的軍火總值為兩千五百萬馬克。其中德國占一千三百萬馬克，多於總數的一半。^{⑦⑬}由於軍火生意利潤高，德國商人雖然向外交部提出了保證，仍繼續繞道提供中國軍火。1927年發生了兩件德商運輸軍火案，一件引起糾紛。

1927年8月底，挪威船「阿克號」(Aker)把三千五百箱軍火運到青島。這些軍火是在奧斯陸(Oslo)裝船的。裝運人是從事東亞貿易的德國公司。第二件是二萬五千支步槍和彈藥，也是在奧斯陸裝上挪威船「斯庫勒號」的(Skule)。1927年12月底，「斯庫勒號」到達青島卸貨。賣主是從事東亞貿易的德商卡羅維茨(Carlowitz & Co.)和西馬森(Siemasen & Co.)公司，軍火是1918年停戰時德軍在比利時留下的毛瑟式步槍，大概是比利時政府把這些槍賣給比國公司，比國公司又賣給德國人，然後由比利時運到奧斯

^{⑦⑥} 參見註^{⑦⑤}，頁296。

^{⑦⑦} Der deutsche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Telegramm Nr. 77 vom 14. März 1927 (4558/150 495-96), in: ADAP, Bd. IV, Nr. 247, S. 545.

^{⑦⑧} 同上。

^{⑦⑨} Aufzeichnung des Staatssekretärs des Auswärtigen Amts von Schubert vom 2. April 1927 (4558/E 150 516-18), in: ADAP, Bd. V, Nr. 56, S. 123-25.

^{⑦⑩} Aufzeichnung des Staatssekretärs des Auswärtigen Amts von Schubert vom 21. April 1927 (4558/E 150 673-74), ebd., Nr. 94, S. 216.

^{⑦⑪} 參見註^{⑦⑤}，E 150 592/S. 1.

^{⑦⑫} 同上，E 150 592-93/S. 1-2.

^{⑦⑬} Aufzeichnung über Waffenverschiffung nach China vom 25. Januar 1928, 3088 /D 623 578/S. 1.

陸，再轉口運往中國。^④

國民政府就「斯庫勒號」船運軍火提供北洋軍閥一事，向駐上海的德國總領事館提出抗議。根據新聞報導，國民政府決意封閉運送軍火的公司在南方的營業分處，並對負責人提出控告。駐柏林的英國大使也為此事向外交部提出照會。^⑤

德國政府雖然認識到，「斯庫勒號」事件說明德國的正常貿易已經因為軍火生意而捲入這個國家的內亂之中，但是德國外交部認為，除了德國自己的法律外，還要通過國際上的共同行動，才能有效地制止軍火生意。^⑥雖然事實如此，但是1927年的中國情況特殊。德國駐北京公使館數年來一再警告販運軍火勢將影響德國的在華貿易，^⑦狄爾總領事也曾指出，國民政府決不坐視德國商人向北洋軍閥提供軍火。^⑧德國外交部和政府容忍軍火生意，顯然有違「嚴守中立」和「不介入的第三者」的原則。

1927年聘用德國軍官來華一事，要比提供軍火所引起的問題，尤為嚴重。國共統一戰線破裂後，國民政府有意派人前往柏林洽談聘用十五名左右德國高級軍官來華。狄爾總領事認為，由於凡爾塞和約第一百七十九條的規定，不能由「官方」來處理此一事件。他同意柏林之行，但建議柏林應該預先考慮能否在德國招募到中國所需要的軍官這一問題。^⑨

對聘用德國軍官一事，鮑耶公使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見。他堅決地向外交部建議，不僅要拒絕任何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而且還要盡力防止國民政府派員來德用其他手段招募德國軍官。鮑耶誇張地說：「十幾名德國軍官在南京軍校任教，這對全世界來說，是明顯地侵犯凡爾塞和約；縱然我們提出上百次的保證；官方根本沒有插手此事，也是枉然。」^⑩

鮑耶分析中國在德招募軍官的動機是，中國人以為德國人既不構成威脅，又容易控制，因為德國軍官將處於中國的司法管治之下，也就是「處於中國的軍事專制之下」。德國軍官不必像其他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人的背

^④ 同上，D 623 580-81/S. 3-4.

^⑤ 同上，D 623 582/S. 5.

^⑥ 同上，D 623 582-83/S. 5-6.

^⑦ 參見註⑦，E 150 592/S. 1.

^⑧ Der Generalkonsul in Shanghai Thiel an das Auswärtige Amt, Nr. 374 vom 15. März 1928 (L 1534/L 464 142-44), in: ADAP, Bd. VIII, Nr. 166, S. 351.

^⑨ Der Gesandte in Peking Boyé an das Auswärtige Amt, Nr. 2470 vom 9. August 1927 (L 1534/L 464 084-90), in: ADAP, Bd. VI, Nr. 99, S. 210.

^⑩ 同上，Bd. VI, Nr. 99, S. 211.

後，還有動輒得咎的政府和砲艦在威脅著。^①

在鮑耶繼續陳述關於中國在德聘用軍官的動機時，他未從德國對凡爾塞和約的「一種明顯地侵犯」的立場出發，而是受他那種對中國人某種情感上的偏見所支配。

由於鮑耶寫給外交部的報告意義非凡，我們引述一些章節，而這些章節實際上又是與報告的主題「招募軍官」沒有太大關連：

德國人應該明白這一點，在中國我們不再可能與那些在諸多書籍中被我們用那種傳統的熱情所讚譽的中國人打交道，不再可能與那些過去曾是勤勞、正直、聰明、禮貌、和藹可親以及人們可以同他們保持一種充分信任的中國人發生關係了。

今天支配中國和發號施令的那些人，也就是跟外國人和外國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是令人感到極其厭惡的假洋鬼子。這些來自低層社會的人，從小就被美國傳教士給予一些必要的語言知識之後，就被送到美國，有些被送往歐洲。他們在那裏學會了流暢的語言，但是只是受過極其淺薄的半吊子教育，沒有真才實學和堅定立場，就返回中國。他們是在娛樂場上，而不是從嚴肅的工作中認識外國的。除了一身外國人的打扮、毫無禮儀和狂妄自大外，他們祇是把一大堆一知半解的口頭禪和口號帶回中國。而他們對這個具有高度文化、修養和藝術的中國，又是一無所知。他們對中國的文字既不懂，又不會寫，就連中國話也不能完全掌握。^②

這些包括很多有名望的假洋鬼子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儘快地撈到一個儘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和可以獲得利益的職位。這些肆無忌憚地追逐權位的人，馬上湧向每一個剛剛取得勝利的將軍，然後又在他第一次失敗的時候離開他。這些人毫無道德約束和任何顧慮，從軍事獨裁者那裏一轉眼跑到馬列主義者那邊去，從民族主義者那裏又跑到另一個新的集團。這些人今天坐在各式各樣的政府和行政機構裏。就是這些人同那些和他們一樣可以收買的軍閥使中國僅存的一點忠誠、信仰，喪失殆盡，從而把國家推向越來越深的腐化和無政府主義狀態的泥沼之中……。當前，在中國有十來個政府，如果人們要想從這些人找出唯一的一個人，一個具有高尚品格、愛國情操、不

^① 同上。

^② 同上。

自私自利，把個人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下的人，那將是徒勞無功的。^⑳

當鮑耶公使發洩了他對這些所謂「假洋鬼子」的高見之後，終於言歸正傳，就招募軍官一事，對外交部發出警告：

德國政府不要被引誘去同任何一個中國集團發生正當關係以外的其他關係，特別是不要去想通過友誼和優惠獲得同情與諒解。正是相反的情況卻能達到（目的）……

在今天的中國，德國應該嚴格地把自己限制在通常的商品交換的範圍之中，對我們來說，中國既不是一個施行實力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活動地區，也不是推行財經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地區，在這裏我們也沒有教育任務……

德國的重點在歐洲。在那裏，我們有更緊迫和更值得的工作，這要比在中國扮演一名謙虛的家庭教師是更有意義的。^㉑

鮑耶公使對於中國將在德國招募軍官的動機所作的評述，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帶有偏見的觀點。這位戰後首任德國公使除了在中國代表他自己國家的利益之外，理應根據1921年中德條約的精神，來促進兩國之間的友誼和諒解。但是鮑耶是在對中國和中國人充滿偏見，缺乏客觀態度的情形下，完成了他的外交使命。鮑耶一定會成爲一個「卓越」的外交家，如果他在1900年前來中國充任威廉第二的公使！在1927年這個關鍵的年代，鮑耶擔任駐華公使，對中德關係的發展，是非常遺憾的。

這多事的1927年，^㉒德國在承認國民政府方面，以及圍繞承認問題而發生的中國與列強的爭執方面，履行了中立政策。至於對中國局勢的判斷，德國外交官的看法，深受其他列強的影響，特別是鮑耶公使的影響。在提供軍火和招募軍官（自1927年底以來）的問題上，雖然德國政府原則上沒有背離中立政策，但是卻表現了極大程度的容忍。

⑳ 同上，頁212。

㉑ 同上。

㉒ 王安娜認爲：「1927年初，柏林外交部和德國外交官使團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一再贊頌蔣介石的大名，努力與蔣氏建立良好關係。」

根據對德國外交檔案的分析，無法證實王安娜的此一論點。

王安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德關係」，〔近代史資料〕，（北京）1983-3，頁136。



學人簡介

Knight Biggerstaff*, 1906—

Jessie G. Lutz**

Knight Biggerstaff belongs to that pioneer generation of China historians who gave legitimacy to East Asian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As in the case of true pioneers, this small group of scholars had a relatively free hand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and emphasis of the field and they also contributed in multiple ways to its growth. We are indeed fortunate that they conceived Chinese history broadly, with attention to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ffairs. We are grateful that they were dedicated to making a place for China in the college curricula of America.

Not only did Knight Biggerstaff help build the Asian program at Cornell University, but he administered the Chinese division of the U.S.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1943-1944. From this program would come materials for intensiv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As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for a decade and as an illustrious membe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Cornell University for thirty-four years (1938-1972), he helped make Cornell a major center for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e also served as consultant to other institu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for example, as they developed their programs in Asian studies.

*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Emeritus, Cornell University

**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Rutgers University

Not only did Knight Biggerstaff and his colleagues organize in 1941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originally known as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but he held office as its secretary during 1950-1952 and as its president in 1965-1966. He has through the years continued to be a promoter and generous patron of the society. The initial concep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 has facilitated fruitful exchange among Asian scholar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both at its annual conferences and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is today the leading professional society in its field. Biggerstaff served other scholarly organizations as well: Chair,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Studies,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47-1949; Truste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7-1961.

Not only did Biggerstaff contribute such teaching aids as maps and texts relating to Asia in the Rand McNally *Atlas of World History* (1957), but he wrote valuable interpretative essays such as *China: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5) and *Some Early Chinese Steps toward Modernizatio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Ever on the lookout in China and the West for Asian materials for the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he promoted Gussie Gaskill's efforts to make the Wason Collection one of the premier resource collections on Asia. For over a decade after retirement, he regularly offered gratis a course in Chinese history at Ithaca High School.

Not only did Knight Biggerstaff write the basic monograph on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but his publications extended to reference aid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of China in revolution. Not only was Knight Biggerstaff an academician, but he also made his expertise available to the U. S. government during a crucial period in U. S. -China relations: China Specialist,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4-1945 and Chinese Secretary, U. S. Embassy, Chungking, 1945-1946.

Knight Biggerstaff and his vanguard generation obviously relished the challenge of such an underdeveloped field as Chinese history in America at mid-century. Though they were, of course, not without predecessors, their esprit de corps as path breakers was high. They vigorously and continually propounded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Chinese studies for citizens of a world power. The fruits of their multi-faceted activities in teaching, in scholarship, in program building, and in the advocacy of Asian studies are evident in the growing maturit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America. While they certainly would acknowledge that much remains to be done, they can find satisfaction in the increased sophistication and in the impressive language skills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young Chinese historians. As mentors, they deserve much credit.

Biggerstaff acquired his basic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and then, like many of his cohorts, obtained specialized training at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 1929-1931, and Harvard University, 1931-1934. As a result of study at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Peking, 1928-1929, and as one of the early Harvard-Yenching Fellows, Biggerstaff thereby joined a select group of American historians with facility in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Also a consequence of these years in Peking was his marriage to Camilla Mills, a home economist at Yenching and a Chinese linguist in her own right. Mrs. Biggerstaff was, until her death in the 1982, a gracious hostess and accomplished Chinese chef, a translator and editorial aide, and in addition a companion and wife.

An assessment of Knight Biggerstaff'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would include reference aids and interpretative essays along with his monographic studies on education and early China missions abroa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published in 1936, revised and reprinted in 1950 and in 19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collaborative work by Teng Ssu-yu and Biggerstaff. It remains a basic reference for Chinese scholars,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Asia. With China's voluminous historical record of encyclopedias, dictionaries, biographies,

chronologies, dynastic histories, etc., aids are essential to efficient historical research, but until Teng and Biggerstaff's *Bibliography* appeared, few reliable evaluative works existed. It must have taken courage, even a little brashness, plus wide-ranging acquaintance with China's historiography for the two young collaborators to choose from among the bulk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n to rate the works in terms of reliability and usefulness. Despite access to new materials and maturing scholarship, the *Bibliography*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belongs on the reference shelf of any China researcher. By studying the *Bibliography's* comments, furthermore, a scholar can learn much about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bout changes in literary styles and appraisals, for the works are placed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hich published both the *Bibliography*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Index Series, becomes apparent. Another basic reference work also benefited from Biggerstaff's contributions; he wrote biographies of several officials and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r A.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1945).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 is characteristic of Biggerstaff's meticulous scholarship; he does not over interpret his findings and rarely does he venture into speculative opinion. Despite new, in-depth research o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 move away from the "Western challenge-Chinese response" framework, Biggerstaff's data and conclusions retain validity. Biggerstaff rightly saw Chinese education at the crux of China's modernizing process and he details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obstacles to changes in China's classical education. He demonst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rratic support of the modern school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ll conceived as related to national defense. As institutions operating outside the educational norm, he argues, they could provide mobility and could

have their greatest impact in fields lacking a vested interest, i. e., the telegraph bureau, the navy, the diplomatic service, etc.

Current scholarship, by pointing up the diverse strains in Confucianism and the continuing appeal of noncanonical philosophies, puts less emphasis than Biggerstaff on the dichotomy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 but few would dispute his conclusion that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faced formidable opposition from conservative ideology and dominant social values. Nor would they disagree with Biggerstaff's contention that the schools and their graduates helpe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rapid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careers of the early graduates might, indeed, clarify the cumulative influence of the schools.

One other work, which has not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requires comment: *Nanking Letters, 1949* (Ithaca: Cornell China-Japan Program, 1979). Biggerstaff was conducting research in Nanking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ok control of the city in April, 1949. As a running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the communist administration in Nanking, the *Letters* are cautious and yet perceptive and balanced. Important themes run through the repor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hortage of trained personnel and the multiple consequences thereof, the sensitivity of communist leadership to all indicators of legiti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control of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rumors that ran rife as a result, the relief at the departure of the Kuomintang forces, but the general lack of public enthusiasm for the communists except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toward whom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 felt very ambivalent. Reading Biggerstaff's 1949 reports to his parents in the U.S. gives immediacy and reality to a time of momentous historical change, a sense often dimmed or lost in later historical assessments.

As a student of Knight Biggerstaff, I treasure most his warm friendship and personal encouragement. All of his graduate students, I am sure, remember with fondness the frequent gatherings at the lovely Biggerstaff home in Cayuga Height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We were individuals to Knight and Camilla and long after we left Cornell, they continued to be interested in us, in our families, and in our careers.

Academic Vita of Knight Biggerstaff

Born in Berkeley, California, February 28, 1906. Educated in Berkeley public schools. AB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27.

AM History and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28.

Chinese language study,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Peiping, 1928-1929.

Graduate study,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1929-31 (Fellow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1929-1932).

Married to Camilla Mills, 1931.

Graduate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1931-1934. PhD Political Science, 1934.

Research in Peiping Palace Museum Archives, 1934-1936 (Fellow of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nstruct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36-38.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1938-1942; Associate Professor 1942-1946; Professor 1946-1972; Professor Emeritus, 1972-.

Director, Chinese division,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Cornell, 1943-44.

China Specialis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4-1945.

Chinese Secretary, U.S. Embassy, Chungking, 1945-1946.

Chairman,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1946-1956.

Chairm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rnell, 1956-1963.

Research in Nanking, March-September, 1949. (Rockefeller & Fulbright fellowships)

Research in Taiwan, Japan and Hong Kong, Spring 1963. (Guggenheim fellowship)

Research in Taiwan, Fall 1969.

Secretary,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1939-1943.

Chairma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Studies, 1947-1949.

- Secretary,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forerunner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50-1952; vice president 1964-1965; president 1965-1966.
- Truste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7-1961.
- Harvard Overseers Committee to visi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1957-1963.
- Advisory Council, Princeton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1960-1968.
- Author,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1961.
- Co-Author with S. Y. Te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1936, 1950, 1971.
- Contributing editor, Rand McNally *Atlas of World History*, 1957.
- Trustee, Wells College, 1962-1971.
- Taught a course in Chinese history in Ithaca High School each autumn from 1974 to 1987 (except 1980)
- Author, *Some Early Chinese Steps Toward Modernization*, 1975.
- Author, *Nanking Letters*, 1949, 1979.
- Articl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Far Eastern Survey* and *Far Eastern Quarterly*.

Bibliography of Knight Biggerstaff

- 1934: "The T'ung Wen Kua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Oct. 1934) 307-340.
- 1935: "The Ch'ung Hou Mission to France,"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8 (Oct. 1935) 633-647.
- 1936: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manent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Abroad,"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 (April 1936) 1-41.
- "The Official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Burlingame Miss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1 (July 1936) 682-702.
- (with Ssu-yu Te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Peipi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vi, 271 pp.
- 1937: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of Investigation Sent to Europ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 (Dec. 1937) 307-320.
- 1939: "Some Notes on the *Tung-hua Lu* and the *Shih L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 (July 1939) 101-115.
- 1940: "The Chinese Large Family: Its Role and Recent Trends," Caroline F. Ware,

- ed.,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9-124.
- 1942: "A Translation of Anson Burlingame's Instructions from the Chinese Foreign Offic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May 1942) 277-279.
 "A Reappraisal of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3-96.
- 1943: *The Far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60 pp.
 Biographies of A-kuei, Ch'ien Feng, Fu-ch'ang-an, Fu-k'ang-an, Ho-lin, Ho-shen, and Liu Yung, in A.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vol. 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45: Biography of Ts'ai Hsin, in A.W. Hummel, *op. cit.*, Vol.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hina: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78 pp.
- 1950: "The Nanking Press: April-September 1949," *Far Eastern Survey*, 19 (March 8, 1950) 50-54.
 "The 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1867-1868: Views of Leading Chinese Statesmen Regarding the Further Opening of China to Western Influe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2 (June 1950) 122-136.
 (with Ssu-yu Te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Reference Works*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26 pp.
- 1956: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 (May 1956), 127-149.
- 1957: Maps and text relating to Asia in *Atlas of World Hist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 1961: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xi, 276 pp.
- 1966: "Modernization and Early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August 1966), 607-619.
- 1971: (with Ssu-yu Te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50 pp.
- 1975: *Some Early Chinese Steps Toward Modernizatio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07 pp.
- 1979: *Nanking Letters, 1949*, Ithaca: Cornell China-Japan Program, 102 pp.

傅 衣 凌

楊 國 楨

1988年5月14日，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家傅衣凌教授病逝於廈門，享年七十八歲。

傅衣凌先生原名家麟，筆名休休生，1911年5月生於福建福州。五歲入私塾發蒙，先後就讀左海中學、省立福州一中、馬江藝術學校和福州第一高級中學。高中畢業後，始入福建學院經濟系，旋轉學廈門大學歷史系。1934年畢業，在福州做了短期的中學教師。1935年東渡日本，進法政大學研究院，從松本潤一郎博士攻讀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知識的兼收並蓄，對於他的治史志趣和學術風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

1937年夏學成歸國，入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工作；1939年，任該室編輯課主任。1941年至1945年，先後任協和大學、福建學院、省立師專等校副教授、教授。其時正值八年抗戰，他從沿海城市內遷到山區，接觸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實際，立志寫作中國農民論、中國農村經濟史。他把福建農村作為站在歷史學的立場上研究經濟社區的突破點，在爬梳文獻之外，親到民間訪查遺俗遺制，搜尋族譜、契約、碑刻，試圖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從經濟史的角度研究社會，編著出版了《福建省農村社會經濟參考資料彙編》（1942年）和《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1944年）。後者利用在永安黃曆鄉發現的契約文書和地志、寺廟志，從佃農經營與佃農風潮兩個層面鋪設研究架構，體現區域研究和以民間文獻等證史的顯明特色，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開拓時期的力作之一。

1946年1月，傅衣凌回到福州，在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兼任文史組組長。研究視野擴展到商人和商業資本，窮搜史料，對徽州、洞庭、陝西、福建等地區性商業集團作了細部的考察。1947年寫成《清代中葉川陝湖三省邊區的手工業生產形態》一文，首次提出手工業中「資本

主義萌芽」的問題。這些論著揭示了研究私經濟的意義和大有可為的前景，在破除經濟史即經濟制度史、官經濟史的傳統觀念和治學方法上，起了發凡起例的作用。

1950年，傅衣凌回母校廈門大學工作，歷任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副校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79、1980、1982年，先後到美國、加拿大、日本訪問講學，受聘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三十八年間，他以探究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問題為核心，致力於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豐富和發展了社會史和經濟史相結合的研究架構和治學風格，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彈性論、鄉族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等比較系統的獨到見解，編著出版了《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1957年）、《明清農村社會經濟》（1961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1982年）、《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和楊國楨主編，1987年）、《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第七冊（主編，1988年）。這些論著啟發和影響了中國和日本、美國、西歐的許多學者，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視為一代大師，多次被英國劍橋出版社和美國傳記學會收入《世界名人錄》、《世界5,000名人錄》、《世界傑出領袖人物名錄》。

傅衣凌先生治史五十餘年，學術興趣廣泛，對於中國上古、中古史以至近代、民國史，均有論列，頗有見地，惜這方面的成就為他治明清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聲名所掩。其中部分論文已整理輯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準備出版。遺著尚有《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等，有待出版。晚年主持編著《明清福建社會經濟史》、《明史新編》（暫名），尚未完成。

傅衣凌教授的逝世，是中國史學界的重大損失。但他的著作將作為寶貴的學術財富永留人間！

沈雲龍教授藏書遺贈近史所

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生前藏書豐富，總計不下萬餘冊。此類藏書，近經其夫人章萃女士及公子沈冀先生整理，已悉數捐贈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刻正由該所整理編目中，不久即可開放供學界借閱使用。近史所近年不斷接受各界贈書，其數量較多者，尚有褚道庵先生捐贈千餘冊，盧福寧將軍夫人七百餘冊。

石川忠雄

林明德

現任慶應義塾大學校長的石川忠雄先生是一位國際知名的歷史學者，尤其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黃金時代，他的著作不少，其中以〔中國共產黨史〕一書最爲著名。近年由於行政繁忙，著述較少，但仍然沒有完全放棄研究工作。

石川先生於1925年12月21日出生於東京市神田一橋，父爲消防人員，卻是養子，祖父母出生地亦不清楚；其父的本家原爲三河德川家的下級武士，江戶開府之時，移居京橋。以當時的社會風氣而言，子繼父職是非常普遍的，因此一般認爲小孩子根本不必受甚麼教育，但是他的父親因爲自己沒有受過教育，非常希望兒子能夠受到充分的教育。1928年4月，石川先生進神田猿樂町的錦華小學校。這是一所歷史非常古老的學校，但他在學的成績並不是最好，卻愛好運動與讀書，尤其是對日本歷史書有偏好。當時因爲家庭環境不佳，無法買書，只能在神保町書店站著看書，星期天有時整天都在書店消磨。

小學校畢業以後，面臨升學問題，以當時的學校制度他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唸中學校，一是進五年制實業學校，否則只有讀高等小學校兩年，然後到社會去。原來第一希望是進九段的市立一中，卻因競爭激烈而改進附近的明治中學。在此雖只有兩年，但對他來說，則是影響甚大，因爲有一位乃木先生鼓勵他學英文，奠定了英文的基礎；至於數學則一直都是難題，不過後來還是克服了。當時有一位朋友講了一句話：「男人應該自力，求學也不能依靠父母，應自己找事，一邊作事，一邊讀書」，這給他很大的影響。

當時因爲不景氣，家境不佳，遂決心半工半讀，即白天工作，晚上唸書。他的父親初表反對，其後由於答應以讀書第一，工作第二，並繼續唸到大學，始勉強同意。於是轉入慶應義塾五年制商業學校，編入二年級。另一

方面，他找到一家出版社春陽堂工作，直到畢業，換了兩次工作環境。雖然這是商業學校，一因由中學二年編入職業學校二年，等於修習了兩次二年級課程，因此學業上收穫頗豐。尤其是在英文的實力充實不少，而簿記與商業法規、珠算等課程，對其數理的了解頗多助益。

商業學校畢業後，進大學亦是一難關，依當時的制度，商業學校畢業的學生，有一定的比率由校長推薦進入大學預科或高等部（專門學校），當然進入大學的較多，但他卻選擇高等部，這還是基於經濟的考慮，蓋只要三年即可畢業，得早一點出去作事，同時，高等部在畢業後，又可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1939年4月，遂被保送入高等部。雖然這是專門學校，但不像早稻田等校專門學習一門課，而是廣泛地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歷史、語言等，即是所謂通材教育，而學風卻很自由，他的中國研究亦自此始。當時擔任日本經濟論的伊東教授正從事有關中國經濟的研究，他就在伊東教授的教導下，鑽研中國近代史。他之所以對中國問題感到興趣，乃是由於以下三點理由：(1)從日本的國際環境衡量，七七事變以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將會決定日本的命運，(2)對中國大陸懷有一種年青人的浪漫憧憬，(3)對於同樣是東亞的國家，受到西歐列強的侵略，而中日兩國的肆應卻有很大的不同感到興趣。

在伊東教授提示他要看的各種書籍中，魏弗格(Karl A. Wittfogel)的〔解體過程中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是一本最難解卻有興趣的書，在方法論上魏氏運用自然辯證法，指出中國的歷史社會，其所以不能像日本產生封建社會，而形成專制的社會，乃是因為灌溉與治水等水的問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一結論卻被反對論者譏諷為「浸水理論」。當時他也認為過分極端，但自以為獲益良多，因為把一個問題徹底的追求探討這種學問的態度，的確給與很深的印象。他在求學中獲得學生徵文比賽的首獎，也歸功於伊東先生的教導。在大學求學時代，馬克思思想對他也有很大影響。在當時極端右傾的時局下，馬克思思想成爲彈壓的對象，但仍然能取得這類書籍，實際上，伊東先生的「日本經濟論」，其方法論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立論。

他之所以對馬克思主義感到關心，乃是出之於對社會上低階層貧困民眾的一種年青人的正義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明快。在研究方法上，經濟學部的一個前輩——一個人文主義者而對馬克思主義有相當研究者——鼓勵他同時也要唸反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是他自認為很有意義的事。最後他逐漸脫離馬克思主義，但此時所唸的〔經濟原論〕以及〔馬克思死後五十

年]，對後來的研究卻有相當的助益。

1942年9月，高等部畢業後即進入慶應大學經濟學部，對中國研究的興趣有增無已，爲了增進對中國的了解，必須研究中國的農業以及農業社會，於是專注於農業經濟學。但不久因學生動員令，應徵入伍，旋即入陸軍飛行學校，接受飛行訓練，直到日本戰敗始復學，從三年級唸起。在畢業之前，再專心鑽研中國農業問題。1946年秋天，受中國現代史大家及川恒忠教授的薦舉，留任慶應大學助教，同時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轉變，即從中國經濟轉到中國憲法史方面。他發見憲法史研究最大的興趣並不在憲法的內容，而在清末以來屢次制定的憲法乃至憲法草案，正足以反映各該時期政治發展的特質。關於此一研究後來出版〔中國憲法史〕而告一段落。不久，及川先生的指導，又轉到中國共產黨史的研究。及川先生本身專研民國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以及中國國民黨史，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史亦表關心，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極力勸導石川先生從事此一問題的研究。而其最早的一篇有關中共的論文是「李立三路線問題的探討」。

1956年7月至翌年6月間，以訪問學人身分前往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認識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如費正清、史華慈以及日本研究的賴世和、季辛吉等人，而影響其對中國共產黨史研究最大的是史華慈教授。他把史教授的名著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1951) 譯成日文，同時發表一篇論文「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共產主義と毛澤東の抬頭」。這時正逢美國研究中國的黃金時代，他能够與美國一流的學者交往，且能從事國際活動，均拜此次美國之行。

他的中國共產黨研究，於1959年出版〔中國共產黨史〕而大功告成。這一本書含蓋的時期是自共產黨創立的時期到抗日戰爭爲止。後來由於與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的中國研究學者以及外務省亞洲局有關人士的交流，遂轉而研究中共建國以後的問題，而其主題則是中共的領導與外交政策。其結果則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狀態與分析〕以及〔現代中國之諸問題〕兩本書。

石川先生以爲日本的現代中國研究，大都一廂情願，而以主觀居多，有偏愛中國而全盤接受中國說法者，也有恣意加以非難者。就意識形態而言，前者多屬於左派，後者則是右派的居多。類此都不是正確的，因此，他想摒棄這種主觀的，富有價值觀的立場，而以客觀的分析角度從事中國研究，這正是上述兩本書寫作的基本態度。

石川先生雖因公務繁忙，無法專心研究，但是仍能忙裏偷閑，翻譯「毛澤東」、「國際政治と中共」等書，至於現代中國問題研究，由於他的倡導提携，慶幸其後繼有人，如山田辰雄（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京都産業大學副教授）、平松茂雄（防衛研修所教官）、國分良成（慶應大學講師）等，都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後起之秀。

石川忠雄教授主要著作目錄

一、專書

1. 〔中國憲法史〕，東京，慶應通信，1953年。
2. 〔中國共產黨史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59年。
3. 〔中華人民共和國——その實態と分析——〕，東京，時事通信社，1964年。
4. 〔中國政治史講義案〕，東京，慶應通信，1963年。
5. 〔國際政治と中共〕，東京，有信堂，1968年。
6. 〔現代中國の諸問題〕，東京，慶應通信，1970年。
7. 中嶋嶺雄、池井優共編〔戰後資料——日中關係〕，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年。
8. 〔日中問題私見〕，東京，酒井書店，1973年。
9. 〔私のみた日本外交〕，東京，慶應通信，1977年。
10. 與朴在圭共編〔轉換期の東南アジア〕，東京，成甲書房，1977年。

二、譯書

1. H・ベロフ著，小谷秀二郎共譯〔ソヴェエトのアジア政策〕，東京，日本外政學會，1957年。
2. ハワード・L・ボアーマン著，監譯〔現代中國——その實體と分析——〕，東京，日本外政學會，1960年。
3. 三上諦聽・芝田稔共譯〔湖北秋收暴動經過の報告〕，東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1年。
4. 三上諦聽・芝田稔共譯〔第四次全國勞働代表大會に提出せる上海總工會の報告表〕，東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2年。

5. 三上諦聽・芝田稔共譯〔一九二二年より一九二六年にいたる中國共產黨五年來の政治主張〕，東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3年。
6. ベンジャミン・I・シュウオルツ著，小田英郎共譯〔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共產主義と毛澤東の抬頭——〕，東京，慶應通信，1964年。
7. フレデリック・ノサール著，小田英郎共譯〔發信地——北京〕，東京，時事通信社，1964年。
8. 三上諦聽・芝田稔共譯〔抗日軍政大學の動態——中國共產黨史研究の一資料〕，東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5年。
9. スチュアート・ミュラム著，平松茂雄共譯〔毛澤東〕，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67年。
10. ガイ・ウイント著〔中共革命への道〕，東京，時事通信社，1967年。
11. A・ドーク・バーネット著，山田辰雄共譯〔中國——毛澤東以後への過渡期——〕，東京，鹿島出版會，1977年。

三、論文

1. 「中國憲法の基本的諸問題に關する——考察（一、二完）——1933年以降の制憲論争を中心として」，〔法學研究〕，卷21，期4、5（1948年）。
2. 「上海國是會議乙種憲法草案(資料)解題」，〔法學研究〕，卷23，期7（1950年）。
3. 須藤次郎共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資料）」，〔法學研究〕，卷23，期10（1950年）。
4. 「中華人民共和國における政黨及び團體」，〔法學研究〕，卷24，期1（1951年）。
5. 「清末及び民國初年に於ける連邦論と省制論」，〔法學研究〕，卷24，期9、10（1951年）。
6. 「民國政治史論」（一、二完），〔三田政治學會誌〕，期33、34（1951年）。
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のうごき」（一、二、三完），〔三色期〕，

期59、60、61（1953年）。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び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資料），〔法學研究〕，卷26，期4（1953年）。
9. 「李立三コース問題の一考察」（一、二完），〔法學研究〕，卷26，期7、9（1953年）。
10. 「新中國選舉法に關する資料」（資料），〔法學研究〕，卷27，期5（1954年）。
11. 「大革命敗退直後における中國共產黨について」，〔法學研究〕，卷27，期8（1954年）。
12. 及川恒忠共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び四組織法」（資料），〔法學研究〕，卷28，期3（1955年）。
13. 「武漢政府時代の中國共產黨」，〔アジア研究〕，卷1，期3（1955年）。
14. 「第一次國共合作とコミンテルン」，〔法學研究〕，卷28，期11（1955年）。
15. 「新中國に於ける人民民主統一戦線の意義とその將來」，〔アジア評論〕，期35（1955年）。
16. 「上海國是會議二種憲法草案」，〔國際政經事情〕，期20（1956年）。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の内容とその特質」，〔外政講座シリーズ〕（1956年）。
18. 「李立三コースとロシア留學生派」，〔法學研究〕，卷29，期5（1956年）。
19.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現代中國關係主要雜誌論文目錄」（一～六完）（資料），〔法學研究〕，卷29，期6-11（1956年）。
20. 「ハーヴァード大學に於ける中國研究」，〔外政〕，期4（1957年）。
21. 「コロンビア大學の中國研究」，〔外政〕，期6（1957年）。
22. 「ロバート・C・ノース氏による張國燾回顧談記錄」（資料），〔法學研究〕，卷30，期11（1957年）。
23. 「西安事件の一考察——モスコと中國共產黨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慶應義塾創立百年紀念論文集〕，法學部第二部（1958

- 年)。
24. 「アメリカの中國研究」，〔アジア研究〕，卷4，期4(1958年)。
 25. 「オーエン・ラテイモア教授著作目録」(資料)，〔法學研究〕，卷31，期5(1958年)。
 26. 「江西ソヴェト期における抗日反帝統一戦線の諸問題」，〔法學研究〕，卷31，期7(1958年)。
 27. 「ワシントン大學の中國研究」，〔外政〕，期8(1958年)。
 28. 「社會主義圏における中國の役割——その自主性をめぐって——」，〔中央公論〕，卷73，期11(1958年)。
 29. 「最近日本における現代中國關係主要雜誌論文目録」(一、二完)(資料)，〔法學研究〕，卷31，期11、12(1958年)。
 30. 「京漢鐵道罷業と陳獨秀」，〔法學研究〕，卷31，期12(1958年)。
 31. 「中共とソ連——中共の對ソ主體性——」，〔史泉〕，期14(1959年)。
 32.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事件と中國共產黨」，〔法學研究〕，卷33，期2(1960年)。
 33. 「劉少奇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共產黨問題〕，卷4，期1(1960年)。
 34. 「中共の對日政策の分析——對日政策の基本目標と具體的政策の展開過程——」，〔日本及日本人〕，卷11，期4(1960年)。
 35. 徳田教之共著「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における中國關係記事目録」(資料)，〔法學研究〕，卷33，期5(1960年)。
 36. 「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問題に關する中國共產黨關係資料」(資料)，〔法學研究〕，卷33，期10(1960年)。
 37.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における中國關係記事目録」(1921年10月(創刊)～1927年7月)，〔法學研究〕，卷33，期11(1960年)。
 38. 「中國共產黨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の若干問題」，〔中共政權の現状分析〕(日本外政學會編，1961年)。
 39.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形成過程における中國共產黨とコミンテルン」，〔法學研究〕，卷34，期2(1961年)。
 40. 「中共の對外政策——對日政策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經

濟】，卷2，期3（1961年）。

41. 「中國共產黨指導部に關する — 考察 — 八期中央委員を中心として」，〔法學研究〕，卷34，期7（1961年）。
42. 「中華人民共和國の對日政策に關する — 考察 —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八年を中心として —」，〔英修道博士還曆紀念論文集 — 外交史及び國際政治の諸問題〕，1962年。
43. 「中國現代史」，〔中國政治經濟綜覽〕，（アジア政經學會編，1962年）。
44. 「中國共產黨史の組織と實態」，〔中國政治經濟綜覽〕（アジア政經學會編，1962年）。
45.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ソの活動狀況」，〔共產圏問題〕，卷6，期2（1962年）。
46. 「東南アジアと中ソ關係」，〔中央經濟〕，卷11，期4（1962年）。
47. 「アメリカの中國研究」，〔アジア研究〕，卷4，期4（1962年）。
48.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ソの活動」，〔三田評論〕，期604（1962年）。
49. 「內政と中共指導部の動向」，〔自由〕，卷4，期7（1962年）。
50. 「『陳誠文庫』目錄 — 臺灣における中國共產黨史資料 —」（資料），〔法學研究〕，卷35，期7（1962年）。
51. “Communist China’s Policy toward Japan”, E. F. Szczepanik, ed.,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62.
52.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Socialist Camp”,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Japan*, Vol. 1, No. 1, 1963.
53. 「中ソ關係の研究」，〔共產圏問題〕，卷7，期5（1963年）。
54. 「『八・一南昌暴動』に關する四文書」（資料），〔法學研究〕，卷36，期10（年1963）。
55. 「アメリカの中共政策 — ヒルズマン演説を中心として —」，〔三田評論〕，期625（1964年）。
56. 「中共の指導者羣と派閥」，〔季刊社會科學〕，期1（1964年）。
57.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の制定と蔣介石」，〔法學研究〕，卷37，期7（1964年）。

58. 「中國における國內情勢と外交政策——一九五七年以降を中心として——」，〔法學研究〕，卷37，期12（1964年）。
59. 「中・ソ對立——中共を支えるもの——」，〔日本〕，卷8，期2（1965年）。
60. 「中共の現實をどうみるか—その内政と外交——」，〔自由〕，卷7，期3（1965年）。
61. “How to Look upon the Reality of Communist China—Its Domestic Situ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Tokyo), No. 4, 1965.
62. 「中華人民共和國の外交政策決定に關する試論的考察」，〔法學研究〕，卷38，期11（1965年）。
63. 平松茂雄共著，「中共の内政、外交の回顧と展望」，〔國際問題〕期70（1966年）。
64. 「中國實力者列傳——毛澤東とその後繼者たち——」，〔中央公論〕，卷81，期1（1966年）。
65. 「中國外交政策の決定要因」，〔中央公論〕，卷81，期4（1966年）。
66. 平松茂雄共著，「中共外交政策の性格——一九五七～八年を中心として——」，〔季刊社會科學〕，期9（1966年）。
67. 「中國共產黨の大衆動員方式」，〔中央公論〕，卷81，期11（1966年）。
68. “Communist China’s Policy toward Jap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Japan*, No. 4, 1966.
69. 平松茂雄共著，「中共外交政策形成過程の—考察——一九五七年～五八年を中心として——」，〔法學研究〕，卷40，期1（1967年）。
71. 「中共の國內革命の成功」，〔極東の安全保障〕（國民講座日本の安全保障編集委員會編，1968年）。
72. 「文化革命の現状をどうみるか」，〔國際時評〕，期40（1968年）。
73. 「米中關係の展望」，〔アジア・クォーターリー〕，卷1，期1（1969年）。
73. 「中ソ關係の現状と見通し」，〔アジア・クォーターリー〕，卷1，

期2 (1969年)。

74. 「中共の文化革命の現状とその長期的展望」, [國際時評], 期48 (1969年)。
75. 「中共外交政策の展望」, [國際時評], 期51 (1969年)。
76. 「朝鮮半島をめぐる國際情勢」, [アジア・クォーターリー], 卷1, 期3 (1969年)。
77. 「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形成と西安事件」, [世界の歴史], 卷16, (筑摩書房) (1969年)。
78. 平松茂雄共著, 「中共外交政策形成過程の研究——一九五三～四年を中心として——」, [法學研究], 卷43, 期1 (1970年)。
79. 「中國の政治」, [東アジア] (1970年)。
80. 平松茂雄共著, 「朝鮮戦争と中國人民解放軍の近代化について」, [法學研究], 卷43, 期7 (1970年)。
81. 「日中關係の展望」, [中國問題と日本の選擇] (日本文化フォーラム編, 1971年)。
82. 平松茂雄共著, 「ソヴェト革命時期における紅軍の基本的性格に關する一考察」, [法學研究], 卷44, 期3 (1971年)。
83. 「日本の國益と中國問題」, [時の課題], 卷15, 期5 (1971年)。
84. 「中國外交政策の新展開」, [國際時評], 期75 (1971年)。
85. 「日中復交と日本の國益」, [自由], 期143 (1971年)。
86. 「ニクソン大統領の訪中と臺灣」, [國際時評], 期78 (1971年)。
87. Japan, China und das Dreieck, *Das grobe Dreieck Washington-Moskau-Peking*, Mit Beitr. v. Schwelien, Joachim,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71.
88. "Outlook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apan in World Politics*,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72.
89. 「單細胞では外交はできない」, [諸君], 卷4, 期6 (1972年)。
90. K・メーネルト他共著, 「日中關係の展望と三極構造」, [巨大なる三角形: ワシントン——北京——モスクワ], 1972年。
91. 「北京以後の日本外交」, [經濟往來], 卷24, 期11 (1972年)。
92. 「新内閣と中國問題」, [國際時評], 期91 (1972年)。
93. 「日中國交回復と臺灣の地位」, [アジア], 卷7, 期10 (1972

- 年)。
94. 「日中共同声明の読み方」, [諸君], 卷4, 期12 (1972年)。
 95. 平松茂雄共著, 「『中國の本』をどう読むか」, [諸君], 卷5, 期1 (1973年)。
 96. 「三極世界における日米安保の役割」, [革新], 期30 (1973年)。
 97. 「日中復交と今後の外交姿勢」, [月刊時事], 卷18, 期2 (1973年)。
 98. 平松茂雄共著, 「中國の動向と日中關係の將來——“緊張緩和”の動向に關連して——」, [防衛論集], 卷11, 期3、4 (1973年)。
 99. 「日中復交と日本外交」, [月刊時事], 卷18, 期7 (1973年)。
 100. 「多極化時代に於る日本の進路」, [アジア], 卷8, 期12 (1973年)。
 101. 桑原壽二編, 「中國共產黨史に見る黨内權力闘争」, [中國の實像], 1973年。
 102. 「日本のアジア政策」, [アジア・クォーターリー], 卷6, 期1、2 (1974年)。
 103. 「一九四〇年代の國共關係」, [三田評論], 期734 (1974年)。
 104. 「國際政治の認識と外交防衛政策」, [革新], 期43 (1974年)。
 105. 「中國外交はこれでいいか」, [自由], 卷16, 期6 (1974年)。
 106.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riscilla Clapp and Morton H. Halperin, eds., *United States-Japanese Relations: the 1970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4.
 107. 「日中關係概観」, [世界のなかの日本] (鹿島平和研究所編, 1975年)。
 108. 「蔣介石没後の中國問題」, [國際時評], 期123 (1975年)。
 109. 「流動化するアジアと日本の對應」, [論展], 卷2, 期4 (1975年)。
 110. 「激動する國際政治情勢下の日本の選擇」, [經營者], 期9 (1976年)。
 111. 「毛澤東死後の中國——毛主席の遺功とその内包する宿命——」, [自由民主], 期249 (1976年)。

112. A Review of Japanese-Chinese Relations, Kajim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ed., *Japan in the World* (The Japan Times Ltd.) 1976.
113. 「一九八〇年代の中國と日本——アジアでの勢力均衡のための必要條件——」, 「アジア公論」, 卷6, 期5 (1977年)。
114. 「新階段の中國・アジア・日本」, [アジア], 卷12, 期9 (1977年)。
115. 「大躍進運動をめぐる黨内論争」, [法學研究], 52卷, 期7 (1979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 上冊

七十七年六月出版, 四一〇頁 精500元 平450元

- 陳志讓：試論邊緣地區的農業商業化
 黎志剛：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 1878-1881
 張朋園：理性與傲慢：清季貴州田賦與教案試釋
 陳三井：基督教青年會與歐戰華工
 黃福慶：鄒魯與國立中山大學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
 李恩涵：九一八事變(1931)前中英撤廢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北伐後中國「革命外交」的研究之四
 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 B團案
 Ursula Richter: Did Yuan Shih-kai's Son Dine with the Kaiser? Some Evidences for Yüan K'o-ting's Journey to Germany in 1913
 C. Martin Wilbur: The Beginnings of the Farmers Movement in Kwangtung, 1924-19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 下冊

七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四一三頁 精500元 平450元

- 陳存恭：張之洞在山西, 1882-1884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官督商辦工業
 何漢威：清末賦稅基準的擴大及其局限——以雜稅中的菸酒稅和契稅為例
 呂芳上：清末的江西省諮議局, 1909-1911
 陸寶千：章炳麟之儒學觀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 1912-1926
 林明德：偽滿洲國與反滿抗日運動
 王樹槐：張人傑與淮南煤礦, 1928-1937
 楊翠華：蔣夢麟與北京大學, 1930-1937
 朱法源：1930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
 劉鳳翰：論抗戰前日人對中國軍事之調查

※函購七折, 郵撥帳號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坂野正高

林 明 德

出生於美國紐約的坂野先生是戰後日本研究近代中國史學者之中，少數具有多種語言能力的一位，他不僅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都能運用自如，中文根基亦佳。他勤於研究、著述頗豐。尤其是在中國外交史方面造詣更深，1974年即以〔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現代外交之分析〕二書、獲得「吉田獎」（財團法人吉田茂記念事業財團）。

坂野先生於1922年自美國紐約返回東京，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學校，由於在美國住了六年，全家都講英文，以致回到日本就學發生語言的障礙。小學六年畢業，中學則因當時教育制度的不同，前後唸了八年才畢業。其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修習政治學，於1942年畢業。旋留任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至1948年任教於東京都立高等學校，翌年昇任副教授。其後在東京都立大學教授數年之後，於1962年任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專授亞洲政治外交史，直到1976年退休，轉任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始終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其間曾擔任日本政治學會理監事國際法學會理事、亞洲政經學會理事等。

坂野先生專攻外交史，爲了蒐集史料，曾到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同時也到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參觀外交檔案。他的博聞強記，對史料的熟悉，令人贊嘆不已。費正清、史華慈教授等，更是推崇備至。他雖然鑽研外交史，但所涉獵的書包羅甚廣，除政治學、社會學、國際法之外，經濟學、哲學以及名人傳記等，無不仔細研讀。

坂野先生最大的貢獻在於編纂各種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書目，對於初學者裨益良多。他參與〔世界歷史事典〕〔政治學事典〕〔亞洲歷史事典〕〔國際法事典〕〔日本外交史事典〕的編纂，也替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撰寫中國近代史的有關條目。而最早的應推〔中國外交文書辭典〕（1954年出版，1985年再版）。與費正清教授合編的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更爲美國歷史學界廣汎應用。此外，在〔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與〔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研究〕等書中，均不厭其煩地詳解史料的利用與史學方法等，其中尤以〔近代中國研究入門〕一書中的「政治外交——清末の根本史料を中心として」爲最詳細且具實用價值。

坂野先生受日本外交史大家植田捷雄教授的影響，認爲外交史的研究，不僅要注重國際法上的問題，運用國際法學的分析，同時還要將歷史的過程與現代連結起來，否則，只是沿革論，而不具有現代的意義。

坂野先生長年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結晶是 1964 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的 *China and the West 185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而評價最高的是，1974 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這是一本相當完整的學術書，取材豐富，態度謹嚴，不僅各國的第一手史料全都運用，所有有關的學術論文，亦都加以充分參考利用，誠爲精典之作。綜觀坂野先生的治學態度，堪爲後世之典範。

坂野正高教授著述目錄

一、專書

1. 〔中國外交文書辭典、清末篇〕，（與植田捷雄、魚返善雄、衛藤藩吉、曾村保信合編），東京，學術文獻出版會，1954年（1985年，圖書刊行會再版）。
2.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5) (With John King Fairbank), (Reprin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with Sumiko Yamamoto as a third co-author).
3.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 〔中國的國際政治——影像與現實——〕（與衛藤藩吉合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
5. 〔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6. 〔現代外交之分析——情報、政策決定、外交交渉——〕（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
7. 〔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自達伽瑪到五四運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
8. 〔近代中國研究入門〕（與田中正俊、衛藤藩吉合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
9. 〔萬花筒似的印象——我的美國、日本、中國體驗——〕（東京，筑摩書房，1982年）
10. 〔中國近代化與馬建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
11. 翻譯 George Macartney 〔中國訪問使節日記〕（東京，平凡社，1975年）。

二、論文

1. 「鴉片戰爭後最惠國待遇問題」，〔東洋文化研究〕，第6號，1947年10月。
2. 「外交交渉過程中清末官吏的行動模式——1854年修改條約交渉爲中心的考察」，〔國際法外交雜誌〕卷48期4，1949年10月、12月。
3. 「外交史研究者的困惑」，〔歷史學月報〕號5，1952年2月。
4. 「總理衙門設立的背景」，〔國際法外交雜誌〕卷51號4，1952年8月；卷51期5，1952年10月；卷52號3，1953年6月。
5. 「1848年青浦事件的考察——清末官末條約解釋之範例」，〔人文學報〕（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會）號11，1954年2月。
6. 「中國」（與衛藤藩吉共撰），載中國政治學編〔戰後世界政治與美國〕（東京，岩波書店，1954年）
7. 「赫德」，載東洋經濟新報社〔世界史講座〕第5卷，1954年。
8. 「天津條約（1858年）簽訂後清朝外交機構之動搖——從欽差大臣之移駐上海到美國公使之入京——」，〔國際法外交雜誌〕卷55期6，1957年3月；卷56期1，1957年4月。
9. 「總理衙門成立的過程」，載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近代中國研究〕卷1，1958年1月。
10. 「歐洲中國研究之印象」，〔亞洲研究〕，卷5期1，1958年8月。
11. 「北京對俄交涉機構的變遷——自天津條約（1858年）簽訂至1860年5月」，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近代中國研究〕卷3，

1958年8月。

12. 「外政機構、外交文書、外交史研究——亞羅號事件爲中心——」，〔東洋文庫年版〕1960年10月。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檔案——以『四國新報』『辦理擴爲檔案』爲中心」，〔東洋學報〕，卷43號4，1961年9月。
14. “Japanese Studies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A Reappraisal by the Involved—” *Bulletin of the Japan Branch of the Visiting Scholars Associatio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vol. I.
15. 「座談會 中國的近代化」，〔世界的歷史，11〕（東京，筑摩書房，1961年）
16. 「日本人的中國觀——織田萬博士的『清國行政法』」，〔思想〕號452，1962年2月；號456，1962年6月。
17.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Foreword—” *Developing Economies*, (亞細亞經濟研究所), *Preliminary Issue*, No. 2, September-December. 。
18. 「黃仲畚（張彤雲）與亞羅戰爭——中英交涉機構的一面——」，英修道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論集委員會編〔英修道博士還曆記念〕〔外交及國際政治諸問題〕，1963年。
19. 「黃惠廉與亞羅戰爭——一個會講英文的青年的角色——」〔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雜誌〕卷3期2合併號，1963年3月。
20. 「座談會——中國之考驗」，〔中央公論〕卷79號7，1964年7月。
21. 「歷史的推論」，〔朝日新聞評論〕卷8期43，1966年10月16日號，『特集，變遷中的中國』。
22. 「同治年間（1862-1874）的條約的爭論」，〔東洋文化〕號42，1967年3月，
23. 「英國外交官如何看中國——自馬嘎尼使節團的派遣到辛亥革命爲止」，〔國際法外交雜誌〕卷67號5，1968年2月。
24. 「現代學者的學問與政治——萊特教授小傳——」〔東洋學報〕卷53號1，1970年6月。
25. 「學會展望1969年」（亞洲部分），〔年報政治學1970年〕，（岩波書店，1970年）。

26. 「出席第屆國際東洋學者會議」，〔亞洲調查月報〕卷3號4，1971年4月。
27. 「評介第28屆國際東洋學者會議(1)——東洋史部門，尤其有關中國史關係之報告——」，〔史學雜誌〕卷80號6，1971年6月。
28. 「法國留學時代的馬建忠——有關外交及外交官制度的兩項意見書（1878年）爲中心——」，〔國家學會雜誌〕卷84號5、號6合併號，1971年8月。
29. 「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東洋經濟〕（週刊）1972年2月19日號。
30. "A Kaleidoscope of Images—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as Personally Experienced—",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30, October.
31. 「馬建忠的海軍論——1872年的意見書爲中心——」，川野重任編〔亞洲的近代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
32. "Ma Chien-chung (1844-1900) a frustrated French-trained early reformist—his views on diplomatic service and naval traini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No. 30
33. 「外交的非正式途徑——讀『松本重治回憶錄』有感——」，〔歷史與人物〕號27，1973年5月。
34. 「馬建忠的鐵道論——1879年的兩項意見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號63，1974年3月。
35. 「論清增格林沁奏疏略辭」，故松村教授追悼事業會編〔故村松教授追悼論文集——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5年）
36. 「中國與日本——羅素的『中國問題』評介」，〔東京大學公開講座、亞洲中的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
37. 「鐵桶中的收發——談飯塚浩工圖『滿蒙紀行』——」，〔亞洲時報〕號74，1976年6月。
38. 「訪問杜美爾先生——與巴黎漢學家們聚會的一個月——」〔UP〕號49，1976年11月。
39. 「找到所需資料爲止——巴黎所見馬建忠的成績表——」〔學內廣

- 報〕（東京大學廣報委員會）號36，1977年3月22日。
40. 「歷史研究與現狀認識——訪中國偶感——」，〔世界〕，1977年6月號。
 41. 「毛主席去逝後的政局——張香山、孫平化兩人所作國內情勢的說明爲中心——」，福武直編〔現代之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
 42. 「吉野作造的中國觀」，〔中央公論〕1978年3月號。
 43. 「馬建忠與巴黎」，〔思想〕號654，1978年12月。
 44. “Ma Chien-chung’s mission to India in 1881—his travel account, Nansing-ji (南行記) ——，〔社會科學雜誌〕（國際基督教大學）號17，1979年3月。
 45. 「馬建忠的印度紀行『南行記』——1881年鴉片貿易漸減案調查之旅——」，〔東洋史研究〕卷38號4，1980年3月。
 46. 「撰擬書誌——與費正清教授的共同作業——」，〔書誌索引展望〕，卷4號1，1890年2月。
 47.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書疏散之記」，〔國書之念〕（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月報），卷19號8，號9，1980年8月、9月。
 48. 「馬建忠『擬設翻譯書院議（1894年）』——解題與譯文」，〔亞洲文化研究〕（國際基督教大學），號13，1981年11月。
 49. 「出席武漢學術討論會——兩次答詞」，〔東亞〕號177，1982年3月。
 50. 「張蔭桓『三洲日記』（1896年刊）讀後感——清末一外交家的西洋社會觀——」，〔國家學會雜誌〕卷95號7、8，1982年7月。
 51. 「清季一個外交家的西洋社會觀——張蔭桓撰《三洲日記》札記——」，中華書局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全3冊）

三、書評

1. 「評內藤虎次郎『清朝史通論』」（1944年），〔國家學會雜誌〕卷60號1，1946年1月。
2. 「評大熊眞『幕末期東亞外交史』」，〔東亞文化研究〕號2，1946年9月。
3. 「評立作太郎博士論文集委員會編『立作太郎博士論文集』」，〔東洋

- 文化研究]，號3，1947年3月。
4. 「評松田智雄『英美資本與東洋』」，〔歷史研究〕號147，1950年9月。
 5. 「評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亞洲史研究〕號1，1954年4月。
 6. 「評費正清『中國沿岸的貿易與外交』」，〔亞洲研究〕卷1號2，1954年10月。
 7. 「評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國際法外交雜誌〕期53號4，1954年11月。
 8. “P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acific Affairs*, 30: 1, March 1957.
 9. 「評福克斯著『英國的提督與中國的海賊(1832-1896)』」，〔東洋學報〕卷43號1，1961年6月。
 10. 「評近藤俊清『臺灣之命運』」，〔朝日新聞評論〕卷3號51，1961年12月17日。
 11. 「評三田村泰助『官宦——親信政治的構造——』」，〔朝日新聞評論〕卷5號11，1963年3月17日。
 12. 「評野村浩一『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東京大學新聞〕號1690，1964年10月12日。
 13. 「評衛藤藩吉〔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亞洲研究〕卷16號3，1969年10月。
 14. 「評羅倫斯奧里方(Laurence Oliphant)『額爾欽出使中日記,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學燈〕，卷67號6，1970年6月。
 15. 「評市古宙三『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週刊東洋經濟〕，號3648，1972年2月19日。

「學人簡介」欄徵稿

傳略以二、三千字為宜，應包括出生時地、學經歷、學術貢獻等方面，並請附著作目錄。



從中國海關研究首次國際研討會看大陸的海關研究

張 存 武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香港大學的歷史系和亞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中國海關研究首次國際研討會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席學者三十餘位，提出論文二十七篇。會議在港大評議會會議室舉行，而來自臺灣的兩位，大陸的十四位，日本的五位，及美、加各一位學者，均寓居該校的招待所柏立基堂。籌備委員霍啟昌、黃約瑟等諸先生熱心能幹；與會學者執著於學術討論，故會議十分圓滿。

港大校長王賡武與廈門大學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主任陳詩啟老先生在開幕式中報告了會議緣起，王校長並希望將海關研究與經濟、外貿、財政、及近代研究結合起來。至於各論文的作者、題目如下：

湯 象 龍 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 (1681-1910) 的簡介。

張 存 武 臺灣對海關資料的收藏與利用。

霍 啟 昌 香港檔案所藏有關中國海關資料簡介。

邱 克 試述晚清檔案中有關海關的資料。

夏 良 才 近年來國內研究海關史簡況。

劉 蜀 永

近年來國內研究海關史簡況。

徐 思 彥 評「中國近代海關史的問題初探」

R. J. Smith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1862-1874

章 九 鳴 海關總稅務司與洋務運動。

黃 啟 臣 赫德是中國海關主權的徹底破壞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J. J. Gerson *The CMCS Revisited: 1858-1868*

張 寄 謙 金登幹 (J. D. Campell) 與中國海關。

汪 敬 虞 賀壁理和黃浦江的疏濬。

韋 慶 遠 論康熙時期從禁海到開海的政策演變。

戴 和 清代粵海關稅收的考核與報解制度。

岡本隆司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 Late Ch'ing China*

趙 繼 祖 中國海關之人事制度

趙 淑 敏 「稅專」與中國海關的人事制度。

飯 島 涉 中國海關對於常關的管理問題。

松 浦 章 清代海關と中國商船。

陳 詩 啟 近代中國海關與引水。

黃 福 才 論中國海關在辦理近代郵政中的作用。

F. H. King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and China's Foreign Borrowing*

濱下武志 香港與中國海關

副島昭一 日本與中國海關。

鄧 開 頌
余 思 偉 拱北海關的建立及其作用。

林 仁 川 福建洋關的建立與福建近代社會

湯象龍先生是八、九十歲的老學者，在抗日戰爭之前已發表學術論文，大家都很想見他，然而直到會議結束，他與韋慶遠先生仍滯廣州，不至香港。甚麼原因不深悉，也許與廣州舉辦「梁方仲紀念大會」有關。梁氏也是近代史知名學者，為梁嘉彬先生之兄弟。中、日論文宣讀者均有若干年青人，其中有的人相當出色，將來必成爲有建樹之學者。

看了這些論文，聽了評論者的意見，以及私下談論，對於大陸的海關研究，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一、資料：從邱克、霍啟昌先生的文章，以及陳詩啟先生的口頭報告得知，1949年以前總稅務司的檔案全移至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共有十二萬餘件。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第129號之卷132、134、141、155等，及外務部檔案第17號內有中國要求在香港設海關，及設九龍關的檔案。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宮中硃批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軍機處雜件、總理衙門檔、

外務部檔、稅務處檔案，均有關涉海關的文件。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所藏 324 冊總理衙門清檔，有相當部分與海關有直接關係。如英文檔中有各關船鈔奏銷冊，粵、潮等各關罰款清摺，及津海、東海、山海、牛莊、閩海等關稅務等文件，此外法字、俄字、美字檔均有與法、俄、美、布（普魯士）四國通商文件。北大圖書館尚有同治間總署奏稿，1854-88 的總稅務司之經費撥款罰款船鈔總賬。北京圖書館有總稅務司赫德呈文一冊，而四十冊總署奏底匯訂中有總署經費收支、使臣經費支付造報、商務稅約、中外出進貨及貿易銀數。後者可補海關十年報告之不足。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藏有清代題本九百餘冊，約三萬件。其歲入門中有海關關稅類百餘冊，新政門有總署及京師同文館經費類，外交通商門有出使經費類、通商交涉類、中琉貿易類、商務類，均為研究海關之重要史料。廣東省檔案館所藏 1861-1949 年之文件，已全部對外開放，有關該省海關者超過百萬件，包括粵、潮、瓊、九龍、拱北、三水、梧州、江門、雷州各關之設立文件，及總稅務司令文索引、呈文索引、關令目錄、新關題名錄等，以及有關華南貿易統計、華工出洋、通商旅遊、考察、留學等資料。

二、組織及研究、編譯成果：從夏良才、劉蜀永先生論文，及 1986、87、88 三期「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動態」可以略知大陸上的海關研究情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可數的工作只兩件。一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利用海關檔案編譯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共十冊。另外為彭雨新所著「清代關稅制度」。文革期間救死之不得，自然無所成就。文革後開始有活動。1985 年 7 月成立了中國海關學會，任務編寫中國海關史，總結海關管理的經驗。翌年創刊〔海關研究〕雜誌。1985 年 11 月中國海關學會與廈門大學合辦的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在廈門大學成立，由厦大歷史系教授陳詩啟先生負責，從事「組織海內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協調各方力量，製訂科研規劃。」該中心得到海關總署、海關學會之資助，而「近代海關史已列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博士點資助項目。」大陸現正從事編修地方志工作，而各海關編寫其史志為上項工作之一環。於是海關研究中心負起了編者工作的指導任務，曾在廈門主辦海關地方史志講習班；中心人員每年有一個月到若干海關協助、講解史志編修及海關史，又在上海召開史志編寫工作座談會。圖們、瀋陽、青島、武漢、蕪湖、南京、湛江各關已完成關志初稿，九龍關也在編百年大事記之關志，及檔案資料彙編。此外，該中心並與第二歷史檔案館簽約，合作編輯出版〔中國近代海關資料〕，而青島檔案館

也編列了〔帝國主義與膠海關〕一書（檔案出版社，1986）。

十年來大陸的海關研究成果有以下幾項。盧漢超著〔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強調赫德介入外交活動，侵害中國主權。丁名楠等編寫之〔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1986）專節討論海關人員介入 1902-1903年的中英、中美、中日通商條約的訂立，所用史料即原定作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十一編，辛丑和約訂立以後的商約談判的史料。汪敬虞的〔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人民出版社，1987），以及陳詩啟先生集其舊作新著而成的〔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展望出版社，1987）。1985年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徐雪筠等用海關十年報告編譯了〔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湯象龍先生的〔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681-1910）〕一書在印刷中。全書第一部分為緒論，討論稅務司制度、稅制、稅收分析、稅收分配分析。第二部分為全國海關歷年稅收和分配綜合統計，共四十六表。第三部分全國各海關歷年稅收及分配關別統計，共六十表。將為一非常有用之書。大陸上很重視翻譯工作。海關前輩方家駒、趙九齡等四人中譯了加拿大 Toronto 大學教授葛中(J. J. Gerson)所著，哈佛大學出版的*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譯名為〔李泰國與中英外交〕。馬士(H. B. Morse)所著*The Chronicl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由區宗華教授譯出，共一百二十萬字，名為〔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美國哈佛大學出版，Katherine F. Bruner,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教授司馬富(R. J. Smith)共編述之*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由袁東衣先生譯出，稱〔赫德日記——在中國任職〕，第一卷，步入中國仕途(1834-1863)。吳亞敏譯了本Stanly F. Wright的著作^①，名為〔中國海關的起源與發展〕。此外，海關研究中心編了〔中國近代海關地名漢英對照〕，及〔中國近代海關名詞常用語英漢對照〕兩書。以海關的建制及發展而言，陳詩教授的書，是一概括且深入之作。

三、理論思想的演變：大陸學者的研究著作，以前必須嚴格遵照官方宣示的思想路線，現在也是強調實事求是。由於實事求是便於按工作實際情況發展，所以海關研究的思想理念，現在已趨理性、活潑。例如他們的對〔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那套書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也指出其缺點，說該書是依專題需要而選編海關檔案，然而刪去了與所列專題無關的許多重要檔案，使研究者無法了解檔案全貌，無法從廣泛的角度利用這批檔案；說由於編者

目的在揭露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對於有關海關本身發展的文獻均未收錄，以致研究者未能得到有關海關起源和發展的史料；此外，他們說由於政治環境的影響（作者案：指毛澤東的一面倒的政策），編者還對某些原始史料作了不必要的刪節。例如在中國海關與英德借款編中，將俄國在俄法集團與英德集團爭奪貸款的史料一律刪除。

在盧漢超的〔赫德傳〕及汪敬虞的〔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兩書，將赫德打成帝國主義的差使，所有帝國主義的侵華活動赫德都有份的同時，少壯學者已在主張，赫德代表外人控制中國海關是實，但不能因此斷定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壞的。他們指出：在赫德的促使下，中國捲入了世界經濟市場的激流；同時他還提出中國近代化改革的主張，提倡、幫助辦同文館，建議派出中國第一個官方人士——斌春訪問西方，倡導派出第一個使節團——蒲安臣等聘問歐美各國。這些都有積極意義。此外，他們也肯定海關是中國近代化成功的部分，說「這些都屬公益事業，又是設置在中國土地上，很難說是只對洋人有利，而對中國無益。因此不應一概否定。」

少壯學者認為，改進近代中國海關史研究的方向之一是：

提高理論思維水平，力求完整和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歷史實際出發，用多元化的觀點辯證地理解和研究海關史，過去國內學者研究海關史主要是從道德的角度、國家主權的角度、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角度進行的。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它反映了事物的一個側面。但是，問題還有另外的一面。海關是國家的窗口，是中國聯繫世界的重要途徑。不論怎麼說，舊海關的不斷擴大，總是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在加強。當然其中有痛苦、辛酸和犧牲。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受到新的技術革新和經濟發展潮流的影響，世界性的聯繫的總趨勢是日益增強的，這是一種進步趨勢。無論那個國家或地區都不能閉關自守、與世隔絕，以致處於凝固不變的狀態。如果我們把近代中國海關放在這種世界整體發展趨勢的背景中來考察，我們的視野就會開闊一些，研究方法上也會出現多元化，就會注意到海關與中國社會近代化過程的關係，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問題僅僅局限於侵略與反侵略的範圍之內。應該說，近代中國海關的變革，既是外國入侵的產物，又是對西方科學管理和技術文化的引進，它的內容和作用 是錯綜複雜的，其中有衝突和暴力，也有交流和融合。而且無論

以何種方式出現，海關變革的本身即涵蓋著世界潮流對中國部分社會結構、生產方式、文化形態產生的多元化的影響，其中有得有失、有利有弊、有是有非，決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對於這些多元化的影響，我們都不應該摒棄於視線之外，而需要以實事求是、客觀的態度給予科學的總結。

雖仍在講馬克思主義，然要完整和正確地理解，而且所說要以世界性的開闊眼光處理這多元化影響的中國海關之史，也已與自由世界學者們的見解相差無幾了。

註：資料未說明英文書名，或為 *China's Struggle for Tarriff Autonomy: 1843-1938*。

香 港 學 界 消 息

•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資料部 •

一、香港浸會學院開辦「歷史學」及「中國研究」學位課程簡介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通過「英國國家學歷頒授議會」(CNAA)的評審，由1988-89年度起開辦文學士(歷史學)榮譽學位課程，成為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之後，香港第三個頒授此項學位的大專院校。此項課程以近代中國及對外關係為重心，開設科目分為五大類：

(一)史學訓練——必修科有「史學及史學史概論」及「歷史理論與應用」，選修科有「中國史學名著導讀」及「西洋史學名著導讀」。

(二)中國／亞洲與西方關係——必修科有「1600年後的中國與西方」及「西方外交在近代亞洲」，選修科有「二十世紀中國、蘇聯與美國」、「近代中美關係史」、「近代日本與西方」、「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關係」及「中國／亞洲與西方關係專題研究」。

(三)中國歷史——必修科有「中國文化及社會史」、「中國近代史」或「

當代中國」，選修科有「中國政治與制度史」、「明清史」、「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近代中國思想史」、「民國時代的革命和民族主義（1912-1949）」、「中國史專題研究」。

(四)西洋歷史——必修科有「西洋文化史」、「歐洲的革命、民族主義和工業化（1878-1914）」或「歐洲與兩次世界大戰」，選修科有「美國史」、「西方帝國主義的起源」、「西洋思想史」、「二十世紀美國外交」及「西洋史專題研究」。

(五)本地及亞洲歷史——必修科有「二十世紀香港政府與人民」及「近代亞洲（1800-1945）」，選修科有「香港史（1842-1900）」、「東南亞史」、「東南亞華人」、「二十世紀日本」、「二十世紀中國與亞洲」、「亞洲歷史專題研究」及「香港與中國當前問題」。

此外歷史系與經濟系、社會系及地理系合辦另一個名為「中國研究」的社會科學榮譽學位課程，採科際整合教學，剛於十一月初獲得「英國國家學歷頒授議會」通過，於明年（1989）開始招生，該項課程以當代中國為重心。其中歷史系所開之科目包括「史學導讀」、「近代中國之基礎」、「近代中外關係史」、「現代中國政治思想」、「臺灣近代史」，其它相關科目包括有「近代中國社會」、「中國地理」、「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控制」、「中國農村與都市發展」、「中國人口地理」、「中國能源地理」、「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管理」等十多科，該類課程之學生均需到中國大陸從事短期普通話研習及生活體驗。

又上述兩次學位課程之畢業生均需撰寫學位論文，預料香港地區之中國近、現代史專業訓練之人才，將會有所增添。

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二十五週年紀念講座」（歷史學）

香港中文大學為慶祝創校二十五週年，於 1988 年 9 月 7 日舉辦學術講座，邀請美國余英時教授來港主講，題目為「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

講者認為，「激進與保守是思想史上常見的兩種型態，特別是在一個變動較為劇烈的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也有激進和保守兩種立場的長期爭持。本講演的主旨是通過中國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來觀察這兩種思想型態的中國特性，及二者之間的關係。」講者結合兩種不同的分析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個方式是歷史的，即將激進和保守兩型思想的發展大致分成三個階段：(一)清末到「五四」前夕；(二)從「五四」時期到抗日戰爭；(三)從抗戰到1949年。講者指出，這三個階段的激進與保守之爭都各具特色。

第二個分析方式則從區別類型著手。「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主要可以分為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兩大類，但二者又是互相聯繫的。無論是在政治或文化的領域內，激進和保守之爭都表現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如維新與革命、中學與西學、傳統與反傳統、科學與玄學、民主與獨裁之類。這些問題的出現都有一定的時間次序，也是通過特定的代表人物的。因此類型的分析和歷史分析必須交互運用。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比較清楚地看出這兩種立場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互相爭持的整個過程。」（以上引文據講演摘要）最後，講者又把當前中國的思想狀態和這一歷史發展連繫起來，以為「鑒往知來」之一助。

三、香港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合辦「蔡元培誕辰 120 週年紀念活動」

香港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合辦「蔡元培誕辰 120 週年紀念活動」，由 1988 年 11 月 21 日至 30 日止，共有以下幾項活動：

一、在商務印書館圖書中心舉行《蔡元培生平事蹟圖片文物展覽》。展品除照片、書籍外，還有蔡元培的手稿如《自寫年譜》、《西遊日記》等，蔡元培在清朝末年參加科舉的殿試考卷原件及民國初年就職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的委任狀，都是珍貴的文物。電影《蔡元培的生平》，亦在會場播放。

二、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祭掃蔡元培先生墓。由蔡元培先生的女公子蔡粹盎、兒子蔡懷新主祭，並有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旅港同學會、新華社文教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香港教育出版商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國際科技工商管理交流中心、聯合出版集團及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近二十個團體的代表獻花。

三、假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辦《蔡元培與近代中國教育》講座。講者及題目依次為：北京大學蕭超然教授《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北京大學丁石孫校長《北京大學近期改革與發展》、香港大學王廣武校長《香港大學與香港社會》。

四、香港大學主辦「康有為、梁啟超與戊戌維新運動」學術研討會

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廣東康梁研究會協辦的「康有為、梁啟超與戊戌維新運動」學術研討會於1988年10月28-29日舉行，由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主持開幕儀式。研討會程序及發表論文如下：

- ◎10月28日 第一節 主席：趙令揚
 - (1)袁偉時：萬國公法書籍與康有為前期思想——康有為思想瑣論之一。
 - (2)曾近義、崔萬里：康有為論中國近代科技落後的原因
 - (3)李時岳：維新思想史上的癥結——「議院」與「民權」
- ◎10月28日第二節主席：張磊
 - (4)李錦全：托古改制與變法維新——讀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兼論中國近代化進程的歷史特點
 - (5)何佑森：論「大一統」
 - (6)周佳榮：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對日本的認識
- ◎10月28日 第三節 主席：何佑森
 - (7)方志欽：維新反思論
 - (8)李雲光：康有為桂林講學述評及《康有為弟子名錄》補遺
 - (9)黃明同、徐光仁：《杰士上書匯錄》與《戊戌奏稿》比較分析
- ◎10月29日 第一節 主席：陳炳良
 - (10)張江明、黃明同：戊戌維新是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首次嘗試
 - (11)張磊：近代中國第一次民主啟蒙運動——紀念戊戌維新運動九十周年
- ◎10月29日 第二節 主席：李鐸
 - (12)陳善偉：唐才常與譚嗣同之交誼與事功
 - (13)陳華新：康有為近代意識芻議
- ◎10月29日 第三節 主席：李時岳
 - (14)黎活仁：愛國詩的時間意識——有關有康為詩的研究
 - (15)李鴻生：試析戊戌變法時期學會性質
 - (16)陳澤昌：我〔新會〕縣五年來對梁啟超思想研究的情況報告
- ◎大會討論 主席：趙令揚

康、梁的維新運動對近代中國的貢獻

(編者按：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另提供「中國海關研究」國際研討會及「羅香林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消息，本期及上期通訊業已刊出，茲不再登錄。)



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概述

程 玉 鳳*

一、本館資委會檔案之接收與典藏

「資源委員會」為我國抗戰時期經濟部所屬之重要機構，其前身為「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原直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二十四年四月改組後，隸屬軍事委員會，始稱「資源委員會」；至二十七年二月，依中央調整機構案，改隸經濟部。其業務範圍，從最早之調查全國資源，研究設計與國防有關之工業建設，擴大而為創辦、經營及管理全國工、礦、電業，對於支援長期抗戰，全面帶動我國之工業發展，走向現代化，貢獻頗鉅。有關其沿革、組織及業務概況，可參閱本刊第六期史料介紹及本館出版之「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一書。

按資源委員會檔案原存重慶牛角沱，抗戰勝利後，中樞還都南京，資委會乃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由總務處第一科檔案股韓筠將該會檔案移交重慶辦事處（處長曹麗順）保管待運，共計三百零四箱。自同年十二月初，迄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中，先後分五批由公路及水道東運到京，其中隨復員汽車隊循川湘公路輸京兩批，共運卷箱二十五口，大木箱十八件；另江輪第三批運卷箱三十五口，大木箱五十七件，所有卡片、表冊、卷櫃等等亦隨船東下。惜因當時交通工具缺乏，以致尚有民國三十年以前之舊卷和附件一百二十八箱，未及東運（據聞現存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及至大陸淪陷，政府播遷臺灣，該批檔案乃由資委會派秘書處第四科科員董鐵錚護送，由南京經廣州轉運來臺，於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運抵嘉義，暫存該會所轄之中國石油公司嘉義溶劑廠原料庫。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始由經濟部移交國史館典藏，作為整理抗戰文獻之用。以上為本館接收資委會檔案之經過。

* 國史館佐理員

二、資委會檔案之清理

資委會檔案歷經戰亂，由重慶而南京、廣州、嘉義而臺北青潭，其間輾轉運送，致遭殘缺破損，而在嘉義庫存期間，復遭蟲蝕與「八七」水災浸濕，其受損毀之災情更可想見，有的已成爛泥硬塊，嗣經本館整檔人員開箱清理，細心檢點，凡原卷完整者，仍按原案卷所分之「總務」、「業務」、「材料」、「工務」、「運輸」、「會計財務」、「綜合」等部門予以分類歸卷，將原編之檔號及案名，填於新卷夾上，其餘散亂無章者，仍按上述分類原則，依內容擬定新案名，亦即儘量使其還原或重建。至於英文部分，則先將英文案名譯成中文，以便於查閱。以上為資委會檔案初步清理之概況。

三、本館現藏資委會檔案數量與內容

本館現藏資委會檔案，共有 27,595 卷，532,000 件，另有地圖 3,875 張，其中中文案卷 19,616 卷，英文案卷 7,979 卷，茲分別介紹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中文檔案

中文檔案即資委會本會及各附屬機構在國內往來之公文，為中式之案卷。以下按總務、工務、業務、會計財務、運輸、材料、綜合等七大門，分類述之。

1. 總務門：時間起自民國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

a. 總類：內容包括各項法令、規章，各單位組織章程，各種會議紀錄（如東北辦事處之聯席會議紀錄），各機構動態（如遷址）及職員交接等等。

b. 人事類：內容包括人員之甄選、介紹、實習、任用、選調、辭職、免職、遣散、留資停薪；薪俸調查、公費、生活津貼、年終考績及請假等之考核；舉辦各種特別訓練、職員進修、派員出國實習；員工子弟學校設立、獎金核發、保險、消費合作社等員工福利；員工撫卹、因公損失、空襲損害等救濟，以及各種表報（如人事動態月報），員工之緩役，貪污舞弊之查緝，員工之診療、保健（如與醫院簽約）等等。

(c) 文書處理類：內容包括印信、電信電報拍發、公文處理、郵務

等。

(d) 事務類：內容包括房屋租賃、車輛、器具、材料、燃料、糧食、服裝之購置供應、通訊工具之裝設（如電話）等等。

(e) 治安類：內容包括警衛之編制、薪餉、消防等。

(f) 交際類：內容包括各種參觀、招待（如魏德邁之蒞臺參觀）及集會、慶慰等。

(g) 圖書類：內容包括圖書之訂購、閱覽及公報刊物發行。

2. 工務門：時間起自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七年。

(a) 總類：內容包括經濟法規、各單位之工程合同、合約、施工計畫（如揚子江三峽計畫）、各項工程報告、圖表等。

(b) 工程實施類：內容包括各項工程修建、各廠房設備之裝配修復、機器安裝及修理（如中國油輪公司永瀨輪之修理）等。

(c) 工程紀錄類：內容包括各礦區之探勘（如錫銅煤礦查勘報告）、原油礦樣之化驗分析、發明專利申請等。

3. 業務門：時間起自民國二十八年至四十年，七大門中以此門包含範圍最廣，案卷也最多，甚具參考價值。

(a) 總類：內容包括各項法令、各單位營業規章、工作計畫、擴充計畫、生產計畫、業務計畫、工業重建計畫、以及各種報告（如工作報告、業務報告、工作日報、月報、年報、視察報告）等。

(b) 調整類：內容包括各單位結束業務及移交清冊，接收敵偽各公司、株式會社之估價清冊、經濟部魯豫晉特派員辦公處接收各廠報告書，各廠處之撤遷情形報告等。

(c) 物資管制類：內容包括成本、採購收購礦品，對英、日各國易貨價，內銷、外銷、緝私礦品，呈報出品報告、生產及供應情形等等。

(d) 工廠管理類：內容包括新工廠之登記、檢查。

(e) 權益類：內容包括呈請設定國營礦權、申請註冊商標、註冊圖表、核發礦品運輸執照等。

(f) 設計研究類：內容包括本會及各單位、臺灣各公司之廠況調查、資料蒐集（如調查表、統計表）等等。

(g) 資源開發類：內容包括各礦區之探礦情形及礦區圖表等。

(h) 徵用類：內容包括各公司房地、交通工具、器材之徵借及清冊等。

(i) 意外事故類：內容包括各廠之遭盜竊、舟車輸運損失、水火災損失清冊、戰時財產損失報告等。

(j) 合作類：內容包括董監事及股東代表之選舉任用、合辦電力公司、外國投資技術合同、顧問報告（英文）、申請美援等等。

4.會計財務門：時間起自民國三十年至四十一年。案卷數量頗多，僅次於業務門與總務門。

(a) 總類：內容包括會計財務規章之核備、會計財務總報告等等。

(b) 歲計類：內容包括各單位之營業、創業、經常費概算、預算、計算、年度營業決算等。

(c) 會計報表類：內容包括本會及各單位之各種靜態報告（如現金結存表、財產目錄、現金日報、會計日報、月報、年報），各種動態報告（如日、旬、月、季等動態會計報表）等等。

(d) 經費類：內容包括本會及各單位之經常費（如經常費單據粘存簿），請領撥借流動金，各廠礦自籌借款（如向銀行透支借款和工貸案借款），易貨償債基金之動支週轉金，各種賦稅之課徵（如所得稅、關稅、產銷稅、礦稅），各種捐款（如獻金、寒衣捐、慰勞捐及其他公益慈善捐）等。

(e) 外匯類：內容包括各種重工業外匯（如向美貸款列購器材），產運銷礦品外匯及外匯申請、外匯結購、外匯結售等。

(f) 保險業務類：內容包括水火險、運輸險等。

(g) 資財調查類：內容包括資產報廢及各款項帳目之查核。

5.運輸門：時間起自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七年。

(a) 車費類：內容包括車輛之增購、調度、修理配裝；汽車燃料之購辦、撥借油桶、呈報油料損失等。

(b) 運務類：內容包括運輸表報、器材運輸概況、運輸計畫（如西北運油計畫），運費結算，各種營運業務（如公路、驛運、呈送運輸合約）及請領運費護照、物資出口（如鎢銻、汞外運等運輸統制）等。

6.材料門：時間起自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七年。

(a) 章則類：內容包括材料之管理、裝運等章則。

(b) 採購徵詢類：內容包括各種機器材料、應用工具、原料之採購如向英、美、日之購炸藥、鋼鐵等（含清冊），呈送運輸報告（如購料月報表），器材原料之招標洽購，各廠器材之訂單合約等。

(c) 材料管理類：內容包括呈報材料儲運狀況、材料收發月報，存料

報告（如材料盤存比較表），讓售材料，呈報材料損失等。

(d) 調節類：內容包括各機關之間器材之讓借調撥，代辦各機關之託購器材、供應調配煤量等。

7. 綜合門：即業務委員會綜合組之案卷，其內容十分龐雜，時間起自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其主要內容包括各事業單位組織規章、年度工作計畫、各項工作報告、顧問報告、各委員會議紀錄、董監事任免、職員名冊、對各國銀行貸款、購料與技術合作、接收敵偽事業、以及人員之介紹、考績、勞工會議、工潮、器材之運輸及運費等。

(二) 英文檔案

英文檔案係指資委會駐美單位與國內本會及附屬事業機構或國外機構來往之信函、電報、各種資料等等，其內容中、英文兼而有之，然仍以英文占多數。時間起自民國二十九年及至四十一年，其中以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之檔案為最多，共約 287,939 件。該會駐美單位先後計有：「國外貿易事務所紐約分所」、「購料室駐美辦事處」、「駐美技術團」、「駐美代表辦事處」等，其任務為負責對美銷售特種礦品、清償鎊、錫等項債款、辦理購料事宜、接洽技術合作與人員訓練等等，故該批檔案內容亦不出此範圍，其主要內容僅據目錄歸納如下：

1. 美國各大公司之函電、函件及通知書：如美國無線電公司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國鋼鐵公司 (U. S. Steel Corp.)、雷諾汽車公司 (Reo Motors Inc PFC B-3)……等與資委會來往之函電、函件及通知書。

2. 訓練組與各公司往來函件：如訓練組與南賓州石油公司 (letters Between Training Department and South Penn. Oil Co.)、伯利恆鋼鐵公司 (letters Between Training Department and Bethlehem Steel Export Co.)、西屋電氣公司 (Westinghouse Elec. & Mfg. Co.)……等接洽實習訓練事宜之函件。

3. 與美各公司之訓練計畫、技術合作計畫：如與北美肥料公司 (North American Fertilizer Co.)、N. R. K. 機械製造公司 (N. R. K. Mfg. & Engineering Co.)……等訓練計畫。

4. 赴美實習技術人員之訓練資料、函件、報告：如孫運璿、劉曾适、蔡同興、韋永寧……等人之資料。本館去年出版之「資源委員會技術人員赴美實習史料」一書，即就此部分檔案編撰而成。

5. 個人函件：如翁文灝、錢昌照、盧祖詒、杜殿英等重要主管之電報、信函。

6. 國外貿易事務所出口市場報告、函件。

7. 與美各公司購貨、交易之往來函件：如該會與氰胺公司（File of American Cyanamid Company）、鋁業公司（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等購貨、交易往來之函件，為數頗多。

四、結 語

由上述本館所藏之資委會檔案觀之，其中文檔案內容幾已包括原檔案分類之各門類、項目，而英文檔案更為其特色，從此一檔案可以概見當年資委會為謀突破技術之困境，與美國各公司達成合作計畫，訓練人才，並以易貨償債方式向其購買機器、材料，促成中國抗戰時期工業發展的艱辛歷程，故頗具研究價值。

□近史所口述歷史新書兩種□

(16) 袁同疇先生訪問紀錄

精250 平200元

郭廷以校閱，張朋園、馬天綱、陳三井訪問，陳三井紀錄

袁同疇先生（1901-1986），湖南省汝城縣人，復旦大學畢業，曾赴日留學年餘。青年時代，先生在上海及南洋等地撰文鼓吹新思想。北伐以前，任職黃埔軍校。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歷任湖南省、內政部、考試院等黨政要職。抗戰軍興，重參戎行，經歷多項軍中要職，尤以主辦退役軍官十餘萬人之轉業，貢獻最著。勝利後當選為汝城縣國大代表。來臺之初，曾代表國防部接收日本賠償物資，旋任職於國營事業機構。本紀錄為民國五十二年三月至五月所作之四次訪問整理而成，訪談內容以先生早歲求學經過及抗戰前從政經歷為主；並選錄先生遺著「往事如煙八十年」中之相關文章十一篇，以廣流傳。

(17) 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

精250元 平200元

黃嘉謨、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

勞聲寰先生原籍廣東，1905年誕生於廣西都安，先後畢業於中央陸軍官校、軍官教育總隊、中央航空學校陸空聯絡訓練班。歷任排、連、營、團、師長，空軍入伍生隊長、總隊長、驅逐總隊長，空軍特務第六團團長兼飛行基地陸戰指揮官、國防部參議、總政治部高參、軍友社軍眷服務處副處長、處長、聯勤軍眷管理處處長等職。民國五十一年退役，為國家服務四十餘年，貢獻良多。本書為先生訪問紀錄，並附先生親撰補充資料，應為國軍幹部的珍貴史料。

*函購七折，郵撥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所藏保皇會、 中國民主憲政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史料

余 慧 子*

中國民主社會黨的產生，據伍憲子所劃分為三階段：一、由強學會、保國會至戊戌維新；二、由保皇會至民主憲政黨；三、由國家社會黨與民主憲政黨合併而為民主社會黨。這三個階段史料，以第一階段由強學會、保國會至戊戌變法至為豐富，研究論著至多。第二階段史料因多流散海外，蒐羅不易。至於第三階段史料，亦因當時時局動亂，加以黨人鬧分裂，更難搜集齊全。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在海外成立「保皇會」，其後發展為「帝國憲政會」、「民主憲政黨」。全盛時期，擴展至南北美洲及澳洲等地，分會遍佈二百餘埠，會員多至百餘萬人，為中國之大政黨。其後逐漸轉化，後期日漸衰弱，未能在中國政治舞臺佔有一席之地。

憲政黨後期與國家社會黨合併而成民主社會黨，可追溯張君勱在德國教授哲學時，兩黨首腦即有緊密之聯繫。其後合併而分裂，過程及有關資料，均為當事人第一手資料，至為珍貴。

本史料所涉及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徐勤、張君勱等，在中國近代政治及思想史上，曾起極深厚之影響。由於史料多流散在海外，或出於忌諱，近人著述中，極少引用。實為研究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的政治活動、思想生活最重要的資料。

此批屬於民主社會黨第二、三階段史料，原為香港文華圖書公司主事人費多年心血，自港、美兩地徵集而成，全部均為原件原本，從未公開或印行，現存祇此一份。

1. 救大清皇帝會序

Chiu Ta-Ch'ing huang-ti hsü.

* 柏克萊加州大學華美研究圖書館主任

By K'ang Yu-wei. [n. p., n. d.] 16p. (double leaves)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康有為離開日本，三月到加拿大，四月曾赴英倫，復返加拿大。六月十三日與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域多利 (Victoria) 組織保皇會。此篇序文是成立保皇會時的演說，為保皇會最原始史料之一。本書為手寫石印本，所言內容與康有為政變思想悉合，且篇後有康有為信徒張炳雅題：「按此篇序文乃南海先生蒙難初抵加拿大域多利埠演說」，由此可證實此序文是出自康有為手筆。

2. 保皇會公議改定新章

Pao-huang hui kung-i kai-ting hsing-chang.

New York, Chung-kuo wei-hsin pao, 1905. 26p. (double leaves)

內容：招集會議之書；各埠代表地名人名；章程；大會演說文；跋文；議案。本新訂章程二十七條是康有為所訂立，卷末由康有為署名。其中尚包括康有為演說及創作之愛國歌、干城學校歌及保皇會歌等。

3. 保皇會干城學校校史

Pao-huang hui Kan-ch'êng hsueh-hsiao hsiao-shih [n. d., n. p.]

保皇會創辦干城學校於光緒三十年，先後在美國羅省、芝加哥等地成立。創辦時康有為致函訓勉有嘉，並為干城學校兵操圓題詞。光緒三十一年春，康有為自加拿大南游美國，抵達羅省時保皇會歡迎盛況，並與干城總教習李將軍參觀各地干城學校。另附有干城學校李總教習所擬定軍例並小啟譯錄。

4. 丙午佈告改會全文及簡單

Ping-wu pu-kao kai-hui ch'üan-wên chi chien-chang.

By Chung-kuo hsien- cheng tang chu Mel-chou chin-pu. New York, 1936. 26p.

康有為：布告百七十餘埠會眾丁未年元旦舉大慶典告保皇會改為帝國憲政會文（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四日）；康有為：行慶改會簡要章程。

5. 帝國憲政會大會議敘例

Ti-kuo hsien-cheng hui ta-hui hui-i hsü-li.

New York, Chung-kuo wei-hsin pao. 1907. 8p. (double leaves)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帝國憲政大會在美國紐約召開，康有為自歐洲來蒞會，各地代表以美東較齊集，其他如遠至澳洲者亦派代表出席，會上康有為發表演說凡三小時，至二月二十日會議閉幕。本書敘述當時會議過程，各埠代表名錄，以及各議員通過提議各條及會章等。

6. 中華帝國憲政會聯合海外二百埠僑民公上請願書

Chung-hua ti-kuo hsien-cheng hui lien-ho hai-wai erh-pe pu kung-shang ch'ing-yüan shu.

By K'ang Yu-wei. [New York] 1908. 58p.

本書為單行本，內容與「不忍」雜誌第四、第六册一九一三年五月、七月發行，標題：「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相同，但出版時間較「不忍」雜誌發表早五年，為康有為寫成此文（一九〇七年）後次年出版。

7. 美洲中華帝國憲政會稟

Mei-chou Chung-hua ti-kuo hsien-cheng hui pin.

By Chao Wan-sheng and Feng Ching-ch'üan. 1909.

本稟為廣東賭害大，宜先禁賭而後籌款。

8. 林立澂：英屬加拿大七省憲政總會稟

Ying-shu Chia-na-ta ch'i-shêng hsien-cheng ts'ung-hui pin.

By Lin Li-kuang and Chiang Nai. 1910.

本稟為國勢岌危，民情惶惑，請開國會，發憤圖強。

9. 憲政黨章程

Hsien-cheng tang chang-ch'eng.

New York, Chung-kuo wei-hsin pao. 1914. 4p. (double leaves)

本章程除收有康有為甲寅年（一九一四）年修正共六章十八條外，並增加第七章海外支部附則。

10. 憲政黨章程 甲寅年修正

Hsien-cheng tang chang-ch'eng [n. p.] 1917. 4p.

本章程經康有為修正於甲寅年，附修正十八條外，並附有憲政黨加拿大支部專章。

11. 中國憲政史之一瞥：請願國會事

Chung-kuo hsien-cheng shih chih i-pieh: Ch'ing-yüan kuo-hui shih. Peking, Kuo-hui ch'ing-yuan tai-piao tuan shih-wu so. [1910]

一、代表團五月二十日奉上諭後之議決案；二、北京國會請願同志會成立及各地同志會名單；三、北京國會請願代表團決行第三次請願通告書；四、伍憲子致維新報公函。

12. 中國商務公司招股簡明章程

Chung-kuo shang-wu kung-szu chao-ku chien-ming chang-ch'eng.

By K'ang Yu-wei and Liang Ch'i-ch'ao. 1903.

本章程爲梁啟超擬定，以康有爲出名爲督辦。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梁啟超致康有爲書云：「一、弟子瀕行時，再印一招股簡明章程數條，出先生名爲督辦，弟子名爲副督辦，其總理管銀等職由督辦派出，蓋非如此，則事權不能專也……」。計擬辦如下商務：一、在香港開設銀行；二、在蕪湖開設磁器公司；三、在省城開設電車至佛山；四、在香港、紐約、上海、橫濱等處開設庄口辦出入口貨。

13. 彙招銀行鐵路股優給非常特利章程

Chien chao yin-hsing t'ieh-lu ku yu-chi fei-ch'ang t'e-li chang-ch'êng.

By K'ang Yu-wei. 1907.

本章程由康有爲署名，爲籌辦華墨銀行及認購粵漢鐵路股權而招股，據章程內容云：「今特商定優給特利之例，俾我同志銀行鐵路兩利俱得，且可化一爲二，以一圓作二圓之用，以一銀行股生意，而兼得鐵路之生意……」。

14. 華墨銀行公司股票

Hua Mê yin-hsing kung-szũ ku-p'iao.

華墨銀行所發出股票二份，編號八五四五及八五六九號，發出日期爲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股票持有人爲馮鏡泉，股票面額爲華銀一百二十五元及華銀二十五元，股票上另蓋有「特利票每股三十元」紅印。

15. 劉觀察勸業編

Liu kuan-ch'a ch'üan-yeh pien.

By Liu Shih-chi. Vancouver, Wên-ko-hua hsün-pao, 1908. lv.
(various pagings)

勸美洲華僑振興廣西實業文；劉觀察鳴博在溫哥華埠演說文；劉觀察鳴博答菜苑李君福基書；劉觀察鳴博與南美洲智利國意機忌埠中華會館書；劉觀察勸業編跋（歐雲高）

16. 振華公司與辦廣西實業稟奉批准奏諮立案各稿

Chên-hua kung-szũ hsing-pien Kuang-hsi shih-yeh pin fêng p'i-chun tsou-tzũ li-an ko-ka.

By Chên-hua kung-szũ fa-ch'i jên. [n. p.] Wên mou yin-chü, [1908] lv. (various pagings)

一、振華公司與辦廣西實業報告書（劉士驥）；二、稟奉批准奏咨立案各稿（葉恩等）；三、創辦廣西銀行懇荒開礦輪船鐵路振華有限公司招股章程。

17. 劉銘博觀察令嗣布告天下同胞書

Liu Ming-po kuan-ch'a ling-szŭ pu-kao t'ien-hsia t'ung-pao shu

By Liu Tso-chieh. [n. p.] 1909. 29p. (double leaves)

劉銘博觀察遇害後，其後人所輯錄劉銘博赴美招股日記擇錄，並輯有與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交涉函電二十餘通，為研究康有為與振華公司關係之重要資料。卷末附「兩廣官紳學商合祭劉銘博文」；「追悼劉鳴博觀察紀事」；「官紳學商四界輓聯」。

18. 駁徐勤等報告書 原書附

Po Hsu Ch'in teng pao-kao shu yüan shu fu.

By Kuang-hsi chen-hua shih-yeh kung-szŭ. [n. p.] 1909. 17p. (double leaves)

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憲政黨人為振華公司權益與廣西振華實業公司葉恩、歐渠甲等入衝突。徐勤為此發表油印報告書致各埠憲政黨人。本書為斥駁徐勤報告書而寫，並云徐勤之報告書實出自梁啟超手筆。

19. 駁徐勤布告書再啓

Po Hsü Ch'in pu-kao shu tsai ch'i.

By Kuang-hsi chên-hua shih-yeh kung-szŭ. [n. p.] 1909. 7p. (double leaves)

20. 雲高華埠憲政會佈告書

Yün-kao-hua pu hsien-cheng hui pu-kao shu.

By Chia-na-ta hsien-cheng ts'ung-hui. [Vancouver] 1909. 30p.

本篇為加拿大憲政黨人為廣西振華實業公司權益問題與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辯駁資料。卷末「附錄徐勤等佈告書」；「附錄檀山正埠帝國憲政總會公啟」此篇與「駁徐勤等佈告書」，及「駁徐勤布告書再啟」互具參考價值。

21. 振華公司在美洲招股始末真相

Chên-hua kung-szŭ tsai Mei-chou chao-ku shih-mo chên-hsiang.

By Liang Chao-chieh. [n. p., n. d.] 19p.

本書作者乃振華公司發起人之一。本篇敘述其本人與劉銘博在美洲招股過程，言明振華公司創辦成功，憲政黨人居功至偉，不容振華公司當權者所能抹煞。

22. 憲政會紀始事略

Hsien-cheng hui chi-shih shih-lüeh.

By Li Fu-chi. [n. p.] 1909. 11p.

本書前半部敘述康有為戊戌政變在國外成立保皇會經過。下半部則為憲政黨商務及廣西振華公司事件與葉恩等人之辯駁，可作為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人

之辯護詞。

23. 瓊彩樓徵信錄

Ch'iuung-ts'ai lou chêng-hsin lu.

Comp. by T'an Chang-hsiao. [n. p.] Kuo-hun Jin-pao, 1909.
18p. (double leaves)

本篇輯錄譚張孝與康有爲爲瓊彩樓賬目協訂，譚張孝藉此「徵信錄」表明清白，列明歷年進支數目，附錄康有爲駁數及認數原信，並附印康有爲原信筆跡。此「徵信錄」發表對康有爲頗爲不利，故其甥游師尹致康有爲書云：「張孝亦以人心如是，故敢明拒，至將舅父所與他的信件盡影發各埠。如朝廷有好消息，必須報此陰謀。孝當舅父至難之際，而挾人心慾各埠以拒，可惡之極！」。

24. 康有爲致各埠憲政黨同志書

K'ang Yu-wei chih ko-pu t'ung-chih shu.

By K'ang Yu-wei. [Hong Kong] 1904. 16p.

此信康有爲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在香港寫成，分寄各埠憲政黨人。全函長一萬二仟餘字，主要爲商務責黨人捐款不力，並爲香港華益銀行之邱壽及日本之梁啟超申辯。函末並爲其本人業積自評之曰：「……適遭國危，捨身任之，吾生亦既備歷十死矣，焚書三百牘，珍愛之書畫古董，盡以充沒，而田園廬舍不計也；亡弟旣戰，先人之墳墓被掘，全家十口，幾乎盡死……假如吾得政權爲相國，再成大功如俾斯麥，以吾觀之，亦味如嚼蠟……吾亦爲捨身救萬里中國，維新五千年古國之人，他日吉金樂石，青史詩歌，焜耀輝煌於千百年後者，雖合全國仇者攻之，不能少損也，吾復何求哉……」，惜後人評之爲「封建餘孽」，此非康有爲所能料也。

25. 康有爲致張炳雅自辯函

K'ang Yu-wei chih Chang Ping-ya chih-pien han.

By K'ang Yu-wei. [1907]

戊戌政變後，康有爲在海外成立保皇會，與黨人經辦商務計有：墨西哥華墨銀行、香港華益公司、廣西振華實業公司、芝加哥瓊彩樓等。後因賬目不清，權益不均，黨人彼此攻訐，康有爲亦牽涉在其中。本函係康有爲致其信徒張炳雅，爲商務賬目不清而自辯，列舉其購樓置業投資等經濟來源。信末更提及與婦女關係，因其五十無子，在紐約納第三妾等，是研究康有爲生平重要資料。

26. 南海電文

Nan Hai tien wên.

San Francisco, Chung-hsi jih-pao. [1920-1926]

康南海覆張紹曾電；康南海演講孔道；康南海為浙議員鄭邁質問省長西湖古蹟事致沈省長函稿；康長素之自白；康有為致吳佩孚電（一九二一年十月）；康有為讀報聞日俄立協約遂亡高麗降封李王痛慨感賦六章；康有為為羅文幹辯誣電（一九二二年）；康有為對孫中山電（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致美國務卿休士書（一九二三年）；康有為對金佛郎案之通電（一九二四年四月）；康有為致陳廉伯書；康有為致段祺瑞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日）；康有為致善後會議函；康有為致班禪書（一九二五年）；康有為述游說經過函；康有為討赤電（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康有為盛誇君主立憲之萬能；康有為再為溥儀請命（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康有為陝西講因果；康有為題鄭州續獲古物詩；康有為哭西陵。

以上南海電文是三藩市中西日報輯存，發表期間為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因流傳海外「康有為詩文集」、「康有為政論集」、「萬木草堂遺稿及外編」等書均未收錄。

27. 康南海先生戊戌輪舟中與徐君勉書及丁巳跋後

K'ang Nan-hai hsien-sheng wu-shu lun-chou chung yu Hsü Chün-mien shu chi ting-i pa-hou.

By K'ang Yu-wei. [Peking] 1917. 1v. (double leaves)

戊戌政變康有為為英人所救，在英輪上遺書其弟子徐勤託以後事。康有為六十壽日，徐勤之子徐良乞其為此遺文加以跋語以廣流傳。

28. 康有為手迹：宣統元年委派徐勤為代辦總長書

K'ang Yu-wei shou chi: Hsüan-T'ung yuan-nien wei-p'ai Hsü Ch'in wei tai ts'ung-ch'ang shu.

康有為親筆寫在 P. & O. 船公司信箋上。宣統元年，康有為遊埃及、耶路撒冷、旋遊瑞士、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七月初一回檳榔嶼，此函在檳榔嶼寫成。以久病及目疾遵醫所囑謝絕人事，遂委派徐勤為代理總長。函云：「此後商事會事，皆就近與徐徵君及梁總長公商，不必告僕」。函右角上寫有「可登報」。署「宣統元年七月朔」，當一九〇九年八月。

29. 金山大埠世界日報年結總簿

Chin-shan Ta-pu shih-chiai jih-pao nien-chieh ts'ung-pu.

San Francisco, Shih-chiai jih-pao, 1926. 8p. (double leaves)

30. 金山大埠世界日報年結簿

Chin-shan Ta-pu shih-chiai jih-pao nien-chieh pu.

San Francisco, Shih-chiai jih-pao, 1927. 7p. (double leaves)

31. 民元後憲政黨文件

Min yüan hou hsien-cheng tang wën-chien.

中國憲政黨致閻錫山書（一九三〇年一月）；中國憲政黨美洲黨員致張學良書（一九三一年九月）；梁任公、梁文卿來書（有關討袁事）；中國憲政黨總部通電；中國憲政黨駐美總支部為抗日救亡事敬告全美僑胞書；忠告國民黨全體黨員書；中國憲政黨、致公堂通電；中國憲政黨志並會議情形；組織南海學會公函；籌設萬本學院緣起；任公學會簡章。

32. 徐勤致伍憲子函

Hsü Ch'in chih Wu Hsien-tzŭ han.

徐勤字君勉，為康有為入室弟子，憲政黨創辦人之一，曾任憲政黨主席至其逝世。戊戌政變康有為倉卒逃亡，在英輪上致書徐君勉以後事相託，可見其師徒關係之深切。徐勤致伍憲子函六通，多寫於民國十八年間，其中不乏當時國內外時局動向，徐勤處理康有為書籍遺物等，從中可窺見徐勤的政黨活動及其政治見解等。

33. 徐勤傳略

Hsü Ch'in ch'uan-lioh.

By Hsü Liang. [1932] 4p.

34. 伍憲子手稿：中國憲政黨史略（拾篇）

Wu Hsien-tzŭ shou-kaō: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shih-lŭeh (shih pien).

By Wu Hsien-tzŭ. [1934] 9p. (double leaves)

35. 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

Chung-kuo min-chu hsien-cheng tang tang-shih.

By Wu Hsien-tzŭ. [San Francisco] Shih-chiai jih-pao [1952] 206p.

36. 中國憲政黨宣言大綱

Chung-kuo hsien-cheng hsüan-yen ta-kang [n. p.] [1928] 20p.

37. 中國憲政黨三藩市支部宣傳科駁中國國民黨三藩市分部宣傳科文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San-fan-shih chih-pu hsüan-ch'uan k'o po Chung-kuo kuo-min tang San-fan-shih fen-pu hsüan-ch'uan k'o wên. By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chu San-fan-shih chih-pu hsüan-ch'uan k'o [San Francisco] 1929. 1v. (double leaves)

38. 中國憲政黨三藩市支部宣傳科斥國民黨三藩市黨部自認陷害僑胞為合法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San-fan-shih chih-pu hsüan-ch'uan

k'o ch'ih Chung-kuo kuo-min tang San-fan-shih tang-pu chih-jen
hsien-hai ch'iao-pao wei ho-fa.

By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San-fan-shih chih-pu hsüan-ch'uan
k'o [San Francisco] 1929. 7p.

39. 中國憲政黨總部對時局之嚴重宣言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ts'ung-pu tui shih-chu chih yen-chung
hsüan-yen.

By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chu Mei-chou ts'ung chih-pu. San
Francisco, [1929] 12p.

40. 國民黨人親口招供的醜史

Kuo-min tang jen ch'in-k'ou chao-kung ti ch'ou-shih.

By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San-fan-shih chih-pu hsüan-ch'uan
k'o. San Francisco [1930] 60p.

41. 夢蝶先生批評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告國人書

Mêng Tieh hsien-sheng p'i-p'ing Nan-ching kuo-min tang chung-
yang hsuan-ch'üan pu kao kuo-jen shu.

By Mêng Tieh (Wu Hsien-tzŭ). New York, Niu-yo kung-pao
[n. d.] 24p.

42. 蔡廷鍇：抗敵救國箴言釋義

K'ang-ti chiu-kuo chen-yen shih-i.

By Ts'ai T'ing-ch'ia, annotated by Wu Hsien-tzŭ. [San Francisco]
[1935] 12p.

43. 洪門革命史 附黃三德致伍憲子函

Hung Mên kê-ming shih fu Huang San-tê chih Wu Hsien-tzŭ han.

By Huang San-tê and Wu Hsien-tzŭ. [San Francisco] 1936. 55p.

本書是伍憲子據黃三德所提供資料而寫成。黃三德與孫中山先生之關係在孫中山傳記、革命逸史等著作均有提及。附黃三德致伍憲子函六通，敘述孫中山參加洪門經過，洪門救孫中山先生出安琪島木屋，同游美陸各埠籌款，洪門資助革命運動，民元後孫中山先生與洪門關係恩怨等，其中若干節有對孫中山先生不敬之處，由此可緬懷國父奔走革命之辛勞。是書由憲政黨人執筆寫成及印行，可視為革命黨與保皇黨論爭之延續。

44. 紐約中國維新報

Niu-yüeh Chung-kuo wei-hsin pao. (Chinese Reform News)
New York, Chung-kuo wei-hsin pao, March 10, 1904–October 6,
1904. Nos. 1-30.

紐約維新報創刊於戊戌政變後第六年，是保皇會會刊，曾出版不少有關保皇會小冊子，現存由第一期至第三十期，惜原藏人所將其中部份動頁，但仍不失其研究保皇會之參考價值。

45. 革命軍彙刊

Kê-ming-chün hui-k'an.

San Francisco, Chung-kuo hsien-cheng tang San-fan-shih chih-pu
hsüan-ch'uan k'o, August, 1929–January, 1930. 1: 1-10; 2: 11-20;
3: 21-30; 4: 31-40.

46. 張君勳手稿：四十年來吾國政治思想之變遷及今後政治思想之獨立

Chang Chun-mai shou-kao: Szu-shih nien lai wu-kuo cheng-chih
szü-hsiang chih pien-ch'ien chi chin-hou cheng-chih szü-hsiang
chih tu-li.

By Chang Chun-mai. [Jeva] [1931] 20p. (double leaves)

此篇張君勳從未發表手稿，為張君勳於一九三一年任教德國耶納大學時寫成，本篇共三章：一、衝決網羅之譚嗣同；二、民族自由主義之梁啟超；三、共產主義之陳獨秀。

47. 張君勳致伍憲子、李微塵函

Chang Chün-mai chih Wu Hsien-tzŭ, Li Wei-ch'ên han.

張君勳致伍憲子、李微塵函件十八通，寫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間，大部份為張君勳應聘德國耶納大學教授中國哲學時之通信，為研究張君勳當時之生活思想，及中國憲政黨與國家社會黨關係之重要史料。

48. 中國民主社會黨政綱釋義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eng-kang shih-i

By Chang Chün-mai. [n. p., n. d.] 19p.

49. 中國民主社會黨：政綱、黨章、宣言及公告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eng-kang, tang-chang, hsüan-yen chi Kung-kao.

Published by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ti-i tz'ü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mi-shu ch'u [Shanghai] 1947. 13p.

50. 盧毅安：中國民主社會黨分裂之經過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fen-lieh chih ching-kuo.
By Lu I-an. [n. p.] 1947. 24p.
51. 萬武：我爲什麼要反對張君勱
O wei-shen-mo fan-tui Chang Chün-mai.
By Wan Wu. [Shanghai] [1947] 11p.
52. 孫寶剛等：誰歪曲了黨的路線
Shui wai-ch'ü tang ti lu-hsien.
By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hsuan-ch'uan wei-yuan hui.
[Shanghai] [1948] 18p.
53. 中國民主憲政黨：和平民主統一方案
Ho-p'ing min-chu t'ung-i fang-an.
By Chung-kuo min-chu she-hui tang. [n. p.] 1948. 7p.
54. 民主社會黨革新委員會民主社會黨海外各總支部聯合聲明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kê-hsin wei-yüan hui,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hai-wai ko ts'ung chih pu lien-ho shêng-ming. August 6, 1947.
55. 中國民主社會黨省市黨部組織規程中國民主社會黨支分部組織規程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sheng shih tang-pu tsu-chih kuei-ch'êng;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ih fen pu tsu-chih kuei-ch'êng. October 1, 1947.
56. 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組織規程
Chung-kuo min-chu she-hui tang chung-yang ch'ang-wu wei-yüan hui tsu-chih kuei-ch'êng.
57. 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常務委員監察委員聯席談話會紀錄及代電
Chung-kuo min-chu she-hui tang chung-yang chien-cha wei-yuan hui lien-hsi t'an-hua hui chi-lu chi tai-tien. Shanghai, September 3, 1948.
58. 中國民主社會黨經濟方案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ing-chi fang-an.
By Sun Pao-kang and Chin Liang-pên. [n. p., n. d.]
59. 中國民主社會黨外交方案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wei-chiao fang-an

By Yao Hsin-nung and Chin Liang-pên. [n. p., n. d.]

60. 李微塵：我們對現局勢的態度和意見

O-mên tui hsien chü-shih ti t'ai-tu ho i-chien.

By Li Wei-ch'en. [n. p., n. d.] 25p.

61. 告全黨同志書

Kao ch'uan-tang t'ung-chih shu.

By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ung-yang ch'ang-wu wei yuan hui. Hong Kong, 1948.

62. 中國民主社會黨產生之時代及沿革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an-sheng chih shih-tai chi yen-kê.

By Wu Hsien-tzu. [Hong Kong] [1948]

63. 中國民主社會黨分裂過程剪報輯存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fen-lieh kuo-ch'êng chien-pao chi-ts'un.

Comp. by Wu Hsien-tzŭ. [1947-1955] 2 vols.

本輯共二厚冊，是伍憲子親自剪輯省、港、滬、海外等地各大小報章報導有關中國民主社會黨分裂過程，及其與張君勱各為黨內糾紛所發表各種聲明，民社黨兩派通告等。伍憲子是憲政黨與民社黨合併及分裂的當事人，曾任憲政黨主席及憲政黨報章主筆多年，由其親手輯存剪報等文件，是研究中國民主社會黨分裂過程最直接及重要資料。

64. 中國民主社會黨黨訊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tang-hsin.

Shanghai, Chung-kuo min-chu shê-hui tang chung-yang hsüan-ch'uan wei-yüan hui, September 20, 1947-July 15, 1948. Nos. 1-21 (Nos. 3, 9-10 missing).

65. 中國民主憲政黨之立場

Chung-kuo min-chu hsien-cheng tang chi li-ch'ang.

By Li Ta-ming. [San Francisco] Chung-kuo min-chu hsien-cheng tang chu Mei-kuo ts'ung chih pu, 1948. 5, 37p.

66. 李大明：駐港美總領事報告書的批判

- Chu Kang Mei ts'ung-ling-shih pao-kao shu ti p'i-p'an.
By Li Ta-ming. [San Francisco] Shih-chiai jih-pao, 1945. 144p.
67.A PROGRAM FOR THE RESURRECTION OF CHINA
By Lee Dai-ming (Li Ta-ming). [San Francisco][n. p.] 1948. 21p.

附伍憲子著作四種

1. 伍憲子手稿：最近文稿

Wu Hsien-tzu shou-kao: Ts'uan-chin wên-kao.
By Wu Hsien-tzŭ. [1937-1939]

最近文稿目錄：復華僑某君書 戊寅正月；徐州陷落後敬告日本朝野智士書；關於應付新時局之討論；東亞和平之前提；東亞和平三大方案；東方學術復興期成會緣起 己卯；戊寅聖誕紀念詞（為檀香山新中國報作）；陳敦樸略傳；新民書局的辦法；寄佐字書；關於東亞新秩序建設之意見；應日軍某中將之請寫我的意見 戊寅九月；日本對中國之國策如何；安定中國第一策 二十六年八月代表某團體寫稿；復國運動議 二十六年稿；在聯青社演詞 二十七年六月稿；康梁合譜傳序；東亞集體安全研究會緣起；復井上雅二函 二十八年三月代徐勳撰稿；陳覺生哀詞 丁丑多月。

2. 伍憲子手稿：動物園卷三

Wu Hsien-tzu shou-kao: Tung-wu yüan. (chüan san)
By Wu Hsien-tzŭ (Mêng Tieh). [n. d.]

動物園卷三包括以下各章：第十一章 錦鷄飲彈；第十二章 猗猗孫舞簇起兵；第十三章 七山二十洞之太平夢；第十四章 訓猿；第十五章 獸風。這是伍憲子以擬人筆法所作小說手稿一卷，以動物園諷寓時局，敘述時期約為同盟會辛亥革命至倒袁止。作者是憲政黨人政見與保皇黨一脈相承，對革命黨人必無好感，極盡醜詆之能事。

3. 夢蝶文存 十九年之一部份

Mêng Tieh wên-ts'un.
By Wu Hsien-tzŭ (Mêng Tieh). [1930][n. p.] lv. (various pagings)

內容：一、指正孫文學說之錯誤；二、先與汪精衛談談；三、指正孫文演講「三民主義」之謬誤。

4. 十九路軍殺賊記

Shih-chiu-lu-chün sha-tsê chi.

Ed. by Wu Hsien-tzū. (Mêng Tieh). [San Francisco] [1932] 22p.

本書是伍憲子編寫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是他主編金山世界日報時期。香港淪陷時作者困居香港，為避免日軍檢查而將本書封面撕去，及將書名塗掉。本書共四章：一、戰爭之起因；二、戰爭之關係；三、戰爭中之輿論；四、十九路軍之歷史與人物。

綜觀以上資料，尤以廣西振華實業公司的文獻較為完備。從劉鳴博海外招股的勸業編起，至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與振華公司主事人爭奪權利引致衝突，互相發表的佈告書等。本資料可說是中國一個大政黨興起而至衰落過程的紀錄，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政黨史所不能缺少者。

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特藏之臺灣資料

吳 文 星*

如眾所周知，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是世界最大的圖書館。1980 年之際，其所典藏中文圖書逾四三萬冊，日文圖書幾近六〇萬冊，亦分別是中、日兩國以外地區最大的中、日文圖書典藏處所；其典藏項目包括已刊行的書籍、報紙、期刊，以及手稿、私人日記、函牘，甚至公家機構的檔案等，可說無所不包。因此，至該館利用的學者每有意不到的發現。過去，夏威夷大學楊格教授 (Prof. John Young) 即曾以該館日文部所藏未編目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資料為基礎，加上美國十個、日本二十五個主要圖書館的相關典藏，費了八年時間，編成一部收錄多達六、二八四種資料的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 Y., 1966)，被譽為介紹滿鐵研究活動最詳實的指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此次，筆者至該館利用兩週，在該館日文部 (Japanese Section) 未編目的典藏中發現一批關於日據時期及光復初年臺灣的資料。該批資料除了已刊行的書籍外，尚包括為數可觀的手稿、油印稿及公文檔案等；由資料上的戳記判斷，該批資料是戰後得自臺灣總督府，以及東京的東亞研究所、東亞經濟調查局、滿鐵東京支社圖書館及比島中央棉作試驗場等機構之典藏。筆者於倉促間將其中較重要者抄得一份目錄，茲略作分類，並依資料作成的時間先後排列，介紹如下：

(一)手稿及公文原檔

1. 阿緞廳港東上里第二派出所主幹補助屬森岡房雄撰，阿緞廳港東上里赤山庄舊慣調查書，明治三十六年(1903)七月。
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概況，三四頁，大正五年(1916)四月十日。
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理蕃の概況，十九頁，大正十三年(1924)八月調查。
4. 陳大機，臺灣黃麻，八七頁，大正十三年(1924)七月二十日撰調查報告。
5.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煙草課，本島住民の喫煙率について(附資料)昭和四年(1929)十月三日。
6. 臺灣大眾時報社，新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擬於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一日發行九九頁，但被日本內務省依第一九一六號令，於昭和五年十二月十日禁止發行。
7. 臺北州，昭和十二年度社會教育主要事務概要，八頁。
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第二回山地開發調查委員會附議事項，內有昭和十一、十二年度山地開發調查報告、有關臺東郡地區山地開發要綱之決議及昭和十三年度山地開發調查地區之決議等檔案，昭和十四年(1939)。
9. 臺灣總督府遞信部，臺灣油田概況，二二五頁，昭和十五年(1940)。
10. 昭和十八年(1943)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資料一包，內有關於「青年鍊成之情況」等。
11.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有關密業、土石、工業、交通、海運等之公文一包。
12.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煙草課，煙草專賣事業概要，一八〇頁，昭和十九年(1944)三月。

13.臺灣總督府殖産局農務課，本島の農業狀況，三七頁；附：農業情報，七五頁；另有公文資料；昭和二〇年(1945)九月。

14.臺灣總督府專賣局，クラーク少佐に提出の産業報告，内包括金屬、鑛業、精鍊業、漁業、製造業等，昭和二〇年十月。

15.臺灣總督府，政治情報に關する事件（臺參涉第十三號照會に依り提出せ人），三三頁，昭和二〇年十月。

16.臺灣總督府，臺灣に於ける貨幣銀行クシデットに關する情報，（上）、（中）、（下）（臺參涉第十三號に依り提出すべき），内包括全臺之銀行及財政機關、クシデット機關、無限公司、臺灣拓植株式會社等之資料，昭和二〇年十月。

17.臺灣總督府，臺灣鑛物資源に關する情報（臺連涉第九號に依り陸軍少佐しオナード・エフ・クラークに提出すべき），六八頁，昭和二〇年十月。

18.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煙草課，煙草、燐寸、度量衡事業説明書，一九六頁，昭和二〇年十一月。

19.作者不詳，臺灣紀略（附澎湖）（南筑山房用箋），二九頁，撰寫時間不詳。

20.パイワン蕃語集，八六頁，撰寫時間不詳。

21.日本語，ヤーミー語對譯字彙，一一五頁，撰寫時間不詳。

22.A B C配列タイヤル語字彙草稿。

(二)手寫油印或打字油印資料

1.總督伊澤多喜男撰，臺灣統治管見，五二頁，大正十三年(1924)。

2.臺灣總督府，西部地方内地人農林業業績調查書，三二九頁，昭和三年(1928)。

3.石黑（？）調査報告，本島勞働行政上の諸問題，一四六頁，昭和四年(1929)。

4.臺東廳，移民事業の概況，昭和六年(1931)。案：臺灣分館藏有昭和七年本。

5.臺灣銀行總務部調査課，臺灣に於ける農業金融に關する參考事項，五九頁，昭和六年(1931)六月。

6.臺北觀測所，昭和十年七月十七日新竹州強震概報，二四頁，昭和十年(1935)七月二十五日。

7.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書，計四八冊，內容包括華南、南洋、臺灣等地之農、林、漁、牧、工、礦、貿易、交通、移民、教育等之調查報告，昭和十年(1935)。案：臺灣分館亦藏有一套。

8.臺南州，理蕃概況，昭和十二年(1937)。

9.臺東廳警務課，高砂族調查資料に關する事件，內附理蕃概況，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十九日。

10.臺灣總督府，高砂族關係資料，內有昭和十二年度全臺「理蕃概況」，昭和十三年。

11.臺灣總督府山地開發調查委員會，第三回山地開發調查委員會概況，二七頁，昭和十三年(1938)十一月。

12.臺灣拓植株式會社，臺拓事業概況說明書，九六頁，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

13.臺灣拓植株式會社調查課，臺灣と支那勞働者，三三頁，昭和十六年(1941)九月。案：臺灣分館藏有影印本一冊。

14.臺灣拓植株式會社調查課，臺灣を中心とした戎克貿易に就て，三六頁，昭和十七年(1942)八月二〇日。

15.臺灣總督府，臺灣鐵工業の現勢，九頁，昭和十七年(1942)。

16.臺灣總督府，臺灣鐵工業統制會設立に關する件，二三頁，昭和十七年(1943)七月七日。

17.臺灣總督府，臺灣鐵工業統制會に屬する指定機種細分表(案)，二〇頁，昭和十七年。

18.臺灣總督府，臺灣鐵工場主要工場一覽表，一〇頁，昭和十七年三月調查。

19.臺灣總督府，臺灣鐵工業統制會に關する說明概要，五頁，昭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20.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の寺廟問題(舊慣信仰改善に關する調查報告)，八九頁，昭和十八年(1943)六月。

21.高雄海軍航空隊，臺灣の氣象(高空教參考資料第一號)，二三頁，昭和十九年(1944)十月十二日。

22.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煙草課，昭和十九年度煙草製造計畫(秘)，七七頁。

23.臺灣總督府防衛本部防空部，本島空襲狀況(昭和十九年十月十二～

十七日六日間) (極秘), 六五頁, 昭和十九年。

2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空襲被害概況 (昭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昭和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三六頁, 昭和二〇年。

2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防空課, 臺灣空襲狀況集計 (昭和二〇年八月中), 五頁, 昭和二〇年。

26. 臺灣總督府, 臺灣空襲被害狀況 (昭和十九年十月~昭和二〇年八月), 九一頁, 另附圖十張, 昭和二〇年。

27. 臺灣總督府, 昭和二〇年公文雜纂, 內容包括島內民情、空襲狀況、空襲下治安狀況、關於改善對臺人待遇所引起的民間反應等, 昭和二〇年。

28. 臺灣總督府, 臺灣統治概要, 上、下, 昭和二〇年。

案: 此書於同年出版。

29. 臺灣煙草耕作組合聯合會, 煙草耕作組合事業說明書 (附該會昭和二〇年度豫算書), 昭和二〇年十一月。

30.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煙草課, 臺灣煙草耕作法要綱, 一三五頁, 撰寫時間不詳。

31. (常用) 紅頭嶼列島植物目錄 (英文稿), 五四頁; 附小紅頭嶼植物目錄, 三五頁, 撰寫時間不詳。

32. 臺北州勸業課水產係, 管內概況, 撰寫時間不詳。

33. 臺灣總督府, 有用植物調查資料, 撰寫時間不詳。

34. 嘉南大圳利用の現況並に對策, 十五頁, 撰寫時間不詳。

35.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公約, 十七頁, 撰寫時間不詳。

36. 臺南州警務部, 水利取締要項, 二七頁, 撰寫時間不詳。

37. 臺灣寫真大觀, 一五〇張, 昭和年間輯。

(二) 已刊行資料

1.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 犯罪常習者名簿, 一八四頁, 臺灣日日新報印行, 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

2.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 臺灣宅地租調查事業成績報告書, 八一頁, 大正五年(1916)四月。案: 臺灣分館亦藏有一冊。

3. 大藏省所管大正九年度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歲入歲出預算書, 五〇頁。

4.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臺灣の鐵道(秘), 八四頁, 昭和十年(1939)八月十三日。案: 臺灣分館亦藏有一冊。

5.財團法人臺北市社會事業助成會，臺北市社會事業十年誌，昭和十一年(1936)。

6.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作課，鐵道車輛の冷房裝置（極秘），七一頁，南方協會，昭和十六年五月。

7.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自動車課，自動車空氣調和裝置（極秘），十九頁，南方協會，昭和十六年七月。

8.臺灣農會，臺灣農會義勇團誌（秘），二七三頁，昭和十七年七月。

9.高雄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高雄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定款，九頁，昭和十七年四月。

10.高雄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第拾壹期營業報告書，十八頁，昭和十九年九月。

11.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工務部，工務部報，第四號，三五三頁，昭和十八年十月。案：臺灣分館只藏有第四號補遺。

12.臺灣旅行案內社發行，臺灣鐵道貨物運貨總覽，二八九頁，臺灣新報社印行，昭和十九年五月。

13.臺灣銀行臺北調查部，大東亞共榮圈內錫需給狀態（推定）並に錫鑛業一覽表（秘），一〇二頁，非賣品，昭和十九年九月。

14.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創刊號起，計四四冊，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日。

15.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臺灣交通彙報，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專供參考，不對外發表。

以上資料絕大部分均是目前在臺灣難以看到復本者。這些資料頗有助吾人瞭解日據末期及光復初年臺灣的社會、經濟狀況，故特提供給有志於此一時期研究的學者參考。

□清季變法與維新運動研究專刊四種□

(12)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	精 140元	平 90元
(19)元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論爭	精 130元	平 80元
(24)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精 150元	平 100元
(28)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	精 190元	平 140元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所藏檔案簡介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原名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成立於1951年2月，至1965年4月始改今名。

該館的主要收藏是民國時期各個中央政府機構及其所屬機構的檔案，時間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迄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該檔案館搜集了各機關資料後，詳加考證，並將同一機構的檔案編為「全宗」，截至1985年底止，共收藏有七百五十六個全宗，計一百四十多萬卷，排架長達三萬四千公尺。這些史料中以國民政府統治的二十二年間收藏最豐，共五百八十五個全宗，計一百三十萬卷，其它南京臨時政府檔案、北洋政府檔案、日偽政權檔案、及人物檔案等收藏數量較少，有些已整理編輯成書為《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一、二、三、四輯。

自1980年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已正式對外開外，茲將該館藏檔案全宗一覽表附錄於下，以便參考。

<u>全宗名稱</u>	<u>全宗號</u>	<u>案卷 數量</u>	<u>全宗名稱</u>	<u>全宗號</u>	<u>案卷 數量</u>
一、南方革命政府檔案					
南京臨時政府	26	138	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	19	475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230	138			
二、北洋政府檔案					
國會	1060	54	善後會議	1031	106
籌備國會事務局	1029	268	總統府軍事處	1003	962
辦理國會事務局	1044	84	臨時執政府軍務廳	1004	223
國民代表會議籌備處	1030	35	國務院	1002	1,232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禮制館	1008	11	全國經界局	1009	4
國史館	1007	7	蒙藏院(蒙藏事務局)	1045	941
幣制局	1028	164	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	1013	190
內務部	1001	6,531	將軍府	1015	34
護軍管理處	1010	76	陸軍部	1011	6,540
督辦賬務公署	1033	117	軍事部	1012	130
辦理附賬款票處	1034	65	參陸辦公處	1014	535
辦理義賬獎券處	1035	31	督辦邊防(參戰)事務處	1016	368
全國防災委員會	1037	18	督辦邊防軍(參戰軍)訓練處	1017	230
中央防疫處	1036	96	邊防軍(參戰軍)第三師	1018	76
外交部	1039	654	邊防軍(參戰軍)所屬機構檔案匯集	1019	71
財政部	1027	3,630	步軍統領衙門	1023	351
財政部津浦全路貨商統捐總局	1058	105	京畿衛戍總司令部	1024	782
中華匯業銀行	1064	63	禁衛軍	1055	110
稅務處	1059	180	陸軍第二十師	1063	122
教育部	1057	613	晉軍李培基部	1043	128
交通部	1056	210	北洋時期零散軍事檔案匯集	1026	590
農商部	1038	3,040	直魯豫巡閱使署	1020	332
司法部	1049	3,218	熱察綏巡閱使署	1025	303
大理院	241	15,674	北洋政府33個機構及不明全宗檔案匯集	1041	501
總檢察廳	1048	8,473			
平政院	1005	77			
肅政廳	1006	27			
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	1032	63			

三、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檔案

(一) 國民黨及其他黨派檔案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	712	10	設事業專款審核委員會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平臨時分會	114	230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	711	1,605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建	714	15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717	4,079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718	1,580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國民黨中央通訊社	656	1,447	國民黨中央三民主義叢書	719	16
正中書局	410	44	編纂委員會		
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	720	40	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	724	271
			(黨員通訊局和內政部調查局)		
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	721	93	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上	725	85
			海辦事處		
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訓練部)	722	4,002	國民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	368	598
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	223	1,912	國民黨中華海員特別黨部	727	91
中央訓練團	723	688	國民黨黨務系統檔案匯集	9	1,699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地方自治計畫委員會和經濟計畫委員會	713	74	國防最高委員會	43	291
			中央設計局	171	1,779
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716	588	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	161	1,397
國民黨中央檢定黨義教師委員會	715	12	三青團中央團部	728	191
			中國青年黨、民社黨等11個小黨派檔案匯集	729	214

(二) 國民大會、參政會和政協檔案

國民大會	451	706	憲政實施促進會	587④	8
國民大會自由職業團體代表選舉事務所	281	238	國民參政會	416	491
			政治協商會議	587①	2

(三) 國民政府及其直轄機構檔案

國民政府(總統府)	1	11,541	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	580	26
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	707	223	全國運動大會籌備委員會	587⑩	10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			主計處(部)	6	6,429
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	46	138	國史館	34	1,479
建設委員會模範區灌溉管理局鳳懷區實驗場	328	382	中央研究院	393	2,667
首都建設委員會	587⑦	4	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	374	135
全國救濟火災委員會	579	37	中央研究院河南古蹟研究會	470	13

<u>全宗名稱</u>	<u>全宗號</u>	<u>案卷數量</u>	<u>全宗名稱</u>	<u>全宗號</u>	<u>案卷數量</u>
(四)軍事機構檔案					
軍事委員會	761	476	國防部	783	890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762	1,624	國防部二廳	784	385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	33	202	國防部綏靖、服務、戡建青	786	237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第二廳	290	76	訓四總隊和青救團		
軍事委員會外事局	763	464	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	787	9,170
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	764	422	國防部第六廳雷達研究所	25	134
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	136	1,958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806	3,959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國防部保密局	765	527	聯勤總部第五補給區司令部及第七兵站總監部	807	450
中美合作所及所屬	766	117	聯勤總部重慶軍糧接運處	808	76
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	781	155	聯勤系統全宗匯集	809	808
軍事委員會四川船舶總隊部	780	60	國防部第三被服廠	812	680
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	779	300	中央飛機製造廠	645	28
軍事參議院	782	418	陸海空軍總司令部	788	156
參謀本部	767	1,126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	789	107
參謀本部國防設計委員會	47	72	海軍總司令部	790	77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	769	3,026	空軍部隊	791	36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772	6,559	國民革命軍第三方面軍司令部	792	237
軍事委員會軍事訓練部	771	141	部		
行政院軍政部	773	2,405	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司令部	793	59
軍政部京滬區特派員辦公處	778	48	部		
兵工署	774	3,543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	795	310
兵役署(部)	775	1,616	東北剿匪總司令部	796	169
軍需署	69	1,909	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政治工作隊	797	114
軍政部城塞局	777	278	東北保安長官總司令部	798	98
軍政部軍糧總局	810	722	東北策反委員會	708	79
軍政部糧秣實驗場	794	552	京、滬、杭、漢各市衛戍與警備司令部	800	127
軍政部各被服廠	811	873	重慶衛戍總司令部	801	622
後方勤務總司令部及所屬	805	1,256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重慶及南京防空司令部	802	410	各軍事學校與訓練班檔案匯集	813	441
憲兵司令部	799	151			
陪都空襲服務總隊	803	150	軍事系統各機關檔案匯集	627	1,535
陸軍各部隊檔案匯集	804	765	勵志社	643	346

(五)立法、司法、考試、監察機構檔案

立法院	10	2,654	考選部(考選委員會)	373	241
司法院	32	483	河北、山東考銓處	730	501
行政院	29	475	監察院	8	2,340
最高法院	16	10,810	江蘇區監察使署	294	1,140
最高法院北平分院暨最高法 院檢察署北平臨時庭	252	3,349	浙江區監察使署	295	2,024
最高法院重慶分庭	258	1,181	蘇浙區監察委員行署	296	254
最高法院檢察署	14	8,446	皖贛區監察使署	186	644
中央特種刑事法庭	709	15	閩浙區監察使署	180	1,779
重慶高等特種刑事法庭	710	67	川康區監察使署	259	3,181
司法行政部	7	12,460	雲貴區監察使署	260	289
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	460	295	甘寧青區監察使署	411	1,689
考試院	37	768	審計部	42	2,904
銓敘部	27	8,642	審計部河北審計處	314	843
			審計部重慶審計處	206	106

(六)行政機構檔案

(1)行政院及其直轄機構檔案

行政院	2	19,374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和 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	44	2,499
國家總動員會議	181	1,764			
國家總動員會議川、康、鄂 三省限政聯合辦事處	182	27	戰時生產局	419	2,176
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	183	75	行政院疏運委員會和美援運 用委員會	737	14
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議	184	33	行政院輸出入管理委員會	447	3,977
行政院經濟會議秘書處	172	731	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辦公 處	39	90
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清查總 處	589	56	縣政計畫委員會	280	189
綏靖區政務委員會	185	96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190	69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	593	1,074	(附川康企業公司)		
日本賠償委員會	189	9	非常時期服務團委員會	532	1,332
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	534	170	行政院政務電訊管理處	188	47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333	889	新聞局	24	923
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	208	51			

(2)內政、衛生機構檔案

內政部	12	28,401	衛生署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	527	144
內政部禁煙委員會	41	743	中央衛生實驗院	528	114
內政部敵產處理委員會	277	141	中央國醫館	606	93
內政部人口局	278	1,867	衛生部麻醉藥品經理處	533	75
內政部縣市行政人員講習所	222	292	靜生物調查所	609	36
地政署(部)	36	2,303	中國特效藥研究所及中央生	531	75
衛生部(署)	372	1,151	物化學製藥實驗處		

(3)外交、僑務機構檔案

外交部	18	3,525	山、紐約領事館		
外交部駐滬辦事處	204	1,063	中國駐日本公使館	750	109
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公署	735	221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及駐仰光	757	287
外交部駐平津特派員公署	736	38	、臘戍領事館		
外交部駐雲南特派員公署	439	2,384	中國駐蘇聯列寧格勒、伯力	749	48
中國駐蘇聯大使館	748	1,039	、海參崴、黑河領事館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751	3,288	中國駐河內總領事館	758	149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及駐法屬	753	82	中國駐加爾各答、孟買領事	759	164
塔那利佛領事館			館		
中國駐捷克大使館	747	29	中國駐哈瓦那總領事館	754	103
中國駐瑞典大使館	745	198	中國駐智利總領事館	755	232
中國駐瑞士公使館	746	1,664	中國駐外使領館檔案匯集	760	20
中國駐芬蘭使館	744	74	僑務委員會	22	1,025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及駐舊金	756	35	僑務委員會南洋研究所	420	62

(4)蒙藏機構檔案

蒙藏委員會	141	4,142	西藏駐京辦事處	174	74
-------	-----	-------	---------	-----	----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西藏駐平辦事處	175	19	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	173	26
西藏駐康辦事處	176	8	自治政府駐京辦事處		
班禪駐京辦事處	177	15			

(5)教育機構檔案

教育部	5	18,052	國立中央大學	648	6,881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及中 國大辭典編纂處	614	576	私立金陵大學	649	2,103
教育部戰區學生指導處	109	327	國立江蘇醫學院	651	92
教育部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	521	310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668	228
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 委員會	108	767	金陵神學院	628	397
教育部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 致訓練委員會駐京辦事處	111	103	私立鄉村建設育才學院	237	236
教育部青年復學就業輔導委 員會	110	936	私立建國法商學院	102	69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484	1,656	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106	139
教育系統檔案匯集	113	468	國立藥學專科學校	650	177
國立政治大學	112	3,319	國立邊疆學校	105	557
			國立北平研究院	394	406
			國立編譯館	107	1,361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4	93
			教育部科學儀器製造所	662	102

(6)社會、賑濟機構檔案

社會部	11	8,308	中國地政研究所、地政學 會、土地改革協會	103	185
社會部合作事業管理局	479	180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236	249
社會部全國合作社物品供銷 處	814	1,136	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473	94
社會部重慶游民訓練所	283	292	中緬文化協會	483	7
新生活運動委員會	587 ^⑤	23	中國勞動協會	608	76
全國慰勞總會	284	281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	478	427
中國工程師學會	74	306	中國盲民福利協會	520	227
中華農學會	75	184	中國回教協會	477	49
中華自然科學社	529	29	北平總主道院	414	165
中國衛生教育社	530	27	中華基督教會等宗教組織	628	397
中國新聞學會	732	63	基督教公誼服務會	611	848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中華海員總工會	701	3,237	賑濟委員會第七區特派員事務所	120	56
全國鹽工總會	209	49	賑濟委員會重慶小本貸款處	121	31
各社會團體全宗匯集	588	483	賑濟委員會兒童教育輔導隊	122	87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	21	36,348	賑濟委員會所屬重慶兒童救養院和醫療機構	123	41
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	30	3,183	重慶空襲救濟機構匯集	119	127
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機械農墾管理處	79	601	中國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	581	31
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鄉村工業示範處	815	241	中國國際救濟委員會	610	1,722
賑濟委員會	116	1,730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	573	468
賑濟委員會運送難民總站辦公處	117	56	華北國際救濟委員會	574	20
賑濟委員會所屬難民運送救濟機構檔案匯集	118	95	中國紅十字總會	476	3,629
			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	257	1,004
			全國徵募寒衣運動委員會	587⑥	8

(7)財政、金融機構檔案

財政部	3	52,188	國稅署	155	762
財政部駐港辦事處	313	750	財政部冀熱察區國稅管理局	438	56
財政部四川特派員公署	135	94	財政部鹽政總局	266	17,267
財政部專用無線電臺	330	68	財政部各鹽務機構殘缺全宗匯集	157	142
財政部全國財務人員訓練所	59	85	財政部專賣事業管理局	150	266
財政部考選委員會	329	40	財政部煙類專賣局	125	398
國庫署	367	5,106	財政部火柴專賣公司	126	448
關務署	179	1,886	緝私署(處)	145	3,437
海關總稅務司署	679	53,672	財政部稅警總團	139	335
財政部國定稅則委員會	578	53	財政部戰時貨運管理局	134	332
財政部所得稅事務處	339	114	財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	40	549
直接稅署	337	5,727	財政部中央造幣廠	450	632
稅務署	340	20,310	中央印製廠總管理處及六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442	868
財政部蘇浙皖區統稅局	191	598	中央印製廠北平分廠	207	705
財政部湘鄂贛區統稅局	192	381	發行準備金管理委員會	626	26
財政部魯豫區統稅局	193	53			
財政部鄂豫區統稅局	195	556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財政部清理汪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處及各區處	619	442	中央信託局	318	15,829
貿易委員會	309	12,858	中央信託局產物保險處	366	634
貿易委員會生絲研究所	445	54	中央信託局所屬單位	268	132
復興商業公司	270	305	中央信託局蘇浙皖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535	404
復興商業公司所屬單位	271	65	中央信託局粵桂閩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165	223
富華公司	272	86	中央信託局粵桂閩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166	16
中國茶業公司	273	218	中央信託局粵桂閩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167	145
中國鹽業股份有限公司	265	2,320	中央信託局粵桂閩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168	52
中國鹽業股份有限公司東北分公司	335	996	中央信託局粵桂閩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169	136
中國鹽業股份有限公司華北分公司	336	436	中央信託局粵桂閩區敵偽產業清理處	170	136
蜀餘企業公司	462	657	郵政儲金匯業局	127	8,472
財政系統	原3	23,280	中央合作金庫	71	133
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聯合辦事總處	585	4,913	中央儲蓄會及分支機構	586	73
四聯總處保險管理委員會及再保險管理處	369	127	中英銀公司	704	25
四聯總處糧食購儲委員會	88	45	中國保險公司	360	207
四聯總處嘉定支處	486	36	中央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65	76
中央銀行	396	18,940	太平洋保險公司	364	546
中央銀行加爾各答通訊處	70	1,081	中國農業保險公司	363	399
中國銀行	397	16,190	中國物產保險公司	361	164
交通銀行	398	25,910	交通保險公司和國民產物保險公司	463	64
中國農民銀行	399	18,774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362	253
中國農工銀行總管理處	68	396	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公司	616	40
中國國貨銀行	403	1,520	各銀行檔案匯集	289	1,424

(8)農林、水利機構檔案

農林部	23	2,022	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	80	291
農林部農業推廣委員會	437	2,220	農林部糧食增產委員會陪都	432	24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專員辦事處			工程處		
農林部農田水利工程處	81	924	長江水利工程總局嘉陵江工程處	598	661
農林部全國稻麥改進所	436	65	長江水利工程總局華陽河工程處	597	117
農林部蘇皖區推廣繁殖站	430	16	長江水利工程總局湘南水力工程處	600	46
農林部東南獸醫防疫站	435	20	淮河水利工程總局(導淮委員會)	320	3,592
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	413	679	導淮委員會運河流域工程局	321	455
農林部所屬棉產改進處等單位	380	3,003	導淮委員會茶江閘壩管理處	596	519
中央模範林區管理局	426	12	導淮委員會茶江水道工程局	326	713
農林部中央農業經濟研究所	431	77	導淮委員會淮河流域復堤工程局	323	340
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	424	1,181	導淮委員會烏江水道工程局	325	303
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	425	991	導淮委員會赤水河工程	594	29
農林部中央水產實驗所	78	219	淮河水利工程總局三河活動壩工程局	322	46
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	434	82	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沂沭區水利工程總隊	324	55
水利部(水利委員會)	377	2,027	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淮河濱海區水利工程總隊	327	75
華北水利委員會	488	55	江漢水利工程局	590	2,796
中央水利實驗處	623	1,342	各水利工程機構檔案匯集	515	21
中央水利實驗處四川水文總站	601	41			
水利部水利示範工程處	471	478			
長江水利工程總局	595	1,481			
長江水利工程總局長江堤閘工程處	599	342			
長江水利工程總局長江上游	602	32			

(9)糧食機構檔案

全國糧食管理局	82	261	辦公處		
糧食部	83	4,356	糧食部上海糧政特派員辦公處	92	22
糧食部田賦署	84	453	中國農業供銷股份有限公司	91	23
糧食部田糧署	591	91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	89	328
糧食部倉庫工程管理處	86	104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上海辦事處	90	38
糧食部儲運處	94	48			
糧食部川東南區督糧特派員	85	11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中國食油公司	357	166	糧食部重慶碾米廠	87	13
中國植物油料廠	310	744	糧食系統殘缺全宗匯集	100	96

(10)工商機構檔案

工商部	613	1,491	經濟部礦冶研究所	449	16
實業部	422	22,839	經濟部地質調查研究所	375	832
經濟部	4	35,955	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	448	582
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	553	1,326	資源委員會	28	26,927
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駐蘇辦事處	554	111	資源委員會東北辦事處	480	327
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徐海接收專員辦事處	555	41	資源委員會重慶辦事處	48	81
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駐杭州辦事處	556	33	資源委員會駐美、印辦事處	72	595
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駐蕪湖辦事處	557	14	資源委員會購置委員會	45	941
經濟部冀熱察綏區特派員辦公處	536	729	資源委員會保險事務所	365	217
經濟部魯豫晉區及東北區特派員辦公處	66	58	資源委員會電訊事務所	49	656
經濟部商標局	818	30,271	資源委員會材料供應事務所	621	719
經濟部採金局及所屬單位	60	525	資源委員會國外貿易事務所	264	845
經濟部上海商品檢驗局	617	395	資源委員會運務處	52	3,133
經濟部農本局	402	892	資源委員會礦產勘測處	376	716
經濟部農本局漢口辦事處	274	32	資源委員會電業管理處	379	3,606
經濟部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	76	248	資源委員會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	429	711
經濟部紡織事業調節委員會	77	380	資源委員會龍溪河水力發電廠工程處	428	338
經濟部全國花紗布管理委員會	73	1,355	資源委員會新電廠工程處	549	5
經濟部上海區燃料管理委員會	703	20	資源委員會煤業總局	61	2,145
經濟部工礦調整處	819	4,150	資源委員會煤業總局上海營運處	552	55
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	731	8	資源委員會四川油礦探勘處	63	437
			資源委員會四川油礦探勘處天然氣運輸聯營處	64	22
			資源委員會金屬礦業管理處	57	721
			資源委員會鎢業管理處	58	14
			資源委員會鎢錫聯合運輸處	51	63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資源委員會汞業管理處及西 南汞礦局	59	37	有限公司籌備處電瓷廠和 華亨電瓷廠		
資源委員會系統殘缺全宗檔 案匯集	67	503	資源委員會南京電照廠	490	137
資源委員會冀北電力公司	550	17	資源委員會中央化工籌備廠	205	195
資源委員會臺灣電力公司	551	12	上海工廠		
資源委員會川黔各電廠重慶 辦事處	65	47	資源委員會天津化學工業有 限公司	332	323
資源委員會各電廠上海聯合 辦事處	548	151	資源委員會中央銨肥有限公 司籌備處	56	38
資源委員會井陘煤礦有限公 司	522	256	資源委員會臺灣碱業有限公 司、臺灣肥料有限公司和 錦屏磷礦有限公司	537	36
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	95	4,634	資源委員會動力油料廠	39	262
中國石油公司	317	7,657	資源委員會中央造船有限公 司	622	500
資源委員會錦錦廠籌備委員 會	53	58	華章礦務公司總管理處	455	8
資源委員會華北鋼鐵有限公 司	481	94	中國紡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75	5,608
資源委員會石景山鋼鐵廠	482	44	中國紡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辦事處	269	202
資源委員會中央機器公司重 慶營業所	54	322	四海豐有限公司	516	36
資源委員會中央電工器材廠	466	2,195	揚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401	258
和中央有線電器材公司			揚子電氣公司首都電廠	663	46
中央無線電器材廠	665	454	中國物產有限公司和中國手 工藝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514	60
資源委員會中央絕緣器材廠	55	994			

(1)交通機構檔案

交通部	20	27,990	交通部首都材料廠、鋼鐵配 件廠	694	187
交通部京滬區特派員辦公處	545	64	交通部第一、第二交通警察 總局	706	364
交通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	212	2,037	中央氣象局	485	139
交通部材料儲運總處	464	1,083	鐵道部	214	1,401
交通部青島材料儲運處	676	187			
交通部港九材料儲運處	695	15			

<u>全宗名稱</u>	<u>全宗號</u>	<u>案卷數量</u>	<u>全宗名稱</u>	<u>全宗號</u>	<u>案卷數量</u>
交通部鐵路測量總處	459	32	汴洛鐵路局	671	11
平津區鐵路管理局	443	5,291	湘桂黔區鐵路管理局	680	57
北寧鐵路管理局	215	2,573	湘黔鐵路工程局	487	15
津浦區鐵路管理局	538	9,358	昆明區鐵路管理局	569	342
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浦沅段管理處	539	81	川滇鐵路公司總經理處	567	1,248
膠濟鐵路局	673	125	滇越鐵路滇段管理處	568	328
淮南鐵路局	674	525	滇越、川滇鐵路線司令部	570	240
華中鐵路管理委員會杭暨段總辦公處	456	62	成渝鐵路工程局	681	1,273
京(寧)滬、津浦鐵路局人事檔案	138	448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	560	2,010
京(寧)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457	14,275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第一工程處	561	174
京(寧)贛鐵路贛境工程管理局	540	3,018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第二工程處	562	108
京(寧)贛鐵路宣貴段工程局	541	2,730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第三工程處	563	128
京(寧)贛鐵路清理處保管處	546	313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第四工程處	564	234
商辦江南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542	226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駐緬甸辦事處	565	47
京滬興業有限公司	678	36	滇緬鐵路督辦公署駐昆明辦事處	566	18
浙贛鐵路公司理事會	452	632	滇緬鐵路工程局	558	1,848
浙贛鐵路局	453	10,938	滇緬鐵路工程局西段工程處	559	329
浙贛鐵路局煤礦公司籌備處	454	244	滇緬鐵路工程局孟定辦事處	571	70
南潯鐵路管理局	458	40	紋昆鐵路工程局	576	96
平漢區鐵路管理局	677	2,781	錦州鐵路管理局	702	984
平漢區鐵路管理局北段管理處	213	1,194	中國長春鐵路管理局	699	499
粵漢區鐵路管理局	572	1,120	吉林鐵路局	700	292
隴海區鐵路管理局	669	3,271	東北地區鐵路交通部門全宗匯集	705	271
徐州鐵路局	675	40	同蒲、太原、正太 晉冀鐵路局	683	102
開封鐵路局	670	81	清揚鐵路局	672	41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門齋鐵路公司	682	128	處		
高線鐵路公司	684	25	康青公路管理局營玉段工程	391	32
中國橋梁公司	543	95	處		
錢塘江大橋工程處	544	272	康青公路管理局甘玉段工程	392	46
交通部鐵路總機廠	693	204	處		
威墅堰機車車輛工廠	685	381	公路系統殘缺全宗匯集	630	34
江岸車輛工廠	686	282	交通部南京港工程局	646	36
四方機廠	687	185	交通部塘沽港工程局	474	162
三橋車輛廠	688	166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468	6,841
皇姑屯總機廠	689	277	中國油輪公司	467	927
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工廠	690	42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491	227
長辛店鐵路機廠	691	401	民用航空局專用電訊總臺	492	72
天津信號廠	692	22	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493	644
公路總局等公路機構	15	7,717	歐亞航空公司	494	75
公路總局管訓處	620	220	中央航空運輸公司	495	495
公路總局汽車器材總處	440	2,459	交通部郵政總局	137	18,863
公路總局第四區公路工程局	384	18	交通部電信總局	142	12,077
公路總局第五區公路工程局	381	174	交通部第一區電信管理局	631	76
公路總局第七區公路工程局	412	364	交通部第二區電信管理局	124	5,391
公路總局第八區公路工程局	733	8	交通部第三區電信管理局	605	185
公路總局第一區運輸處	547	440	交通部第四區電信管理局	251	7,537
公路總局第五區運輸處	382	41	交通部第五區電信管理局	632	40
公路總局第一機械築路總隊	612	634	交通部第六區電信管理局	603	3,703
交通部西祥公路工程處	575	4,629	交通部第七區電信管理局	297	2,364
軍委會行營公路監理處川康	383	56	交通部第八區電信管理局	633	38
公路工程處			交通部第九區電信管理局	634	27
川康公路管理局	390	176	交通部臺灣郵電管理局	641	11
川康公路改善工程處	389	248	交通部國際電臺	248	156
康青公路管理局康營段工程	387	34	交通部各電信機構檔案匯集	144	100

四、日偽檔案

(一)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機構檔案

偽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 2 014 789 | 偽臨時政府行政部內務局 2 045 27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偽臨時政府內務部	2 015	399	偽臨時政府統稅公署	2 048	121
偽臨時政府治安部	2 016	160	偽臨時政府華北救災委員	2 049	73
偽臨時政府教育部	2 017	316	會		
偽臨時政府法部	2 046	486	偽臨時政府司法、內政等	2 027②	47
偽臨時政府賑濟部	2 047	125	單位		

(二)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機構檔案

偽維新政府系統	2 001	205	偽維新政府國定稅則委員會	512	17
偽維新政府外交部	2 058	44	偽維新政府司法行政部	2 043	77
偽維新政府財政部	504	46			

(三)汪偽國民政府機構檔案

汪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	2 006	242	汪偽交通銀行	2 030	770
會			汪偽教育部	2 078	49
汪偽政府系統	13	8,426	汪偽國立圖書館	2 067	43
汪偽國民政府	2 002	1,896	汪偽司法行政部	2 044	832
汪偽行政院	2 003	1,798	汪偽司法行政部華北事務	2 068	284
汪偽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	2 033	139	署		
會圖書專門委員會			汪偽最高法院華北分院	2 055	281
汪偽敵產管理委員會	2 066	113	汪偽實業部	2 012	252
汪偽內政部	2 010	1,331	汪偽實業部農林署	417	43
汪偽警政部	2 009	388	汪偽實業部林墾署	418	12
汪偽外交部	2 061	2,889	汪偽實業部第八區林墾示	2 071	19
汪偽僑務委員會	2 062	791	範農場		
汪偽財政部	2 063	4,226	汪偽實業部上海商品檢驗	2 072	94
汪偽財政部關務署	2 064	328	局		
汪偽海關總稅務司署	2 085	1,481	汪偽鐵道部、建設部、交	2 079	202
汪偽財政部關稅稅則委員	2 065	19	通部		
會			汪偽郵政總局	2 074	4
汪偽華中鹽業公司	2 073	69	汪偽郵政儲金匯業局	2 075	105
汪偽中央儲備銀行	2 041	4,853	汪偽社會福利部及社會部	2 013	3,723
汪偽中央儲備銀行分支行	2 042	1,260	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		
處			汪偽賑務委員會	2 076	1,215
汪偽中國銀行	2 029	124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汪偽賬務委員會江西臨時辦事處	286	97	汪偽經理總監部(署)	2 031	8,092
汪偽立法院	2 008	80	汪偽清鄉委員會	2 004	416
汪偽軍事委員會	2 038	123	汪偽黨務、軍事、財政、金融機關	2 077	80

(四)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機構檔案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	2 005	3,306	署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內務總署	2 018	1,038	偽國立華北觀象臺	2 052	31
偽華北禁煙總局	2 050	456	偽華北衛生研究所	2 053	13
偽華北土藥業總會	2 051	194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臨時處	2 054	1,338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總署	2 019	386	理法務委員會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	2 021	1,528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工務)總署	2 020	494

(五)日本侵華經濟機構

東亞經濟懇談會華北本部	2 080	307	江北興業株式會社	2 032	36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北支事務局	2 022	556	長城煤礦鐵道株式會社	2 026	81
華北交通株式會社	2 023	3,425	日本侵華各經濟機構	2 024②	405
華北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2 028	2,186	日本侵華各經濟機構檔案資料匯集	2 057	2,439
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2 025	1,270			

五、人物檔案

馮玉祥	3 001	1,514	胡漢民	3 010	18
熊希齡	3 002	290	陸興祺	3 011	4
朱啟鈞	3 003	192	周佛海	3 012	11
張靜江	3 004	719	程德全	3 013	56
陳友仁	3 005	179	陳儀	3 014	32
徐樹錚	3 006	1	孫科	3 015	21
唐寶鏗	3 007	14	吳稚暉	3 016	86
余谷逸	3 008	11	王寵惠	3 017	181
孔祥熙	3 009	978	楊杰	3 018	112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全宗名稱	全宗號	案卷數量
李石曾	3 019	49	陳公博	3 031	1
戴傳賢	3 020	85	汪精衛	3 032	2
陳布雷	3 021	220	嚴家驥	3 033	8
沈宗濂	3 022	117	蔡元培	3 034	421
周慶雲	3 023	85	顏惠慶	3 035	40
童冠賢	3 024	6	曾仲鳴	3 036	96
崔叔賢	3 025	67	蔣廷黻	3 037	30
錢芥塵	3 026	7	徐新六	3 038	6
俞飛鵬	3 027	17	黎元洪	3 039	132
李景銘	3 028	1	邵元冲	3 040	93
譚慶林	3 029	2	蔣中正	3 041	182
孫中山、宋慶齡	3 030	7	李根源	3 042	1

中研院近史所最新出版

目錄彙編(1)：經濟檔案函目彙編 精300元 平240元

第一冊：1903-1937 一九三頁 七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有清末以來，各種中央級經濟行政單位留下之官方文書，為研究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的最佳史料。自民國七十年起，在行政院國科會支持下，已完成多項機構檔案的編目工作。本函目彙編第一冊包括清末之商部、農工商部，民元以來之工商部、農商部、全國水利局、內務部、實業部、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等單位檔案目錄，以供學界參閱研究。

史料叢刊(7)：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

七十七年九月出版 精400元 平350元

國民政府扶植和援助韓國獨立運動，早為既定政策。抗戰時期朱家驊負責協助韓國獨立運動的短短數年，雙方關係尤為密切。本項文書即係取材自朱家驊檔案中有關韓國獨立運動的文件。論內容，以韓國各黨派在華活動、韓國光復軍問題，和國民政府對韓獨立運動的資助三大類數量最夥，兼及中韓文化協會、國民政府對韓國及韓人之關注等項文件。論時間，起自民國27年11月，迄民國57年12月。這些文件包括函件、電稿、簽呈、便條、節略、報告書、備忘錄、談話紀錄、宣言、新聞稿、名單等多種。足可看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對韓國獨立運動，是採取主動積極的扶植政策。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書評介

耿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簡介

□李 又 寧*□

中共素以胡適為思想上的大敵，原因眾所周知。胡氏代表的是自由民主，與教條主義針鋒相對。1949年以後，「胡適思想批判」，在中國大陸屢起迭出，遍及各地，數次演為「運動」，聲凌勢厲，惡語用盡。在那陰風怒號，濁浪排空的歲月裏，人人自危，戰戰兢兢，即使不加入「批判」、「清算」，唯恐與胡適不能「劃清界線」。噤若寒蟬，已是難能，談什麼研究?!

近十餘年來，「運動」過氣，「交流」入時。為了與海外交流，各方面都必須改弦更張，史學界亦然。不論本國史或外國史，其中都有許多「資產階級」成分，都有許多「資產階級」人物。當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又有幾個與「資產階級」絕緣？交流者，平等互惠，往來以禮；「批判」者，居高臨下，無上權威。要交流，避不了「資產階級」，總不能把人家及其祖宗不管青紅皂白「批判」一通。

以是及其它之故，許多「資產階級」的歷史人物，當年被一古腦兒推入陰溝，於今又挖出來讓人看看。為了與世人重見，總得加以梳洗整理，做點新衣，打扮打扮，再畫張像，才能置於歷史的畫廊。這修容和畫像的工作，甚費思量。愁的倒不是材料，而是方法和態度。歷史人物的形象，早已存在，積重難返。畫像者若標新立異，後果難測；若因襲隨俗，何必研究。難矣哉！而且難中帶有險。

以胡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研可究之題，俯拾皆是；何況在中國大陸，有很多關於他的資料，還有不少他的故舊門生。由於他曾是眾矢之的，而今「平反」無期，關於他的新著屈指可數。例如，石原皋所著《閑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題為「閑話」，顧名思義。作者是胡適的同鄉親戚，知其家事甚詳。所聞所記，多屬生活瑣事，可增加對

*美國紐約市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胡氏個人的了解。寫此回憶，作者考慮再三，深恐「引火燒身」；大概是爲了「自衛」，引了一些「生硬的黨調」。（周質平著，〔胡適與魯迅〕，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8年，頁170-171。周文「該是破繭而出的時候了——評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胡適研究」，原刊香港〔明報月刊〕第二五三期，1987年1月）。

198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胡適傳〕，共一百十四頁，作者白吉庵，工作於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此書中的「黨調」不多，並非沒有。例如，書的結語：「胡適一生著作極富，桃李遍天下，對我國的新文化運動和教育事業作出過巨大貢獻。自稱『但開風氣不爲師』。事實上正是如此，他在哲學、文學、考證學等領域，都有開創的功績，稱得起是一代宗匠。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結果走向人民的對立面，不能爲師了。這是他一生悲劇之所在。」（頁102）最後兩句，與前面幾句不甚合調，作者想是自知的。此書所重，是胡適自己的教育過程及他對於教育的建樹，敘述甚爲穩實。它避談政治，蓋出有因。

「胡適檔」與耿雲志

胡適的歷史感極強，而且自少年時代就有心做個歷史人物。他的日記和大量的書信，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寫給研究者看的；他也很著意保存他自己的資料。1948年12月，時局劇變，他來不及帶走自己的檔案。這些檔案現在北京，編爲「胡適檔」，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近代史研究所。該所出版的三冊〔胡適來往書信選〕及一冊〔胡適的日記〕，選自此檔，如周質平所言，「爲胡適研究提供了爲數可觀的新材料。」（同上引，頁165）「胡適檔」中還有許多資料，至今尚未公布。熟知此檔而曾廣加運用者，是耿雲志，他是當今大陸上的胡適研究權威，所著〔胡適研究論稿〕，是大陸四十年有關胡適的最具份量的史作。此書共五百四十八頁，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從此書扉頁可知，耿氏爲「遼寧省海城縣人，生於1938年。1964年於遼寧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參加撰寫『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並發表『論清末立憲派的國會請願運動』、『論諮議局的性質與作用』、及『1905年反美愛國運動中的資產階級』等論文多篇。」他現任近史所研究員。

此書的「後記」告訴我們，耿氏於1975年開始搜集胡適的資料，七八年以後想寫「胡適傳」。但「因有別項集體的工作要做，所以『胡適傳』的工作事實上擱置了。」此書是他「幾年來零星進行的研究工作的一個初步小結。至於『胡適傳』的寫作，只好等到有可能心力集中於這項工作的時候再進行。」（頁 546-547）。

〔胡適研究論稿〕

此書收論文九篇及附錄一篇，共占三百十二頁，可說是第一部分。胡適「年譜」，占二百三十二頁，可說是第二部分。

前九篇論文的題目是：「胡適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論胡適在文學革命運動中的作用」、「評胡適的歷史學成就及其理論和方法」、「論胡適的實驗主義」、「評胡適的中西文化觀」、「胡適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從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適政治態度的變化」、「胡適與梁啟超」、「胡適與陳獨秀」。附錄是：「博士學位問題及其他」。

第一篇論文，敘論胡適在五四時期的言行，如提倡：白話文、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實驗主義、小說考證、疑古精神、白話新詩。此題涵蓋很廣，做來不易。雖然已有中外學者在此題上做過文章，還可精做細做。耿文意在博採，也就採了不少「批判」學及其術語，使人聯想到「文革」的後遺。（此文原刊〔歷史研究〕1979年第五期，時際「開放」之初。）耿氏是遼大哲學系畢業的，能運用邏輯思考，提出一些新見，可引人思索，例如：

胡適概括他的治學方法叫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當然，我們得承認，假設和求證是任何科學的思想過程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完全不要假設和求證，則不但科學的研究活動無法進行，甚至人的起碼的認識活動也是不能想像的。因此，在批判胡適的時候，籠統地否定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為完全是胡說，那是不能真正打倒對手，也不能令一般人信服的。那麼，胡適的根本謬誤在那裏呢？他的根本謬誤是在於，它的公式掩蓋了最重要的前提，即任何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必須是詳細地占有材料。假設必須建立在對大量材料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沒有材料，或材料甚少，或沒有把握足以反映事物本質的材料，在這種情況下作出假設，必然使研究工作陷入主觀唯心主義，最後得出不合實際的結論。當然，胡適在另外的

場合也講過「細心搜求事實」等類的話，但都不是在講科學方法的情況下說的。（頁 23-24）

精要在後半

「謬誤」及類同字語的在耿著中頻頻出現，乃是因為胡適至今尚未「翻身」，他的種種，仍是形形式式的「批判」對象，即使不是全盤的否定，也只是保留的肯定。例如：

胡適在對中西文化作比較觀察時，說出過一些基本正確的意見。他看到了迎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先秦名學史〕前言中他還表述這樣的見解：「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怎樣用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相協調，並繼續發展」，……但他只承認迎受西方文化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資本主義文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否認迎受那西方文化發展的 最新成果——共產主義文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這是他的資產階級立場的局限，是應當給以批判的。（〔胡適研究論稿〕，頁 180）

總的說來，耿著的前七章，不能使海外讀者覺得耳目一新。淺見以為，此書的後半較佳。讀到第八章，「胡適與梁啟超」，心胸稍舒。在這篇論文中，作者敘述梁、胡二人的交往，比較二人的異同，多處可見耿氏閱讀之博、治學之勤，與其史評之力。試引一段為例：

梁啟超是今文經學的末代子孫，其人聰穎機敏，有所論著，輒不乏大膽的創見。然而以方法不够謹嚴，常常自相矛盾。所以，論治學之嚴謹，方法之一貫，梁氏不如同時代的章炳麟，更不如後輩的胡適；與以專精著聞的王國維就更不能相比了。但和他親受業的康有為相比，他顯得還多一些冷靜考索的功夫。古文經學家的考證辨偽稍近於科學方法，在清代發展到最高水平。胡適把它納入他的實驗主義的體系，造成他自己的治學方法，頗為一貫地用之於他的學術研究之中。其最顯著的特點，一是懷疑，提倡於不疑處有疑；二是重證據，提倡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他爲了弄清戴震曾否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時間積累資料，搜尋證據，至死仍未肯定全部看法。梁啟超是決不肯幹這種事的。人們可以懷疑胡適這個研究題目本身的價值究竟有多大，卻不應懷疑他這種謹慎的態度。（頁

248-249)

據此書的「後記」，「胡適與梁啟超」一文寫於1984年夏秋之間。在大陸史學界，此二頭號「資產階級」人物排排並坐，讓人觀看兩人的關係及各人的長短，此文似為首次。雖然議論並未劇變，然語氣較此書前數文要平和一些。事有巧合，居臺名史家張朋園氏，在此期間或前後，撰寫了一篇題目略同的文章——「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載於1986年12月印行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下冊（頁81-108）。那時海峽兩岸尚無往來，此二文作者不約而作了類同的研究，所用的資料大致相同，張文較豐較詳。而兩文的觀點不同處甚多。由此也可略窺兩岸的近代史觀及治學方法。它日有人撰寫近代中華史學史，此二文也可作為參考。

如張氏所言，「梁胡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各有其崇高的地位。」（同上引，頁81）他們不但承先啟後，而且領導中國知識分子放眼世界，博採廣納，因而豐富、活潑了中國的文化、思想和學術，使之提昇到近代化的層面。他們不但開風氣之先，而且影響廣遠。時至今日，重讀他們的著作，仍覺有啟發性，而且感慨萬千，因為他們的一些預言，不幸而言中。如果說在政治上他們是「失敗」的，那是因為「革命」風靡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半時光。雖然將來難測，改良漸進似為時勢所趨，一切將日趨世界化。梁胡的歷史地位，尤其是胡適的，亦將隨之上昇。關於他們的研究，也會日趨重要。鉅論二者的關係，並比較其異同，不但可增加對二者的了解，且可發現歷史的延續性和變異性。從此題目可延伸引導出許多題目，研究人際關係、代差關係、及文化及思想之際的關係。梁胡二人固然值得大研究特研究，與他們先後及同時代的人物，還有很多可並研並究的。人物研究是點，人物之間的研究是線，聚集多線可成為面，縱的或橫的。點、線、面之間，可以互相比較、互為印證。那麼，中國近代史研究當更富歷史的透視和立體感。

胡適與陳獨秀

讀到第九章「胡適與陳獨秀」，興趣益增。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引用了不少未發表的史料，也提出了一些前人所無的新見解，值得史界注視。

例如，胡適何時與陳獨秀結識，以前是個問題，有人以為是在〔競業旬

報] 時期。耿氏引用兩封汪孟鄒致胡適的信，證明胡陳神交是在1915至17年間。（頁 271-272）又如胡陳在北大推進教育改革的合作，鮮爲人知；耿氏所述，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資料未註出處，想是原件。（頁 274-275）

這一章中的第三節，討論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胡陳「的歧異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二是爲什麼他們在政治上互相對立，而友誼卻始終得以維持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耿氏的回答是：「胡適主要著眼於從學理上論述文學革命的見解，而陳獨秀主要著意於從時勢的需要上來論述其文學革命的見解。進言之，胡適是以學者立言，陳獨秀是以革命家立言。胡適後來談到他對文學革命的態度時曾說到，他做爲一個留學生同國內學者討論這樣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態度不能不放謙虛一些。足見他從學理上看待這個問題。他又說：陳獨秀是個老革命黨，他一上來就是以革命家的態度，『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欲掃蕩乾淨而後快。……如果沒有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至少還得經歷十年的嘗試。但是反過來，如果只有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和『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而沒有胡適的具體的合於學理的主張，沒有耐心地實地試驗新主張的實際效果，那麼，儘管革命氣勢如何磅礴，仍難以做到以白話取代古文的統治地位。風潮過後，仍可能是舊物重來。所以，全面地看問題，應當承認，胡適與陳獨秀的態度，著眼點的差異，使他們充當了文學革命中相輔相成的兩翼，二者不可偏廢。在這裏，我們既要看到他們的差異性，又要看到他們的統一性。」（頁 285-286）

解答第二個問題，耿氏引了1925年12月胡適寫給陳獨秀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爲老朋友者，正因爲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耿氏認爲胡、陳所以能一直維持友誼，是因爲「他們頭腦中多少有一些彼此相通的東西……這相通的東西，就是對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的一點迷信。陳獨秀出黨之後，特別到晚年，他幾乎又完全回到資產階級民主的立場上去了。」（頁 289-290）

耿氏所論，很具識力。「容忍異己」，確是民主精神的一個特點，也是胡、陳二人的深長友誼的共同思想基礎。耿著未明言，而讀者可體會的一點，或可補充。胡爲人平和溫厚，陳則勇猛急躁。二人的交往，胡容忍陳之

處，遠過於陳容忍胡之處。胡歷次克己助陳，自始至終。趕寫博士論文並準備考試，是胡一生中一個關鍵；而他不惜分心分神，為陳所辦的〔青年〕（自二卷一期起，改名〔新青年〕）雜誌大寫文章。陳潦倒落魄之時，胡不念舊怨，探監營救。幾人能做到?!

筆者覺得，「胡適與陳獨秀」，是個很好的題目，耿氏言有未盡，還可深入並擴大研究。不但詳述二人的交往、比較其思想及政治上的異同，更從而研究其「人」。既為人物的研究，「人」的本質——個性及修養，若不以為之為主體，至少應屬重要部分。大陸近年出版的許多人物研究和傳記，往往著重言論和事蹟，或以「階級出身」籠統武斷地解釋言行背後的「人」，或對其人視而不見。言之有「物」，狀之無「人」。耿氏在此章中對胡適這個「人」，略作素描。結語說：「綜觀胡、陳兩人的一生交往，可看出陳氏具有『至性』，喜怒愛憎常發自衷心；而胡適待人接友，多賴於『修養』。這也可算作他們兩人的一點不同吧。」（頁 291）「修養」二字，具簡約之美；其詳細內涵，有待進一步的解釋。

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

胡適一生，前後共得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為數居國人之首。然而，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卻是一個問題，臺灣及海外的學界曾為此爭論。耿著的附錄，「博士學位問題及其他」，在此問題上提供了新的史料，並加考證，使這疑案有所澄清，是為一項貢獻。

耿氏的考證，分兩部分：一是內證，一是外證。內證來自胡適的〔留學日記〕，在1917年中，有如下語：「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考過」二字中有文章。耿氏說：

胡適的日記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早的、最有價值的證據。既然胡適自己只說「考過」了最後考試，而沒有說「通過」了最後考試，我們誰也無權替他更改。「考過」，只是說明參加了考試；而「通過」則包含考試合格之意。如果胡適當日順利「通過」考試，他決不會只說「考過」。一字之差，其意大殊。胡適自己是當事人，用不著費什麼斟酌，也斷不會用錯了詞。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胡適的這篇日記是事隔五天之後追記的。他為什麼當天沒有記呢？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考試不順利，情緒不佳，不願記此事；二為當日不知道考試結

果，故未記。這後一種可能性極小。一般地說，這類考試的結果都是當日當面告知。所以前一種可能性最大。（頁 297）

耿氏在「考過」二字上看出問題，甚見功夫。他所引的外證甚多，最重要的是朱經農於1919年9月7日給胡適的信：「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般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爲好友，今爲讐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 pass』……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當年就有謠言，而胡適不曾自辯，更爲可疑。（頁 298-298）

胡適年譜

此一部份，共二百三十二頁，居全書五分之二有餘。如周文所說：「年譜部分雖不如胡頌平所編十冊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84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那麼詳盡，但卻相當簡明扼要……比『長編初稿』精審，對胡適一生的行事及著作有得當的處理。」（「該是破繭而出的時候了——評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胡適研究」，出處同上引，頁165-166。）

這年譜，不但「對胡適一生的行事及著作有得當的處理」，而且同時代的史事及人物，有甚精要的介紹。排比之力，於此可見。此年譜，史實豐富，理論寥寥，對海外學者很有用。引用的原件，如胡適的家書，極爲可貴。又如所引1906年，胡氏在澄衷學堂的一篇作文（頁144-145、322），也是難得的文獻。

眾所周知，胡適廣交遊。此年譜，述及胡適的種種交誼及函信往返。治中國近代史者，若耐心將此年譜從頭到尾細讀一過，可得許多線索，並可發現一些意外的史料。但是，也有未錄者，例如，胡適與吳晗的師生之誼。

結語

胡適名震中外，影響廣大深遠。時至今日，其人其言仍有許多地方可發人深思，足資啟迪。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性，能與之比擬者幾稀。

這樣的一個人物，應是種種專題研究的對象。中國大陸不但有豐富的史料，也有很多人才。然而在四十年中，出版的有關胡適之作，具有學術價值

者，屈指可數。耿著無疑是其中之要者重者。作者用力甚勤，資料甚富，並讓一些原件公諸於世，為一貢獻。在胡適研究的書單上，此書不可缺少。

大陸與海外，政治社會制度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學術立場也有所不同。前者以為然者，後者未必以為然；反之亦如是。胡適在大陸，「歷盡滄桑」四字恐不足以形容。從眾矢之的，到居於學者之案，其間道途，必甚曲折艱險。學術之區雖云「開放」，未開未放及半開半放之地，可見的及不可見的，環境的及腦中的，惟個中人知其實況，外人難得其詳。因此，耿著的立場及議論，本文不想多說。

筆者不是胡適專家，所言泛泛。作為一個歷史的學徒，閱讀耿著，難免有些感想，願誠懇直言。以耿氏研究胡適十餘年的功力，以他對於近代中國史料的博覽，以他坐觀「胡適檔」的特有條件，大可以寫一部紮紮實實的胡適傳或更詳細的年譜，海外翹企待之。史傳的寫法，見仁見智；雖然古往今來，也有一些共通的看法。傳之主體是「人」，傳記學是「人學」。人的個性，亦如其面，同中有異，無二盡同。為人寫傳，不能不寫其個性；猶如為人畫像，不能不畫其特徵。否則失真，徒勞而已。寫傳比畫像更難，因為畫像是片面的、一時的印象；而傳記必須描寫個性及思想的發展過程，其間的因素錯綜複雜，變化多端，豈是「階級性」一語所能概括！

為胡適寫傳，他的個性和思想的發展，尤其不能忽視，不但因為他的思想獨樹一幟，而且因為他畢生力倡個性和思想發展在傳記中的表現。1914年9月23日，他在「留學日記」中寫著：「余以為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 (character)。而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已也，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 (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並評東方的傳記：「大抵靜而不動。何謂靜而不動？……但寫其人為誰某，而不寫其人之何以得成誰某是也。」胡之「四十自述」及其英文「自述」，頗能實踐其所提倡。他的提倡和實踐，為僵化已久的中國傳統傳記學注入新血液，使之重新呈現一些動態的「人」的氣象。這是近代中國文學和史學的一種進步，也是世界的潮流。為胡寫傳，有無逆潮流的道理和必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否合情合理呢？

胡適看人待人，古人或今人，出發點是「人」，不是「階級」。耿著告訴我們：「平日對陳獨秀所託辦的事，胡適總是盡力而為。例如瞿秋白、蔡和森等都曾有書稿經陳獨秀托胡適請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他還曾幫忙安排過一些共產黨人的職業。」（頁 290）這些共產黨人有求於胡適，想不是

因為胡屬於「資產階級」；胡幫助這些共產黨人，想不是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人。「階級」之外，還有可通之處，是什麼呢？古人都能容忍「階級」異己，難道今不如昔嗎？

「資產階級」的帽子太大，壓在胡適頭上太久，僅見其帽，難見其人。而且此帽太舊，該「現代化」一下。何況，戴帽不是人的必需；即使必需，也當因時因地制宜。若是處處頂著一個舊帽，豈不累贅！摘帽事非小，涉及史觀和史傳的寫法，非耿氏一人所能決定。然此帽不除，胡傳難撰。希望大陸史學界把此事當作一個史學上的問題加以討論，不但有益胡適研究、其他人物研究，或也有助大陸史學的「現代化」，海外華裔史者誠懇地企待著。

一九八九年一月底定稿·紐約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988年10月~1989年3月)

七十七年

- 十月一日 Joseph W. Esherick (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義和團事件的新探索——從社會史角度分析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社會結構
- 十月十四日 Elizabeth J. Perry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上海工人運動
- 十月二十七日 沈松橋：從自治到保甲：清末民國河南地方基層政治的演變，一九〇八~一九三七
- 十一月十日 王樹槐：張人傑與淮南煤礦
- 十二月三日 張朋園：協餉、鴉片與雲貴經濟
- 十二月八日 郭恒鈺 (西德柏林自由大學)：一九二七年的中德關係
- 十二月十五日 James R. Anderson (美國喬治城大學)：中國近代的科學發展
- 十二月二十日 駱惠敏 (澳洲國立大學)：袁世凱顧問莫里遜及其文書

七十八年

- 一月九日 劉廣京院士：再論魏源
- 一月二十六日 呂芳上：民國初年的江西省議會
- 二月十八日 何丙郁院士：再談「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認識」
- 二月二十三日 張力：近代國人的開發西北觀
- 三月九日 陳儀深：「獨立評論」中有關三民主義的討論
- 三月三十日 胡國台：抗戰時期國共校園鬭爭 (1937—1945)

評介郭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李 雲 漢*

書名：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第一次國共合作」——

著者：郭恒鈺

出版：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民國七十八年（1989）一月

篇幅：序文一八頁，目次四頁，引言三頁，
正文四四一頁 附註

—

我所熟識的史學界朋友中，以「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為研究主題並有學術專著出版的，有兩位：一位是俄裔美籍的青年女學人 Mrs. Lydia Holubnychy，另一位是柏林自由大學中國史名教授郭恒鈺。Lydia 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的碩士論文即是“*The Comintern and China, 1919-1923*”（1976），後來又在韋慕庭教授（Dr. C. Martin Wilbur）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題目為“*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兩篇論文銜接起來，就可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這一主題的全貌。可惜 Lydia 英年早逝，她的論文則已於 1979 年出版。至於郭恒鈺教授，中華民國的學術界對他並不陌生，他時常回到臺灣來出席會議或蒐集資料，上學期（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且曾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學四個月，郭教授長年在西德講學，是華人歷史學者中對共產國際檔案了解最多，研究最久的一位專家，他的德文名著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P Chinas und der Kuo-*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mintang, 1924-1927，早於1979年出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本(1989)年一月出版的這冊「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正文部分就是德文原著的譯文，當然也做了若干修訂。

郭著出版後，東大圖書公司即依郭教授的囑託，給我寄來一冊。一方面由於感謝老友의 盛意，很想「先讀爲快」，一方面也由於個人對容共清黨問題曾經作過研究，渴望從郭著中得到一些新觀點和新材料，因而很認真的讀了這冊新書——也是一冊國內難得常見的好書。張玉法兄和我談起這冊書，希望我寫點評介文字，我也樂於把自己的讀後心得寫出來，供國內外史界朋友們參考。

二

郭著篇首，以著者1980年10月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第十五卷第十期的那篇「『第一次國共合作』辯」，作爲「代序」，因爲這篇專文中所顯示的觀點，代表著者的基本主張，也可說是一種革命性的新見解：否定了中共黨人慣稱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認爲這種說法「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是國共統一戰線，不是國共合作」；也有限度的修正了國民黨人所沿用的「從容共到清黨」一詞，認爲：「『容共』政策從1925年3月孫中山總理逝世到1927年4月『清黨』，在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把自1923年到1927年4月的國共關係籠統地稱爲『從容共到清黨』，是值得商榷的。」

著者這篇專文在「明報」發表後，即曾剪一份給我，他專文中「籠統地稱爲『從容共到清黨』」一句下加註，以我的「從容共到清黨」一書爲證。（代序，頁三，註④）對著者這一批評，我自然要作鄭重的、認真的、客觀的考慮，我曾再度翻閱有關的會議紀錄和有關文獻，也曾和研究所謂「三大政策」有深入認識的史界好友交換過意見，到目前爲止，我仍然認爲自己的觀點合於當時的事實，還沒有發現——也可能永遠不會發現——強有力的證據，使我不能不修正自己的看法。在這裏，我只提出兩點：

第一，孫中山的著述、言論及中國國民黨1923年至1928年的黨務會議和文獻中，只有「容納共產份子」或「容共」之言詞，並無「聯共」的字樣。所謂「聯共政策」，是中共方面的說詞，並非國民黨的決策，在這方面，韋慕庭、蔣永敬等人的研究，應當是最公正的，願讀者參閱。著者尊重史實，他以堅定的語氣說出下面一段話：

1927年中國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常常談到「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可是「聯共」的這個概念沒有出現於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沒有出現於第二次代表大會（1926年）的文件中。這裏所謂孫中山三大政策之一「聯共」，純屬虛構，孫中山僅僅說了容共。（頁80）

第二，拙著「從容共到清黨」，是以中國國民黨為主體，依據中國國民黨原始的文獻資料，敘述自開始容共（1922年）到驅逐共產份子出黨並對蘇聯絕交（1927年）這五年間「錯綜複雜」的過程，「容共」是個起點，「清黨」是個終點，自起點至終點間的若干重大演變，拙著中都有所交代。如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的西山會議，十五年即1926年的「整理黨務案」，十六年即1927年的「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及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三中全會」的有關言論與決議，都作過整個的分析和說明。形式上看來也許失之「籠統」，內容上自信並無「割裂」之失。讀者可以體會到「容共」的演變情形，也可以觀察到所謂「聯共」，並無依據，僅是中共的謀略運用。的確，有不少人——包括當時甚至今日的一部分國民黨人，對「容共」「聯共」的分際，弄不清楚，汪兆銘就是一個例子。他曾說過「聯共」的話，也曾仰承俄共鼻息而企求與中共「合作」，但最後還是醒了過來，曾於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8月6日公開發表言論承認錯誤。汪說：

我們有錯誤沒有呢？唯，有的。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總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共產黨員如果不和我們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我們便立刻不能容他。我們為什麼一直等到共產黨員快要消滅國民革命，我們才不容他？這真是我們極大的錯誤。

犯錯誤的何止汪兆銘一人！這種情形，非常值得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小心謹慎的去探討，去探證，去評價！

三

郭恒鈺教授的著作，分三大章，亦即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 1919-1924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形成歷史，第二部分敘述 1925-1926 的軍事政治發展，第三部分為本書的重點所在，著者自述其內容說：「這一部分詳細的敘述了1926年7月北伐戰爭至1927年7月統一戰線徹

底破裂這段時期的軍事政治發展，以及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這個多事之秋的政策。與此相關，在第三部分也敘述了俄國黨內的意見分歧。」（引言）

第一章，標題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統一戰線的形成（1919-1924年）」，下分九節，分別說明共產國際反帝民族革命的理論，對中國政情的認識以及對中國革命的評價，促成中共的早產，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決議以及孫中山的容共政策，而以「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作為結束。讀過這一章，我覺得著者對史事的認識很真實，寫作的態度很嚴正，而且也有獨到的見解，充分顯示出他的客觀立場和獨立精神。他指出毛澤東關於蘇俄十月革命對中國知識份子所生影響之認識，並不真實：

毛澤東後來認為，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但在當時，1920年和1921年，中國還談不上有這樣的信念。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熱情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不是出自思想上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論上的考慮，而是出自一種渴望，渴望中國在馬克斯主義的幫助下重新贏得自由和獨立。（頁30）

著者確認中共的成立，是「在共產國際代表努力下建立起來」的「一個人為的早產」，「客觀的條件在那時並未成熟。」（頁35）指證中共黨史著述及黨人如胡喬木者，有意對「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作了「有目的的批評」（頁42），而且，「北京的批評是多麼站不住腳。」這些話由著者口中說出並由筆下寫出來，自然不是中共當局所樂聞樂見的，著者自然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

著者依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和其來華代表執行其「統一戰線策略」的史實，斷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最後還是決定參加國民黨。」（頁46）然則共產國際又何以能「接受孫中山的條件——在國民黨內進行合作」？著者指出除「希望中國共產黨人能推動國民黨向左轉」的理由外，還有三個原因：一是華盛頓會議，二是香港罷工，三是孫中山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作用。（頁66-75）這都是就當時中國國內外情勢作全面觀察所得到的結論，因為「華盛頓會議和香港罷工以後，孫中山愈來愈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共產國際才接受了孫中山的「容共」政策。

第二章，也就是郭著正文的第二部分，以「統一戰線破裂前的醞釀（1925-1926年）」為標題，下含九項子題，有系統的敘述了三大歷史事件的

發生及其影響：一是中共1925年1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對付國民黨的政策；一是1925年「五卅慘案」的意義和影響；一是1926年以蔣中正（郭著稱蔣介石）為中心人物的「中山艦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以及蔣氏態度與共產國際的對策。

大多數歷史學者，都認為中共係於孫中山逝世後，才大肆對國民黨進行分化。郭著依據中共的黨務文獻及中共黨人的著述，卻正確的指出中共之決定在國民黨內「擴大左派」、「反對右派」並「分化中派」，是開始於孫中山逝世前兩個多月，即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著者指出：在這次大會的決議中，顯示「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作好了進攻的準備」，因而稱這次大會是「一次戰鬥大會」（頁107）。中共要「進攻」，目標自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因此進入了多事之秋。兩個月後，孫中山死了，中共的「進攻」更無忌憚。著者的論斷是：「中國共產黨人因孫中山的逝世感到機會來了，他們在孫中山在世時只能秘密而徒勞謀求的東西，現在可望得到了，這就是國民黨和民族運動的領導權。」（頁111）

對於「五卅慘案」，著者作了認真而細緻的敘述。和其他絕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一樣，認定這一事件鼓起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潮，使中共的發展深受其利，中共也始終認為這是一個革命的新起點。著者有一句很中肯的話：

隨著1925年的「五卅事件」中國革命史開始了一個新時期，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過去和現在只說「1925-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而不說1924年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原因。（頁128）

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是著者所要作深入探討的一項子題，而對事件發生的主導者蔣中正之地位、性格和權力的取得，都有甚為公正的說明。他的決斷性的說明是：

蔣介石當時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能力發動政變，反對在廣州的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因為他對於在他影響下的第一軍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住，那裏有共產黨代表和軍官，王懋功就是證明。在蔣介石看來，事件的尖銳形勢已經危險到如此地步，如果他不願自暴自棄的話，他就必須採取行動。（頁188）

著者說「正因為蔣介石的行動捷如閃電，俄國顧問和共產黨才手足無措，一下子被解決了。」顯然他認定蔣的行動是痛快的，成功的。但對於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依蔣氏建議而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卻有批評，著者的話很尖銳：

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活動的九點措施，雖然有條件的符合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但是蔣介石通過聯席會議在一個問題上作了根本性的改變，甚至可以說是修正。迄今為止，在理論上中國共產黨黨員只是單方面服從國民黨的政策和紀律，但從現在起他們取得了合法地位，可以作為平等的聯盟夥伴共同決定涉及兩黨的一切重要事務。蔣介石把一個很重要的權力交到了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國共產黨黨員手中，使他們可以更輕易地按照他們的意圖影響和控制國民黨。以後的發展情況證明，組織聯席會議是一個嚴重錯誤。（頁 193）

當然，「中山艦事件」直接影響到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著者對莫斯科的反應以及蔣氏的因應，作了適度的敘述，他的斷語是：「蘇聯人和蔣介石商定：作為對蔣介石反擊右派的報答，蔣氏可以得到蘇聯對計畫中北伐的支持。」（頁 215）

本書的第三部分——第三章，以「統一戰線的破裂」（1927年）為標題，下含十三小節。著者指明，這一部分乃全書的重點所在。

誠然，第三部分的特點，在於對共產國際的政策和態度的轉變，作了甚為詳實的交代，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的決議，分析尤為明白，先後舉述了布哈林和史達林的論點，並提到中共代表譚平山及國民黨代表邵力子的講話（頁 239-243）。著者於共產國際決議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作重點敘述（頁250-252），認為「共產國際本應考慮到：由於強行推動農民運動，強行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統一戰線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分裂。」事實上共產國際卻不了解中國的情勢，因而著者作了如下的批評：

我們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期犯下了多大的錯誤。共產國際更多的是一個歐洲的共產國際，它善於用歐洲的眼光來觀察世界革命和國際工人運動的一切問題。（頁 253）

著者以相當多的篇幅（頁254-421），敘述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廣州、南昌、武漢、南京、上海等地的政治情勢及其變化，他是將蔣中正的權力起伏為敘述的線索，並以共產國際的立場來作了解和評價，也依據共產國際的有關文獻，說明共產國際對國民黨清黨反共後的挫敗及其意見的分歧。這是一段盤根錯節，複雜而又混亂的政治層面，著者的論述盡可能作到客觀而有條理，但由於引用資料的限制，自然是有得也有失。對一些中國讀者而言，如非同時參閱更多的中文原始文獻或學術專著，將難以窺知此一階段政治變化的全貌。

四

毫無疑問的，郭著是近年來在臺灣出版的第一種討論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學術著作。它的最大特色，乃是客觀的介紹並有限度的批評了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這種知識，正是中華民國學術界所缺少的。就我個人的體察，郭著確曾使我對「容共」與「清黨」的國際背景，加深了印象並且擴大了視野；我深信其他的讀者，也會有同樣的感受。

著者最大的貢獻，乃是對中共一直堅持的「聯共」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作了歷史性的澄清，也糾正了可能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謊言和誤導。著者特別針對北京大學教授向青的長文「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提出評論，他認為向文誤解了共產國際1923年對於中共的「一月指示」說：

向青把這個「一月指示」寫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無論是俄文原題，還是英譯，都沒有「國共合作」的字樣與涵義。如果不是誤譯，而是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尋找文獻上的根據，那就值得商榷了。（代序）

對於國民黨黨史及國民黨人的著述，著者也有批評。他說：「北京在敘述中國共產黨黨史時通常不提孫中山的遺囑，只講孫中山致蘇共中共的遺書。而國民黨領導當時對遺書就有爭論，今天更是不再提及。」「至於1925年3月1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拍給季諾維也夫和斯達林的電報，國民黨在當時，在今天，都是諱莫如深。」（頁112）著者也對我作含蓄性的批評，指出拙著中沒有提到蔣中正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12月25日發表之反對西山會議的電報，說：「甚至李雲漢在關於國共第一次合作範圍十分廣泛的研究中，也沒有提及這份電報，李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天國民黨的觀點。」批評的當否是另一問題，但這種嚴格的批評精神，確是作為一位卓越學者必備的條件，值得欽佩，我個人更是由衷的感謝。

大量引用共產國際的文件，是郭著的優長，但也同時帶來了少許對史實認識不夠確實的缺失。舉例說，著者提到1925年3月10日在北京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並「決定將三百二十名國民黨右派開除出黨」（頁108），這是錯的，因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不在北京，在北京的只是一部分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多數也具有中央執行委員身分，他

們曾建議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未成爲事實；汪兆銘等開過政治委員會會議及執行委員臨時會議，但不是「擴大會議」，也未開除三百二十名黨員的黨籍。又如提到胡漢民曾是「國民政府成立前副元帥」（頁153），也不全對，胡漢民是在孫中山北上後的代理大元帥，公私文件上稱之爲「胡代帥」，「代」與「副」的意義自然不相同。再如提到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3月間，蔣中正爲部署清黨，曾經「派張靜江去浙江，林森去福建，胡漢民去廣東，爭取同盟者。」（頁280），也不完全是事實。林森是西山會議派上海中央黨部主持者之一，十六年五月以後才與南京合作，胡漢民則一直住在上海，四月上旬始參與清黨之籌畫。另如三〇六頁所記「西山會議右派於1927年4月2日假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之名在上海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決定發動『護黨救國運動』，並決定將共黨分子清除出國民黨。」這也不够確實，因爲會議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除吳敬恒外，其餘與會的中央監察委員都與「西山會議」無關。此外，說顧正紅（原名爲顧正洪，五卅後改「洪」爲「紅」）是共產黨員（頁123），應當再考慮，顧是在死後變成共產黨的，正如鄒韜奮死後被「追認」爲共產黨員一樣。郭強調「1927年3月20日於上海」的「蔣介石聲明」（頁285），也值得商榷。上海是3月22日爲革命軍完全克復，蔣中正在是3月26日進駐上海，如何能於20日在上海發表聲明？蔣氏在上海停留至4月9日，曾於3月26日聲明南京事件1927年3月24日不擴大及「不以武力收回租界」，30日對日本記者重申審案解決辦法並保證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外，並未正式發表政治性聲明，共產國際機關報「國際新聞通訊」有關「蔣介石聲明」的刊布，真令人懷疑！是否是譯文或排印方面有了疏忽！

談到譯文，不能不提醒讀者，郭著絕大部分是由德文中譯的，而且多半是參考1985年大陸學人李遠六的譯筆（編後語），也許是譯者所處的環境及習慣不同，有些詞語的意義有待商榷，如把上海三次暴動譯爲「起義」。也有些詞語是不必要的累贅，如頁二六六「共產黨的領導同志」一語中的「同志」，不但無此必要，且使著者的立場失去客觀。同樣的情形也見於頁一六八第一行，稱中共黨人爲「上海的同志」，對右派國民黨人則稱「國民黨反革命分子」，貶國揚共，想非著者的本意！

少許的舛誤及史事的值得商榷之處，無損於郭著的價值，世界上那裏有盡善盡美的事？那裏有盡善盡美的書？我喜歡這冊書，重視這冊書，更要向老友郭恒鈺教授表示由衷的祝賀。

張憲文著：中國現代史史料學

劉 維 開*

書 名：中國現代史史料學

作 者：張憲文

出 版 者：山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1985年11月

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史料是從事研究工作的基礎，但是史料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資料，必須經由歷史研究者的評估與選擇，史料本身的意義或價值才能確定。因此關於史料的搜集、整理、鑑別、考訂等工作，就成為史學方法上十分重要的一個部分，或稱為「史料學」。在中國史研究方面，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史料學，都已經有相當不錯的基礎，發表了許多專著和論文，但是現代史的史料學卻仍處於起步階段。不論是從1912年或1919年至1949年的中國現代史領域中，史料之多，種類之繁，數量之大，是任何一個歷史研究領域所無法相比的。這些史料又大多十分雜亂，沒有經過有系統的整理，甚至有些史料至今尚未公開。因此對於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研究者而言，確實產生相當困擾。學者有鑒於此，多年來分就各人不同的研究範圍或所了解的史料收藏單位，陸續發表了不少專文，分析或介紹中國現代史史料的概況。如張玉法主編的「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二輯「史料與史學」一書，即選錄了十一篇專文，分別介紹臺灣地區、及美、日、韓、法、德等國典藏中國現代史史料的情形及研究情形。而在民國77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集國內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者，編寫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册）」，及李雲漢於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發表的「中國近代革命史資料與研究之初步觀察」論文，則是最近出現的兩種專著。然而就中國現代史史料的全面分析與整理言，上述諸篇論文或專著多僅止於史料分布之介紹，缺乏進一步的說明，而1985年11月，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代史史料學」一書，正可以補充這方面之不足。

本書作者張憲文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南京中華民國史研究會副會長，曾主編「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是大陸新一代的民國史研究者。

全書除前言外，共分八章：

第一章「概論」。作者首先就史料學的任務及其在歷史科學中的地位做了一個說明。他表示史料學是「專門考察史料，研究史料的源流、價值和利用方法的一門學問」（頁一），它的任務是「考訂史料的真偽，確定史料的年代、作者、版本和來源，辨明史料的價值，以做到求實、存真，從而為歷史研究提供豐富的、可靠的史料」（頁二）。而「史料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基礎學科，是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頁一），所以「史料學並不等於歷史科學，更不能代替歷史科學」，它「是歷史學的基礎，是歷史研究的起步工作」（頁二）。其次，作者就中國現代史史料學的研究方法提出個人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現代史的史料範圍十分廣泛，但是它所反映的歷史內容，卻不一定完全真實，其中可能有某些錯誤，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最重要的就是進行考訂工作，包括鑑別史料、校勘文字及考訂史實等方面。

第二章「檔案史料和文獻叢編」。中國自古以來，史學家十分重視檔案，許多著名的史籍都是採用大量檔案文件寫成的，而在中國現代史方面的檔案史料尤其豐富，作者分別敘述了（一）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檔案整理與保存工作的情形，以及目前中國大陸保存這兩個時期史料最豐富的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概況；（二）中共政權對於檔案搜集和保存的系統；（三）臺灣地區收藏中國現代史檔案的機構與內容。最後作者就大陸地區、臺灣地區及海外歷年來所編印的中國現代史檔案和文獻彙編，做了一個整體的介紹與評述。其中包括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等中國現代史有關資料，與中共黨史資料，及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經濟、中外關係、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近代思想、抗日戰爭等專題史料匯編；臺灣地區出版的「革命文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交通史料彙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國史料叢刊」、「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民國二十年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等，以及美、英、日等國編印的外交文書。

第三章「報紙史料」。作者認為報紙的史料價值在於(一)報紙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所以為研究現代政黨、政治集團和各個階級提供重要的史料；(二)報紙具有新聞性、時宜性、廣泛性，所以報紙是研究社會狀況、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的重要依據之一；(三)報紙新聞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實過程和結果五個基本要素，所以可以用來鑑別回憶錄等的正確性。他在這一章中，分別介紹了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晨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救國日報等十種一九四九年以前由國人經營的較著名報紙；宇林西報、順天時報、盛京日報、大美晚報等四種外人在華興辦的報紙；以及南華日報等八種汪偽政府下的報紙；大同日報等二種偽滿洲國的報紙；救亡日報等六種由所謂「民主黨派和進步團體」辦的報紙；與熱血日報、紅色中華等十八種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在各個時期與地區辦的報紙。

第四章「期刊史料」。期刊就是雜誌，作者認為期刊的史料價值在於(一)許多期刊是政府、政黨或團體的機關刊物，經由這些刊物可以為研究政府、政黨或團體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及其活動，提供豐富的資料；(二)雜誌的種類繁多，性質不一，創辦者又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可以反映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三)雜誌比報紙更加側重於理論、學說和學術問題的探討。他將1919年至1949年，亦即大陸學者所界定的中國現代史範圍，分為「北洋軍閥割據混戰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時期」、「國民革命和北洋軍閥統治崩潰時期」、「國民黨建立全國統治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及「全國解放戰爭和國民黨政權覆滅時期」等五個時期，就各時期重要期刊分別分類介紹其創辦經過、政治立場及重要內容等，並予以評述其意義與重要性。

第五章「歷史回憶錄」。回憶錄是研究歷史的珍貴史料，作者表示它的基本特點是真實性，但是從多年的研究經驗來看，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受到許多局限，如回憶者記憶不清導致的錯誤、回憶者有意誇張或縮小歷史的真實情況、回憶者受到某些政治環境影響而帶有某種政治偏見或偏激情緒、回憶者受到本身地位的限制只能見到事件的一部分或表面現象、回憶錄的內容出於偽造等，均會使回憶錄成為不真實的資料。作者在本章中介紹了八類關於中共人物或事件的回憶錄，及大陸地區、臺灣地區與香港三地出版的關於1949年以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個人經歷之回憶錄。最後作者分別就日、美、蘇等國有關中國問題的回憶，如日本方面的「岡村寧次回憶錄」、「重光葵外交回憶錄」，美國的「司徒雷登回憶錄」、「西行漫記」（史諾著），

蘇聯方面的「中國回憶錄」（達林著）、蘇聯在華軍事顧問的回憶等，加以評介，他特別指出，蘇聯顧問的回憶錄，大多發表在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的六〇年代以後，蘇聯的領導集團激烈反華，所以「這些回憶錄難免不受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如過分地誇大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幫助，突出蘇聯顧問的積極作用。相反地，對他們在政治上的失誤和指揮不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和危害，則避而不談或涉及甚少。」（頁二二一）

第六章「人物研究史料」。研究人物的基本史料包括文集、日記、函札、自傳、年譜、家譜、族譜、墓誌銘等，每種對於歷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其重要性。作者除分別分析了這幾種史料的特性外，同時也列舉了大陸地區及臺灣地區所出版有關資料，並予以介紹與評述。

第七章「地方史志政府公報和年鑑史料」。作者在這一章中，分別就地方史志、政府公報、以及年鑑三種史料的性質與對現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予以詳細的說明。同時作者也就目前大陸地區對這三種史料的保存和整理情形做了介紹。

第八章「中國現代史工具書的種類及其利用」。從事歷史研究一定離不開工具書，有了工具書，在研究工作上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浪費的時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在中國現代史方面，史料數量龐大，內容繁雜，保管分散，工具書更有其重要性。作者在本章中，分為「目錄和索引」、「人物研究工具書」、及「關於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工具書」三部分，就民國以來，各個時期編印的圖書、報紙、期刊目錄或索引，人物志、名人錄，及國外研究中國問題有關的工具書，分別加以評述。

誠如作者所說：「中國現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無法估量。可是現代史料工作，基本上還停留在搜集和編纂階段，對史料缺乏系統的、科學的考訂工作。有些同志，看到材料，不經選擇，拿來就用，甚至對一些傳抄材料，也不追究來源，不辨真偽，這樣就去寫文章，著書立說，是很危險的。史實有錯誤，結論就不準確。」（頁四）因此對於作者編寫本書的動機，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作者在內容的分類、編排上也十分用心，對於各種史料均加以有系統的分類，使讀者不致產生茫然沒有頭緒的感覺。如期刊史料方面，不僅將一九四九年之前出版的期刊分為五個時期敘述，每一時期再根據刊物性質的不同分為若干類，以「抗日戰爭時期的期刊」一節為例，即分成「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出版的刊物」、「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創辦的刊物」、「抗日救亡運動和進步黨團的刊物」、「為國民黨統治政策服務的刊

物」、「爲汪偽和偽滿政權服務的刊物」等六類。同時作者對於書中所列舉的報紙、期刊、政府公報、工具書等，均加以簡略的說明，使讀者所閱讀到的不是一堆報紙名稱、雜誌名稱或書名，而感到枯燥乏味；對於部分與中國現代史研究關係密切的報刊，作者也會加以評述，如稱申報在「研究中國近百年史，尤其是研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史」有重要參考價值（頁七九）；新聞報爲「我們研究中國資產階級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態度，尤其是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工商業的興衰狀況，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歷史資料」（頁八一—八二）；國聞週報是「中國現代史上很有影響的一份雜誌，研究中國現代政治史，不可不查閱『國聞週報』」（頁一一六）；東方雜誌「雖然在思想上比較保守，但由於它的內容非常廣泛，無所不包，反映了中國現代史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一個豐富的史料寶庫」（頁一一六）；建設雜誌是「研究國共合作前將中山等人思想變化的重要史料」（頁一四六）等。這些對史料的分類、說明或評述，雖然大多是作者主觀的意見，值得商榷之處頗多，但是爲研究者在搜集資料時，確實可以提供不少幫助。

作者在書中除了對大陸地區的資料收藏及出版情形，敘述的十分詳盡外，對於臺灣地區及美、英、日、俄等國收藏及出版中國現代史史料的概況，也介紹的相當完整。至於在態度上，亦能維持一個公正的立場，比較各地區之優缺點，如在版本考訂方面，作者就批評中共在這方面做得不够好，「有些史料，包括領導人的講話、文章或某些歷史文獻，在再版時往往加以修改。對作了哪些修改，爲什麼修改，均不加說明。」（頁一二）對於臺灣地區出版的「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則表示：「本書所錄文電的許多原件，仍保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經過仔細核對，內容是一致的，證明本書所錄檔案文件是準確的、可信的、有利用價值。」

（頁四一）整體而言，作者對於臺灣地區出版的史料叢編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如認爲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的「革命文獻」：「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的重要參考資料。」（頁三九）「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綜觀全書內容，資料豐富，規模浩大，多是外間極少見的原始文件。可以認爲這部檔案匯編，對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正面戰場、蔣介石的政策、中外關係、國統區和淪陷區，都有重要參考價值。」（頁三九）國史館編印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本彙編雖對正面戰場的一些戰役有過高的評述，但也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頁四〇）由此亦可見大陸地區研究民國史學者

對於臺灣地區出版現代史料的評價。

從對資料的介紹、整理等方面來看，作者在中國現代史史料的研究上，做了許多貢獻，但是在意識型態上，卻始終跳不出馬克思主義的框框。作者於前言中說明撰寫本書的方法時，即明白表示：「本書力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按照史料的種類和性質，進行區分、綜合，較系統地闡述中國現代史的基本史料和利用方法，並對一些史料的價值作了初步評述。」論述中更一再強調這一點，如：「今天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史料，建立科學的、系統的、完整的史料學學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頁三）「歷史研究工作的任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進行綜合、分析，找出它所固有的規律性來，給人們以歷史的借鑑，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使其自覺地沿著歷史潮流前進。」（頁二二三）同時作者仍然堅持以階級史觀做為評定史料的標準，如他認為中國現代史史料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頁六）所以「我們必須以階級分析的方法，正確地對待檔案和使用檔案」（頁二〇），「歷史是人類進行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過程」，研究歷史人物「必須正確處理領袖、羣眾、階級和政黨的關係」（頁二二三）。此外本書也和其他許多大陸著作一樣，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的著作，當成經典，在書中不時引用，並作為論述時的依據；同時對於反共的言論，即用「叫囂」、「胡說」等字眼，予以批評。這些都是本書明顯的缺失，也減低了本書的學術價值，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稿，中、英文不拘。
- (二)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用有格稿紙謄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七)來稿請寄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馮爾康等編著。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六六頁。

本文所要評介的這本書，是由大陸明清史學者馮爾康主編，白新良、張國剛、常建華和李喜等人所共同撰寫的一本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工具書。這本書也是天津教育出版社主持出版大型系列叢書，「學術研究指南」，其中一本。在綜合、整理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有關中國學者研究社會史的論著及敘述方面，這本書具有豐富的資料性和學術性，是一本難得的深入淺出的參考著作。

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不僅在中國學界是個尚待發展、再界定的學術項目，在國際學界裏，也是一門尚未成熟的中國史研究環節。誠如本書編著者之一馮爾康，在「代序言」所云，中國社會史由於史家認識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詮釋。一方面，社會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專門史，以歷史上各個段落的羣體生活與生活方式作為研究對象，另一方面，社會史所要研究的對象，由於近代學術分工的影響，許多已為社會學、民俗學、民族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所涵蓋；歷史學家如何在各種專門學科的衝擊下，找尋適當的題材、特定的研究內容，確實是一項艱難的研究工程（頁 2-3）。

在西方漢學界裏，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也面臨類似的困境。以研究「漢口」著名的美籍學者 William T. Rowe，曾以「現代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為題，指出中國社會史研究普遍有兩個困題，一是如何在中國各種社會發展不均衡的歷史條件下，找出歷史進程和發展規律；二是西方學者很難掌握巨量的歷史材料，研究大型社會變遷或社會革命對一般人民生活的影響。歐美史學界本身不乏社會史大師，如 Le Roy Ladurie 和 Lawrence Stone 等人在地方史家族人口史的著作，但由於語言及資料的限制，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卻很少有精彩的社會史著作。（參見 Oliver Zunz 編著 *Reliving the Past—The World of Social History*, 1985, pp. 236-237）。

然則，如何在社會科學分工及缺乏大量人口、家族、社區生活等等條件的限制下，展開中國社會史的研究？馮爾康等人並未提供確切的答案，但從他們界定社會史研究的範疇，卻不難找出若干線索。的確，社會史的研究內容，每每「瓜分」歷史學者，尤其是經濟史、人類學方面的學者善用科學統計、田野工作等訓練，作出比一般歷史學者較為精確的描述。然而，歷史學者從事社會史研究，卻有「立體化」的特點，也就是從長時期觀察某一特定

研究對象的變遷歷程，譬如家族與人口歷史、地區發展史以及農業在各地的擴展等等。

值得注意的，倒是編者對中國社會史在大陸學界遭受政治干擾而全面、停滯發展的反省。馮爾康指出，自 1949-1977 年，大陸學界因中共官方跟隨蘇聯腳步而取消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門，被迫封禁社會史領域；其次，大陸學者在過去三十年側重「階級矛盾分析」，影響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性觀照，乃致於社會史形成階級鬥爭史的主要內容。相比之下，臺灣自七十年代以來，揉和社會科學和社會史著作，已為大陸學界所肯定。

「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列舉了中國學者研究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乃至近代社會史(主要指1920-1930年代)等幾個主要歷史段落的專著及論文。編者從各個歷史斷層的社會結構、血緣羣體與社區生活、人口與社會救濟、生活方式和風俗習尚等四個主要中心題目，詳述過去六十多年來相關的論文、專書。這四個主題，一方面反映了編者對中國社會史內涵的定義，以中國社會下層的人民生活、物質條件為主幹；舉凡近代社會中的會黨、工人、買辦、民族資本家、華僑，都列有子題，介紹有關論文。對近代社會變遷，譬如商品經濟和農村生活、婦女問題以及人口壓力等等，也舉例說明研究的成果及其缺點。另一方面，本書將歷史上的社會結構、社區生活分割成幾個不同片面，對於編著努力將歷史「立體化」的嘗試，顯然有所矛盾。這些分類子題，對有意進一步了解中國社會的學者、研究生，固然有參考作用，但分類項目，卻失之於靜態，未能將相關的歷史問題聯繫起來。William Rowe 在處理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問題時，認為有五個議題可蓋括中國社會（至少明清以來）的特質：中國農村社會的本質、地方聚落社區生活、國家（政府）與社會關係，商業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羣眾運動（宗教活動已有 F. Wakeman 教授專文，故作者略而不談）。這種將相關子題聯在一起討論的做法，可以使歷史問題動態化，具體地點出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在支配社會資源方面所引出的問題。

雖然如此，這本書最大的貢獻，是整理、編目（附有索引）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有關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專書簡目和重要書目；搜羅範圍甚廣，包括臺灣學者的著作，譬如陳其南、黃俊傑和莊英章等年輕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參考工具書，這本書已具有諮詢、備覽的工具書功能，值得有志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者參考引用。

□陳秋坤·中研院近史所□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臺北，谷風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影印出版，四一六頁。

臺灣歷史學界雖然不乏有關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作品，但是對中國現代思想史作全面檢討的作品卻尚未一見。加上目前的中國大陸熱，所以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繼〔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登陸臺灣以後，深受各界重視。

本書由下列八篇論文組成：「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記中國現代三次學術論戰」、「胡適、陳獨秀、魯迅」、「青年毛澤東」、「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略論現代新儒家」、「漫說『西體中用』」。從文章的組成中，可以發現作者並非漫無目的隨便寫作，而是以一條若隱若現的主線來貫穿中國現代思想史。這就是從「啟蒙與救亡」的角度，一方面反省五四運動，另一方面則檢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未來。其中「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藉著對五四運動性質的兩個面向——啟蒙與救亡——的檢討，勾勒出此二者在五四時代由相互為用走向救亡壓倒啟蒙的錯綜複雜過程，也勾勒出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發展主線。至於「記中國現代三次學術論戰」一文，則是就「『救亡』主題壓倒『啟蒙』主題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內的一些具體過程和狀況」（頁97）做進一步的探討。而「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則是從救亡與啟蒙的互動，尤其是在前者壓倒後者之後的情況，來討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崛起、得勢的經過。另外討論胡適、陳獨秀、魯迅的論文，則是討論三個啟蒙運動的健將在五四前後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並給予不同的歷史評價。與此文相類，「青年毛澤東」則是對民國初年尤其是五四時代尚未成為馬列主義者的毛澤東思想從事探討。這是因為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主宰中國政治思想的日後事實，回過頭來檢討青年毛澤東思想的特質。至於「西體中用」的提出既總結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發展，也是檢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與現狀之後，面對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動搖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心的現實，作者想為他們找出一個恢復信心的辦法，這也是作者意圖以「西體中用」總結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用心所在。他首先將「體」置於某種程度帶有馬

克思主義意味的下層結構或生產方式的思考方式中，賦予所謂「社會生產方式和日常生活」的新義，而把「西體」等同於現代大工業和科技之後，再以「近代大工業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革命理論和建設理論」為由，使馬克思主義成為「西體」重要的一環。而後使「西體」「適應、運用在中國的各種實際情況和實踐活動中」；並以「西體」改造「『中學』，轉換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頁402-4）。以此，作者自認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格局，並嘗試重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

與此主線發展關係較不密切的「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與「略論現代新儒家」兩文，則是對現代中國文藝思潮與新儒家思想的扼要討論。

問題是：以這樣的主線來建構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形貌，作者固然能成其一家之言，掌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面相，但是同時卻捨棄了中國現代思想史（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其他一些相當重要的部分。以作者提出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來檢視一九三〇年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以及鄉村建設的主張，難道與此一雙重變奏無關?!難道不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一個主要部分?!而從中西文化論爭的思想史角度來省察，則十分重要的「中國本位文化論戰」以及其他與中國國民黨關係密切的思想主張，也被作者忽視了。「成者王、敗者寇」，作者太強調1949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勢的事實了。

至於作者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來理解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發展，確有獨到之處，對強調以追求富強來理解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臺灣思想史研究者而言，有清新之感。不過作者在說明此一雙重變奏時，並沒有深刻掌握「啟蒙」與「救亡」在思想基底上的矛盾性格^①，尤其對一方面是民族主義的集體主義，另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之間的衝突這一類問題，並未站在尊重人的尊嚴、價值的角度重新深入地加以檢討，這似乎不無缺憾。

二

或許任何思想史（或歷史）的研究都必然有其立場存在，但是，有立場並不表示可以扭曲史實，不幸作者即有此一傾向。他常常把一些與馬克思主義並不同，甚至在形式上並不相干的歷史現象硬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正」字標誌，如：評斷李大釗思想時，認為李大釗攻擊「孝道」是「從馬克思主義觀出發，也指出對個性的扼殺」（頁19），但從作者引用的史料卻看不出哪

一點是根源於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其次，縱觀全書，也常常出現由於名詞不加說明或說明不清而導致的論證不足。如：作者認為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許多學人修正自己的觀點，乃是「自覺自願地接受了和相信了馬克思主義」（頁 180-1），但他卻不曾告訴讀者所謂的「自覺自願」到底是什麼？也完全忽略了客觀存在的強勢政治力在學人修正自我觀念的流程中，所起的冷酷作用。與此相類的，作者在不曾說明什麼是「歷史的邏輯」的情況下，便強調根據歷史的邏輯「必然」導致五四時代科學派的主張朝向他們所反對的馬克思主義發展（頁69）。

另外在本書中，常常出現名詞濫用、定義不清的狀況，甚至與政治宣傳用語混淆。以在本書中屢屢出現的「實用理性」一詞為例，作者既沒有特殊的定義，又與西方思想中的康德、韋伯定義及理性主義等一般常用的各種不同定義不甚相合，使讀者難以確切地掌握。這樣的混用名詞加上碰到政治用語如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之屬就更糟糕了，因為在政治的實際運作下，馬克思常被簡單地貼上唯物論的標記，但只要對西方近代思想史稍有涉獵，作為黑格爾左派的馬克思，或者說是本書提到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馬克思，又豈能如此簡單地加以理解？！

再者本書也出現許多作者對歷史事實認識不清的情況，如：作者對張之洞「中體西用」思想中可變的「法制」望文生義地理解成「政經體制也可以改」（頁 380），卻不知道張氏的原意只是指「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並不是根本大法，連諸議院性質的議院都不在內呢②？！另外對於佛學與革命的關係，作者也輕率地以「據於儒，依於老，逃於禪」來理解，完全忽略了佛學對他所描述的章太炎革命思想的正面意義③。

三

學術論著必須以學術論著的標準來要求，因此，前述提及的本書的一些缺失或為作者囿於主、客觀環境所致，但不能不加以批評。不過，除了前述以「啟蒙與救亡」來詮釋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發展之外，作者討論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注意到大眾的參與（頁225）以及馬克思的理論（頁173），也確有獨到之處。

最後，必須要指出的是，作者雖然不同意新儒家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也

對「中體西用」思想提出批判，並提出「西體中用」的替代主張。不過，除了前述提及與儒家截然不同的「西體中用」主張之外，此一主張有其另一面向存在。由於他認為「西體」（現代化）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學作為途徑和方式（頁 405），結果使得他的主張無論字眼如何變換，在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學作為現代化過程不可抹殺的前提這個角度下，仍與新儒家的主張相類。無論如何，本書雖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在中國大陸史學界或也有其時代意義，但是整體而言，作品本身囿於作者所存立的時空，加上內容上頗多疏漏、輕率之處，不必過度加以重視。

- ① 筆者發表的「民族主義、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宇宙〕192期（臺北，1986年4月），可供參考。
- ② 參見筆者所著〔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臺北，1987年），頁186、229。
- ③ 章太炎如何結合佛學與革命理論，可以參看李永熾，「大獨與華嚴之行——章炳麟的革命道德論」，〔歷史的聲音〕（臺北，1984），頁27-34。

□薛化元·臺灣大學歷史系□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By John King Fairbank. New York: Happer & Row, 1986, 396pp.

以革命為主軸來詮釋中國近現代史，費正清並非第一人。在他之前，即有 Mary C. Wright 以相似的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為題，於1968年編撰出版。不過，把革命的起點，提早到1800年，也就是嘉慶五年的時候，並將其斷限，截止在停筆交稿的1985年，則費正清確為第一人。他這樣做的意思，似在透露另外一道信息，告訴讀者，即使到了他交稿的時刻，中國仍在革命當中。換句話說，中國的革命，並非真的止於1985，中國革命應該還繼續著。

費正清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中國的近現代史，使讀者對於究竟什麼叫做革命，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依照一般的說法，革命指的是在短暫時間內，對現狀加以劇烈變革，其中還夾帶著流血事件。簡單地說，革命應該就是：在短時間內劇烈改變現狀。像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美國大革命，都是在一段並不太長，最多也祇有數十年的時段中完成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革命的時期也應該很短才對。中國的革命，應指像辛亥革命、中共人民革

命、文化大革命之類的才算，才比較明確，比較像法、美、俄的革命。爲何費正清不這麼處理，而逕把自嘉慶五年到今天這麼漫長將近兩百年的整個歷史都算成「一個」革命？這裏頭有兩層意義。

第一、費正清認爲中國的革命曠日費時。別的國家祇花數十年即成功的，中國不同，中國要花掉一百八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也就是說，中國的革命特別難，特別慢。

第二、外國的革命其實也要花上百數十年工夫，但其中有某一時段特別激烈，因此，一般史家多將較短的那一段，作爲革命期。換句話說，外國革命，通常被史家做狹義解釋；中國革命，其實也可以專指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等等，但這幾個革命無不激烈萬分，因此用廣義的來看，整個過程都應納入。因爲若以較大的視野，來看十九以及二十世紀的中國，會發現其變化之激烈，也是史所未有的。

不論是第一層，中國革命的速度慢（或者說「遲滯」），或者第二層，中國革命所生激烈變化接二連三不斷，都代表美國某一部分學者的史觀，確與其他史家有相當大的差異。他站在更高遠的位置，來觀察中國的近現代史，發現中國人在過去的近兩百年裏，焦心困頓，一方面繼承著數千年來從不曾滅亡的悠久傳統，另一方面力思仿習西洋的器物、制度、文化、甚至思想。中國人在這兩百年內，既要自己的傳統，又要外來的「傳統」（從外國人的觀點言）。於此東西兩大傳統，在中國的土地接仗無數回合的情境裏，中國人栖惶惶地過了相當不安寧的兩個世紀。因爲費正清認爲中國人的 *inertia* 太強了。這種緣於深厚文化傳承，所生對外來文物的遲鈍反應，被他用 *inertia*（指惰性、慣性、遲鈍、不活潑）這個觀念來貫串。

這裏頭涉及東西兩大文化傳承之間，究竟何者爲優、何者爲劣，或者何者方爲十九、二十世紀的強勢文化的問題。在費正清的行文之中，可以隱約看到，東方向西方學習，就是客觀的方向。書中，他以細膩又深入的筆觸，循著時間的先後順序，勾勒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部位。從中，隨處可見中國人因爲向西方學習，而自我憂煩困擾，或互相殘殺傾軌的景觀。由於主題是中國的大革命，不是西方文化，書中不見西力刺激的明顯痕跡。但是，不論對十九世紀初葉，道光皇帝的無所動於中國人口的劇增及國內外商業活動的活潑（第四章）、中葉洪秀全的神權政府（第五章）、後期的改革運動（第七章、第八章），或者對二十世紀初期的清廷立憲運動、共和革命運動（第九章、第十章）、二〇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國民黨的統一運動（第十一、十

二章）、三〇到四〇年代的國共鬭爭（第十三、十四章）、和一九五〇年代以後的毛澤東的「建國」（第十五章）、大躍進（第十六章）、文化大革命（第十七章）、最後到鄧小平復出後的四個現代化（第十八章），全書自頭至尾，均植根於對西方優勢文明的肯定，對美國富強的自足與自傲。費正清並且從這個據點出發，隔著太平洋，看著這麼一大羣中國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羣人，在彼此簇擁，又彼此踐踏中，一步一步湧向西式文化。

他手裏握著的，是一枝史家的筆。不過，在他流暢而口語化的英文（但偶而心血來潮用些法文）筆觸中，讀到的不僅是中國人爲邁向現代的努力過程，而且更隨處發現他本人的存在。時常以一種有時戲謔，有時詼諧，有時諷評，甚至嘲弄的筆法，歷數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拔尖人物。自道光而後，林則徐、魏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爲、孫中山、袁世凱、胡適、丁文江、蔣中正、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等，都逃不過他的論斷。其中，佔篇幅最廣的，就屬蔣中正與毛澤東二人，其次才是孫中山與道光，以及鄧小平。對於蔣，他貶多於褒，尤其是有關大陸撤守的部分（頁363起）；於毛，他褒多貶也多。特別是毛的發起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不啻是人對類有史以來最荒謬的事件之一，而名之爲「失落的十年」(Ten Lost Years)。

（頁318起）由於本身是美國人，且一生泰半光陰均鑽研中國近現代史，他對當年中國人物故事，理論上確應具有超然的地位與素養，來做客觀的評量。不過，就全書實際觀之，則似仍有著某些力有未逮之處，特別對目前仍多爭議，二十世紀中國的兩個巨型人物的描繪。蔣、毛二人的功過，在中國問題仍未解決的今天，雖然已經蓋棺，卻仍難以論定。因爲他們二人的影響力如今依然存在。如果把論斷時間定在1949年，則毛佔優勢。如果改至1976年，則在臺灣一地力圖既維護傳統，又大力推動現代化，且成功地帶動經濟起飛的蔣氏父子表現較佳。如果再延至1985年，繼毛之後逐漸崛起的鄧小平，確有某種突破。依費正清的說法，可比唐太宗、宋太宗、明永樂與清康熙（頁362）。再假使更將時間往後推移，則臺灣自1988年所興起後蔣經國時代的快速政治改革，亦將在中國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對於1949以後臺灣的演化，在本書之中，作者並未着墨。顯然，在他的視界裏，祇有中國大陸才是中國。因此，關於1949以來的中國大革命，他只敘論大陸上的那個部分。

整個而言，由於地位「超然」，認識獨到，以「革命」作核心概念，所完成的這部巨著，將使費正清因中國在未來的強大而留名，因爲它所述說的人物、事件或活動，均係這些人、事以及物的特寫部分。身爲一個中國

人，看一位終生研究中國的美國史學家歌詠（極少）及數落（極多）我們的人物、事件、制度（如他稱我國的科舉制度為「老鼠競賽」（rat race），頁16；又說我國政治制度，一百八十五年來變化不大，頁364，等等），可以從中學習很多、體會很多。畢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有費正清「中國大革命」一書作為我們歷史的一面鏡子，讓我們好好地看一看別人眼中的自己，不啻是最佳的借鑑，最佳的刺激。

□朱浚源·中研院近史所□

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王綱領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二三七頁。

長久以來，此地的人們一直在「中美傳統友誼」的神話下教育、成長。這種由政客捏造的說詞，罔顧歷史事實，迎合美國政策。每當這個神話一再受到考驗而破滅時，我們都不免自問：如何能夠從歷史中獲取教訓？遠如民國四十六年臺北市民劉自然被美國軍士槍殺、釣魚臺由美國直接轉交日本、斷交事件；近如強銷火雞肉來臺、脅迫簽訂不合理農業協定等等。這些事件，使我們在痛心之餘，興起追究歷史真相之念。如果我們不能從歷史事實中取得教訓，破除神話，重蹈覆轍在所難免。王綱領教授此書以學術研究的方法，引證有據，足以幫助我們解除此一神話的束縛。他的書雖非以國人觀點論述中美關係的開山之作，卻是研究1900-1920年之間美國對華政策一本詳盡、嚴謹的著作，相信本書可以奠定未來此類研究的基礎。

本書雖然以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為名，實際探討的時間範圍卻上及1900年。全書主旨在探討美國為保護其在華利益，所衍生出的對華政策。本書的主要論點為：任何與美國利益衝突者，美國都反對；任何與美國利益符合者，美國都支持，即使要犧牲中國也在所不惜。全文分為七章及兩篇附錄。第一章緒論略述中美關係的接觸及背景，其次陳述全書探討美國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解釋、維護、延伸及折衝的過程」。

第二章論辛亥革命時期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其中涉及美國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及塔虎脫（William H. Taft, 1909-1913）兩位總統的政策。1909年當俄國藉口拳亂佔據東北，拒不撤兵，且圖謀獨吞東北時，老羅斯福公然鼓舞日本對抗俄國。美國工商人士亦大量購買

日本公債，在實際行動上以財務支持日本。當日俄戰爭進行對日本有利時，老羅斯福又擔心日本戰勝後，亦將不利於美國在華利益，而在戰後談判中，安排不使日本獲利過多。這種兩面手法使日、俄均感厭惡。爲了獲得日本不威脅菲律賓的承諾，1908美又與日本簽訂協定，以東北利權滿足日本。

1909年塔虎脫希望以歐美資金共同經營東三省，卻引起日俄聯合對抗。辛亥革命期間，美國爲保護其在華利益，採取中立政策，一方面拒絕孫中山求見，另一方面也拒絕清廷地方官求助之請，只靜觀等待強勢的一方出現。當時，美海軍部曾有建議：佔領一處中國港口，以便爲美國爭取更大利益。民國建立以後，美國希望由國際合作控制及改造中國。本書強調：「在列強多方進行的權利割讓的角逐中，美國所追求的只是『幸分一杯羹』而已。」（頁26）

第三章論述美國與二十一條件之交涉。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企圖控制中國。美國所關懷的只是其在華利益，並希望以交換條件的方式與日本達成協議。如果日本同意維持商業機會均等、不公然佔領中國領土，則美國默許日本對山東及南滿的要求。直到美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多次向美政府反映，中國人民對二十一條的憤怒及抵制日貨現象，威爾遜總統才在惟恐此類交換條件爲中國人民獲知，而引起反美情緒的狀況下，乃決定採取堅定不承認的立場。著者在本章結論中評述：「美國對二十一條件的態度早在二十一條件提出之前已經顯出。美國的立場，永遠是以有否影響美國利益決定的。所謂的道德義務或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只是美國利益的附屬品，此兩者之提倡或存在的條件是：『不違反美國利益』，及不致陷美國於國際困難（即使是不損己而利人）的條件下始能存在。」（頁56）

第四章檢討美國在洪憲帝制運動的政策，美國的原則是「中國政體的改變，只要不違美國的利益，不引起強大有組織的反對，美國願意承認」。美國不論袁氏是否違反時代潮流的做法，只求中國平靜無變，使袁氏政府繼續掌權。芮恩施建議美國務院承認帝制，並協助袁氏在美購買飛機。1916年1月貴州繼雲南之後宣布獨立，反袁勢力增強。帝制被迫撤銷後，芮恩施又支持袁續任總統。美國這種做法，王綱領認爲不是「協助袁氏摧毀共和」，而是在向日本表示：「美國也是中國的監護人。」（頁85）不論帝制或共和任何一方勝利，都會繼續向美國請求財政援助，中國的門戶仍舊會維持開放，美國的立場及其利益則不會改變。

第五章討論美國對於中國參加歐戰的立場。歐戰發生後美國鼓勵中國在

其引導下對德宣戰，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並使中國脫離枷鎖，進一步可使日本在東亞的控制權減弱。爲達到此一目地，美國甚至承諾貸款中國，以爲報酬。結果由於未能獲得列強的支持，而告失敗。更由於日本外交策略的成功，美、日兩國反就中國事務在美國本土進行談判。美國政府在拙劣的外交技巧與不良的國際政治認識狀況下，於1917年11月2日簽下藍辛-石井協定（The Lansing-Ishii Agreement），承認日本在與中國接壤地區，有特殊之利權。美國這種犧牲中國的做法，目的在使日本感覺：美、日同在協約國的這一邊。瞭解美國這種損人利己的做法後，就不難理解爲何羅斯福與史達林會於1945年2月12日簽下雅爾達密約，出賣了中國以換取俄國參戰。

第六章檢討美國發起新國際銀行團以圖達到扶助、改造中國的目的。新國際銀行團是以英、法、美、日四國妥協的方式，替代過去列強競爭的局面。但是整個「組織交涉過程中始中未與中國政府直接商談，充分表示其對中國主權的忽視與改造中國之缺乏誠意。」（頁162）美國的構想也是藉此一組織，遏阻日本在華勢力的繼續擴張。新國際銀行團成立之後，四國發現列強在華權益錯綜複雜，難以解決，既「不能退出，只好求諸暫停」。新國際銀行團最後無疾而終。

第七章探究美國在巴黎和會中謀求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方案。美國威爾遜總統及其幕僚都希望1918年歐戰停止後的巴黎和會，能解決日本要求山東及設立國際聯盟的兩大問題。美國在會議中沒有列強的支持，放棄原定的原則而妥協。最後美國拒絕簽署和約，也沒有加入國際聯盟。本書對於威爾遜的悲劇論斷：「在中美外交關係上，爲中國事務傷透腦筋，開頭高談道德理想，口口聲聲要以彌賽亞的姿態拯救中國免受主權及領土的破壞，引起中國上下的期待；但等到發現中國事務太過複雜，則又不勝其煩地將此一燙手山芋交予英法或者日本，使中國遭受不必要而更嚴重的傷害。」（頁198-199）

王綱領教授的這本書是有關中美關係史研究的一本新著作。本書並非全面性的探討中美關係，而僅是重點式的選出幾個關鍵性問題，如辛亥革命，二十一條，洪憲帝制等，做爲探討的項目，重新詮釋美國的對華政策。其中最精彩的部份是每章的結論，往往都有簡潔有力的評論。如果每章的結論能匯集爲一總結論，放置於全書之末，則本書會更爲清晰、有力。

除了上述優點以外，本書也有部份內容有待改善，譬如像緒論中若能更明確的提出：全文主旨在探討美國爲保護其自身利益而發展出的對華種種政策，並在諸論中略爲發揮此一論點，可以使讀者在閱讀正文之前有所遵循，

而不必等讀完全書後才獲得此一印象。其次在本文中有部份引證稍嫌簡略，雖然已可看出脈絡，但仍有待進一步發揮。至於部份人名，如芮恩施等，多次出現在不同章節，似乎只需中英文同時出現一次，而不必每次不厭其煩的重覆出現。同一問題亦出現在各章節的註文中，前面章節已引註的書籍及檔案名稱，其後章節並未按縮寫的方式，反而重覆出現。前後的統一及協調，似可於再版中修正。至於出現於註釋中 *op. cit* 等的拉丁文，學術界目前已不再使用。

□胡國台·中研院近史所□

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劉維開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六一頁。

本書為作者就讀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時，所撰之碩士論文「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擴增而成。主旨在透過對民國十八年的國軍編遣會議之研究，以探討是年三月起一連串反抗中央的軍事行動之起源及其本質。全書共分五章，十三節，十九目，約二十萬言。

第一章，「編遣會議召開的背景」，共分兩節。指出編遣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裁減兵額。就中國言，裁兵問題的產生實有其歷史淵源及客觀環境之需要。而孫中山先生在民初提出的「化兵為工」等裁兵主張，經中國國民黨納入政綱後，更成為北伐以後國民政府實行裁兵計畫的主要依據。

第二章，「編遣會議召開的原因」，共分三節。作者認為：北伐結束後，中國形式上完成了統一，但是實質上則仍處於分裂割據之局面，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軍事不統一。編遣會議之召開，除了希望由軍事領袖的協商達成編遣軍隊之目的外，同時也希望透過軍隊編遣的過程，結束此種軍事不統一的現象，建立一強而有力的中央，使中國達成實質的統一。

第三章，「編遣會議的召開」，共分三節。分述編遣會議之醞釀與舉行經過。除詳記各次會議的重要決議內容外，並將這些決議依類分析、檢討其利弊。最後針對參與會議的幾位軍事集團領袖：蔣中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琛等，彼此的利害衝突加以論述，以見編遣會議進行過程之艱辛。

第四章，「編遣工作的實施」，共分四節。為貫徹民國十八年一月間召

開的編遣會議各項決議，國民政府除於會後積極成立各級編遣機關，執行各項編遣事宜外，復於十八年八月再召開編遣實施會議，具體規範了裁兵的細則及程序。同時更發動各地方人民團體，聯合組織裁兵協會，以監督並協助裁兵計畫之實行。然而由於自二月起，各地方軍事領袖的叛變即接踵而生，蔣、馮、閻、李之間的猜忌益深，致使兩次會議議決的各項裁兵方案根本無法實行，編遣工作終因戰爭的再起而完全停頓。

第五章，「編遣會議的影響」，共分兩節。編遣會議結束後，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集團即率先發動反抗中央之軍事行動，中央採取斷然處置，將叛軍一舉擊潰。此役顯示了中央的軍事實力，但也激起了其餘軍事集團的不安與懷疑；而國民黨內部的政爭適予以機會，乃發展出十九年春的全面叛亂行動，即所謂「中原大戰」。作者認為：這些連串的軍事叛變，原因雖十分複雜，但由當時軍事領袖來往函電內容來看，則確係由編遣會議而起。地方軍事領袖目的在維護個人的封建勢力，而編遣會議要求國家軍政之統一，因此造成了兩種勢力的衝突。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編遣會議本身，由於自始即遷就現實的緣故，乃不可避免的存有若干缺失，其中最嚴重的是忽略了對裁減後士兵的安置問題，此不僅使人懷疑政府主持裁兵的用心，也造成軍事領袖們不徹底實施裁兵的藉口。無疑的，編遣會議是促使反抗行動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國民政府能將這些反抗一一收平，自然增進了國民政府的統治地位，也完成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整合。

全書引用資料除已公開的戰史等相關著作外，復參考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庫藏之國軍編遣委員會的出版品，包括會議報告書、公報及法規彙編等。另引用國史館現藏「閻故資政遺存檔案」中十七年六月至十九年二月部分。此外尚直接徵引當時中外報刊雜誌及回憶文字三十餘種。由於同類專題的著作十分有限，故本書顯得有相當程度的開創價值，足以重視。

全書內容對編遣會議的召開及實施部分，敘述評析詳實而中肯，毫不保留的指出裁兵政策的缺失所在。惟對於各軍事領袖的心理狀態分析仍有不足。作者既認為編遣會議的實施及其影響，主要關鍵在於各軍事領袖的態度與決心，則應於此點多加闡釋引證，如此其關係才明確。拙見以為，各軍事領袖個人對裁軍政策的真意為何？甚至蔣中正個人貫徹此政策的動機何在？軍事領袖間的差異又如何？皆值得以更懷疑的研究精神去深入探討。而由此差異再逆溯諸軍事領袖之間的利害關係，會更有意義。另外對於編遣會議召

開的背景與原因部分，宜針對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的北伐所造成的主、客觀情勢，全面釋論即可，不必籠統的通論清末民初以來的各種兵害現象。就研究方法言，此將更符合全書題旨。

□蘇啟明·國史館助修□

民國時期的寧夏省（1929-1949）。胡平生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五二八頁。

以中國某一特定地區在某一特定時段內之發展情況，作為探討的主題，是中外歷史學者頗感興趣的研究取向之一。過去十餘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進行兩次「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集體研究計畫，就是依照行政區的劃分，來觀察各地在接受近代西力衝擊後，所表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遷。該項研究計畫第一次選擇的區域，是中國的沿江沿海省區或都市，第二次則包括了若干內陸省區。不過以國民政府時期的省區劃分來看，近史所的兩次現代化研究計畫尚不能完全包含內蒙古之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以及青海、西康、新疆、西藏等省區。事實上已有部分中外學者對這些省區進行過程度不同的研究，其中新疆省因地位特殊，相關之研究成果也較為豐碩。胡平生的這本近著，選擇了1929年至1949年的寧夏省作為研究主題，作者雖未說明是否依現代化的理論架構來處理此一題目，但綜觀全書，除缺少「西力衝擊」之探討外，其餘各章之安排，與近史所進行的現代化研究計畫極為類似。

一般而言，近代中國內陸省區的發展，原本就比沿江沿海地區要遲緩，不易觀察到較劇烈的變化。此外，內陸省區的相關史料甚難掌握，除非史料蒐集方面能有所突破，否則很難作謹嚴的研究。作者在「自序」中就明白表示，他之選擇「民國時期的寧夏」作為研究主題，主要是因為偶然發現一套由寧夏省政府編印，在民國三十二年出版，共計八冊的〔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以及葉祖灝在民國三十八年出版的〔寧夏的今昔〕一書。再以此為基礎，作者遍訪海內外圖書典藏機構，蒐羅了三百餘種直接和間接史料。因此作者撰寫本書的認真態度，不容懷疑。全書除「自序」和「結論」外，共分五章，分別探討寧夏省的歷史沿革與自然地理、軍事與政治、經濟建設、社會情態、教育發展。全書共三十餘萬言，主要論述這五個子題，故而每章的

內容至爲豐富，這是作者廣泛蒐集資料後，所展現的本書最大的長處。讀者可以透過本書，對北伐以後以至大陸淪陷前的寧夏省，有一詳盡的瞭解。

不過本書之史料蒐集及論題處理，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現分述如下：

第一：本書參考文獻多達三百餘種，但尚有一些重要資料，作者未加引用。如近史所前年購得之〔西京日報〕（民國二十三至三十四年）和〔西北文化日報〕（民國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三十二至三十七年），係於西安出刊，有關寧夏之報導甚多。作者曾參考〔西京日報〕民國三十三年八、九月份，其餘年份未提及，恐係這兩份報紙的微捲，近史所圖書館編目較遲，作者未能留意到。檔案方面，近史所檔案館近年陸續整理開放的經濟檔案，涉及寧夏省者有礦業、水利等案卷，應能提供更直接的經濟建設資料。另外作者所列之書目，並無英文參考資料，其實最有關係的一本英文著作，是美國密西根大學 John Themis Topping 在 1983年完成的博士論文“Chinese Muslim Militarist: Ma Hongkui in Ningxia, 1933-1949”，這本論文雖未正式出版，但此間取得不難。該論文所述時段與胡著大致相同，內容則各有所長，作者應可加以參考，甚至透過這本英文研究成果，激發更有價值的觀點，並發掘到更多有用的中外文資料。

第二：本書第二章題爲「軍事與政治」，不過作者顯然對軍事方面著墨較多，尤其對馬家軍系的形成，以及歷次戰役的經過情形，描述甚詳；政治發展的探討，倒不見有所發揮。雖然此一時期寧夏省的領導階層黨政軍不分，但是若從政治層面細加分析，或許可以深入瞭解馬鴻逵本人的施政理念，省、縣政府的組織與人事，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黨、政關係。

第三：本書除「自序」之前，附有一張簡略的「寧夏省全圖」，其餘各章節均未利用地圖來輔助文字敘述。研究區域歷史的發展，大量之文字反覆解說，有時反不如一張適切的地圖標示，予人深刻印象。本書幾乎探討了二十年來寧夏省的各方面發展，可以借用地圖說明之處甚多，如第二章敘述各項戰役，雙方交戰概況，第三章有關經濟建設的分布，第四章的人口分布，以及第五章的各級教育分布情形，均爲其中要者。因此作者能在文字解釋和地圖運用之間，作一適當的抉擇，最好能使其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將會更有助於讀者對於研究主題的瞭解。

總之，本書之史料運用及史事鋪陳均可顯現作者的功力，但書中對於重要問題之分析，似嫌不足；否則本書對現代史的研究，會有更大的貢獻。

□張力·中研院近史所□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鍛製「勝利」的鐵砧：東北的共產主義革命，1945-1948) By Steven L. Lev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抗戰勝利後不到四年時間，東北全面淪陷。關於這一段歷史，我們聽到很多憤怒的指責。指責史達林是新沙皇，阻撓國軍接收；指責馬歇爾天真上當，強迫國軍攻佔長春之後，停止乘勝追擊；指責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以勝利者姿態君臨東北，大發接收之財；也指責陳誠不知己不知彼，亂發六個月解決東北戰爭的狂言，而裁軍措施使東北幾十萬「偽軍偽警」紛紛投靠共軍。可惜憤怒聲中，到今天為止，我們仍沒有一本冷靜客觀、翔實可靠的歷史。在中國大陸淪陷後不久，美國發生「失去中國」的論爭，也是充滿情緒和指責；但是他們畢竟有良好的學術環境，瞭解研究和反省的重要；Steven Levine 這本書就代表這種研究和反省的精神，為東北的淪陷作了精闢而簡明的分析，使我們瞭解中共在東北的勝利並非歷史不可抗拒的潮流；國軍在東北覆亡，政府主事諸人固然難辭其咎，東西方冷戰中的美蘇外交政策也不脫關係，然而最重要的原因仍是中共方面的主觀努力。

一九七八年，美國學者 Susan Pepper 出版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一書，對研究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史，頗有開創之功；可惜的是該書研究國共內戰，完全從政治角度出發，對軍事問題不置一辭。另外，在分析國共內戰時，由於白皮書的影響，認為國軍失敗、共軍獲勝，根本是雙方自己的事，國際政治毫不重要。這是兩個缺憾。Steven Levine 則加以彌補，一方面強調國共內戰根本就是武裝鬭爭，分析問題必須從武裝鬭爭這個角度著眼，另一方面也強調東西方冷戰對國共內戰的影響，堅持應把美蘇外交放在分析問題的架構之內。Levine 能如此兼顧軍事和外交兩層面，從本書寫作開始的年月看，應當和 Susan Pepper 的前車可鑒無關；但無論如何，凡是她曾為人非議的地方，他都加以避免了。

片崗鐵哉對本書的影響，則是作者所明白承認的。片崗在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一書中反駁七十年代流行一時的說法，即人民戰爭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是中共在國共內戰中賴以得勝的法寶。他反駁的根據是抗戰時期的所

謂第二次國共合作。作者則根據東北內戰的史料，肯定片崗的看法。除證實分化和中立城市是中共擊敗國軍策略的重要一環之外，更進一步指出：中共根本是暫時寄寓鄉村的城市革命組織，靠農民滋養身體，無論是就意識型態或認同對象來說，中共都是百分之百的城市產物，所以蘇軍尚未進入東北，就已積極為返回城市而努力了。蘇軍進入東北之後，更拼命取得當地城市的控制權。後來雖然在國軍壓力之下，不得已而放棄了瀋陽和長春等大城市；卻始終盤據哈爾濱、牡丹江、佳木斯、齊齊哈爾等大小城市。作者認為，如果沒有哈爾濱這些城市提供人才、資源和其他幫助，中共單憑土地革命打敗國軍，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作者雖然強調城市對中共勝利的重要，但本書的具體分析著重武裝鬭爭、美蘇冷戰和城鄉戰爭資源的動員等三個子題。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中國的政治衝突——內戰的根源」，在這一章中，作者認為抗戰結束前，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非常失敗，日本人儘管不得民心，卻有力的扼止了國共兩黨在東北的活動和發展，所以抗戰勝利前後，東北的國共鬭爭可以說是全新的發展。這場國共鬭爭基本上是關內國共鬭爭的延長。由於兩黨都瞭解東北是決定國共內戰勝負的關鍵，所以均傾全力加以爭奪。當時東北是在蘇軍控制之下，中共派人馬前往，有地利之便。國軍精銳遠在西南邊陲，則須仰賴美國空軍協助。因此東北的國共內戰，一開始就和當時已逐漸形成東西方冷戰聯為一體。在這部份討論中，作者指出：蘇聯由於不相信中共能在內戰中能夠獲勝，所以採取兩面外交，一方面協助中共擴展，另一方面也不放棄拉攏國民政府。相形之下，美國則放棄了一九四四年以來兩面外交的作法，一方面派海軍陸戰隊佔領天津等華北海港，另一方面則以空軍協助國軍進入東北，完全不考慮爭取中共的友誼。

第二章「美蘇兩國在東北的競爭和冷戰」，討論美蘇對東北問題的政策，批評美國既然因為重歐輕亞政策等原因，無意為東北問題而和蘇俄兵戎相見，就不應該在調停國共內戰同時，透過空運國軍等方式明顯偏袒國民政府；在另一方面，作者證實蘇聯的協助是共軍在東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也強調這不是決定性因素，因為若非中共有一套動員東北資源的辦法，則蘇俄的援助，也不一定能保證中共在東北獲得全面勝利。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瞭解美蘇雙方的對華政策：馬歇爾並不是因為同情中共而壓迫國軍停戰，他壓迫國軍停戰是因為對美國式民主有盲目的信仰，希望透過國共成立「聯合政府」之舉，轉變中共，並切斷中共和俄共之間的意識型態臍帶；

史達林則固然幫助中共，卻決不致於爲了中共的「革命」利益而犧牲蘇聯國家利益，所以在中國所採取的不是「一面倒」的政策，雖幫忙中共，卻不忘同時和美國以及國民政府打交道。作者最後指出，儘管美蘇外交對國共東北內戰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但東北的命運最後還是操諸國共兩黨之手。

第三章「建立共黨在東北的權力結構」，討論抗戰結束前後，國共兩黨如何爭奪東北。作者的重點是敘述中共如何在東北立定腳跟。在敘述中，他強調三點：第一、無論從人事配備或軍隊動用的數量來說，中共都比國民政府重視東北。不但派十幾萬軍隊進入東北，並且在接收蘇聯提供的武器同時，大量收編偽軍偽警。此外，更起用東北籍人士，全力爭取地方民心，最後更經由土地革命和其他工商業政策，發展出一套利用東北人力、物力、財力的有效辦法。相形之下，國民政府自恃軍事實力強大，完全不懂東北人爭取東北民心之重要，最後因爲糧餉、武器均須依賴關內，而關內力有不逮，終於在東北一敗塗地。第二、中共初到東北之時，也曾因爲農村動員是一條曠日持久的辦法，數度集中軍力佔領大城市，後來由於蘇軍拒絕合作，美國主張成立聯合政府，而國軍又攻勢凌厲，遂退出遼寧地區的大城市，將大部份實力用於農村的土地革命。在這裏作者強調，農村的土地革命是由哈爾濱等大城市協調的，而農村土地革命的幹部主要來自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第三、中共成立聯合政府的地方政權，名爲民主，其實是中共所一手控制，對不明究理的知識分子和國際人士，有相當的吸引力；然而這些地方政權並非一開始就是鞏固的，土地革命是鞏固這些地方政權的主要措施，武裝鬭爭的不斷勝利更是個中關鍵。

第四章「東北的革命戰爭」，主要是簡明地敘述東北的內戰經過，比較兩軍在軍民關係和後勤補給各方面的優劣，結論是國軍沒有整體戰的思想，不能在東北發展出一套動員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辦法。所以儘管在最初兩年，國軍佔盡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優勢，中共卻因爲有一套鞏固後方城市和鄉村的辦法，就地徵發，而轉危爲安，最後更全殲國軍。在這一章中，Levine 強調中共革命（城市和鄉村）和武裝鬭爭相輔相成的關係。也提到一九四六年四平街戰役後的停戰協定，認爲國軍不乘勝追擊，美國壓力固然是重要考慮，但國軍的補給線早已過長，而松花江以北的東北，從晚清以來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國民政府也不得不對蘇聯的反應有所顧忌。換言之，如果仍然把馬歇爾調停看成是國軍失敗的主要關鍵，那未免太高估了當時國軍的實力了。

第五章「內戰的政治經濟」，強調東北的內戰是傳統性的戰爭，國共雙方都需要工商農業作為後盾。國民政府據有松花江以南的東北，但無法利用此地原有的工商業基礎。中共則竭盡全力恢復佔領區的工商業，儘管面臨了許多困難，卻多少已能滿足前線和城市的需要。在這一章中，作者不再強調共產革命和軍事鬥爭相輔相成的關係，他反而強調兩者之間的矛盾，指出無論在城市中進行激烈的工人運動，或在農村中進行狂瀾的土地革命，都對中共恢復北滿的工商業有不利影響；中共必須在發動城市工人之後，迅速扼止激烈的工運，更必須在發動農民起來清算鬭爭和重分土地之後，迅速強調說服「羣眾」自我節制，並緊跟著推行大生產運動，克服農業減產的危機，及時有效的支援中共前方。

第六章「東北農村的革命」，則解釋中共何以能有有效的動員東北當地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作者在此一章中強調土地革命的作用，認為土地革命並非東北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潮流，它根本是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而製造出來的。設非中共軍隊和政權壓陣，東北農村的「變亂」頂多祇是地方性的個別現象，不可能有燎原之勢，遑論發展成土地革命了。從生產觀點來看，土地革命雖曾起了一些反效果，但大多數農民因之而效忠中共，中共也因之而取得內戰勝利的保證。不過因此而推論，中共的勝利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成者王，敗者寇」的邏輯，沒有事實根據。在這一章中，作者一方面突出了土地革命的奪權本質，另一方面也很清楚的說明了土地革命過程中赤色恐怖的來源，赤色恐怖乃中共有意鼓動出來的，其目的在徹底摧毀鄉村中既有的權力結構。最後作者試圖對中共所以能夠動員廣大農民提出解釋，他從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交換理論出發，承認根本原因是中共在動員農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也經由土地革命照顧大多數貧苦農民的切身利益，但強調交換過程中，中共一直據主導地位，所謂農民的自由選擇其實離不開權力脈絡，經常不得不爾，而且交換理論描寫的土地革命過程過分抽象，沒有歷史的具體感。

從以上的簡短介紹中，我們可以一窺 Levine 此書的主要內容。雖然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理論，但非常平實，從軍事、外交、政治、經濟各種角度來分析問題，實在是一本上好的東北國共內戰史。就史料來說，作者能在英文資料之外運用俄文資料，並仔細考慮俄國的觀點，這是本書一大優點。否則，總難免予人是美國學者一偏之見的感覺。至於作者使用的中文資料，除國民政府當事人（熊式輝、張嘉璈、董彥平、蔣經國等）的日記、回憶錄

和其他材料之外，主要是中共的公開刊物，譬如東北日報，對有閱讀中共黨內書刊經驗的讀者而言，這似乎是一憾事。但在產生這種感覺的同時，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眼光之銳利，因為閱讀公開刊物，而不為中共的政治宣傳所惑，抓住問題核心，作相當鞭辟入裏的分析，畢竟並非易事。尤其依賴公開刊物，並非作者本人蒐集資料不勤，而是實逼處此。在此，我也要特別提一下在八二三金門砲戰中殉職的趙家驥將軍，他曾參與東北戰事，極可能是從整體戰的觀點來分析東北內戰的第一位國人，至少他對東北內戰的檢討，甚為作者所稱道。

當然卒讀本書，評者也發現少許可以商榷的地方。譬如作者根據中共領袖所發表的一些公開言論，認定在國共和談過程中，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主和派，彭真和林彪是主戰派。這似乎是低估了中共內部的配合能力了。如果作者看過劉少奇寫的「論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也看過毛澤東論「打打拉拉，拉拉打打」策略的指示，恐怕就不會如此輕易的就作出以上論斷了（作者祇在註中說明有此懷疑）。又譬如作者根據 Richard Little 對「干涉」和「非干涉」兩詞的特殊定義，認定國共內戰時期的美國外交策是干涉的，而蘇聯外交政策是非干涉的，儘管美國曾一再壓迫國民政府停戰，而蘇聯也不斷在武器和其他各方面協助中共。Little 對干涉和非干涉兩字的定義，艱澀難解，作者卻分別用來概括當時美蘇兩國的外交政策，以前者指美國調停國共內戰，卻拒絕承認中共為外交實體，並明顯偏袒國府，以後者指蘇共拒作調人，表面上以國府為利權交涉對象，實際則不斷幫助中共，作者為何捨干涉和非干涉兩字的一般字典定義不用，而另外標新立異，引進 Little 對這兩個詞的奇怪定義，的確費解。或許作者是反越戰運動中成長的學者，也不免受當時新左派美國外交史學者的影響，認為批評美國外交政策中不顧國力在全球到處反共的作風，有其必要。也可能基於反越戰的同一理由，在美國學界幾乎一致認為馬歇爾調停乃一失敗之舉後，作者卻偏要持相反論調，堅稱是一次成功的使命，理由是：馬歇爾之調停並未把美國帶入另一場世界大戰。作者忘記，在杜魯門和其他美國政要的眼中，中國大陸並不值得美國拼命犧牲，縱使換其他人來出使中國，中國大陸也不可能成為美蘇兩強一決勝負的戰場。

上述批評祇是商榷而已，並不影響作者這本書是好書這一事實。作者並未因為史料欠缺，而閉門造車，靠理論和想像來補足史實，反而從有限的資料看出一般人看不出的問題，值得欽佩。另一方面，作者也能實事求是的繼

承新左派對美國外交史的批判和反省精神，更要令我們慚愧。我們學術界的反省精神不够，以致在距離國共內戰將近四十年的今天，我們仍須仰賴美國學者來瞭解爲什麼失去東北，爲什麼失去大陸。

□陳永發·中研院近史所□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向山寛夫著。東京，日本中央經濟研究所，昭和六十二年（1987）七月，一六四五頁。

有關日據時期的臺灣抗日民族運動史，在六〇年代以前，尙少有人研究（若有也較偏重武抗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史料的不足。何以會有缺乏資料的現象呢？就統治者而言，對被統治者的民族運動總是有意的加以疏忽，如臺灣總督府雖有各種浩瀚的統計資料，但有關民族運動（尤其七七事變到日本戰敗這段時期）、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的統計資料則付諸闕如；就被統治的臺灣民眾來說，由於戰後採取戒嚴體制及若干的忌諱，在談到日據時期的政治運動時，對臺灣共產黨、勞農運動及無政府主義則諱莫如深（如葉榮鐘著〔臺灣社會運動史〕）。本書作者在那樣的時代中克服了資料不足的挑戰，完成了這部鉅著，其毅力著實令人敬佩。

作者向山寛夫中小學時代在臺灣度過，因此對臺灣歷史發生了興趣，戰後鑒於日本學者有關臺灣史的經典之作大半是經濟取向的研究，而研究政治方面的篇章不是只鑽研某一階段就是不談民族運動，於是下定決心於1948年起開始研究，並於1961年脫稿。論文完成後，得到了九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本論文雖完成於1961年，但因1.作者轉而專注於法學方面的領域；2.尙未參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中卷〕及〔臺灣社會運動史〕兩書，不敢貿然地出版。當作者見到上述兩書，並加以增補修改後，在論文初稿完成二十五年後才予以出版。

然而在這二十五年中，在臺灣的學者如黃秀政〔『臺灣民報』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在日本的學者如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黃昭堂〔臺灣民主國の研究〕、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

と彈壓] 等人都對這個相關的問題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雖然不如本書全面而詳細，但對問題之分析、解釋和判斷，卻遠在本書之上。如果本書能在1961年左右出版，也許評價會更高。（既然在1987年出版，就只能以八十年代的學術水準來評價）

二

本書除了緒言外，共分八章，茲介紹如下：

(一)第一章「序說」：主要包括日據前的臺灣歷史，及日本未占臺灣前本國之歷史發展，以這兩個背景來說明日本領有臺灣之原因。

(二)第二章「日本占領臺灣及臺灣人的抗戰」：由臺灣民主國成立，臺灣武官總督統治的確立及北中南部不絕如縷的抗日運動，一直到第四代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聯合體制下，才大致壓服了這一階段的抗日行動。

(三)第三章「臺灣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及民族運動」：日本確立了對臺灣殖民政策後，爲了加速臺灣的資本主義化，而採行種種措施。這些措施完全以日本爲重心，忽視了臺灣原有的產業結構，也剝奪了臺灣民眾的經濟權益，尤其是對臺人採行差別待遇，普遍引起不滿，使得抗日運動又逐漸展開。這些運動最後都被彈壓了，在治安回復的基礎上，臺灣的經濟有了長足的進展。

(四)第四章「小資產階級運動的抬頭及發展」：談及林獻堂等社會領導階層在梁啟超的啟發下，以實行臺灣自治、成立臺灣議會、撤廢六三法等爲訴求項目的民族運動。類似活動以在東京留日學生團中的啟發會開始，隨後臺灣島內也陸續展開，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五)第五章「無產階級民族運動的抬頭及發展」：除了小資產階級領導或參與之抗日運動外，一般勞農大眾的民族運動也陸續展開。本章旨在說明東京臺灣留學生的左傾現象；臺灣的勞工運動，臺灣工友聯盟的逐步發展，臺共的組成，上海、南京、廈門、廣東、東京等地臺灣民眾的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霧社事件的發生經過則放在本章最後一節。

(六)第六章「戰爭期間的統治及民族運動」：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爲戰爭前期，七七事變到日本投降爲後期，本章論述日本在實行戰時體制下，一再鼓吹皇民化，內臺一體，取消部分差別待遇來爭取臺民的向心。但也因臺民的民族意識仍存，澈底同化不易，日本政府對臺民仍百般猜忌，冤獄不斷發生。

(七)第七章「日本統治的結束」：本章並不以日本戰敗為終結，而是論到光復後的接收，藉以說明二二八事變的原因。據作者的看法，該事件發生的原因，實際上是因為臺胞受到差別待遇，而且戰後所受壓制和榨取還在日據統治之上。

(八)第八章「總括——日本的臺灣統治及臺灣人的抗日民族運動的評價」。本章著重在分析日本殖民統治成功的原因及臺灣在脫離日本統治後，無法達成獨立的最終目標的原因。

三

(一)本書以一千三百多頁的正文來描述日據五十年間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工程浩大，所引用的書，所參考的資料也相當豐富。不過，卻有些重要的資料遺漏了。黃昭堂曾在「向山寬夫著〔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民族運動〕」^①一文中指出，作者未曾引用丘念臺〔嶺海微塵〕、臺灣革命同盟會〔臺灣問題言論集〕等第一手史料。其次雖列舉了許世楷、涂照彥、若林正丈、淺田喬二等著作，但似乎未充分參考。筆者不僅同意上述看法，而且認為，本文在掌握資料時，並未「考證」史實的信憑性，如臺灣日日新報、警察沿革誌完全是官方的報告，是否盡屬可用；其次臺灣人關係文件^②中有昭和初期到一、二八事變之間臺灣民眾在大陸上海、汕頭、福州、廈門等地展開的民族運動，各地領事將有關資料對外務大臣所做的報告，如能比對參考，會更翔實。第三、民族運動中，文學應當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本書並未深入多加討論。

(二)本書以對事件的描述鉅細靡遺見長（每一次彈壓抗日運動，日人派多少人、喪亡多少、用那種砲彈，幾乎都有記載）；對每一件事，不僅面面俱到，而且比重差別不大，如此一來反倒分不清孰重孰輕，而且有這麼豐富的資料做背景理當更重分析探討，然而這一部分稍感不足。如當時臺人由抗日→要求自治→爭取獨立→回歸祖國這一系列的思想變化莫不受到時空及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作者將之分散在各章各節中，沒有勾勒出全貌，專題探討，至為可惜。

(三)本書的總括一章，是全書中的精華，作者認為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是成功的，且其成果就是臺灣近代化，至少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不論在經濟上、文化上都有顯著的提高。他分析造成殖民地統治成功的原因是：1. 臺

灣是一個被隔絕於外界的島，和祖國的關係被隔絕，管理也容易。2.臺灣在清代原只是中國的國內殖民地，國家權力尚未滲透，因此住民一般缺乏國家觀念，對政治也不關心。3.日本的統治政策既柔軟又得當，^③如鴉片政策的執行，准許臺灣民眾黨成立等，有其彈性的一面。4.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開發，使民族問題在某些程度上轉化為富的分配問題，而稍戢止民族的氣勢，並促使穩健化。5.文化提高，且推進同化政策。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促使臺灣近代化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正如高柏林所謂，日本提高臺灣經濟的發展水平，只是殖民政策的副產品罷了。^④又如劉進慶所言：「戰前日帝統治時期經濟開發的長足進步，也是人們所默認的。就是由於它的特性是完全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殖民地經濟，才對此期之經濟增長不能正面地以及全面地加以評價」^⑤保留臺灣人民本身的政治經濟上的立場，這是極為正確而重要的看法。因此統治臺灣的是否成功，不能完全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也要考慮被統治、被殖民者的立場，才不偏頗。就臺人來看，日人的統治可以說是既陰狠又毒辣，是「糖與鞭」的政策，不能謂之柔軟而適切。

(四)本書的附錄相當有分量，包括三部分：1.文獻(十二頁) 2.年表(二〇三頁) 3.索引(九二頁)。文獻和索引雖都分門別類，但是書和索引的分門別類，反倒翻查不易，寧可按筆劃順序或日文的五十音順序排列較合乎慣例。其次就年表部分而言，委實是作者的力作，比目前所能看到的如原房助的〔臺灣大事年表〕、〔臺灣省通志稿大事記〕、楊碧川的〔臺灣史事年表〕等人所編的來得充實，尤其有關數字方面的仔細，更令人歎為觀止。誠如黃昭堂先生所言，實可單獨出書，不過若能加上社會、文學等方面的資料再付梓，將更為詳瞻。

- ① 黃昭堂，「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民族運動〕」，アジヤ研究(中央經濟研究所)，卷351期，昭和63年10月，此文由黃英哲先生告知，並影印給筆者，在此特致謝意！(此文之譯文曾在〔民進報〕刊登)
- ②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臺灣人關係雜件，A 5, 3, 0, 3. 自昭和2年～昭和17年。
- ③ 在分析臺灣人戰後獨立未能成功時，也將之歸因於——日本統治政策既柔軟又適切。(日本が強大であり、統治のための施策も概して柔軟、適切であつた)。
- ④ 高柏林，「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收入薛光前編，〔近代的臺灣〕(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6年)，頁256。
- ⑤ 劉進慶，「臺灣經濟成長的商榷」，收入〔臺灣研究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編，一九八八年)，頁293。

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1845年——1987年：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二十五週年特集。譚汝謙編。香港，日本文化學會，1988年4月出版，中英日三種語文合集，有圖表，519頁，非賣品（英文書題 *Hong Kong and Japan: Grow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s, 1845-1987—A Special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Hong Kong*）

眾所周知，香港為英國殖民地，已有百多年的歷史。在英國長期統治香港期間，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香港無一不受英國的影響，舉凡政府政策的制定，甚至公務員用的文房用品，大皆來自英國。有人批評香港患了嚴重的「親英病」，只着重與英國的交往，而忽略與其他地區國家的關係，香港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的關係之不受重視，便是顯例。其實，香港和日本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自十九世紀香港開埠初期，香港居民羅森（向喬）於1854年隨美國柏利（M. C. Perry）艦隊赴日簽訂美日商約，協助打開日本鎖國之門，並將所見所聞寫成《日本日記》，成為近代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日本見聞錄，可是這樣重要的歷史事實卻鮮為世人所知。

香港人注視與日本的關係，只是近十數年的事。香港每年對日貿易的巨額逆差、日本遊客大批湧港、日本百貨公司如雨後春筍般開設、日本投資急劇增加等現象，現已成為注視的焦點。在香港政府督促下，已經成立「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1979年），多任港督（包括麥理浩、尤德、衛奕信）親自率團赴日訪問。只着重經濟而忽略文化關係，向來是港人的通病。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為慶祝該會成立二十五週年，特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譚汝謙博士蒐集豐富的論文和資料，編成《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一八四五——一九八七》一書，已於1988年4月出版。本書針對上述弊端，既重視經濟關係，又着重文化交往，同時從歷史角度出發，檢討過去百多年的港日關係，提出實質的建議，展望兩地未來關係的發展，香港掌故專家魯金先生評本書為「研究港日關係史不可不備的參考書」^①，誠不為過。

本書分四大部分，分別為：(1)香港日本文化協會成立二十五週年誌慶的賀辭（頁3-46）；(2)該會的歷史、組織和現狀（頁47-100）；(3)港日關係：戰前（1845-1945）部分（頁103-167）；(4)港日關係：戰後（1945-1987）部分，下細分：a. 總論，b. 經濟關係，c. 人的交流，d. 文化交流，e. 香港日本研究、語言教育現況，f. 中外人士對港日關係的體驗和感懷（頁167-515）。

全書共計五百一十九頁，共收中、英、日三種語文撰寫的學術論文和資料八十六篇，內容豐富，規模龐大，成為探討港日關係的空前鉅著。

論文作者不乏國際知名學者，其中包括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饒宗頤、經濟系教授林聰標、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譚汝謙、香港大學日文系高級講師原武道、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亞細亞大學校長衛藤藩吉、慶應大學法學教授二瓶恭光，和創價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陳荆和等。至於所收資料，部分雖為舊文轉載，大皆屬流傳數量少而又甚具史料價值者。例如1942年日本東亞研究所根據官方文獻和實地調查而編印《日本對香港的投資——日系經濟、文化概觀（1870年代至1939年）》，原屬「極秘」內部資料，對當時日系集團在本港的經濟和文化活動，詳盡報告；又如羅森的《日本日記》，原載1854年11月號、12月號和1855年1月號的《遐爾月刊》（香港英華書院發行），羅氏為第一位和日本官方接觸的香港人，而《日本日記》也為近代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日本見聞錄；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本書轉載了日本岩倉使節團隨員久米邦武編《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香港及上海之記》，該文原刊於1878年（明治11年），記錄使團在歐美回程歸國時，遊歷香港及上海的詳情；同時值得重視的是重刊1957年6月日本亞細亞大學中國留學生部學友會印行的《來日三年》特刊，該刊為日本戰後首批外國留學生（全是香港學生）所編印，藉此可了解當時留日實況，內有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及文部大臣灘尾弘吉等人的祝辭，和何應欽、張維翰、錢穆、唐君毅等知名人士的題字，充分反映了香港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特殊地位。以上重刊資料都是珍貴的史料。

綜觀百多年來的港日關係，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1)建立友誼（1845-1941）；(2)戰時緊張（1941-1945）；(3)戰後恢復關係（1945-1964）；(4)「日本風」盛行（1964—現在）。由於香港和日本有著不同的歷史、相異的國情，往往成為影響兩地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例如日本於開埠初期，為求早日達到現代化，實行超英趕美目標，香港便曾作出重要的貢獻。例如，香港居民羅森協助美國柏利艦隊赴日簽訂日美商約，打開日本鎖國之門；大批香港麵包師傅、理髮師、洋裁等受聘日本，協助實現城市現代化計畫；岩倉使節團等日本代表團訪港，學習揉合東西方的香港獨特文化；日本購入香港造幣廠二手的機器，促進其近代金融體制的奠立。以上種種，皆適在日本急劇現代化過程中產生，而兩地的關係，亦於此段時期建立。1930至1940年代，隨著日

本軍國主義當道，日本向亞洲發動史無前例的侵略戰爭，使港日關係一度陷入低潮，而兩地正常的交往和平等關係亦因此而斷絕。又如80年代的今天，香港和日本在戰後經濟的急速成長，使兩地經濟往來日趨密切；由於港日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日本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亦比以前增強，使港人逐漸意識到港日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扭轉了過去港日關係不被重視的局面。本書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供讀者了解兩地的關係。

本書論述的港日關係，主要分為兩大時期：戰前（1845-1937）和戰後（1945-1987），卻忽略了戰時（1937-1945）部分，這可謂本書美中不足的地方。我們知道在過去香港和日本的交往中，曾經有一段極不愉快的日子，尤其是日本侵佔香港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對日本軍國主義侵佔香港三年八個月，除編者譚汝謙博士的「編後語」略有提及之外，本書並無專文探討這段慘痛的歷史，實有欠全面。據悉，編者現已成立專題研究小組，進行全面探討香港在日本軍統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我們期待譚博士的研究能補足這方面的空白。

註①魯金〈第一位和日本官方接觸的香港人羅向喬〉，1988年7月26日《明報》，頁52。

□李培德·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研究生□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一至六期學人簡介

（括弧內為作者）

- 第一期：**郭廷以（呂實強·張瑞德），C. Martin Wilbur（張玉法·張朋園），吳相湘（陶英惠）
- 第二期：**全漢昇（李木妙），沈雲龍（陳三井），市古宙三（林明德）
- 第三期：**梁嘉彬（王樹槐），衛藤瀋吉（張啟雄），Otto Franke（Ursula Richter）
- 第四期：**John King Fairbank（郝延平），Joseph R. Levenson（沈松僑），李定一（張力），伊原澤周（張存武），Sow-Theng Leong（Tim Wright）
- 第五期：**蕭公權（黃俊傑），鄭學稼（周玉山）
- 第六期：**鄧嗣禹（黃培），Frederic Wakeman, Jr.（葉文心），Karl August Wittfogel（Ursula Richter）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88-1989)

一、博士論文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民國)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臺灣大學	七十七年二月	賴惠敏	明清浙西士紳家族之研究	劉 翠 溶 徐 泓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七月	鄭亦芳	中國電氣事業之發展(1882-1949)	王 樹 槐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七月	戴寶村	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	林 明 德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七月	金貞和	近代中韓反傳統思想之比較研究(1894-1924)	張 玉 法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七月	李 鉉	清代實學思想對韓國之影響	王 家 儉
師範大學	七十八年一月	金澤中	明清之際在野知識分子的歷史意識——以談遷《國權》為中心——	王 家 儉
文化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安嘉芳	政治都市的發展——抗戰前的南京(1927-1937)	程 光 裕

二、碩士論文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民國)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馬文英	近代江蘇租佃制度與環境的關係	王 樹 槐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孟祥翰	清季及日據時期臺灣東部發展之研究	李 國 祁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黃綉媛	民初廢督裁兵運動(1916-1925)	張 玉 法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楊慧媛	民國四川團練之研究(1912-1937)	呂 實 強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陳雲卿	中國青年黨的創建與初期發展	沈 雪 龍 張 玉 法

師範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劉湘王	唐君毅思想形成之研究(1905-1951)	李國禛
師範大學	七十八年一月	周志宇	近代中國的軍事改革(1860-1900) ——以淮軍為中心的探討	李國禛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易正義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研究	蔣永敬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賴理生	徐復觀思想之研究	尉天驄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徐安琨	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	莊吉發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林宸生	抗戰時期中共的文藝政策	王聿均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侯坤宏	抗戰時期糧食供求問題之研究	王樹槐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劉文賓	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 (1935-1948)	劉翠溶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林偉盛	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	林能士 張炎憲
政治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林建發	近代中國東北社會中的鬍匪 (1860-1930)	趙中孚
東海大學	七十七年六月	鄭淑敏	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	尹章義 張勝彥
東海大學	七十八年一月	蔡明坤	臺灣省議會教育決議案之研究	古鴻廷
東海大學	七十八年一月	呂小燕	中國小學現代化之問題與研究—— 以江蘇省為例——(1902-1936)	胡昌智
東海大學	七十八年二月	江淑文	清末民初小學教師專業化之研究 (1903-1927)	蘇雲峰
文化大學	七十七年一月	錢月蓮	蔣夢麟與臺灣農村之復興	王綱領
文化大學	七十八年一月	陳政吉	華盛頓會議後至北伐前英國對南方政府之態度(1921-1926)	王綱領

國內東亞、大陸問題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 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1970-1987)

• 賴瑞貞輯* •

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博士班

畢業年月(民國)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七十四年十一月	蔡國裕	中國社會主義論戰之研究(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	陶希聖 周應龍
七十五年十一月	吳安家	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研究(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林一新
七十六年五月	吉基祥	毛澤東軍事思想之研究	蔣緯國
七十六年七月	施哲雄	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	曹伯一

(二)碩士班

畢業年月(民國)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五十九年七月	施達郎	一八九〇年中英關於藏印間哲孟雄界務之交涉	歐陽無畏
五十九年七月	余義章	七七事變前後中共策略路線之研究	陶希聖
五十九年七月	侯家國	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及其施政之研究	劉岫青
六十年七月	區錫坤	遵義會議之研究	郭乾輝
六十一年五月	施哲雄	中共游擊戰爭之研究	沈之岳
六十一年五月	黃公弼	立三路線之研究(一九二八~一九三一)	郭乾輝
六十一年六月	陳朝陽	中韓延吉界務之交涉(一八八二~一九〇九)	李毓澍
六十二年一月	周偉伶	中共在農村建立根據地策略之研究(一九二七~一九三四)	郭華倫
六十二年六月	沈銘鐘	王明路線之研究(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中共國際路線之研究)	陳建中
六十二年五月	吳安家	中共延安時期整風運動之研究	郭乾輝
六十二年六月	蔡國裕	瞿秋白政治思想之研究	王健民
六十二年六月	吳鎮龍	毛澤東軍事思想之研究	陳森文
六十二年十二月	王松憲	日共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一九四〇~一九七二)	沈覲鼎
六十三年六月	毛鑄倫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坐大原因之研究	曹伯一
六十三年六月	陳蜀光	抗戰期間美國對華政策之研究(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杭立武
六十三年六月	賴瑞卿	陳獨秀對中國革命意見之研究	陶希聖
六十四年一月	趙卜成	中共在江西蘇區的赤少隊運動(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王昇
六十四年六月	徐新生	「一二九運動」與「民先隊」——中共利用學生運動之個案研究	李煥

六十四年六月	馬 勵	王實味事件之研究	鄭 學 稼
六十四年六月	黃 松 義	中共職工運動之研究	陸 京 士
六十四年六月	徐 恩 奎	中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教育 (一九三五~一九三七)	郭 華 倫
六十四年六月	周 玉 山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研究	胡 秋 原
六十四年六月	蔡 明 裕	張國燾與中共	郭 乾 輝
六十四年六月	黃 源 德	新四軍的發展與皖南事變	李 天 民
六十五年六月	劉 柏 登	中共建立時期的社會與文化背景 (一九一一~一九二一年)	沈 雲 龍
六十六年六月	閔 燮	抗戰期間中共青運工作之實質 (一九三七~ 一九四九)	施 啟 揚
六十七年五月	王 福 羣	中共早期特務工作之研究 (一九二八~一九 三四)	陳 森 文
六十七年六月	申 宇 均	中共黨的建設理論之研究 (一大至七大)	郭 華 倫
六十七年六月	唐 國 英	周恩來與中共政權之建立	郭 華 倫
六十七年六月	黃 季 寬	陳獨秀思想轉變之初探	沈 雲 龍
六十八年六月	周 謀 添	抗戰勝利後中共的青年學生運動——一九四 五~一九四九	宋 時 選
六十九年六月	郭 武 平	新青年雜誌與民初中國意識轉變	曹 伯 一
六十九年六月	克 思 明	論中共之農民運動與土地政策 (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	郭 華 倫
六十九年六月	韓 劍 華	西山會議之研究	曹 伯 一
七十二年六月	鄭 戴 一	毛澤東與國際派鬭爭之研究	郭 華 倫

二、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年月 (民國)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六十四年七月	謝 鎮 藩	中共黨羣關係之研究	項 迺 光 陳 澤 民
六十四年六月	楊 開 煌	共產黨內「民主集中制」之研究	尹 慶 耀
六十五年七月	顧 朗 麟	中共統戰策略與西安事變關係之研究	王 健 民
六十五年六月	林 昭 倫	中共延安時期幹部政策之研究 (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	曹 伯 一
六十五年七月	張 自 民	中共建黨初期聯合戰線之研究 (一九二一~ 一九二六)	葉 翔 之
六十六年二月	江 躍 龍	「共產主義」移植中國之研究	陳 澤 民

六十六年六月	葉飛鴻	「國共關係」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項迺光
六十七年六月	賴明仁	中共羣眾運動之研究	張鎮邦
六十七年六月	丁宜培	中共羣眾運動之理論型態與演變	陳澤民
六十八年六月	竇鴻君	中共人民戰爭之研究	蔣緯國
六十八年七月	張發金	中共延安時期黨員教育訓練之研究	項迺光
六十八年七月	馬建白	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	王建民
六十九年七月	陳伯祥	中共青年學生運動的理論與實際	宋時選
六十九年七月	陳建隆	周恩來的政治人格之研究	任卓宣
六十九年七月	單培祥	蔣中正先生與早期的中共（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王健民
七十年七月	鞠立仁	抗戰時期中共政策與知識分子（政治經濟社會政策之研究）	宋時選
七十年六月	吳玉霞	抗戰時期中共農民運動之研究	曾永賢
七十一年一月	鄭洪奎	中共軍隊之演變	項迺光 操釋青
七十一年六月	薛曉陽	中共職工運動之理論與實際（一九二〇～一九四九）	曾永賢
七十二年六月	金正旭	中共軍事思想之研究	項迺光 操釋青
七十二年六月	莊光彩	毛澤東「文藝思想」之分析	侯健
七十五年七月	宋教瑛	中共建黨前知識分子思想探源（一九一五～一九二一）——論陳獨秀、李大釗思想之轉變	項迺光
七十五年六月	葉賀松	朱德與中共軍隊關係之研究	項迺光 操釋青

專刊(57)：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

呂芳上著，七十八年四月出版，六一五頁 精450元 平400元

從中華革命黨的創立開始，孫中山就想建立一個組織完備，紀律嚴整的革命政黨。此一構想到一九二四年終告實現。中國國民黨的改組，除有其時代背景和外在條件，自發性的思想因素同樣不可忽視。本書以大宗原始資料為基礎，一方面探討中山先生思想發展的線索，一方面觀察五四思想激變的時代，革命黨人迎接新思潮，在評介社會主義、重估傳統，參與新文學運動、重視民眾力量、倡議軍隊的改造和黨務改組的進行上，所作出的相當值得重視的回應。作者的研究，同時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多元性，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說明。

* 函購七折，郵撥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87年1月~1989年3月)

(1987) 5月 由日本東方學會和國際亞非學會日本委員會主辦的「第32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在日本東京和京都舉行，共有三十一個國家的三百八十一名學者與會，宣讀論文五十餘篇，大會且以「近代東亞的國際關係」為題，舉行專題討論會。

6.22 中共「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在南京召開「中國抗日戰爭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內容有：中國戰場在二次大戰中的地位 and 作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 and 作用及其相互關係；有關中國抗戰與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太平洋戰爭中有關海戰的問題等。

7.18 由中共「吉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吉林省日本史學會」、「吉林省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等數個單位共同舉辦的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第六次學術討論會」，在吉林省延吉市舉行，會期四天（至7.21），計有中、日學者一百四十餘人與會，分就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中日關係史中的一些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7.26 中共「東北三省中國經濟史學會」，假吉林市的銀河大廈，舉辦第四屆「中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經濟史及殖民地經濟學術討論會」，會期五天（至7.30），計有中、日學者約百人與會，提交論文二十二篇。

9.15 中共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湖北大學、湖北省社聯在武漢共同主辦「中國走向近代的文化歷程」學術討論會，七十餘位國內外學者與會，會期四天（至9.18），議論焦點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區分；中國文化傳統向現代化轉化的複雜性。

9.20 「十九世紀中國教案——義和團學術討論會」在安徽省績溪縣召開，約有一百三十餘名學者與會，提交論文七十餘篇，與會學者就近代教案

的性質、近代教案與各種社會力量的關係、近代教案與義和團、對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的評價等四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9. 25 中共河南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學術討論會」，三十多名學者與會，提交論文十二篇。

10. 31 日本京都大學主辦的「中國科技史國際會議」，假京都國際會館召開，計有中、美、德、澳、日等國約百餘名學者應邀與會，宣讀論文十九篇，議題圍繞中國數理科學史與生命科學史兩大主題，與近代史研究相關者如下：①橋本敬造：「十七世紀中國的科學家與歐洲」；②吉田忠：「耶穌會士系的著作及翻譯在東亞」；③ P. U. Unschuld: 「多形範的科學對革命性的科學——關於歐洲與東亞認識能力比較研究的某些想法」；④何丙郁：「最近在中國的科學史研究的動向和展望」；⑤席澤宗：「十七、十八世紀傳入中國的西方天文學及其影響」；⑥村上陽一郎：「對制度史研究的一個提議」。

(1988)3. 10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邀請臺灣大學黃富三教授演講，講題是「霧峯林家與臺灣地方研究史的問題」。

3. 12 中共武漢市文物管理處、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及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聯合發起的「武漢國民政府史研究座談會」，在漢口舉行，歷時十二天（至 3. 23），參加座談會的三十多位學者專家，分就如下議題展開討論：①武漢國民政府的體制；②武漢國民政府前期的歷史功績和外交策略；③關於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④關於集中現金政策；⑤鮑羅廷的土地問題主張；⑥毛澤東與鄧演達有關農民問題的思想比較；⑦爭奪東南地區的鬭爭。

5. 26 中共中山大學主辦「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廣州舉行，會期三天（至 5. 28），國內外學者專家七十餘人與會，提交論文四十餘篇。

4~5 月 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舉辦數次漢學研討會，與中國近代史相關之議題有：①Stephanie Mitchell, "The Role of Foreign Attorneys in Business with Ching,"(4. 8) ②Angela Zito, "The Intersection of Ritual and Writ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6. 28 中共廈門大學、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及華南師範大學聯合主辦「全國首屆中西科學思想研討會」，在廈門大學舉行，歷時五天（至 7. 2），與會人士百餘人，中心議題是：關於科學思想的含

義；關於中西科學思想的比較；關於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

7.23 日本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討論會事務局在日本箱根強羅的靜雲莊召開「第四回中國近現代經濟史シンポジウム」，大會以農業與農村經濟問題的檢討為研討主題，美日等國學者共提交論文五篇，與近代史相關之論題如下：① Linda Grove：「中國近代化における農村工業——河北省高陽縣を中心に」；② 內山雅生：「華北農村經濟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③ 吉田滋一：「河北省豐潤縣米廠村における農業經營と農民層分解の動向」。會議歷時三天（至7.25）結束。

8.2 「臺灣史研究會」與中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合辦「臺灣研究學術交流會」，宣讀論文十四篇，相關論題如下：① 陳小沖：「日本南進下的臺灣——以福建官腦局案為中心的研究」；② 閻亞寧：「鹿港街屋的空間組織與立面形式（1661-1911）」；③ 李祖基：「清代巡撫御史制度研究」；④ 陳在正：「王忠孝與鄭成功——關於明遺臣與鄭成功關係的一個探討」；⑤ 鄧孔昭：「《臺灣通史》獨立紀辨誤」；⑥ 周翔鶴：「清代臺灣早期土地文書研究」；⑦ 林嘉書：「南靖縣向臺灣移民的譜牒文獻調查研究」。

8.3 中共吉林省的清史研究者與日本滿族史研究會共同召開「『清入關前史』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共宣讀論文十三篇，會議歷時二十天（至8.22）。

9.17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舉辦晚清經世思想演講會，由 Helen Dunstan 及 Benjamin A. Elman 兩位學者，分別以“Qing Statecraft and the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 the Sprouts of Economic Liberalism.”及“Wei Yuan and Statecraft Ideology in the Huangchao Jingshi Wenbian.”為題，發表學術演講。

10.1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女士，至中研院近史所做為期兩周的訪問研究。（另參見 10.12 條及 10.14 條）

10.1 美國奧利岡州立大學周錫瑞教授 (Joseph W. Esherick) 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並以「義和團事件的新探索——從社會史角度分析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結構」為題，發表學術演講。

10.3 美國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汪榮祖先生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為期四週。

10.6 中共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哲學及社會思想史學會第四次年會暨學術討論會，在遼寧省丹東市召開，與會學者專家七十餘人，提交論文三十篇，

中心議題是：北方少數民族哲學史邏輯起點；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與宗教的關係；發展商品經濟與保持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社會心理、民族意識與現實的結合。大會歷時五天（至 10. 10）結束。

10. 12 美國華盛頓大學裴宜理教授 (Prof. Elizabeth J. Perry) 應邀至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發表演講，講題是「介紹當代西方學界關於革命與羣眾運動的幾種理論」。

10. 14 中共「中國近代軍事史第二屆學術討論會」在上海舉行，主要討論中國軍制近代化，軍事思想變遷及戰略、戰術的發展等問題。會期歷時五天（至 10. 18）結束。

10. 14 美國華盛頓大學裴宜理教授 (Elizabeth J. Perry) 應邀至近史所演講，講題是「上海工人運動」。

10. 21 美國亞洲學會西區分會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舉行，會期二天（至 10. 22），會中宣讀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者有：① Jung-fang Tsai,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② Chen Lanyan, "Unionism in the Republican Era," ③ R. Kent Guy, "Manchu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o, Where and How Many?" ④ Edward Rhoads, "Manchus in Late Qing China: Who, Where and How Many?" ⑤ John E. Herman, "Triads, Taipings, and Guanxi Administration," ⑥ Chia-lin Pao Tao, "The Feminist Thought of Yu Cheng-hsieh (1775-1840)," ⑦ Shiao-ling Yu,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Recent Chinese Fiction."

10. 21 美國亞洲學會大西洋區分會 (Mid-Atlantic Reg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假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舉行第十七屆年會，會期三天（至 10. 23），宣讀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者如下：① Zoltan Farks, "Carsun Chang, The Making of a Twentieth Century Neo-Confucian," ② Roger Jeans,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Chun-mai,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losing of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Wartime China," ③ Thomas K. Curran,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hanging Role in Republican China," ④ Jacques M. Downs, "The Caleb Cushing Papers and other China Trade Material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⑤ Murray A. Rubinstein, "Oliphant's Island: China Trade Materials in Manhattan Library Collections-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nd the Union Theological Library,” ⑥ Nancy E. Davis, “Cargo Manifest Records from American China Trade Vessels Bound for the Port of Philadelphia, 1784-1844,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 (Washington, D. C.)” ⑦ Gilbert Cha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Liao Chung-K'ai's Perspectives of Mass Movements, 1924-1925,” ⑧ Odoric Wu, “The May 30th Labor Movement in Hunan,” ⑨ Ka Che Yip, “Taking Care of the Masses: the Guomindang and State Medicine, 1928-1937,” ⑩ John J. Fitzgerald, “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 the Nationalists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1927,” ⑪ John D. Young, “Confucianism in Transition: Late Ming-Early Qing China,” ⑫ Jane Kate Leonard, “Portrait of a Working Administrator: the Daoguang Emperor's Court Letters on Grand Canal-Grain Transport Management, 1824-27,” ⑬ Barry Keenan, “Academy Founda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Qing-yi Dissident in Post-Taiping China,” ⑭ Winston Hsieh, “Macao Under Chinese Hegemony, 1550-1800,” ⑮ Jane Kate Leonard, “Benevolent Rule and Qing Imperial Management of Grand Canal Grain Transport System.”

10.22 由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和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聯合籌辦的「中國邊疆史地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會期五天（至10.26）。

10.25 中共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在北京召開「第一屆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國際學術討論會」，會期歷時五日（至 10.29），計有來自中、美、加、日及香港、星加坡等百五十餘學者與會，提交論文十五篇。（詳情請見本期譚其謙先生撰文）

10.27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合辦演講會，邀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徐乃力先生演講「加拿大華人移民史上的幾個問題」。

10.28 香港大學中文系、廣東康梁研究會合辦「康有為、梁啟超與戊戌維新運動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至10.29），計宣讀論文十六篇。

10.29 美國亞洲學會新英格蘭區分會年會假美國 Middletown 的 Wesleyan University 舉行，會中宣讀之相關論文有：① Vincent P. Tong, “Weberian Bureaucracy and Bureau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 ②

Margaret Pears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Reform in China," ③ Thomas Bartlett, "Fundamental Beliefs in Ku Yen-wu's Statecraft Thought," ④ Pamela Crossley, "Manchu Exemplars and Late Ch'ien-lung Cultural Idealism," ⑤ Arthur Waldron, "Moral Aspects of Frontier Demarcation: Ming and Ch'ing," ⑥ Ann-ping Chin, "Tai Chen on Wisdom, Humaneness, and Courage," ⑦ David Ownby,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Feud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from the Late-Ming through the Mid-Qing."

3-10月 日本孫文研究會於春夏兩季舉辦數場學術研討會，講者、講題及日期分列如下：①羅晃潮：「中國の華僑研究」(3.12)；②安井三吉：「孫文『大亞細亞問題』(1924)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3.12)；③張憲文：「中華民國史研究の現状と發展の方向」(7.5)。

11.1 中共中國科技史學會、中國數學會、中國科技大學等單位聯合發起的「紀念梅文鼎國際學術討論會暨第三次全國數學史年會」，在安徽省合肥、宣州兩市舉行，會期五天(至11.5)，計有中、日學者約一百二十人與會，提交論文約有百篇，宣讀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者有：①吳文俊：「梅文鼎與中國古代數學的特色」；②道協義正：「從梅文鼎看中算與和算思路的不同」；③鄧宗琦：「梅文鼎與中國近代數學」；④莊石然：「梅文鼎與明清實學思潮」；⑤胡文炳：「梅文鼎與清代疇人」；⑥劉潔民：「關於梅文鼎《籌算》的新史料」。

11.7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邀請旅日學者劉進憲與涂昭彥先生演講，講題是「研究臺灣經濟之課題與方法——(1)國際經濟上的觀點(2)臺灣社會經濟結構的觀點」。

11.9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劉鳳翰先生應邀至香港新亞研究所講學，為期約一個月，已於十二月十七日期滿返所。

11.14 中共於武漢舉辦首次國共關係學術討論會，歷時五天(至11.18)，計有一百一十人與會。

11.20 臺灣史蹟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聯合舉辦「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共提出論文六篇，史料發掘報告三篇，相關論題有：①黃典權：從獅潭山區的拓墾看晚清臺灣內山墾務的演變；②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③湯錫勇：清代巡臺御史夏之芳的事蹟；④陳羽：蓮溪葉氏之渡臺與其祭祀

公業之研究；⑤陳炎正：大陸有關臺灣史料之研究；⑥曹永和：有關日本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灣貿易商之經濟關係；⑦張炎憲：苗栗鯉魚潭巴宰族的古文書。

11.21 香港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為紀念蔡元培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辦「蔡元培與近代中國教育」講座，邀請北京大學教授蕭超然先生主講「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1.30 漢學研究中心假國立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會期三天（至12.2），計有我國，以及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澳洲、日本、韓國等九十餘位學者與會，宣讀論文四十篇。

11.30 由香港大學歷史系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中國海關首次國際研討會」，在該校評議會會議室舉行，歷時三天（至12.2），中外學者數十人與會，宣讀論文二十六篇。（詳情請見本刊張存武先生文）

8~11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舉辦數次漢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及研討活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之論題如下：① George Yu, "The Early Years with Dr. Sun Yat-sen, 1915-1925," (8.20) ② Maria Chang, "Visionary or Stateman? Dr. Su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swering the Challenge of Imperialism," (8.20) ③ L. Van Slyke, "Building the First United Front, 1922-1927," (8.20) ④ Israel Epstein, "Building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1931-1945," (8.20) ⑤ Jack Chen, "Wuhan Victory and Defeat: Moscow Exile, 1927," (8.20) ⑥ John Service, "The Chunking Days, 1938-1945," (8.20) ⑦ Helen Dunstan, "A Storm in a Grainsack? Revisions in Popular Subsistence Policy in China in the 1740's," (9.22) ⑧ Joshua Fogel, "Japanese Literary Travellers in China, 1900-1937." (10.11)

10~11月 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中文系與中國研究中心舉辦中國史研討會，與近代史相關之議題，其講者，講題及日期如下：① Ye Xiaoqing, "Popular Culture and Western Influence in Late 19th Century Shanghai," (9.20) ② K. M. Tso, "Zhang Ju-zheng in the Eyes of Early Qing Historians." (10.11)

1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聘副研究員賴惠敏女士已於是日到職。賴女士係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其博士論文題目為「明清浙西士紳家族研究」。

12.4 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系舉辦「臺灣歷史研討會」，共宣讀論文八篇，與近代史相關論題有：①曹永和：簡介維也納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臺灣古地圖；②黃富三：從林文明案看清代臺灣的司法運作；③張炎憲：日本統治時期朝鮮與臺灣反對運動之比較研究；④陳志梧：清代噶瑪蘭城空間的重建；⑤吳密察：臺北帝國大學在日本殖民地教育體系中的意義——從殖民地教育學制的角度看臺北帝大的設立。

12.5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明德先生應邀出席由日本經濟調查協會主辦，為期四天（至12.8），在東京舉行之「東亞知識人會議」，並於會中宣讀論文，題目為「NICS 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背景」。

12.12 日本宮崎大學市川信愛教授發起的近代日本華僑研討會，在日本長崎舉行第一屆國際近代日本華僑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至12.13），宣讀論文十篇。（詳情請見本期張炎憲先生撰文）

12.15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傅大為先生應邀至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演講，講題是「五〇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傳統：殷海光實徵主義思想的辯證」。

12.15 由中原、東海、東吳三所大學及宇宙光傳播中心等位單合辦的「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假臺灣大學舉行，會期三天（至12.17），共宣讀論文二十四篇，相關論題有：① Joseph Sebes, "Matteo Ricci's Attempt at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② Robert Eetenmann,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in Eighteenth-Century Szechuan," ③ 趙享恩：Contextulization of Gospel in the 19th Century China: A Missionary Case Study；④ 呂實強：民初時期教會人士對中國基督教社會使命的看法；⑤ 趙天恩；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1919-1927；⑥ 王成勉：文社：二〇年代中國文字本色化的努力；⑦ Jessie G. Lutz, "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 Indigenization Within an Overall Context."

12.29 旅美史家余秉權教授遭遇車禍罹難，享年六十三歲，氏主持「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十餘年，搜集國史資料，成就斐然，所著〔中國史學論文引得〕甚為學術界推崇。

11~12月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 Workshop on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and Local Realities 舉辦演講會，講者、主題及日期如下：① Lloyd Eastma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1:3) ② Guy Alitto,

“Local Studies Research in the PRC: Experiences in Zhouping County, Shandong,” (11. 17) ③ Zhang Xin, “Local Elite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12. 1)

(1989) 1. 2 中央研究院何丙郁院士應該院科學史委員會暨史語所、近史所之邀，至該院進行訪問研究，為期三個月。（另參見 2. 18 條）

1. 5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假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歷時三天（至1. 7），應邀出席學者近二百人，宣讀論文二十八篇，議程分八個子題進行，分別是：1. Trad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2. Commercialization and Regional Market; 3. Commercial Institutions; 4. Land Market, Farm Wages and Grain Prices; 5. Commodity Markets; 6. Credit Market and Monetary System; 7.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8. Utilization of Capital.（詳情請參見本刊陳慈玉小姐文）

1. 12 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William Rowe 應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之邀，發表學術演講，講題是：“The Significance of Hankow Trade in Late Ch'ing Times.”

1. 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趙中孚先生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請，前往該所訪問一週。

1. 15 墨爾鉢澳洲國立大學教授金承藝先生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預計停留半年。

1. 19 美國亞洲學會東南區分會，假 Tuscaloosa 的 Sheraton Capstone Inn 舉行。本次會議由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主辦，歷時三天（至 1. 21）。會中發表之相關論文計有二篇：① Luther T. Denton, “China'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② Roger B. Jeans, “Third Party Traitors (han-chien) in Wartime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1. 20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等單位共同主辦之「第一屆海外華人國際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一樓會議室舉行，會期二天（至1. 21），計宣讀論文十三篇，相關論題有：①余慧子：柏克萊加州大學華美研究圖書館資料簡介；②孫子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典藏華僑史料簡介；③吳劍雄：九一八前後美國華人的愛國運動；④霍啟昌：香港華人在近代史上對中國的貢獻試釋。

10月(1988)~1月(198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集體研究小組，先後邀請數位學者發表專題演講：①10.15王業鍵教授(美國 Kent University)：「區域經濟研究之我見」；②10.26汪榮祖教授(美國 Virginia State University)：「晚清變法派的經濟思想」；③11.5徐乃力教授(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第三世界現代化困境的歷史因素」；④1.19江勇振先生：「民國時期的高等教育」；⑤1.25卓遵宏先生(國史館)：「近代中國貨幣演進趨勢，1860-1937」；⑥1.31侯繼明教授(美國 Colgate University)：「雙元論之再檢討」。

2.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邀請何丙郁院士發表專題演講，講題是：「再談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認識」。

3.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林毓生教授應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之邀請，進行為期二週的訪問(至3.27)。(另參見3.18條及3.22條)

3.17 美國亞洲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假華府希爾頓飯店舉行，會期三天(至3.19)，會中共分為121場議題進行，宣讀之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者近五十篇。(詳情請看本期頁21-24會議報導)

3.18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林毓生教授應臺灣大學歷史系之邀，假文學院會議室，以「作為啟蒙運動的『五四』之再認識」為題，發表學術演講。

3.2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林毓生教授在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會議室發表演講，講題是「從比較思想史的觀點看中國古代的祖先崇拜、宇宙論與政治秩序的觀念」。

3.25 科學史委員會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舉辦「第二屆科學史研討會」，議期歷時兩日(至3.26)，宣讀論文二十三篇，與近代史相關論題茲列如下：①烏尾永康：Science and Natural Theology in 教會新報(Church News)and 七一雜報(Weekly Messenger): A Comparative Study；②楊翠華：「中基會與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研究之一：成立與改組；③劉鈍：從徐光啟到李善蘭——以「幾何原本」之完璧透視明清時代的思想文化；④黃一農：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⑤洪萬生：從兩封信看一代疇人李善蘭。⑥林崇熙：臺灣「長科會」綱領形成的歷史背景研究。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一九八七年出版

王也平譯 九一八事變（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遺稿）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五月 一七七頁

王思治 清史論稿 成都 巴蜀書社 十二月 四一五頁

王德昭 從改革到革命 北京 中華書局 三月 二九五頁

中國人口學會編印 臺灣地區人口遷移、分佈、區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中國人口學會 六月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 天地會(六)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九月 五二九頁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 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十二月 四六五頁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 五卅運動在天津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 一二九運動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六月 四八九頁

中共安徽省委黨校理論研究所、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淮上起義軍專輯 合肥 安徽出版局 一月 二一一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 第一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七月 八一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左宗棠全集〕整理組編 左宗棠未刊奏摺 長沙 岳麓書社 十二月 八一三頁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委員會編 五二〇運動資料 第二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七九一頁

-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校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軍部摘譯〕 上、中、下冊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四、五月
-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校 緬甸作戰（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 上、下冊 北京 中華書局 二、四月
-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上、下冊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九月 一二二九頁
- 孔永松 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演變史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〇〇頁
- 北京市檔案館編 日僞在北京地區的五次強化治安運動 上、下冊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九月
- 江西省檔案館選編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三月
- 李宗一等著 中華民國史 第二編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 第一卷(1912-1916) 北京 中華書局 九月
- 李宇平 近代中國的貨幣改革思潮(1902-1914) 臺北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十二月 二五三頁
- 李世平 四川人口史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十月 二二一頁
- 汪向榮 中國近代化與日本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月 一七四頁
- 汪敬虞 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九月 四〇三頁
- 步平 郭蘊深等著 東北國際約章匯釋 1689-1919年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十月 六四四頁
- 吳忠禮編 寧夏近代歷史紀年 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年 (寧夏史料叢刊)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十一月 四一三頁
- 吳雲鵬、康昭建主編 中國革命史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八月 四一六頁
- 杜受祜等主編 近現代四川場鎮經濟志 第二集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七月 四二九頁
- 余伯流、夏道漢編著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三八六頁
- 沈家五編 張賽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 周子東等編著 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 北京 知識出版社 十一月
一五八頁
- 周尚義、賀世友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
三四一頁
- 周春元等主編 貴州近代史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九月 四四二頁
- 周勇等譯編 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展(1876-1949)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
社 十二月 五一二頁
- 姜立夫 民國軍事史論稿 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七月 三四〇頁
- 范士華編著 戊戌維新——近代中國的一次改革 北京 求實出版社 十一
月 二四五頁
- 〔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 南京 江蘇古
籍出版社 十一月 二四六頁
- 南昌八一紀念館編 南昌起義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六月 五九〇
頁
- 施職朱、許良國主編 臺灣民族、歷史與文化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
- 高平叔編 蔡元培史學論著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十月 三四一頁
- 高秀芳等編 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傳記索引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七月
六五一七頁
- 陳伯鈞日記(1933-1937)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九月 七九七頁
- 陳旭麓主編 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想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八
二〇頁
- 張力、劉鑒唐 中國教案史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四月
- 張俠等編 北洋陸軍史料(1912-1916)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十月 六
一一頁
- 張篷舟主編 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1932-1982) 第三卷 一九三八~一九
三九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五月 四〇八頁
- 楊中州 西安事變 開封 河南人民出版社
- 楊志本主編 中華民國海軍史料 北平 海洋出版社 五月
- 彭明主編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第一冊(1919-1923) 北京 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六月 五七六頁
- 彭明等主編 中華民國史第二編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 第二卷 一九一六~
一九二〇 北京 中華書局 九月

黃美眞、郝盛潮主編 中華民國史事件人物錄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九月 八三二頁

解學詩主編 滿鐵史資料 第四卷 煤鐵篇 北京 中華書局 八月

來新夏主編 天津近代史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三月 三五八頁

蔣學德等編 貴州近代經濟史資料選輯 上册(第一、二卷)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二月

劉楓、曹均偉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研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 十月 二二二頁

遼寧省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電稿 奉系軍閥密電 第三卷 北京 中華書局 四月

蔡少卿 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 北京 中華書局 十月 四五九頁

近藤光男 清朝考證學の研究 東京 研文出版 七月 五〇〇頁

後藤孝夫 辛亥革命から滿洲事變へ——大阪朝日新聞と近代中國 東京みず書房 四七六頁

Darby, Philip. *Three Faces of Imperi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 1870-197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67 pp.

Edwards, E. W. *British Diplomacy and Finance in China, 189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00 pp.

Garvett, Valery M.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840-19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7 pp.

Hess, Gary R.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 194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48 pp.

Morrison, Hedda. *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6 pp.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 Hong Ko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0 pp.

Parkes, Graham,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istaino, Marcia R. *China's Art of Revolu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Discontent, 1927 and 192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74 pp.

Sangren, P. Steven.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80 pp.

Stein, M. Aurel.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I-II. 1912; rp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546pp, 517 pp.

Sucheng Chan.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03 pp.

Yong, C. F., and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八八年出版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上海方志資料考錄 上海 上海書店 五二八頁

王光遠編 陳獨秀年譜 重慶 重慶出版社 三八四頁

王綱領 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七月 二三七頁

王壽南編 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二六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九月 八六七頁

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徵集研究室編 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 抗日戰爭時期(一)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二五四頁

中法戰爭鎮海之役史料編委會編 中法戰爭鎮海之役史料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七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護國運動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六月 五二八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選譯、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編輯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編譯 清入關前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貴州省檔案館合編 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 天津檔案館中國集郵出版社編 清末天津海關郵政檔案選編 天津 中國集郵出版社
- 孔祥吉 戊戌維新運動新探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史式等編 羅爾綱與太平天國史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 吳文星、鄭瑞明、黃文新編譯 臺灣慣習記事 臺中 臺灣省文獻會 十二月
- 李光一、郭清樹、王文泉、張振忠合編 中國現代史 開封 河南人民出版社
- 李宗一、章伯鋒主編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資料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李家振 濟南慘案 濟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八月
- 李新、李宗一主編 中華民國史 第二編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 第一卷 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北京 中華書局 九八二頁
- 吳天任編著 民國梁任公先生年譜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七月 一九〇七頁
- 杜春和編 榮祿存札(義和團資料叢編) 濟南 齊魯書社
- 佟佟、叢配遠編著 中國東北史(第一卷)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阮忠仁 清末民初農工商機構的設立——政府與經濟現代化關係之探討(1903-1916) 臺北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十二月 五〇三頁
- 林勝俊 臺灣寺廟的職能與功能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六月 一七五頁
- 柯上達 捻亂及清代之治捻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五月 四二六頁
- 胡平生 民國時期的寧夏省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五月 五八二頁
- 侯坤宏編 糧政史料 第一、二冊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五六二、五六四頁
- 高熙倫 中國農民運動紀事(1921-1927) 北京 求實出版社 二月 二六六頁
- 唐培吉、王關興、鄒榮庚合著 兩次國共合作史稿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莊英章主編 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資料叢刊之一) 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六月 二五七頁
- 游鑑明 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 臺北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三五三頁
- 國史館編印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一輯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六六二頁

國史館民國史傳記組主編 國史擬傳 第一輯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國際孔學會秘書處 國際孔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 該會秘書處出版 六月

一八二八頁

陳然、謝奇籌、邱明達主編 中國鹽業史論叢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 八月

盛邦和 黃遵憲史學研究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二二八頁

張玉法 中國現代政治史論 臺北 東華書局 三〇九頁

張同新編著 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四月 五七五頁

張海鵬編著 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 北京 中國地圖出版社

程玉鳳、程玉鳳合編 資源委員會技術人員赴美實習史料 民國三十一年會派 上、中、下冊 臺北 國史館 二二二八頁

連溫卿 臺灣政治運動史 臺北 稻鄉出版社 十月 三五九頁

復旦大學歷史系合編 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楊國楨 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二月 三九五頁

楊碧川 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史 臺北 稻鄉出版社 十一月 三一五頁

趙中孚、張存武、胡春惠主編 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六、七、八冊

臺北 國史館 五、六、十一月 一〇三六、七九〇、八五四頁

臺灣史研究會主編 臺灣史研究論文集 臺北 臺灣史研究會 六月

臺灣省文獻會編 臺灣省文獻會慶祝四十周年論文專集 臺中 臺灣省文獻會

聞少華 汪精衛傳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四六頁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古代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廣東省佛山寺博物館編 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五一八頁

劉惠吾主編 上海近代史 下冊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五七六頁

燕大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 燕大文史資料 第一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四月 一九三頁

閻伯川紀念會編 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共六冊）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九月 二六八二頁

- 蔡德全 汪精衛評傳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蕭克非、仲沖、徐則浩主編 劉銘傳在臺灣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 四月
- 顧祝同將軍紀念集編輯小組編 顧祝同將軍紀念集 臺北 國防部史政局
- 蕭超然、周承恩等編著 北京大學校史 一八九八～一九四九 增訂本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五〇六頁
- 井上清、衛藤審吉編 日中戦争と日中關係 蘆溝橋事件五十周年日中學術討論會紀錄 東京 原書房 三九六頁
-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 太平洋戦争の道 開戦外交史4 日中戦争下 東京 朝日新聞社 四三六頁
- 平野正 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 東京 研文出版 三〇四頁
- 任鴻章 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アジアなかの日本歴史 第四卷) 東京 六興出版
- 呂万和 明治維新と中國(東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歴史 第六卷) 東京 六興出版 八月
- 佐藤慎一 知の帝國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國像 東京 平凡社
- 波多野澄雄 「大東亞戦争」の時代——日中戦争から日米英戦争へ 東京 朝日新聞社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センター編 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 日本現存短期零本中國雜誌記事總目(五) 東京 編者刊 一五四頁
- 科大衛監修、黃永豪主編 許舒博士所藏廣東宗族契據彙錄(下) 東京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 二九二頁
- 星斌夫、鈴木正孝、中道邦彦編 中國社會經濟史語彙(三) 光文堂
- 宮本延人 日本統治時代臺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 日本天理教道友會 四月 二八〇頁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中國正史朝野傳 譯註一 서울 編者刊
- Char Wai Jane, and Char Tin Yuke, ed. *Chinese Historic Sites and Pioneer Families of Rural Oah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04pp.
- Ching, Frank. *Ancestors: 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 London: Harrap, 528 pp.
- de Bary, W. Theodore. *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56 pp.

- Daniels, Roger.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2 pp.
-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36 pp.
- Eastman, Lloyd E.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1550-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2 pp.
- Egan, Susan Ch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62 pp.
- Fogel, Joshua A. *Nakae Ushikichi in China: The Mourning of Spiri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50 pp.
- Guy, Kent R.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st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89 pp.
- Hoyt, Edwin P.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From the Last Emperor to Deng Xiaoping*. New York: McGraw Hill, 206 pp.
- Jiang, Arnold Xiangz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dany, Lazl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21-1985*.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588 pp.
- Min Tu-Ki. edited by Kuhn, Philip A. and Brook, Timothy.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Eva. *China Journal: An American Missionary Family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MacMillan.
- Smil, Vaclav. *Energy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dvances and Limitations*. Armonk, N. Y.: M. E. Sharpe.
- Stockard, Janice.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186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 pp.
- Vermeer, Edvard B.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 Central Shaanxi Since 19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5 pp.
- Watson, James L., and Rawski, Evelyn S. ed.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68 pp.
- Woodside, Alexander Barton.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0 pp.

一九八九年出版

- 國史館編印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輯 臺北 國史館
三月 五八四頁
- 郭恒鈺原著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一月 四四一頁
- 劉維開 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三月 二六一頁
- 簡筌簧、侯坤宏編 戴傳賢與現代中國 臺北 國史館 一月 四六七頁
- 滿洲中央銀行史研究會編 滿洲中央銀行史 東京 東洋經濟新報社
- 藤原彰、今井清一編 十五年戰爭史(全四卷) 1.滿洲事變 2.日中戰爭
3.太平洋戰爭 4.占領と講和 東京 青木書店 二月
- Gillin, Donald G., and Myers, Ramon H., 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350 pp.
- Ono, Kazuko and Fogel, Joshua A. ed.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80 pp.
- Wilbur, C. Martin and How, Julie Lien-ying.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2-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國內外出版機構或個人如願提供近代史新著予本通訊，編委會將就此新著商請有關學者撰文評論，以廣推介。

坂野正高教授治學嚴謹，在
中國政治外交史研究方面成就
斐然。



石川忠雄教授致力於中國共產黨史
研究，國際知名。

本期要目

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

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第一屆國際近代日本華僑學術研究會

台灣大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國際學術討論會

亞洲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

再談「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認識」

一九二七年的中德關係

學人簡介—Knight Biggerstaff、傅衣凌

石川忠雄、坂野正高

從中國海關研究首次國際研討會看大陸的海關研究

香港學界消息

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概述

柏克萊加州大學所藏保皇會、中國民主社會黨、

中國民主憲政黨史料介紹

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特藏之台灣資料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簡介

新書十二冊評介

國內歷史、東亞、大陸問題研究所有關

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